

THE "LAST" NAZI
—THE LIFE AND TIMES OF DR. JOSEPH MENGELE
by
Gerald Astor
Donald I. Fine, Inc., New York, U.S.A., 1985

“最后一个”纳粹分子
——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一生及其时代

(美) 杰拉尔德·阿斯特 著

张小雷 译 丁钟华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193千字 插图1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200册

ISBN7-80053-105-8/K·008

书号: 11484·008 定价: 1.50元



运送毒气受害者的尸体到焚尸炉去的手推车。（见本书第61页）



在奥斯威辛铁路侧线上，在一个类似门格尔式的集中营医生的监督下，党卫队士兵把新到的犯人们分成男人和女人两个队伍。一般地来说，这些人中有百分之十到三十的人被归入适于干活的奴隶劳工的行列；剩下的人则立刻排队走向或被卡车运往毒气室。（见本书第52页）



这张照片是1956年
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的。门格尔把这张照片
贴在了由德国大使帮助
而获得的护照上。

(见本书第200页)

从恩布的坟中挖出
的头盖骨被X射线拍成
照片，然后与门格尔的
照片对在一起，从而证
实，那具残骸就是门格
尔的尸体。

(见本书第260页)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幽 灵 | (1) |
| 第二章 | 青年纳粹党人 | (11) |
| 第三章 | 奥斯威辛——世界的粪门 | (30) |
| 第四章 | 挑选人——决定犯人的生与死 | (51) |
| 第五章 | 治病者 | (71) |
| 第六章 | 科学家 | (88) |
| 第七章 | 军医旗和卐字旗 | (101) |
| 第八章 | “好人”和“恶魔”——双重性格 | (122) |
| 第九章 | 出 逃 | (137) |
| 第十章 | 阿根廷的赫尔穆特·格雷戈尔 | (163) |
| 第十一章 | 传闻失实、制造假情报和几位名人 | (180) |
| 第十二章 | 南美洲的纳粹主义气氛 | (203) |
| 第十三章 | 佩德罗先生和巴西的阴谋集团 | (211) |
| 第十四章 | 最后的岁月 | (229) |
| 第十五章 | 暴 露 | (242) |
| 第十六章 | “最后一个”纳粹分子 | (268) |

第一章 幽 灵

二百零八块人体各部位的骸骨，八颗牙齿，一些尸衣的碎片，当然还有一小撮碎骨——1985年6月间人们证实，这些东西显然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残骸。这个门格尔就是被人称为“死亡天使”、“灭绝营的安琪儿”、“死神医生”、“屠夫”的那个家伙。据调查，此人是六年多以前在巴西的伯蒂奥加海滩溺毙的。这些残骸是从巴西恩布的一座坟墓中掘出来的。从而，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轰动一时的悬赏缉拿案，就此告终结。

“屠夫”的那个家伙。据调查，此人是六年多以前在巴西的伯蒂奥加海滩溺毙的。这些残骸是从巴西恩布的一座坟墓中掘出来的。从而，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轰动一时的悬赏缉拿案，就此告终结。

约瑟夫·门格尔的名字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恐怖的代名词。在这场大屠杀中，纳粹的杀人工具杀戳了六百万犹太人，消灭了成千上万不计其数的其他民族的人民。从事追捕战争罪犯的西蒙·维森塔尔在约瑟夫·门格尔的死讯传来之前，就曾宣布说：“他是从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死亡工厂中逃出的最后一个活着的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凶手。”就在他的尸体被人们从坟墓中挖掘出来的时候，悬赏缉拿约瑟夫·门格尔的赏格高达三百四十万美元。

约瑟夫·门格尔心狠手辣，十分歹毒。他所犯下的罪行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都是其他纳粹刽子手们望尘莫及的。“这个漂亮的魔鬼站在我们的面前，决定着人们的生死……他站在那里就象一个风度翩翩、萧洒可爱的舞蹈大师，在指挥着一场波洛涅兹舞。他的手或左或右、或右或左，漫

不经心地随便指点着。他的姿态轻松而优美，与周围丑恶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姿态似乎使我们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对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已感到无所谓了……他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或者鬼迷心窍？还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械人？不，他是一个杀人的行家，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恶魔……”

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名囚犯格雷特·萨鲁斯夫人所描绘的。萨鲁斯的丈夫和一家人都死于奥斯威辛。她所描述的“杀人行家”、“以杀人为乐的恶魔”就是指的约瑟夫·门格尔。门格尔是一名医生。他曾经把一名婴儿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几天后，他把婴儿送回来了，但是，孩子的一只眼睛已然变成了一个鲜血斑斑的可怕的大肉球。而这位医生竟然说：“差别就在于你能不能把蓝眼睛变黑。”

有一名犯人公然违抗他，声称自己不怕死。门格尔随即对一名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说：“这名犯人既然想死，那就把他枪毙算了。”于是，那个党卫队员就拔出手枪，将这名犯人杀害了。

约瑟夫·门格尔作为集中营的一名医生，他要会见新押送到集中营来的犯人。他总是一面悠然自得地打着飞指，轻轻地弹着他的手杖，笑容满面，说话和气；一面却宣布把一些人直接送往毒气室立即处死。被他这样杀害的人就有二十万到四十万之多。

对门格尔的起诉书中列举的具体罪行有枪杀和棍打犯人，而经他亲手注射化学试剂致死的就有十二人。一些在他手下幸免一死的人，也都落得肢残体缺，永远留下了在医药试验的幌子下受尽折磨的痕迹。

门格尔其人颇有才智，幽默中亦见刻薄。他竟恬不知耻地说：“他们来到这里时还是个犹太人，但走时却化为一股

青烟从烟囱里去了。”门格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名前同事坚持说：“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家伙。”“他的眼界非常开阔，为人非常风趣。”一名囚犯甚至把他誉为“美男子”；另一名犯人则夸他“很会体贴人”。一些吉普赛犯人还主动上前向他致意，叫他“父亲”、“老爹”、“大叔”。这位“衣冠楚楚”的约瑟夫·门格尔经常身着纯蓝色的衬衫，制服笔挺，浑身散发着香皂的芬芳气味，站在那里审视着一行行肮脏憔悴、饥寒不堪、剃了光头的犯人，一一决定他们的生死。甚至当他谴责一些女犯人堕落无耻时，有一个年轻的妇女还说：“要是我能和漂亮的约瑟夫睡一觉该有多好！”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位犯人医生奥尔加·伦格耶尔在回忆与门格尔及其助手伊尔玛·格雷塞巡视的情景时说：“我感到很惊讶，他们居然这么漂亮，而且很有魅力。”格雷塞是一名党卫队的女看守。由于她对犯人极其残忍，罪行累累，英国人于1945年把她绞死了。

但是，约瑟夫·门格尔平时与犯人打交道，并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虐待狂。他不是那类靠自我奋斗从贫困中挣扎起来的下层社会的子弟。门格尔出身于一个富有而家教严厉的名门望族，又是家中备受宠爱的长子。他曾获得哲学博士的学位以及医生的开业执照。他爱好音乐，常常前来倾听格雷特·萨鲁斯对一些华丽乐章绘声绘色的描述。他读书很多，崇拜意大利诗人但丁。他在学术方面好奇猎异，因此他在同事中间是一位娓娓动听的健谈者，而且喜好搞一些医学方面的研究。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犯人们害怕他的那些研究，就象害怕他手中掌握的生杀大权一样。

犯人医生吉泽拉·佩尔说：“门格尔进行医学试验的诊所，就是那些被迫接受医药试验的人们的拷打所。”

纽约市立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医生说，门格尔的工作“显然是效法当时的物理人类学的一般做法”。

另一名犯人医生埃拉·林根斯对门格尔的研究工作嗤之以鼻地说：“他这个人就是信奉权力至上主义，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玩世不恭的家伙。”

奥尔加·伦格耶尔医生嘲笑门格尔说：“他搞的那套试验简直就象玩票。”

曾经与门格尔一起工作过的匈牙利犯人米克洛什·尼斯利医生，是一位病理学家。他说：“屋外林立着的焚尸炉烟囱里冒出的臭气熏天，而门格尔居然能够一门心思地俯身于显微镜下，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不管门格尔的工作性质如何，被监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人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吉泽拉·佩尔说：“我们大伙儿的性命全都攥在他的手心里，他的那双手权力极大，可以马上判我们的死刑，或者让我们多过几天这样的悲惨生活。”四十年后，佩尔说，她还时常白天、黑夜地做恶梦，担心门格尔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回来决定她的命运。

一位无名的犯人留下了一首诗：

我从黑夜的深渊中涌现出来，
就象一个万能的恶魔。
我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
能够带来无穷无尽的死亡。

门格尔的表现反复无常，令人费解。玛格达·巴丝是一

个十七岁的罗马尼亚姑娘。她在1944年6月6日，即盟军在诺曼底滩头登陆的那一天，来到了奥斯威辛，她跌跌撞撞地下了火车。盟军登陆这一事件的全部意义，简直象是说，盟军连月球都能登上去。当时奥斯威辛火车站里一片混乱，手提扩音器里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喉音很重的命令声，巴丝和她的母亲试图听明白究竟说些什么，这时“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我看得出，他是一位军官。他温和地问道：‘你们是姐妹俩？’

“‘不是的，’我的母亲回答说。‘我是她的母亲’。”这一短暂的相遇，使玛格达·巴丝和她的母亲幸免列入走向毒气室的死亡行列。后来巴丝受尽了门格尔试验的痛苦折磨，随后这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看见门格尔哈哈大笑。一群群的犯人被迫一行一行地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这种姿势难以坚持长久。卫兵们牵着德国大狼狗站在一旁。这些狗是受过训练的，只要听见拍手声和弹指声，或者听到喊‘犹太人！’就会冲到犯人中间去咬人。它们会从男女犯人身上一块一块的肉，撕得粉碎。门格尔却在一边哈哈大笑。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至今都不明白门格尔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

门格尔于1945年1月从奥斯威辛失踪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推动搜捕门格尔的工作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问题只是许许多多问题中的一个。对于一场大灾难的中心人物，总会有许多传说的。而当其他一些事件、狡猾的手段、时间以及所谓回忆的花招等，阴谋要把真相隐瞒起来时，传说就更多了。因此，关于集中营以及集中营的主管人物也是传说纷纭的。集中营中那些应当受到惩罚的管理人员，通过大规模屠杀和销毁档案的手段迫使绝大多数见证人无法作证。因而，门格尔的生平及其时代，简直成了一个事实与虚构的大

杂烩了，而且经过添枝加叶，其中又掺杂着回忆上的错误，头条新闻编造者的谎言，有关方面的蓄意歪曲，捕风捉影者提供的根本无法查证的说法，以及一些为国家大事出谋划策的人物所增增减减的不可告人的成份。

直到目前为止，关于门格尔的实际相貌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维森塔尔引用一项证词说：“门格尔是个小个子，皮肤黝黑，一头黑发。他的左眼有点斜视，上排门牙中间有一个三角形裂缝。”一名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女犯人，在四十年后却坚持说：“门格尔的个头高高的，皮肤白皙，头发淡黄，一双蓝眼睛。”有着这种错误印象的并不只是她一个人。一些记录和照片表明，门格尔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一百四十磅，棕色的眼睛略呈淡绿色，头发深褐色，上门牙中间有一处明显的隙缝。

关于门格尔，现在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所构成的形象，不只是一个人的形象，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形象。例如，门格尔在奥斯威辛的所作所为，除了谋杀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任何意图？他是否真的象所说的那样可怕？或者是否可以想象，他的那些无法无天的罪行是被人夸大了吗？他是一个人独行其事的吗？是否有什么人反对过他的行为？即便是在奥斯威辛灭绝营这样一个绝望的境地，是否有过某些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

在大屠杀的余烬尚未熄灭的时候，门格尔便溜之大吉了。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他的一个犹太情妇，偷偷地带他越过了苏联红军的战线，然后把他隐藏在欧洲的某些大城市里，一直到后来他得以逃出去，逃到离他犯罪的现场一万一千英里以外的地方。这种说法何以能够流传？它是否具有一些真实性？是否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效忠当地

的权贵，密约相率保持缄默，从而使他得以逍遥法外？或者说，他已被节节胜利的同盟国军队所抓获，只是由于当时人们的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而让他逃跑掉了？

这个从表面上来看曾经是一个通情达理而又十分有教养，从其以往的经历来看又可算一名专家的人，究竟受什么所驱使？如果一名精神病医生能够把他带到忏悔室去，那么他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他的临床诊断又是什么呢？他在性方面的表现如何？他结过两次婚，但是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工作时，就没有过什么好色淫荡的行为么？他的性欲对他的晚年生活有什么影响？

门格尔显然嗜好杀人。他的这种嗜好究竟怎么样了呢？在他浪迹天涯期间，这种嗜好是否就象腐烂的沼泽地里的恶臭一样紧紧地附在他的身上？他在离开欧洲以后，是否确实为别人私下堕胎？是否干过持枪格斗和杀人的勾当？他在伯蒂奥加海滩溺毙以前，就传说他已死亡，先后至少有五次之多。

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能够逃脱得了来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报复呢？又怎么能够躲过那些高度专业化、而且狡猾无比的秘密谍报机构的耳目呢？堂堂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为人称道的以色列谍报机关难道都如此无能？

是谁帮助门格尔隐藏起来的？谁在保护他？他是否是在一个技能高超的纳粹秘密组织的庇护下而逍遥法外？这里不妨举出三个组织，如令人畏惧的“敖德萨”、“蜘蛛”或“同志会”。是否有一个专门散布错误消息的情报网，故意地搅乱专职的和非专职的搜捕纳粹分子的侦查人员的视听？

现在，我们对于他的信念方面的问题有什么了解呢？不妨借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一句话的意思来说：“没有什

么东西比失败更能教育一个人了。”但是，失败究竟是使他的坚定信念受到动摇了呢，还是更加顽固起来？门格尔会因为自己的罪行而感到内疚吗？或者说，当他面对着虎口余生的怒不可遏的控诉者们的时候，还能够镇静自若吗？他在巴西的避难所中，对于世界、世界各国的领袖、各国的政府以及各国人民持何种态度？

在那伙为他提供庇护所的人们中间，他这么一个只要轻轻弹一下手指就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人，怎样学会了与他人亲密相处的？那些为他提供避难场所，与他结伴为伙的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是谁？

当门格尔的残骸在恩布被发现的消息刚刚传来时，曾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怀疑。但是，由十七名法医学、人类学、放射学、齿科学和笔迹分析等专家组成的国际调查组提出的报告说：“从科学判断的合理范围看，我们认为，这是约瑟夫·门格尔的遗骸。”后来，美国纽约亨廷顿研究所的法医学科学家洛厄尔·莱文医生补充说：“完全有可能，另外有一个人也具有这一切特征，而且毫无二致。”

以色列负责缉捕纳粹战争罪犯的警官麦那克姆·鲁塞克最初说，这是一个骗局。可是，他千里迢迢到正在检验那具残骸的圣保罗去了一趟之后，便逐渐相信，这具尸体确是约瑟夫·门格尔的。但以色列政府对于这个结论仍持保留态度。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埃利·维泽尔在仅仅两个月以前，呼吁美国总统里根，不要前去拜谒葬有纳粹党卫队队员的西德比特堡公墓时，曾特别提到门格尔。在以色列做出定论以前，埃利·维泽尔也不同意门格尔死亡的说法。西蒙·维森塔尔和另外两个侦缉纳粹分子的著名人士——塞尔日·克拉斯费尔德和比特·克拉斯费尔德夫妇，则赞同这些科学

家们的鉴定。

这些人所以持怀疑态度，是有其道理的。门格尔毕竟已经“死”过五次了。有许多次，人们的确发现门格尔藏匿在巴拉圭内地的某个遥远、偏僻而又戒备森严的庄园里。他怎么能够在圣保罗这种环境里，安安稳稳地住在一座小房子里呢？他的家人们为什么要把他的死亡隐瞒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里，他们还不断受到报界的滋扰；这个家族的生意，由于与门格尔这个人有幸连是否受到损害呢？

这个长期以来广为传播的惊险故事，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突然收场了，使得报纸、广播和电视记者们都感到上当了。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身受其害的人认为受了骗，他们一生遭受的痛苦清算无日了。他们渴望亲眼看到门格尔受到审判，这不仅仅是要他面对控诉他的人们，看看他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也是要把大屠杀铭记在心，从而可以驳斥那些可恶的、声称大屠杀绝无此事的修正论者。

人们普遍认为，约瑟夫·门格尔是最后的一个纳粹分子。《洛杉矶时报》记者威廉·蒙塔尔班诺在他从圣保罗发回的一篇报道中说，或许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79年最终在伯蒂奥加海滩结束的。西蒙·维森塔尔曾经这样说过，他希望抓获门格尔从而使他追捕纳粹战争罪犯的工作得以圆满完成。鉴于门格尔死亡的证据累累，塞尔日·克拉斯费尔德说道：“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一切几乎都完了。”这番话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要让大屠杀在人们头脑中记忆犹新，要使对纳粹残余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报纸、广播和电视的记者们可以把大屠杀及其后果抛置脑后，不再去想它；尽管政治家们为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以贯彻，认为纳粹主义好象在1979年即已灭亡；或者象里

根总统在拜谒比特堡公墓时所说的，参与纳粹恐怖活动的那些人至少可以说，几乎已全部死亡；但是，门格尔居然能够逃脱正义的惩罚达三十四年之久，其神通之广大不能不令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纳粹主义是否已经灭亡。这不只是原来的纳粹党卫队东山再起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小撮人企图恢复纳粹党活动的问题。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现在是否已基本上予以肃清，或者说，它仍然存在着，就象受到压抑的潜在的火种，在环境条件适宜时，就要喷发出来。人们是否能够从门格尔的一生中，从他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来变为一名逃犯的事实中，看出一点苗头，这种苗头毋庸置疑地表明着，门格尔所独特代表的那个运动还在继续存在这个事实。

第二章 青年纳粹党人

京茨堡市位于斯图加特城和慕尼黑城之间，与两地距离大致相等。这一地区称为施瓦本，位于巴伐利亚的西南部。蜿蜒而下的京茨河在京茨堡汇入较大的多瑙河，向东奔腾而去，遂成为浩浩荡荡的多瑙河主流。

京茨堡的周围是地势平坦而肥沃的农田，种植着大片的油菜作物，它那象卷心菜般的叶子可以用来饲养牲畜。京茨堡市有一座古朴的大厦，犹如一座城堡。这里田园生活的宁静从来没有受过严重的干扰。在这片土地上看不到什么决战留下的痕迹，罗马教皇和各国君主也没有在这里达成什么政教协议，他们也没有用贡金在这里建造一座宏伟的教堂。从旅行指南图或书中往往找不到京茨堡。

京茨堡首屈一指的家族无疑是门格尔家族。这个家族在施瓦本根深蒂固。约瑟夫·门格尔十七世纪的祖先是来自离京茨堡不远的赫希施泰特和吕青根的乡村。门格尔的祖父阿洛伊斯是当地人，他娶了特蕾西娅·迈尔为妻，在赫希施泰特烧砖为业，生意颇为兴隆，家财足以供养1884年出生的儿子卡尔攻取大学的学位。（约瑟夫·门格尔说他的父亲卡尔·门格尔出生于1884年，而其他的人则说是在1881年。）

1907年，卡尔·门格尔着手接管京茨堡的一家小型机械工厂，这家工厂始建于1872年，雇佣了七名工人，为当地农民生产脱粒机。作为所有者，卡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工棚上写

上“门格尔”这个姓名。1908年，这位年轻的制造商娶了一位新娘。名叫瓦尔布加·胡普福勒，比他小四岁。

卡尔·门格尔雄心勃勃，具有发明创造的才能。他很少把时间耗费在车间里，而是把自己关在楼上发奋工作，设计一些能够加工饲料、粉碎甜菜、切草和施肥用的新农具。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购买了一部麦塞迪斯牌汽车。这辆汽车成了他的公司的第一辆推销车。

在购置一辆新汽车的同时，也就是在1911年，卡尔·门格尔的头胎子约瑟夫出世了。给这个孩子取名约瑟夫，是为了纪念他的外祖父。他的两个弟弟小卡尔和阿洛伊斯相继于1912年和1914年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门格尔在西线当了两年步兵。他不在家期间，瓦尔布加·门格尔便独自一人一面抚育三个孩子，一面管理家业。有一份报告说，卡尔·门格尔在罗马尼亚担任过德皇的财政部长，一直到战争结束。1918年停战以后，他重返家园，把他的公司经营成为京茨堡最大的一家企业。

当年的京茨堡就象今天一样，是按阶层区分开来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官吏以及象门格尔家族一样的企业家住在上城。蓝领工人和收入微薄的工人则住在下城。但是，门格尔一家人总是离群索居，和谁都不相往来。在一座巴罗克式的房子里，门格尔家族一直居住到1952年。

约瑟夫在孩提时代身体孱弱，常常因患伤风感冒或其他小儿疾病卧床不起。疾病使他很少能够与其他孩子们一块儿玩耍。他在体育活动方面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特长，也对此从不感兴趣。后来，他在填写党卫队队员履历表时，举出自己喜爱的运动项目是“爬山和驾驶汽车”。他曾经说，体育

运动“是多余的”。门格尔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又是城里最富有的孩子，而且他的父亲雇用了他的许多伙伴，使他无法与其他的孩子们结为小伙伴，从而影响了他与人们相处的能力。

门格尔被禁闭于家中时，他的母亲瓦莉(爱称)对他精心照料，关怀备至。门格尔后来在吐露心曲时这样说过，他“非常喜欢他的母亲。”“爱”这个字眼在他看来是种软弱的标志，因此难以启齿。瓦莉·门格尔不是一个温柔软弱的女人。门格尔描述说，她“非常严厉，对待我们很严格，是位性格坚强的女人。”这位受敬重的母亲一生循规蹈矩，经常絮絮叨叨地向她的长子灌输一种严格服从统治的思想。

门格尔对他父亲的赞许却是勉强的。他说，他“钦佩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靠自己的双手创下了一份家业，靠自己的努力富裕起来。”但是，卡尔·门格尔实际上并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人。他经营生意就象是一个专制君主在施舍恩惠，又象一个拥有一千二百名成员的大家族的族长。工人们管自己叫作“尾巴”。只要卡尔·门格尔走进工厂，雇工们便彼此提醒：“老头子”来了。一名工头回忆说：“他一踏进前门，另一头就发出了警告声。”

尽管这个家庭按照京茨堡的水准来说是富有的，完全可以付得起私立学校的费用，可是几个孩子却在本地的公立学校念书。约瑟夫先在初等学校念书，后来进了专门培养有学术抱负人才的大学预科。童年时代的伴侣叫他“毕波”，这是给来自巴伐利亚的所有名字叫约瑟夫的人起的同样的绰号。这个绰号或许是指他那褐色地中海型的面容而言的。他在课堂上表现很好。他的一位同龄人尤利乌斯·迪斯巴赫回忆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学生。他总想出人头地，想

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另一位中学的同学回忆说，他有强烈的进取心，非常爱国。”

这个家庭信奉罗马天主教，这与巴伐利亚人的主要信仰是一致的。瓦莉·门格尔十分虔诚，但是这个家庭的男人们却不是这样。按照约瑟夫的说法，他家里的子孙两代男人们都不按时去教堂做礼拜。

这时，约瑟夫已经读完了大学预科的课程。从一个过着孤寂生活的人来看，门格尔学到了一些肤浅的社交礼仪，学会了跳一手娴熟优美的交谊舞了。再加上他那英俊的容貌，吸引了一群年轻的妇女。1930年，门格尔带着这些品质和大学预科的毕业证书，开着自己的白色小轿车，进入了慕尼黑大学。无论他在京茨堡的社交活动中有些什么禁忌，然而从他在慕尼黑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喜爱啤酒、烟草和漂亮的军服。

当时的慕尼黑是一个政治动乱的中心。1923年，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短命的慕尼黑暴动时，门格尔只有十二岁。这位未来的元首由于暴动失败而被判刑，锒铛入狱，但是他在牢房里受到优待，写成了《我的奋斗》一书。

希特勒出狱后，夺取政权的决心比以往更为强烈。魏玛共和国试图统治德国，但枉费心机。通货膨胀，经济动荡以及德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的条款日益不满，都加剧了政治上的混乱。在历史上，战败国仍然占据战胜国的几百平方英里领土，本国边界仍然未受侵犯的寥寥无几，而德国则是其中之一。支持激进力量的浪潮，把约瑟夫·门格尔这样的大学生都卷了进来。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称纳粹运动，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追随者。

希特勒经常在慕尼黑发表演说，大量的学生成为他的忠

实的听众。约瑟夫·门格尔对德国新的政治生活第一表示的具体支持，便是参加了一个叫作“自由军团”的组织。

根据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规定，德国的军队应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当魏玛共和国的统治日趋衰落时，形形色色的派别便纷纷组织自己的准军事组织，支持自己所主张的秩序。这些组织绝大多数是为右翼政治集团服务的，而且都打着合法的商业的幌子进行活动，如从事货车运输，修筑铁路，成立侦探机构和农业组织。

这伙强盗中包括1921年成立的纳粹党的冲锋队。冲锋队队员身穿褐衫，为希特勒充当打手。他们穿着冲锋队的制服，为纳粹的演讲人欢呼捧场，毒打向演说者提出质问的人们，扰乱破坏其他政党举行的集会。这些褐衫党徒们为纳粹运动提供了德国当时动乱中所需要的打手。这群人还肆无忌惮地吵架斗殴，大搞同性恋，给他们的颇具尊严的教父、教母们增添了麻烦。

二十年代中期，希特勒又创立了另一个准军事组织——党卫队。这个组织最初不过是希特勒的保镖，直到1929年，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慕尼黑地区的前养鸡农场主取得了该组织的领导权后，把原先只有二百人的队伍扩大成为一个后来终于支配德国、使多半个欧洲感到恐怖和深受其害、并且使约瑟夫·门格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组织。

“战士团”，也叫“钢盔团”是一个比党卫队和冲锋队建立更早的组织。它成立于1918年。“钢盔团”最初提出过平等主义的要求，它甚至还支持过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权。但是，这个靠战壕里的同志情谊起家，并因其军事背景对独裁极端服从的组织，最后终于对魏玛政府失去了信心。“我们从

心底里憎恨目前这个德意志国家的形式，因为它拒绝给予我们以解放我们受奴役的祖国的希望；它拒绝给予我们以任何机会以便使德国人民能够摆脱战争罪犯的处境，摆脱那些与我们在东欧取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相悖的工作。”“钢盔团”1928年的这项决议囊括了所有反民主运动，也包括纳粹党的许多基本理论。希特勒也拒绝接受凡尔赛条约的惩罚性的条款，并且大声疾呼要为德意志人民取得更多的领土、更多的生存空间。

“钢盔团”内部发生了分裂，普鲁士人反对巴伐利亚人，新教徒反对天主教徒。但是，却有一点能使各派团结一致，这便是迄今尚未明确提出的反犹政策。到了1931年，有三十万人麇集于“钢盔团”的旗帜下。他们身穿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战服式的灰色制服，举行示威游行，以支持他们的人选。

冲锋队员不仅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而且凡被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都会遭到他们长筒皮靴的踢打。比如，在1933年的竞选运动中，被杀害的反纳粹人士不下五十人。纳粹分子则声称他们有十八名党徒被害。这是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比例。

无论希特勒及其最亲密的伙伴们对冲锋队的暴行怎样反感，他们还是把它视为成功的关键。从理论上说，德国军队是要服从现政府的。这支军队在数量上也许很少，但要发动一次政变，或逮捕纳粹党的领袖并摧毁纳粹党却是绰绰有余的。在对付由军队发动的这种冒险行动方面冲锋队充当了主力。

尽管约瑟夫·门格尔已被希特勒的奸才诡辩所蛊惑，但由于冲锋队行为粗野和性的极端反常而腐败不堪，未能将门

格尔罗织进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1931年5月29日，这个二十岁的大学生没有参加冲锋队，反而追随了“钢盔团”。

在德国许多地方由于政治动荡而纷扰不安时，京茨堡却相对地平静无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以后，市长把各阶层人士召集到市政厅，他竭力推崇废除德皇的独裁政府，呼吁要“代之以一个较好的人民的政府”。一个名叫奥托·盖泽尔哈特的社会党人要求立即组织“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而结果，唯一的变更只是废除了七十马克的人头税。

1922年，即希特勒发动流产的慕尼黑暴动，试图夺取政权的前一年，在京茨堡出现了纳粹分子。据说约瑟夫·门格尔的父亲卡尔·门格尔在二十年代积极参与了巴伐利亚纳粹党的活动。至于约瑟夫·门格尔的母亲瓦莉，由于她的胡普福勒家族的亲戚们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因而她可能也支持纳粹运动。后来有人引述说，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瓦莉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感谢上帝！我可要紧紧拥抱法国人了。战争终于打起来了。”

三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使京茨堡沸腾起来。1930年，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三百一十五张选票。象卡尔·门格尔这样的企业家，则更加卖劲地为许诺要消灭布尔什维克威胁的竞选人效劳，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希特勒为争取担任公职，在京茨堡两次发表政治演说。第二次，卡尔·门格尔殷勤地把他工厂里的一所大厅提供给希特勒作为演讲的场所。大约有八百人参加了这次演说会，并为希特勒的演说欢呼叫好。

在把极权主义政府强加于人民之前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

中，京茨堡市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投票支持希特勒。从全国范围来看，支持者的比例更大，这就足以使希特勒于1933年出任总理。所以，卡尔·门格尔不久也在纳粹区委员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随后又在纳粹建立的地方政府中担任一些职务，就不足为奇了。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成员、老社会党人奥托·盖泽尔哈特1933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后，便“自杀身亡”了。

直到1934年1月3日，年轻的约瑟夫·门格尔才错误地以为前途已经明白，便退出“钢盔团”，加入了冲锋队。正如他的一位同学所回忆的：“门格尔其人谨慎有余，而勇气不足。”他确实太天真了，因为当时希特勒已明确地表示要解散冲锋队。即便是象门格尔这样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已有二百五十万人，但冲锋队对于希特勒来说，已经毫无用处。希姆莱领导的党卫队，在六个月以前就已悄悄地从冲锋队的羽翼下出世。冲锋队队长恩斯特·罗姆是德国的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希特勒和希姆莱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威胁。

1934年6月30日拂晓，一列汽车队在元首的率领下，从慕尼黑行驶三十英里来到旅游胜地维塞。这时，罗姆和几个同伙在狂欢一夜之后，还在床上酣睡。几名冲锋队的头头当场被处决。罗姆后来在狱中拒绝用手枪自杀，被希特勒的部下开枪打死。冲锋队其他的一百五十余名军官，由希姆莱和赫尔曼·戈林组织的行刑队执行枪决。

“谨慎有余的”约瑟夫·门格尔虽是局外人，但对所发生的事件的重大意义是一目了然的。虽然冲锋队还继续存在，不过很快就沦为一个徒有其名的组织。1934年10月，门格尔藉口“患有肾炎”退出了冲锋队。

然而，他又遇到了一个与家庭更有牵连的比较麻烦的抉

择问题。卡尔·门格尔梦寐以求的是，长子能参与家庭经营的生意活动，办成“卡尔·门格尔父子公司”。但约瑟夫对此毫无热情。他说，他对于机器、工厂，或者为赚钱而赚钱都不感兴趣。他拒绝沿着这位“受推崇”、“被尊敬”的父亲走过的道路走下去。在抉择问题上，父子俩发生了争执，但约瑟夫坚持己见。

下述说法虽然肤浅，却不无道理：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可以诊断认定，这种对母亲瓦莉的强烈感情和对父亲卡尔敬而远之的憎恶感情，就是精神病学中尚未解决的恋母情结冲突的证明。由于这种冲突，不幸的欧洲犹太人便成了他对那个专横、苛求，因而也是不容别人争辩的父亲的感情进行发泄的替身，遭到杀害。

约瑟夫·门格尔这时开始埋头于学习。他获得了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他还通过了医学院的考试。为了学医，他又转到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除了在维也纳稍事逗留外，法兰克福成了门格尔的训练营地。

门格尔在法兰克福受到了奥特马·冯·弗许尔教授的影响。这位教授是当时流行的“新人种学”的专家。冯·弗许尔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党人。他在研究人种学中，对孪生现象尤感兴趣。门格尔在冯·弗许尔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关于儿童裂腭的论文，发表在一家医学杂志上。

1936年，门格尔到慕尼黑接受医学评审委员会的考核，并取得了开业行医的资格。然后，他在莱比锡大学医院担任了一个学期的实习医生，最后回到法兰克福大学的遗传和优生学研究所，在冯·弗许尔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人种学的研究方向在当时不可避免地要顺从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强大的潮流。当时法国驻柏林大使馆中的一位外交官

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反犹太主义在德国一直广为传播。它根深蒂固，而且由来已久。这是一种为大众所能接受的偏见和激情。这种反犹太主义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很猖獗。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和左翼政党中所起的作用，又使反犹太主义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希特勒并没有与国民背道而驰，他把他们拉拢得更近一些。他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愿望。他的激烈的反犹太主义没有损害他的威望，反而是他享有威望的基本因素之一。”

远在1879年，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切尔就指责犹太人是德国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犹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他的著作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都足以产生出一种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的运动。因此，在几个政党的纲领中都单独列有反犹太主义的一条。

声称犹太人要阴谋控制世界的《犹太教长老谈话录》是一份伪造的文件。这个《谈话录》最初出现在十九世纪末的俄国。1919年它又在德国出现，正好及时地控制了在德国日益增长的沮丧的情绪。

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影响也触及了德国的艺术。象里夏德·瓦格纳(他的歌剧曾经使约瑟夫·门格尔着迷)，这样的艺术家竟然也公开宣称蔑视犹太人。正如历史学家乔治·L·莫塞所写的：“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是德国思想史的一部分，并不在其范围之外。”

新闻界和政界人士既把犹太人说成是进行高利盘剥、驱使德国濒临毁灭的金融家，又把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的先锋，一心要推翻私有财产，推翻私人拥有的象“卡尔·门格尔父子公司”那样的工厂，以及银行等的私有制。即使不理睬这种荒唐的言论，先天的偏见也是“高于一切”的。

瓦尔特·达雷之流又为犹太民族低劣说提供了“科学”的根据。达雷是一名农业专家。他的著作《血与土壤》是由纳粹党出版的。他把粗俗的优生学应用到人类中来。达雷的思想引起前养鸡农场主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重视，这也毫不奇怪。希姆莱后来挑选达雷主持党卫队的“种族与殖民局”的工作。

种族纯净和犹太人是传染物的威胁，在德国的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已成为一种必须加以传授的信条。当门格尔在慕尼黑大学开始他的学习生涯时，反犹太主义就和比较标准的原子表、牛顿的运动定律一起，在各门科学中迅速发展起来。这位来自京茨堡田园诗般环境的年轻人十分敏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德国东方学学者保罗·德·拉加德之流的著作。这位学者鄙视“出于人道主义而为那些犹太人辩护，或者对于消灭那些高利盘剥的寄生虫心慈手软的人们……与旋毛虫和杆状菌之类的害人虫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他们是不可救药的，把他们消灭得越快、越彻底，就越好”。把犹太人比作病菌，对于那些一手制造大屠杀的刽子手们，特别是对于一心想对局外人以及对自己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那些医生们来说，都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反犹太主义也蔓延到其他许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美国，1938—1942年间举行的历次民意测验表明，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人支持反犹太人的法令。但是，只有在德国，反犹太主义才能集结成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团体。而在美国，以及在其他的地方，许多公民都是强烈抵制反犹太主义的。在德国，反犹太主义基本上可以通行无阻。一些新教团体反对对改变犹太教信仰的人们进行迫害，但对犹太教的忠实信徒却漠不关心。罗马天主教会（就是约瑟夫·门格尔所

信仰的天主教）和纳粹党言归于好。在1933年达成的协议中，双方同意尊重对方的特权。这项协议的制定者之一阿洛伊斯·赫达尔主教（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都宣称他是本地人）是梵蒂冈教廷有影响的人物，后来他在约瑟夫·门格尔的一生中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纳粹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这项协议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一方服务的，因为据估计有四千名天主教的和新教的教士被纳粹杀害了。

将反犹太主义的病毒传染给约瑟夫·门格尔的主要传播者是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同伙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罗森堡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理论家；施特赖歇尔发表过许多文章，来阐述反犹太主义。这些作品粗制滥造、谬误百出。但是，调子都是希特勒定的：

“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不接受大自然的高贵原则，而用人民大众的人多势众来代替永恒的权力和力量。（正如他所说的，德国的犹太人占德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今天，我相信我是在按照万能的造物主的意志采取行动的。我进行自卫、反对犹太人，就是在为上帝的工作进行战斗。

（纳粹分子及其元首是彰明昭著地敌视宗教，敌视非尘世的上帝的；但在符合他的心愿时，他们完全可能宣称自己是站在上帝一边的斗士）。满脸邪恶、得意洋洋的犹太青年，在暗中窥伺毫无防范的少女，用他的血玷污她，从而把她占有，使她脱离自己的民族。他使用一切手段，企图破坏他想要征服的那个民族的种族基础。就象他自己不断地诱奸妇女和少女那样，他也毫不含糊地要去摧毁，甚至大规模地摧毁其他的民族的种族壁垒。把黑种人带入莱茵地区的，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犹太人，而且总是怀着同样的想法和明确的

目的，就是要毁灭可恨的白种人……”门格尔后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也爱玩弄这些类似的关于性方面的花言巧语。

门格尔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住处离他的导师很近。1937年，门格尔仍在学校时，奥特马·冯·弗许尔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第一个终于认识到生物和种族遗传卫生学，并且使之成为治理国家大事的首要原则的政治家是希特勒。”两年后，他又宣称：“我们这些种族卫生学的专家们欣喜地亲眼见到，这项通常只是在科学实验室或学术研究书斋里进行的工作，现在已经扩大到我国人民的生活中了。”

门格尔过去一度短期投靠冲锋队的经历，显然使他不敢再贸然加入其他的政治团体。一直过了三年，即在1937年，他才申请加入纳粹党。当他感到气氛极为相宜时，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于1938年5月加入了纳粹的核心组织党卫队。

当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改组党卫队时，他预见到党卫队将是传播“优秀种族”思想的温床。理想的新成员应是蓝眼、金发，其妻也要有相同的特征，他们的子女要增强这种条顿族的形象。可笑的是，希姆莱自己却个头矮小，鼠眉獐目，身形猥琐。按照上述标准，希特勒也不合格。但是，这个狂热的梦想家的特点，毕竟盖过了他本身的缺陷。而且，除了他们所宣传的雅利安神话外，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本性是难移的。

然而，希姆莱所规定的严格标准不久即证明是过于苛求了。有的人甚至因为镶了牙而被拒之门外。到了1934年，党卫队的头目认识到，人员的数量要比表面上的纯净更为重要。于是，这个组织开始接纳几乎所有的志愿参加者。参加党卫队成了时髦的风尚，党卫队也为机会主义者在“新秩序”

中提供了光辉的前程。党卫队成员必须做到对长官绝对忠诚和服从，严守纪律，不得腐败堕落。

希姆莱在吸收新成员上敞开了党卫队的大门，但他还是力图使党卫队在种族方面保持纯洁。他常常相信民间传说而不相信科学。他根据以往养鸡的经验，把优生学变成为参加党卫队的基础。党卫队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向组织报告自己父系和母系的至少上溯一百五十年的家族谱系。约瑟夫·门格尔本本份份地呈报了所谓“血统记录簿”中所列项目，他所呈报的具体情况，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摘自家庭用大型《圣经》所附空白记录中的记载和教堂记录簿。申请加入党卫队的人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来证实自己是纯雅利安血统，约瑟夫·门格尔也是这样做的。只要有可能还要填明父母双亲的死亡原因。从表面上看，党卫队不得有遗传上的缺陷。不过也有例外。希姆莱的主要助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暗杀的），德国空军的陆军元帅艾哈德·米尔希，以及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等人，全都有犹太人的血统。

不仅要求党卫队成员证明他们是纯雅利安种族的，而且对于他们的新娘也有同样的要求。这就给约瑟夫·门格尔带来了麻烦，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名叫伊雷妮·舍恩拜因的姑娘。经调查她的家庭史发现，她的外祖父是私生子。她的曾外祖父哈里·莱昂斯·杜姆勒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杜姆勒出生于纽约州的布法罗，曾在美国驻法国尼斯市的领事馆任职。1896年，在德国达姆施塔特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后，签署了一份文件，其中载明杜姆勒“同意赡养安娜·舍恩拜因小姐1883年10月所生的孩子”，每月赡养费为二十马克，直到孩子满十四岁为止。文件进一步表明，“杜姆勒先生只是在这样一个唯一的条件下才同意承担这一义务的，即从此以

后，舍恩拜因小姐要完全客客气气地与他脱离关系，特别是不得再行控诉和进行任何形式的诽谤，而且不得再向他提出权利要求……他还明确地反对文件中载明或已载明他承认自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这一否认弄得党卫队的审查官不知所措。他批注道：

“哈里·莱昂斯·杜姆勒的父系家史经过查证，并非无可争议。”实际上，也确实没有办法可以进一步查清伊雷妮的母系家史。因为德国人根本无法接触杜姆勒的档案，即使他承认自己是这个家族世系中的一支。

多年以后，门格尔在谈到伊雷妮时还说，她是“我生命的伟大爱情”。她漂亮、聪明，所受的教育要比门格尔广泛，曾在意大利和瑞士求学，精通四种语言。她喜爱旅行，读书也能给她带来快乐。但是伊雷妮并不能使她的婆家感到满意，她不符合妻子应是家庭主妇这种家庭观念。她太有主见了。更有甚者，伊雷妮还是个路德派教徒，这使得天主教徒瓦尔布加·门格尔大为沮丧。

党卫队对门格尔的婚事迟迟不予批准，加之他的家庭对他的这位新娘也迟迟不予认可，这可能给门格尔的情绪造成了一阵阵不安。但是，约瑟夫·门格尔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个对纳粹的事业表示明确而强有力支持的企业家的儿子，决定不顾党卫队的长官和家庭的反对，与伊雷妮结婚。婚礼是按照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举行的。使门格尔家庭进一步感到不满的是，婚礼没有在京茨堡举行。在一张1938年的照片中，这一对年轻夫妇容光焕发，可能是刚刚步出举行婚礼的教堂。

约瑟夫·门格尔在请求党卫队批准他与伊雷妮结婚时所遇到的手续之繁琐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在调查血统方面这样

大量的文牍工作，所涉及的人何止千千万万。这种情况有力地说明了纳粹德国官僚机构组织之严密，实在令人可畏。而且，政府干预私人生活，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公民们居然能够接受，这也说明知识界对于党卫队的意识形态如此猖獗，缺乏应有的抵制。在这些事务中付出的时间、金钱以及精力之巨大，说明纳粹政权在坚持进行那些使政府效率降低的活动中，是多么的顽固不化。

门格尔曾经在军队中服役，这是作为对党卫队应尽的一部分义务。他在奥地利蒂罗尔的山地团中受过几个月的训练。不过，在他婚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短暂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兰克福遗传与优生学研究所中担任助理医生。门格尔夫妇住在位于美因河南岸的这个城市的萨克森豪森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住址是保罗·埃利希施特大街三十号。由于某种原因，纳粹分子竟未能把埃利希施特这个犹太人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名字从城市街道名册中勾掉。这座房子宽敞、雅致，距离研究所很近，走几步就到了。尽管邻近的许多建筑物在盟军空袭法兰克福时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但保罗·埃利希施特大街三十号看起来竟安然无恙，就象它的房客门格尔竟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安然无恙一般。后来，门格尔到弗赖堡短期行医。这个地方在门格尔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军队按照1939年4月制定的“白色方案”于1939年9月1日蜂涌地越过了波兰边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摧毁波兰的闪电战，不需要门格尔做出任何的贡献。但是，随着两线战争越来越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与苏联人的和平已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时候，这位人种生物学专家也就处于

被动员人员的行列之中了。在门格尔的寥寥几笔的记载中，只提到他曾在西线服役，参加过征服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役，但未载明详情细节。记载中说，他曾在作战于东线的武装党卫队的海盗师里工作过。

希姆莱早就注意到国防军这支德国传统的军队是有其独立性的，于是他着手建立自己的战斗部队，即武装党卫队。希特勒对于另建一支武装力量这种做法是否可行考虑再三，因此最初的计划限制武装党卫队只能有四个师。但是，希姆莱还是成功了，武装党卫队到1945年总数已达三十五个师。武装党卫队的各个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属于最高统帅部，行政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权力却严格地掌握在党卫队自己手里。如果军队对纳粹政府产生强烈不满，以致于发动军事政变，那么就可以调用以坦克、重炮和训练有素的步兵武装起来的武装党卫队来进行抵制。

法国沦陷后，武装党卫队新建的师之一就是海盗师。这个师征招了来自荷兰、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纳粹分子，不足的部分由前第五装甲师的兵力加以补充。该师在法国战功显赫，门格尔可能就在这个师里。

1942年夏天，海盗师艰难地向乌克兰进军，作为切断苏联高加索油田的攻势的一部分。主要攻击点是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德军多次发起强攻，试图攻入这座防守顽强的城市。但一路上反坦克的障碍和沟壕纵横交错，遍地满布地雷，减缓了德军前进的速度。迎战海盗师的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这是苏联式的武装党卫队。这支部队装备精良，宁死不屈，与侵略者展开了白刃巷战，使得德国装甲部队简直无用武之地。红军战士们把大街人行道上的方砖掘出来，垒成一道道几英尺厚的壁垒，把钢

梁横倒在地面上，以阻挡敌人的冲锋。苏联人还在他们的地下室、多面堡里准备了成千上万瓶掺有磷和汽油的“莫洛托夫鸡尾酒”^①。坦克成了海盗师官兵们燃烧的坟墓。德军一座房子一座房子地向前推进，几乎在每一座住宅的门前都会踩上地雷，绊上铁丝网，遭到掩体中射出的火力的狙击。火焰喷射器、手榴弹、机枪、步枪和刺刀在狂飞乱舞。防守者们看来早已横下一条心，绝不活着当俘虏。如果有的苏联伤兵躺在角落里未被发现，他们就又拿起武器从德军的背后开火。党卫队的伤兵不得不放到装甲运兵车里保护起来，否则敌军的渗透人员便会对这些无助的伤员捅上一刀或把他们击毙。

侵略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占领了罗斯托夫，海盗师挥戈南下直奔图阿普谢。这种纵深穿插的目的是夺取迈科普油田。但是，到了1942年秋天，攻势在这里停止下来。而在北部地区，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各部队也深陷困境。尽管有不忠诚的乌克兰人和反苏维埃的哥萨克人的加入，纳粹各军团仍然寸步难行。在这险恶的岁月中，门格尔身受重伤，被送回德国疗养。他由于作战努力，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各一枚，此外还获得一枚对红军作战的军旗奖章。

双方的军队以及苏联的平民百姓伤亡惨重，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相信。对于一名医生来说，面对触目皆是的肢体残缺不全的尸体——有的是被击毙，有的是被捅死，人的血肉之躯受到如此摧残，令人难以想象，此情此景可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于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他对于人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使用的一种烈性手榴弹。——译者

们的苦难会麻木不仁到什么程度呢？其他具有类似经历的人，可以靠其内在的力量，采取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的办法来克服自己感情上的急剧变化，而约瑟夫·门格尔则肯定没有做到这一点。

门格尔伤愈后，被宣布不适于重返前线。他自愿担任设在波兰西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军医官这一新的职务。

第三章 奥斯威辛——世界的粪门

汉斯·赫尔曼·克雷默尔医生所受的教育是古典文学，却在自然科学方面显示了身手，这与约瑟夫·门格尔的经历相类似。1929年，克雷默尔被任命为蒙斯特大学的医学教授；一年后，加入了纳粹党。1941年，他参加了武装党卫队。1942年夏季，当约瑟夫·门格尔所在的海盗师攻取罗斯托夫时，克雷默尔临时被派往奥斯威辛，接替另一名医生的工作。他有一本日记，里面记载了他在奥斯威辛的所见所闻和他对这些事情的反应。

克雷默尔的日记是这样开始的：“清晨三时在现场观看特别行动。在我看来，但丁的《地狱篇》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情节若与这种行动相比，简直成了喜剧了。奥斯威辛不是平白无故地被称为‘灭绝营’的。”

克雷默尔一到奥斯威辛立刻使他感到心惊胆战的所谓“特别行动”，就是把大量的死人抛进浸透了汽油、熊熊燃烧着的木柴堆上烧掉。常常是木柴堆点燃时，有的人还没有断气。克雷默尔写道：“人们全都愿意参加这一行动，因为事后他们可以得到一份特殊口粮：五分之一立升烈酒，五支香烟，一百克腊肠和面包。”

另外几篇日记里，手体字中还夹着黑体字：“今天上午从我的律师那儿得到一个极为令人愉快的消息……这个月的初一，我获准与我的妻子离婚了。（注：我可又见天日了，

笼罩在我生活中的黑雾消失了！）后来，我又以医生的身份到现场观看对八名犯人的体罚和用小口径步枪执行的枪决。得到一些肥皂片和两条肥皂……晚上的特别行动又在场。”

“下午，在明媚的阳光下，听了一场由犯人乐队演奏的音乐会。指挥是华沙歌剧院的指挥，乐师共八十名。午餐喝葡萄酒。晚餐有烤鲤鱼。”

“昨夜，第六次和第七次特别行动均在场……晚八点与集中营副长官波尔共进晚餐……一顿名符其实的晚宴。烤狗鱼很多，管够，还有上等咖啡，优质淡啤酒和面包圈。”

“今天，我们摘取人的肝、脾、胰等新鲜的（重点系作者所加）内脏。”

“到场观看了第九次特别行动（对付一些外国人和憔悴不堪的妇女）。 ”

“到场观看了对七名波兰平民的施刑和处决。”

“到场观看施刑和处决十一人。注射皮洛卡平（毒药）后，取出肝、脾和胰等新鲜的内脏。”

“作了伤寒预防注射，事后于晚间发烧。尽管如此，仍于夜间到场观看特别行动。一千六百名荷兰人。最后一拨焚烧的情景惨不忍睹。”

“星期天上午在场观看第十一次特别行动（对付荷兰人）。天气潮湿、寒冷。三名妇女向我们哀求饶命，情景极为凄惨。”

“应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沃思的邀请，到长官俱乐部玩了个痛快，品尝了保加利亚葡萄酒和克罗地亚烈酒。”

“从一名非常虚弱的十八岁的犹太犯人身上取出肝、脾、胰等新鲜内脏。事前给他照了一张相片。”

可以这样说，大概是门格尔在奥斯威辛的一个同事，一

级突击队中队长蒂洛把奥斯威辛的一个最恰当不过的称号告诉了克雷默尔。克雷默尔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今天下午到场观看了女营的特别行动。这些恐怖场面极为骇人听闻。蒂洛医生今天早晨对我说，我们是处在世界的粪门。他的说法是对的。”

集中营于1933年首先在离慕尼黑大约三十英里的达豪出现。这种把外国人集中关在一起的作法并非纳粹独创。“犹太居住区”就是欧洲古老的传统作法。在美国，土著印第安人被统统送到保留地去。而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罪犯则被送到古拉格群岛去。

达豪集中营是冲锋队开办的，是一个用来关押被绑架者的地方，是一个进行恐吓和杀害反对者的方便场所。曾经镇压希特勒的1923年暴动的巴伐利亚邦政府首脑，古斯塔夫·冯·卡尔就是被人用鹤嘴锄砍死，尸体被抛在达豪附近的沼泽地里的。集中营的建造似乎是纳粹有意安排的，因为他们期望一朝上台，就会有五十个集中营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德国各地出现。起先，人们认为集中营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希特勒本人在1933年圣诞节前夜曾宣布过大赦，释放集中营的二万七千名犯人。但是赫尔曼·戈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对于这一指示不予理睬，只放了少数几个犯人。

罗姆被杀，冲锋队的地位下降后，希姆莱和党卫队接管了集中营，从而使那种束手束脚、无所作为以及行之无效的局面结束。纳粹在魏玛附近建造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柏林附近建造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同时又把靠近梅克伦堡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改为女营。达豪集中营进行了扩建。吞并奥地利之后，党卫队又在林茨附近建造了茅特豪森集中营。

最初，集中营里关押的是所谓政治上的左翼分子，特别

是共产党人，发表反对言论的教士，被认为是反纳粹的报刊的编辑以及不良分子的团伙。其中也有搞同性恋者和一些普通的犯人。起初，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就被投入集中营的。

一个名叫特奥多尔·艾克的党卫队恶棍，被委派为集中营的第一任督察员。他灌输一种被歪曲了的集体精神。调来的工作人员都要经受一系列的屈辱和肉体上的折磨。如有人稍稍流露出同情或反感，就会被认为是玩忽职守。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识别符号——骷髅旗。集中营的看守人员们洋洋得意地自称为骷髅部队的成员。艾克以及他手下的骨干分子训练士兵们要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对犯人残酷无情，就是对纳粹事业无限忠诚的明证。然而，他们又教训看守人员说，无论他们的行为如何残暴，但表面上要做到合理合法。遵守纪律，而且工作内行，是集中营管理人员应有的品质。

按照一种违反常情的理论，集中营的工作是要使犯人改过自新，指出他们思想上的错误，并且要说服他们支持现政权。而在“使之改过自新”时，则使用了简单的行为主义的教育，即采取了极端消极的手段。艾克下命令说，凡是“谈论政治，发表煽动性言论，举行集会，组织小集团，和他人游游逛逛者；凡为了进行反对宣传而提供暴行谎言，收集有关集中营的真真假假的情报者（重点系作者所加）；知情不告，或传播，或暗中传递出集中营，透露给外国来访者的人……，均处以绞刑。”

他还宣布，凡袭击党卫队代表，拒绝服从命令或劳动者，“在行进或劳动时大声叫喊，煽动或发表演说者”，均就地处决。在家信中有言词不满者，处以两周单独监禁和鞭笞二十五下。

（在越南和柬埔寨，为了对那些被认为是对七十年代的政权不够支持的分子进行“改造”和教育而建立的集中营里，也有类似作法）。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集中营已成为一种时尚。的确，那些被授权打出骷髅旗的人物并不是党卫队的中坚分子。许多人是从那些被淘汰的人员中调来的。

征服波兰，给纳粹统治集团带来的不仅仅是领土和经济上的好处，它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可以把犹太居民从西欧，特别是从德国清除掉。德国人认为，他们与斯大林一战在所难免，因此，波兰和苏联的臣民可以充当奴隶劳工。波兰的房地产可以用来办工厂。这些工厂可以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并可以吸收东部地区的犹太人。

但是，还在这些野心勃勃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前，“特别行动队”便问世了。这些特别行动队紧跟在纳粹军队后面，席卷波兰全境。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从党卫队里组成了特别行动队。海德里希是个凶恶的反犹主义者，身材高大，碧眼金发，一副贵族派头，和他的上司截然不同。特别行动队的使命是，清除游击队和潜在的反抗力量，搜捕犹太人，并强迫他们迁入犹太人居住区。

特别行动队以机动的袭击小分队的形式进行活动。他们屠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波兰人，有时血洗整个城镇。他们往往把这些罪恶勾当交给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凶恶的反犹太人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去干。在乌克兰的一座谷物仓库工作的一个名叫赫尔曼·格雷布的德国平民工程师，曾亲眼目睹了特别行动队的一次行动：

“武装的乌克兰民兵在党卫队的监督下，把人们赶开……卡车里装着一些穿着标志犹太人的黄条衣服的人。我径

直走到沟前，没有受到阻拦。当我们走近土堆时，听到附近响起一阵步枪声。从卡车上下来的是些男人、妇女和小孩，他们在手持皮鞭的党卫队士兵的监视下，被迫脱去衣服，他们必须把他们的财物放到指定的地方，鞋子、衣物和内衣分开放。我看到一堆鞋子大约有八百到一千双之多，还有一大堆内衣，一大堆衣物。这些脱去衣服的人们既没有眼泪，也不叫喊，一家人一家人地站在一起，一面拥抱着告别，一面等待着那个站在沟边手拿皮鞭的党卫队队员发出信号。我在那里坐了十五分钟，在这期间，我既没有听见一声抱怨，也没有见到一个求饶的。我注视着有八口人的一家，夫妇俩约莫五十岁左右，围绕着他们的是三个大约为一岁、八岁和十岁的男孩，以及两个约莫二十岁和二十四岁的姑娘。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怀抱着一个婴儿。她一边哼着歌曲，一边轻轻地摇着。婴儿在高兴地喊叫。父亲母亲含着泪水望着自己的一群亲人。父亲拉着十岁男孩的手，轻轻地对他说些什么；孩子强忍着眼里的泪水。然后父亲用手指着天空，又抚摸着孩子的头，好象在解释着什么。就在这个时刻，沟旁的那个党卫队队员向他的伙伴大声说了几句。他的伙伴点了二十人左右，命令他们站到土堆后面。我刚才谈到的那一家人也在其中。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姑娘，身材苗条，一头黑发。她从我身旁走了过去，指着自已说：‘二十三岁’。我绕过土堆，面前是一个可怕的大墓穴。尸体一个挨一个紧紧地堆在一起，只能看见头。大多数人是头部中弹，血染红了肩膀。有的还在动；有的则举起手，转动着头，表示他们还活着。沟的三分之二已填满了。我估计沟里有一千具尸体。我的眼光转向那个执行枪决的党卫队队员，只见他坐在那里，双腿在狭窄的沟边晃荡着，自动步枪搁在膝上，他在

抽烟。赤身露体的人们沿着土墙上挖出的台阶爬下沟，在党卫队指定的地点站好。面对着累累的死者 and 伤者，这名党卫队员轻轻地对他们说了些什么。随后我就听到一阵步枪射击声。我向沟里一瞧，就看到他们的身体扭曲着，头无力地垂了下来，倒在下面的尸体堆上，鲜血从他们的脖颈后泉水般涌出来，奇怪的是，竟无人轰我走开……另一批受害者又向沟边走来。他们爬到沟里，在先前遭杀害者的面前站成一行，又被开枪打死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回来……看见三十具赤裸裸的尸体，在离沟三十到五十码的地上躺着。有的还活着，他们凝视着天空，脸上死板板地毫无表情，似乎既未感觉到清晨空气中的寒意，也没有看见周围站着的工人。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姑娘对我说，求我把她的衣服找来，帮助她逃命。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忽然听到一辆汽车疾驰而来的声音。我看到，这是一支党卫队的小分队。我赶紧回去干自己的活儿去了。十分钟后，壕沟那边传来步枪射击声。那些刚才还活着的犹太人，被迫把那些尸体扔进沟里，然后他们自己不得不躺下，颈背挨上一粒子弹。”

奥托·奥伦多夫在党卫队的经济 and 情报部门干过几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完成了他的外贸专家的任务。然而，这个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却领导特别行动队D行动组的工作至少有一年。1945年，美国检查官在纽伦堡审讯他时，他如实地供认说：“当德军侵入苏联时……南方战区的D行动组……干掉了大约九十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支部队进入一个村庄或城市后，就命令当地有名望的犹太公民把全部犹太人召集起来，准备迁居，并要求他们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而在处决前不久，还要他们交出外衣。男人、妇

女和儿童都被押到处决的刑场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刑场是在一道挖出的较深的防坦克壕的旁边。然后，他们或跪着，或站着被枪决，尸体随即被抛入沟中……1942年春天，我们从柏林的秘密警察头子和党卫队情报局那儿获得毒气车……我们接到命令，要用这种毒气车来杀害妇女和儿童。一个部队什么时候抓到足够数量的受害者，就会给它派一辆毒气车来消灭掉他们。”

德国国防军的少数将领认为，屠杀平民是可恶的。对此表示反对的司令官被撤了职。德国最高统帅部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就这种暴行问题向最高统帅部的首脑凯特尔陆军元帅提过告诫。凯特尔简短地回答说：“元首对这个问题已作出了决定。”他又补充说，如果军队想要避免参加这种行动，那么只好让党卫队和秘密警察部队去执行命令了。

陆军参谋总部首脑，弗朗茨·哈尔德将军在日记里写道：“陆军坚持说，‘内部清洗’要推迟到陆军已经撤回、国家交给文职官员管理时再进行。”军方看来担心的是它自己的形象，而不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犯下的大屠杀罪行。对这个政府，陆军是忠诚地效忠的。

许多军界的高级人员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战争初期，武装党卫队的一个炮兵团队把大约五十名犹太人赶去修桥，然后又把他们赶进一所犹太教堂全部杀掉。当地的司令官们大为震惊，遂召集军事法庭，来处理这个与军人身份不相称的行为。然而，就连判处一年监禁这样宽大的判决，也被陆军总司令作为大赦的一部分而撤消。这一判决消息在军队中不胫而走。这种结局显然说明，对付平民百姓，不必考虑后果。

入侵苏联四个月后，德军第六集团军军长是这样向其部队提出要求的：“在东部地区，士兵们不仅要成为一个遵循战争艺术规则的战斗人员，而且也要成为高举人民主义旗帜的旗手，成为对强加于全体德国人民或与其血肉相连的民族的那些兽行的复仇者。这就是士兵们为什么要充分理解对于低人一等的犹太民族必须坚决、干脆地加以惩罚的原因所在。另一个目标就是要将国防军背后的反抗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历次经验证明，这种反抗活动总是由犹太人一手策划的。”这种言论，自然会使枪杀成批无辜平民的行径合法化，会使可能感到良心不安的普通士兵心安理得起来。党卫队士兵们受过这种教育，即杀害犹太人和其他潜在的敌人是正当的。希姆莱对他手下的党卫队军官曾明确指示说：

“对于那些在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战斗，但由于热情过分而犯法的人，要从宽处理。”

还有一次，希姆莱在谈到党卫队的责任时说：“在我们之间可以坦率提到的一点，但是绝不可以公开地去说，就象1934年6月30日，我们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我们奉命执行的任务，命令那些背离我们的同志靠墙站立，将他们枪决了。……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件事情，将来也绝不会谈它……我的意思是指，清除犹太人，灭绝犹太民族。这件事谈起来非常容易——‘犹太民族正在被灭绝……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必须懂得，当一百具尸体，或者五百具、一千具尸体横亘在田野上时，这意味着什么。要干到底，同时（由于人的软弱性而造成的一些例外不谈）还要不失体面，这就是使我感到为难的地方。这是我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辉的篇章。……”

尽管采用了所有的训练方法，特别行动小组中有些人还

是免不了被希姆莱所说的“人的软弱性”所俘虏。一个德国随军精神病医生曾对著名的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这样说，特别行动小组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由于参与了行凶活动而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尽管行动小组作了最大的努力，毕竟能力有限。而对待犹太人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行刑队，甚至机动毒气车也只能杀掉成千的人。据纳粹统计，住在欧洲的犹太人有一千一百万人，因此让他们在东部重新定居，已不是一个解决使欧洲无犹太人问题的办法了。

1939年1月，希特勒出席了德国国会。他对那个橡皮图章国会这样说：“……如果欧洲的和欧洲以外的金融界国际犹太主义要把各国人民推进一场世界大战的企图能够得逞，那么，其后果将不是世界布尔什维克化，从而使犹太主义取得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毁灭。”希特勒在预测一旦发生世界大战犹太人的命运时使用了“vernichtung”一词，它的译意是“毁灭”或“消灭”。

1941年夏天，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对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下命令说：“……在组织、财政和物质等方面，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尽快交给我一份说明为实现设想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所必需的组织措施和行动措施的全面计划。”戈林在最后一句中使用了“最后解决”这一限定语。

几个月后，海德里希在柏林附近的小镇万泽召集小型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把全部犹太人关进东部集中营去的秘密计划的概要。在场的有海德里希手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阿道夫·艾希曼。他是海德里希的“旅行推销员”，在纳粹统治的领土上积极推行海德里希的政策。艾希曼1961年在耶路

撒冷受审期间，可能说过有一封由海德里希签署的信件，这个党卫队的头头在信中说，元首已下令实行最后解决，“全部能劳动的犹太男人和妇女”暂时予以豁免。但是他没有交出任何予以证明确有此信的证据。

随着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许多大型的集中营，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1940年2月，集中营督察长、党卫队区队长里夏德·格吕克斯发现距克拉科夫城以西三十八英里处有一个他所谓的“非常适合建立一个新的隔离营的地方”。这个最近的城镇奥斯威辛只有大约一万二千名波兰人，不过这个被德国人叫作“奥斯威茨”的地方位于居民稀少的沼泽地区。这个地方不仅位置隐蔽，不易被外人察觉，而且位于维也纳通往华沙的铁路线上，运送犯人极为方便。当不是载运送往奥斯威辛的人货的火车摇晃着驶过集中营的中心地段时，从车窗里所能看到的全部景象，只是一大片临时木建营房。

1940年5月，鲁道夫·霍斯奉命管理这所新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他原是达豪集中营的一名看守人员。他经过特奥多尔·艾克的训练后，擢升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看守长。他也是巴伐利亚人。他的父亲十分严厉，曾打算让他的儿子当罗马天主教的教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六岁的霍斯即设法混进了德国军队。他在东线打过仗，后来又回家过平民生活。这时，霍斯对于宗教职业不再感兴趣了，遂参加了羽翼尚未丰满，在从事政治恫吓方面还是初学乍练的纳粹党。他因参与1923年的政治谋杀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和希特勒一样，他在牢房里只呆了五年。出狱后，被希姆莱吸收成为第一批佩戴骷髅符号人中的一员。

霍斯来到奥斯威辛时，集中营尚在初创阶段，徒有其名

而已。“波兰烟草管理局”曾占用这个地方，现在只剩下一片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马厩和数不尽的臭虫、虱子和跳蚤。最初，霍斯接到指示，要为一万名犯人的到来作好准备工作。他利用助人为乐的奥斯威辛市长提供的三百名犹太人和从萨克森豪森运来的另外三百名犯人，为未来的集中营的居民们建造住房。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计划不断扩大。为了提供更大的地盘和隐瞒活动的真情，纳粹把集中营周围地区的二千名居民赶走，拆除了一百二十三所房舍。到了1941年3月，与苏联的战争逼近，奥斯威辛集中营进一步扩建。除奥斯威辛一号营外，又建立了二号营和三号营。二号营距离一号老营大约二英里，有一片白桦树林，取名为“比克瑙”^①。三号营的主体建在莫诺维茨，因为有一家生产橡胶代用品的工厂，所以有时又被称作“布纳”。伊格·法本工业公司、克虏伯公司，以及德国最大的电器制造商西门子公司都在这一地区开办工厂。这个地方还有一家“德国国防工厂”，这个工厂是党卫队为了给自己捞点利润而开办的。

莫诺维茨的工业联合企业说明希姆莱组织的规模之大令人生畏。党卫队取得了两项重要的经济资产。第一，它拥有向私人工业出售其奴隶劳动力的独有的权利。这些公司要为每个工人每劳动一天付给党卫队六个马克（当时相当于1.5美元），而党卫队用来维持犯人的每天生活费只有三十芬尼^②。

从理论上说，党卫队规定集中营的每名犯人每天的食物所含热量为一千五百卡。但实际上，由于贪污，漠不关心，以及

① 波文意为白桦树。——译者

② 一马克为一百芬尼。——译者

由于采取了蓄意要把犯人慢慢饿死的政策，每个犯人的实际营养每天只有三百五十到五百卡。犯人吃的菜，中午只有一碗难以下咽的胡萝卜、卷心菜或萝卜汤，晚餐只有一英两用人造面粉和锯屑做成的发霉面包。而犯人每天所要从事的强体力劳动却要消耗三千卡的热量。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劳工迅速消耗掉体内的脂肪，然后又消耗掉肌肉组织，一直到虚弱得无法干活。平均说来，一个奴隶劳动力只能支持三个月。

党卫队的第二个收入来源，是它有没收交由集中营统一保管的全部私人财产的权利。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的绝大部分财物都落入了党卫队的腰包。党卫队一到犹太人住宅区，就搜刮财物，装上火车、卡车运走。那些悄悄藏有衣物、皮毛、珠宝、传家宝物、钻石，甚至黄金的犹太人，在他们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后，这些贵重物品还是被掠夺一空。党卫队还搜走了不知怎么会由犯人随身带来的家具，其中包括几架钢琴等。集中营当局把财物贮存在一个人们称为“加拿大”的仓库区。另一方面，集中营还有一个地方称为“墨西哥”，是处决犯人的刑场。

奥斯威辛并不是贫瘠的荒凉地区。这里绿草如茵，到处绽开着朵朵野花。除了为掩藏毒气室和焚尸炉而种植的绿化林带以外，一丛丛灌木，一片片树林，点缀着集中营区的景色。党卫队的士兵们舒舒服服地住在几英里长的配有机枪瞭望塔的电网警戒圈外面。这支骷髅头部队有自己的面包房、屠宰场和腊肠工厂。克雷默尔医生显然对这里的烹饪很欣赏。在闷热的夏天，党卫队士兵们可以在游泳池里消遣。希姆莱同意为士兵们开设一所随营妓院。妓女们除了伺候德国士兵外，有时也接待非犹太人的犯人工头。这些犯人工头协

助党卫队管理集中营。他们和其他一些充当工作人员的犯人，在集中营中工作，有时甚至还可以挣点小钱。

在电网的里面有一个禁区。凡逾越禁区一步的犯人将立即被击毙。击毙擅越禁区界限者的卫兵可得到奖赏。

原先设计容纳约三百人的简陋营房通常要住进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人。犯人们没有床，睡在用钉子钉起来的木板上。这种“铺板”，原计划睡五个人，实际上却挤上十五人。一般不发毯子，也没有枕头。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普通犯人，囚服上有一个绿色三角符号。政治犯是一个红三角。犹太人则是黄三角，上面还有一个红三角，形成一个六角星。搞同性恋犯人的三角是桃红色的。

奥斯威辛由于地面湿潮，不适宜设置一种使垃圾腐烂的处理系统。对于绝大多数犯人来说，在地上刨几个坑就是厕所，这是他们唯一的盥洗设备。那儿垃圾成堆，肮脏不堪，水源也遭到污染。虫虱孳生，疾病蔓延。周期性的流行病痢疾、伤寒、皮疹等，不间断地折磨着犯人，也折磨着看守人员。

1941年夏天，霍斯奉召前往希姆莱的办公室接受密令。关于这次接见，霍斯说，他被告知，元首已下令“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然而希姆莱是否真地用了“最后解决”这个词，则不得而知。霍斯在其回忆中引用希姆莱的话说：“我们党卫队必须执行这个命令。如果现在不执行，那么犹太人将来就会毁掉德国人。”霍斯接到指示，有关消灭犹太人应采取何种最为有效的手段一事，可与阿道夫·艾希曼商量。

霍斯雄心勃勃，想要使奥斯威辛集中营成为其他集中营的楷模。于是，他亲自研究了现有的种种大规模屠杀的方

法。他访问了特雷布林卡集中营^①，看到了把犯人装在车内，通入氧化碳杀死的办法。他认为这种方法并不是非常“有效率”的，于是他又继续寻找其他办法。

一些专家提出建议说，有一种叫齐克隆B的杀虫剂，能够产生有毒的氢化气体，可以致人于死地。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场可怕的杀人竞赛。在这场竞赛中，一个不为人熟知的人物脱颖而出。此人就是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库特·格施泰因。格施泰因调到党卫队中央行政管理处，任首席消毒军官。他的敌人是虱子，他的武器则是齐克隆B一类的有毒药剂。

1942年6月，格施泰因奉命携带二百磅齐克隆B前往位于波兰的贝乌泽茨集中营。贝乌泽茨集中营的长官是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克里斯蒂安·维尔特（绰号“野人基督徒”），他曾经是霍斯的上级。维尔特自豪地领着格施泰因到处巡视他的死亡工厂。这位客人发现，整个集中营弥漫着一股令人生厌的气味。他看到一所带有一个检查贵重财物窗户的穿衣室，牌子上写着：“洗澡和消毒间”。这是一座长长的澡堂式的建筑物，装饰着用混凝土制成的莲蓬形喷头。屋顶镶有“大卫王之星”^②和一个写有“黑肯霍尔德基金会”的标记。

格施泰因注视着—列载满犹太人的火车到达贝乌泽茨。扩音器里传来命令声，要他们脱去衣服，在指定的窗口交出全部钱财和贵重物品。妇女和年轻的姑娘们被带到一排理发椅那里，把头发剪掉。然后所有的人都排成队，走向那座钉有“黑肯霍尔德基金会”牌子的建筑物。只听到有人开导

① 在波兰。——译者

② 犹太教的六芒星形标志，意为“大卫王的盾牌”。大卫王是《圣经》中记载的古以色列国王。——译者

说：“放心好了，不会伤害你们的。只要深呼吸，就能加强肺活量。这样可以避免传染病。这是一种优良的消毒剂。”

在一丝不挂的人群中，有些人听说男人要分派工作，妇女则干些家务，便稍稍镇静下来。但是，根据格施泰因的说法，犯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已意识到他们的命运了，因为“这种臭味泄露了隐秘”。他回忆说，有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妇女，挨了克里斯蒂安的几鞭子后，终于走进毒气室，只见她“两眼冒着怒火，高声咒骂这些杀人的刽子手”。有许多人则在祈祷。当七、八百人被塞进这个建筑物中去以后，门便关上了。格施泰因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座建筑物牌子上那个名字的含义。这是党卫队三级突击队小队副黑肯霍尔德的名字，是他负责开动产生毒气的柴油发动机的。就在这个特殊时刻，发动机出了故障。格施泰因计算了一下时间。他的跑表计明，在耽搁了两小时四十九分钟以后，黑肯霍尔德才又把机器发动起来。在修理机器时，在马尔堡大学讲授卫生学的普法南施蒂尔教授一面从门口小孔里往里瞧，一面报告说听到哭泣声，“好象在举行犹太教徒聚会”。

绝大多数的受难者在机器开始发动后的二十五分钟内死亡，三十二分钟后即全部死亡。门打开时，格施泰因看到受害者们仍然站着，因为他们挤得太紧了。他写道：“这些尸体硬梆梆的象一根根石头柱子一样，满是汗水和尿迹，大腿上粘着粪便和月经血，湿乎乎的被扔出屋外。二十四名工人（是犹太人，不久也将遭受同样的厄运）忙着检查死者的嘴——用铁钩子撬开，寻找黄金。他们用锤子把齿桥和齿冠敲了出来。清扫工们还检查肛门和阴道，寻找藏在体内的金钱、钻石或黄金。”

尸体扔在一个大坑里。几天后，腐烂着的尸体由于毒剂的

作用而膨胀起来，地面隆起二、三码高。以后，在这些残骸上倒上汽油，点火烧掉。

维尔特为他的办法出了毛病感到十分不安。他请格施泰因不要把这次事故向上报告。格施泰因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提起齐克隆B和一氧化碳究竟何者有效，去作一番试验比较了。他借口药剂失效而把他的二百磅齐克隆B埋掉了。因此，库姆霍夫、贝乌泽茨、索比波尔、卢布林和特雷布林卡的集中营继续用一氧化碳杀人。

但是，霍斯却有幸看到用齐克隆B对一批被俘的苏联红军政治委员进行的试验。党卫队把大约九百名苏联人赶进一间为旧军营的停尸房。毒气是通过天花板上的小洞注入室内的。霍斯追述说：“把药粉一投进去，就听里面有人喊‘毒气’！接着就听到一阵怒吼，这群陷入罗网的犯人使用身子猛撞两座大门，但是门关得紧紧的……这种情景使我感到不舒服，不免战栗起来，用毒气毒死犯人的情景要比我曾经想象过的还惨……当时杀害这些俄国战俘，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忧虑。因为上级有命令，我不得不执行。我甚至必须承认，这种用毒气杀人的方法使我感到心安理得。因为大规模灭绝犹太人不久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有了毒气，而且我们也建立了一套程序。”

事实上，霍斯在建立“一套程序”方面，的确显示出相当大的才能。他从比克瑙的一所白色农舍开始。他找人翻修了这座建筑物，除去窗户，拆了内墙，堵塞了任何隙缝，建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五座毒气室中的第一座。

霍斯很快就明白，屠杀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要迅速有效地处理尸体，象格施泰因在贝乌泽茨亲眼看到的那种只是采取大坑掩埋的方法，已是不够的。霍斯在那座过去的农

舍旁边，建起了他的第一座焚尸炉。随后安装的几座，又提高了效率。这些改进的新设备是由后来设计了V型火箭发射场方案的海因茨·卡姆勒设计的。新的装置把犯人脱衣服的前室、毒气室和几具焚尸炉连接起来。升降机把尸体从毒气室运进焚尸炉。党卫队自己的工厂，“德国奥格鲁斯通工厂”制造门窗。埃尔富特的“托普夫父子公司”供应焚尸炉，它过去也曾向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供应过这种炉子。

新建的毒气室内，有些室内支柱是穿了孔的。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党卫队队员，把齐克隆B药丸从屋顶的通风口投入穿了孔的室内支柱中，通风口马上用蘑菇形的盖子盖上，以免毒气漏出。在屋内，毒气药丸由于接触到空气中的湿度而溶解，这种湿度又因人体的汗热加大。窗口设有专供窥视的小孔，可以用来观察里面的动静。一般只需二十到二十五分钟就能置人于死地。（人吸入氢化气后，体内红血球保持氧气所依靠的组织就遭到破坏。中毒症状是肠道失控，出血，最后呼吸系统麻痹，导致窒息）。

一旦弄明，室内所有的犯人均已死亡，抽气车就把毒气室里的气体抽光。一些犯人便进去用水冲洗掉尸体上的污物，然后再搜寻金牙或隐藏的珠宝。他们把尸体装上推车，三个孩子或两个大人装一车，运进焚尸炉焚烧。骨灰用货车载到几英里外，倒入索瓦河中。

鲁道夫·弗巴是最先从奥斯威辛集中营中逃跑的两名犯人中的一名。他提供了关于大屠杀的亲眼目睹的证词。他说：“原则上规定，只有犹太人才用毒气处死。雅利安人则很少被送往毒气室，他们通常受到特殊待遇——枪决。”在使用焚尸炉以前，比克瑙集中营实行枪决，尸体扔在长长的壕沟里烧掉。后来处决是在一座焚尸炉的大厅中执行，焚尸炉

设有特殊装置。1943年3月，奥斯威辛的第一座焚尸炉启用时，从柏林来的贵宾也在场。“节目”包括用毒气毒死并烧掉八千名克拉科夫的犹太人。来宾中文官、武官均有。他们对于“表演”的结果极为满意。当时毒气室门上特设的窥视孔一直没闲着。他们对于这个新建立的装置，赞不绝口。

“德格什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它是“德国除害虫公司”的缩写。齐克隆B就是这家公司制造的。由于齐克隆B在集装箱内容易变质，奥斯威辛不能大量储存。于是，该公司又生产出一种罐装齐克隆B，而且定期订货、交货。齐克隆B还有其他的用途。它可以在密闭的空间用于灭鼠，消灭虫虱。它可以用来烟熏房屋和船只，衣物消毒；如果人戴上防毒面具，还可用来除去人身上的虱子。因为犹太人经常被人说成是寄生虫或害虫，所以第三帝国在宣传中就说他们“应该象害虫那样予以消灭”。党卫队认为，在“最后解决”中使用齐克隆B，是再合适不过的。

用毒气大规模地杀人，这在纳粹党的上层人物内部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是要用一些好听的谎言来掩盖事实的真相罢了。运送毒药被诡称为，“运送犹太人重新定居所需的物资”。卡车运送的地点又美其名曰“奥斯威辛灭菌师”（用来真正灭菌的齐克隆B真是微乎其微！）。

霍斯及其同僚们学会了如何使这条杀人的组装线顺利地运转起来。菲利普·米勒是犯人中第一批充当清扫工中的一个，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居然呆了四年而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根据他的说法，第一次用毒气杀人时，简直乱了套。当时受害者们仍然穿着衣服，当他们被连打带搯地赶到农舍去时，他们明白自己要完了。几个进行反抗的人被卫兵们开枪打死。由于事先谁也没有想到要剥掉他们的衣服，因此他们

死后，尸体、衣服、屎尿和妇女经血搅成一团。犯人清洁工简直无从下手。

霍斯马上改变了做法。当注定要被送往毒气室处死的人们下火车时，霍斯或其随从者中的一员，往往要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来到这里就被剥去衣服，这一切应当是在尽可能平静的气氛中进行，这一点极为重要。”于是，他们就问犯人们有什么手艺。不明究竟的人就会大声说道：“我是裁缝。”党卫队的一名军官便和气地说上一句：“好极了！”“我是护士”，一名妇女会这样喊道。“好的，我们需要训练有素的护士。”

有时，当犯人们被押下火车时，他们看到由犯人组成的乐队，打头的是小提琴手阿尔马·罗泽。乐师们穿着白色罩衫，深蓝色的裙子，演奏着“风流寡妇”或“舟子曲”中的欢乐乐曲。

在更衣室里，受害者们注意到有一些标着号码的衣钩。有人告诉他们要记住自己的号码，以便洗完消毒澡后好取回自己的衣服。过道里有些指向“洗澡、消毒处”的箭头。墙上还贴着一些标语，提醒说“一只虱子就能让你送命”，“清洁可以带来自由”等。

当卫兵们随意打人，用皮鞭和棍棒把落在后面的人们赶进“澡堂”时，有些受害者开始惴惴不安了。当那些能够发现问题的人们发现淋浴喷头是假的时，顿时明白了真情，即使表示反抗也为时太晚，两扇钢门已牢牢地锁上了。党卫队的士兵们已经戴好了防毒面具，只听见二级突击队小队长默尔大声说道：“好吧，给他们点甜头尝尝吧。”随着这声暗号，他们就从屋顶的小孔里把那致命的药丸投了下去。

集中营的一名医生耐心地坐在厚厚的玻璃窥视孔前。他

可以看见赤身露体的人群站在那里，等待着送水淋浴时，突然感到有毒气。受害者为了活命，乱轰轰地撞击着沉重的钢门。他们踩踏着老人、虚弱者、妇女和儿童，有的人踩在跌倒在地的人们的身上往高处爬，企图躲过毒气。痛苦只持续了四、五分钟，尖叫声、祈祷声便停息下来。

只有几分钟的功夫，从焚尸炉冒出来的第一道火舌，便直冲云霄。火焰和烟雾昼夜不停地从烟囱里往外冒。在最忙碌的时期，一天之内就要杀死一万二千或更多的人，浓重的烟雾带着令人作呕的恶臭，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笼罩在集中营的上空。在屠杀的高峰期间，焚尸炉负荷过载，霍斯就临时在室外挖焚尸坑，以便处理更多的尸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名非常自负的官员说：“我们的办法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致于世上无人会相信这些事实。即使有一名犹太人能够逃出奥斯威辛，并把他的全部见闻公诸于世，世人也只会把他当作是一个想入非非的说谎者，谁也不会相信他的。”

后来，一个到过奥斯威辛的德军上校在谈到外界将会如何反应时，提出另一种看法：“在奥斯威辛发生了这一切以后，就要靠党卫队去尽快打赢这场战争了。因为，如果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了，那么我们可以确信，在奥斯威辛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德国也一定不会留下一个活人。”他的错误就在于，以为战胜国维护正义、反对作恶者的情绪要比最后一炉焚尸的余烬更持久。

克雷默尔医生把奥斯威辛形容为“世界的粪门”，是在1942年的6月。几个月后，当约瑟夫·门格尔驱车驶入挂着“劳动带来自由”的牌子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时，奥斯威辛正开始一个更为可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门格尔将起主导作用。

第四章 挑选人——决定犯人的生与死

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约瑟夫·门格尔担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二十二名医生之一的职务时，鲁道夫·霍斯组织的消灭犹太人的过程，正在全面展开。党卫队士兵打开运牲口车似的押送犯人的汽车的车门，大声喝道：“出来！出来！”这些来自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德国、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被放逐者，已经在闷罐车里关了许多昼夜，到了奥斯威辛，往往还要停在侧线上呆几十个小时，等待先到的犯人们下车。由于长时间呆在黑暗中，猛一来到耀眼的阳光里，他们眼睛都睁不开。

当荷枪实弹的卫兵们夺走他们带在身边的背包和行李时，这群又饥又饿，既脏且病，疲惫不堪，惊恐不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拼命地相互拉扯着。车上还留下许多死者的尸体，他们或是由于年岁太大太小，或是由于身患重病，熬不过这没吃没喝的漫长旅途而死去。还有一些人，则是由于虚弱不堪，爬不下车，只好也留在车上。

“这倒很象是一场慢动作的大溃退”，一位犯人回忆说。“简直是个疯人院，卫兵们大声叫喊、咒骂，狗又咬又叫，人们乱成一团，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可能由于看到了管弦乐队，听到了那安抚人心的关于工作的讲话，情绪稍稍镇静下来。但是，冲天的火焰和那难闻的恶

臭，很快又使他们全都惊恐不安起来。这儿还能看到一些身穿黑白条纹、衣衫褴褛的脸上毫无表情的人，他们显然是犯人，在人们中间走来走去，把大家的行李堆集起来。

一名军官通过手提扩音器喊叫，男人和女人要分开。能劳动的人站成一行。第二行则是些年老的、年幼的、带小孩的妇女以及所有被认为体质太弱不能为第三帝国劳动的人。第二行的人要立即前往犯人们生活的村庄去。

这完全是集中营精心制造的骗局的一部分。凡被认定不适于劳动的人，则直接送往毒气室，只是在脱去衣服时才稍事停留。他们来到奥斯威辛后，甚至从未登记过，集中营的长官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或籍贯。

当然，谁适宜从事奴隶劳动，谁应该直接被送去处死，这件事需要一名医生作出决定。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于1943年5月，几乎是在他刚来到这里就开始充当起这一角色。证人们证实，自他来到奥斯威辛以后，看见他执行这一任务总共有七十四次之多。很有可能，他在铁路的侧线上还多次执行过这种任务，不过，那些在现场看见过他的人都已死去。

然而，还有几个幸存者对于门格尔当年对新来的犯人进行挑选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匈牙利病理学家米克洛什·尼斯利，在他来到奥斯威辛的那一天，看见“一名年轻的党卫队军官，制服笔挺，皮靴锃亮，衣领上饰有金色的圆形花饰”。当这位花花公子问起有无具有医疗经验的人愿意从事尸体解剖工作时，尼斯利向前迈进一步。由此他才能够活了下来。

1943年，当纳坦·夏佩尔蹒跚地走下火车时，看到“成百名的党卫队士兵和秘密警察正在等候。我们受到一个人的欢迎，这个人我马上就认出来，他就是‘屠夫’门格尔医生。当

我们这一行人走近那些军官时，变成单行的队伍，从这个毫无人性的魔鬼身边走过。他和其他几个人站在一个小小的高台上，凌驾于我们之上。他举起手，伸出拇指，前后不停地转动着。士兵们赶打着我们从他身旁走过，越赶越快。我们当时并不明白他转动拇指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很快就明白了。向左边的一队是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大约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中年人、老人、年幼的则往右边走……”

“弗兰妮亚（我的一个朋友）和她的妹妹本来朝着左边走去，但当她们看到自己的母亲向另一边走去时，她们又走了回来，问门格尔医生她们是否能与母亲呆在一起。门格尔微笑着说：‘可以，当然可以。’于是，她们就向右边一队走去了”。

吉泽拉·佩尔是一位匈牙利医生。她本来是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但后来由于匈牙利的统治者霍尔蒂海军上将眼见德国盟友要失败，便设法寻求另外一种和平，佩尔等人才被送到集中营来。纳粹分子和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很快就控制了匈牙利，开始大规模地把犹太人运往波兰的集中营。当佩尔来到进行挑选的地点时，她本来一心想乘坐为体弱者准备的卡车的，但是她的女儿极力劝她步行。“一名党卫队的军官问我有多大年纪，我少说了几岁。他说：‘您可以步行’。这样，我就被送进那个可以保住性命的队伍中去。这个军官就是门格尔。”但是她看见父亲紧紧抓住他的那本祈祷书从门格尔身边走过时，被带到另一边去。此后，她再也没有看到过父亲了。

“他们把我们卸下火车”，一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囚犯伊丽莎白·默梅尔斯坦说：“于是那个有名的门格尔医生就说：‘向左，向右，向左，向右。’一拨拨犹太人商量着该

怎么办。可是我们都被弄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母亲们追随着孩子，孩子们又跟随着父母。我跟在我父母的后面，门格尔用德语说：‘你留下，肥猪！你可以去干活。你还年轻！’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情景。我曾三次跑回父母身边，他又三次把我拉了回来。我的姐姐和我在一起，但是他们把她的孩子弄走了。”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卫·马克按照门格尔的指示走向一行队伍去，他的父亲则走进另一行。老马克乘混乱之际跑出队伍把儿子拉到他的那行队伍里去，从而救了儿子一命，没有让他被杀死。

吉泽拉·赫尔什是随那一拨匈牙利人一起被运来的，其中还有她的一个兄弟、三个姐妹和双亲。当他们看到那些“身穿灰色条纹衣服的怪人”时，吓得胆战心惊。“我弄不清楚他们是男是女，他们都是光头，”她这样对别人说。他们把包裹、手提袋、箱子和背包存放以后，想把外衣留下。一名士兵端着步枪命令他们把这些外衣留下。他安慰他们说：“放心，到了营房，都会还给你们们的。”

赫尔什的母亲还不明白，就问道，这些东西堆在一起，怎么能够分开，做到物归原主呢？

吉泽拉·赫尔什在她的《吉泽拉，救救孩子们》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突然，我们听到了乐曲声，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施特劳斯的一支圆舞曲！乐曲声在早晨灰蒙蒙的空气中欢快而有节奏地飘荡着，使人镇静，给人安慰……欢快的曲调向我们诉说着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生活，它给前途带来了希望。一个高个儿、漂亮的党卫队军官在我们身边大步走了过去，来来回回地走动，观察着。”他就是门格尔，他在寻找一个翻译。他发现吉泽拉·赫尔什的德语

说得象本国话一样好，他想利用她的这个本领，便命令说：

“问一问每个成年人，‘您多大年纪？’用匈牙利语问，再用德语告诉我。”

一位大胡子老头站在排头。他说他七十二岁。吉泽拉·赫尔什用德语向门格尔重复了一遍。“这位医生轻轻地弹了一下手指，站在旁边的一名身着褐衫的军官，就把老人朝着医生手指的方向推去。”随着，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走了过来。她只有二十二岁。门格尔用手指右边，就是那位老人走的那条路。接着是一个由母亲打扮得干干净净的三岁小女孩。她穿着宽松的裤子和一双别致的黑皮鞋。赫尔什认识她，叫索菲娅，她在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吃一顿丰盛、美味的早餐。门格尔问了问她的年龄。接着是她的母亲，二十三岁，体弱多病，疲惫不堪。门格尔把索菲娅母女俩打发到右边去了。小女孩抱着的玩具小狗掉到地上，她走回来想要拾起来，一名士兵用枪戳了她一下，用脚把玩具狗踢到一边去了。下一个是索菲娅的父亲，他大声喊道：“没关系，我把狗给她捎去。”

门格尔要他住口。他得知这位父亲二十九岁，就把他弄到能够干活的那一队去了。但是他提出异议，表示要和家人呆在一起。一名士兵说，他以后会和她们再见的，男人们要在分开的营房吃早饭。这位父亲仍然表示反对，于是那个士兵端起了枪。这位父亲便走到左边那一队去了，对于这种挑选工作的含意，依然莫明其妙。

整整一上午，吉泽拉·赫尔什向每个人都提出同样的问题。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原来被分派到能干活的那一队去的，但她问能否和她的父母一起呆在右边那一队里。门格尔耸耸肩膀，就让她急急忙忙地去送死了。

当赫尔什自己的一家人走到排头时，赫尔什试图向他们说明分成两个队伍是什么意思。她已经注意到，所有象她十二岁妹妹卡嘉那样年纪的人，都被送到右边那一行，“送到冒出浓灰色烟雾并且在不断地涌向暗灰色天空的工厂去。老人们也要到那里去。当然，这就是说，送到右边去的人，不需要他们干活了。”这种情况在赫尔什看来是讲得通的，因为这与艾希曼在匈牙利人动身时所作的允诺是相符的。但是，赫尔什对于把三十五岁以上的妇女也要去处死却感到困惑不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还能够干活，可是也被送到右边去了。而且，赫尔什自己的母亲也是三十五岁。

当她的妹妹们走过来时，她暗示她们装着不认识她。她把每个人的年龄都加了两岁，结果连最小的妹妹也被说成十五岁了。所有这些姑娘连同她的弟弟都被分到左边去了。

接着，她的父母来到她的面前。吉泽拉·赫尔什把她的母亲的岁数少报了一岁，说她三十四岁。把她父亲的岁数减去了五岁，说他四十九岁。她的母亲对她说：“吉泽拉，爸爸和我要在一块儿。”

“这个女人想和丈夫在一起”，赫尔什对门格尔说。门格尔的手指猛地动了一下。她的母亲和父亲手挽着手走向注定要被送往“工厂”去的那一队。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

1943年10月，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军队投降了。这个独裁者本人逃往北方的一个安全地方。党卫队的士兵们和残余的法西斯警察统治着罗马。在这个月的一个安息日，一千名被兜捕到的犹太人，被送往奥斯威辛。甚至连集中营长官霍斯也来到铁路侧线上迎接这群意大利的囚徒。谣传说，这些罗马人非常阔气，身披皮裘，满身珠宝，女人们衣着极为时

笔。

阿尔米尼奥·瓦赫斯伯格是一家照相光学仪器厂的工人，出生于奥地利的阜姆城，这个城市后来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约割让给意大利了。当时他在这群罗马犹太人中间。他们在铁路侧线上焦急不安地等待了一夜后，爬下了火车。门格尔正在值勤，瓦赫斯伯格这时还不了解他的身份。

纳粹分子们欣赏够了这些奇装异服、珠光宝气的洋人后，就去干他们的事了。他们大声地对这些新来的犯人发布着各种命令。他们显然听不懂这些命令。于是，门格尔便问道，有没有人可以充当翻译。正如罗伯特·卡茨在他的《黑色的安息日》一书中所报道的，瓦赫斯伯格自告奋勇地充当了翻译。

“他要我去说，上了年纪的女人和带着孩子的女人将要坐上卡车，送往十公里外的集中营去。年轻的留下步行去。如有感到疲劳或不愿走这么远的，也可以坐车去。”瓦赫斯伯格回忆说，队伍里大约有四百五十名年轻而且体格健全的人，“其中约有三百人选择坐车走。”于是，他们就去送死了。

在整个挑选工作中，瓦赫斯伯格一直在观察门格尔的举动。“他举止文雅，平静而泰然自若，但显露出一一种沾沾自喜的样子和一种迷人的魅力。他一边暗示把犯人送向右去，或送向左去，一面哼着瓦格纳的一支咏叹调。”

“我也想爬上车去，因为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车上。但是，当我爬上车时，门格尔走了过来，把我拉了下來，说：‘你要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要你当翻译。你到了集中营，就会找到他们的。’然而，我们只走了十分钟就到了集中营，并没有十公里远。”这一发现使瓦赫斯伯格感到惊恐不安。

瓦赫斯伯格和他的罗马同胞都被剃了光头，手臂上刺上号码，脱去衣服用冷水淋浴并喷洒了消毒剂。在他们到达奥斯威辛的第一天，就看到了犯人的暴死。他们看到一名犯人因为动作不够快，被枪杀了。还有一人因为精疲力尽倒在地上，就在他倒下的地方活活地被打死了。另一个人在绝望中自己触电身亡。

“年纪比较大的犯人对我们说：‘你们的亲人就在那些冒烟的地方。’我们不愿相信他的话。另外一些犯人说，我们的家人只是到消毒区去了，然后再转到家庭营去。我们愿意相信，他们是去家庭营了。

“第二天，门格尔来到我们的营房，对我们进行盘问。他问我们关于意大利的消息，并且要我当晚到他的营房去一趟。他要我尽量具体地谈谈1943年7月25日（即废黜墨索里尼的政变那天）起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并对他谈谈民众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情绪如何。我刚要走时，他送给我一些小面包，一点人造黄油和血肠。”

门格尔有好几次在晚间把瓦赫斯伯格找去闲谈。“他想要了解法西斯垮台后意大利的情况。他极为不安，而且好奇，于是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他。我对他讲得越多，他问得就越详细。他饮了大量的伏特加酒，往往是酩酊大醉。一天晚上，当他醉意已浓时，我向他问起我的家属在哪里。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哪，’他说道。我对他说，有一群犯人对我们谈到过家庭营。

“‘瞧，翻译’，瓦赫斯伯格记得这位医生是这样回答的，‘这是劳动营。我们需要的是能劳动的人。其他的人——’他的双手暗示，其他的人都不存在了。”

瓦赫斯伯格追问说，他自己就曾翻译过门格尔所说的话，他许诺过，劳动的犯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家人。“您的一家人已不在了，”这位医生轻轻地说道。难道瓦赫斯伯格没有看见那冒着黑烟的烟囱吗？门格尔不能相信，难道没有人对这些意大利人谈到焚尸炉的问题。

瓦赫斯伯格争辩说（主要是对自己），在这样规模的集中营里，会有人自己病死或老死，他们的尸体必须加以处理。而他坚信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仍然活着。

于是门格尔从文件柜里取出了奥斯威辛犯人的登记册。他让瓦赫斯伯格看一份犯人的名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但没有看到我家属的名字。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需要工人’，门格尔回答说。

“‘我的妻子年轻力壮，她是能够干活儿的’”，瓦赫斯伯格说。

“‘不过她的孩子被杀死了’，门格尔说道，‘当妈妈的知道孩子们死了，她们是不会好好地干活儿的。’”

瓦赫斯伯格向门格尔问到那三百名要搭车走的身体健壮的年轻人的下落，他曾促使他们走上了通往毒气室的道路。

“‘翻译先生，任何人坐了五天火车以后，走不了十公里路，他也就干不了在我们这里必须要干的活儿。’”

瓦赫斯伯格得出结论说，门格尔至少有一部分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动的，这就超越了希姆莱所规定的界限。希姆莱需要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的供应。通常来说，下火车时活着的人的比例应为全部押送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被直接送去处死了。

装运人货的火车每天从早到夜里要开来三、四趟。从原

则上说，集中营挑选犯人的工作应由集中营的医生们平均负担。但是，门格尔执行的任务要比分配给他的工作多得多，也许是因为其他医生接受这项任务没有门格尔痛快。尼斯使用“不知疲倦”一词来形容门格尔对集中营挑选囚犯工作的热心。犯人特别小队队员阿里·富克斯的工作是负责押送新来犯人行行李的。他坚持说，他认为门格尔在从事对新来犯人的挑选工作时，“总是不分昼夜地连轴干”。

集中营里发生犯人直接反抗的事件是很少有的。尽管犹太人在国内对于纳粹分子和纳粹同情分子的野蛮事件，甚至是屠杀事件屡见不鲜。但当他们走下火车时，还是难以置信，一个文明国家（是的，许多人至今仍把德国看成是一个科学家、音乐家和诗人的国度）会把整列整列火车的人运到数千英里以外去杀害。

关于死亡集中营的传闻已遍布整个欧洲，但霍斯却让集中营的犯人们在一张精制的盖有“瓦尔德”^①邮戳的明信片上签名。明信片印有这样几句话：“我们在这里生活很好。我们有工作，受到良好的待遇。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到来。”正如吉泽拉·赫尔什所回忆的，替纳粹管理犹太人居住区的长者委员会从阿道夫·艾希曼那里得到保证说，年轻力壮的人可以劳动，其他的人则住到家庭营去。

从贝尔根—贝尔森运送来的数千名犯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不抱什么幻想。棍棒和皮鞭使大部分人害怕了，但还是有几百人拒不离开更衣室。一小撮党卫队的士兵闯进屋去要把他们赶出来，于是发生了一场搏斗。犯人们把这些看守痛打一顿，掐断了电灯电源。犯人们拿起从党卫队士兵们那

① 第三帝国虚构的风景区名，用以欺骗外界的。——译者

里夺来的武器后就乱开枪。霍斯赶到现场。犯人们子弹打光后，暴乱即被镇压下去。他们一个一个地被带到隔壁房间里枪杀了。

挑选工作被迫中断，门格尔暴跳如雷。扎哈瓦·莫根亲眼看到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经那位医生一指，要他到那个死亡行列里去，可是他却朝着他的那个合格去当劳工的儿子所在的另外一行人走去。门格尔勃然大怒，他抄起一根粗棍子，朝老人的头部猛然打去。这个违令者甚至还没有意识到他那微薄的努力是要逃避毒气室的厄运，就倒地身亡了。

确定新来的犯人能否充当劳工的职责由集中营的医生承担，他们必须到现场。实际上，这套做法是荒谬可笑的。凡不能站立起来走下火车者，均被这位党卫队医生认为是“官方核定的死人”。这些人中往往也包括那些婴儿，他们的母亲或已死去，或者虚弱不堪、无力携带他们。许多已经无力爬出闷罐车的受害者，尽管还活着，但还是被直接送往焚尸炉。新生下的婴儿会被扔进洗衣房的锅炉里去，这是再方便不过的了。

至于那些能够从门格尔面前通过的人，他往往是根据年龄来决定的。有时干脆只是扫上一眼就算完事。这样的决定是任何一个党卫队看守都能够作出的，根本牵扯不上什么医学知识。门格尔显然很喜欢这项工作。

集中营的条例还明确规定，毒气是否已将犯人毒死，要由医生鉴定。犯人特别小分队队员菲利普·米勒在现场注视着门格尔。“当我们走出吊车（尸体是用吊车送往焚尸炉的），集中营长官施瓦茨胡贝尔和门格尔医生就站在通往毒气室的门外。医生打开电灯后，就向前探身，通过门上的窥视孔，查看里面是否还有人活着。过了一会儿，他命令小队

长打开电风扇，把毒气吹走。”米勒注意到，这次毒气室的门被打开时，死人堆最上层的尸体竟滚落到院子里来了。

由于把新来的犯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迅速地消灭了，才使集中营的人能够保持在可以容纳的范围之内。但是，每一趟火车还要不断送来新的、比较健壮的奴隶劳工。为了给他们腾出地方，挑出一些人送去处死的工作，在集中营的范围内是经常进行的。挑选工作也由医生去处理。点名时清点人数往往就是要进行挑选的标志。最明显的候选人是那些“穆斯林人”，那些瞪着一双双僵尸般眼睛的男男女女。他们骨瘦如柴，肮脏得简直令人难以形容，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似乎已不再关心。所以要用这个字眼，因为在德国人看来，这些一个个来自远方的人就象作祈祷的穆斯林一样。

所以会出现这种死人一般的沮丧表情，是因为他们的亲人死了，他们经常遭受棍棒的毒打，而且天天在挨饿。有些人在没有沦为“穆斯林人”的地步之前，就下定了决心要去触电网死掉；还有一些人则故意越过周围的死亡警戒线去寻死。

但是，毒气室和焚尸炉的胃口很大，从来没有足够的“穆斯林人”能填饱它们。夏洛特·德尔伯曾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战斗，1942年被俘后被送往奥斯威辛。她的丈夫已被处决。她在《我们将无一能生还》这本书中回忆点名时的情景说：“一名党卫队员出现在集中营大街的尽头，他朝着我们走来，在我们队列的前面停了下来。从他军帽上的标记来看，他肯定是个医生。他慢慢地把我们每个人看了一遍，然后开始说话。他不是在大喊大叫。他提了一个问题，但没有人回答。他喊了一声，‘译员。’玛利亚·克劳德走出了队列。这个党卫军重复了一下他的问题，玛利亚·克劳德翻译说：

‘他问我们中间是否有人忍受不了这种点名。’他注视着我們。瑪格達，我們的犯人頭目，注視着我們，並且往旁邊挪了挪步，輕輕地眨了眨眼睛。

“實際上誰能忍受得了這種点名呢？誰能在深更半夜餓着肚皮不睡覺，在雪地里站上幾個小時呢？有一些人舉起了手。這個黨衛隊軍官讓他們走出隊列，數了數人數，太少。他輕輕地又說了句什麼，瑪利亞·克勞德翻譯說：‘他問是不是還有別人，老的，病的，感到早晨点名太難受了’。這是要使受害者們成為他們自我謀殺、自我挑選中的幫凶的又一次努力。又有一些人的手舉了起來。於是瑪格達迅速地用肘碰了碰瑪利亞·克勞德。瑪利亞·克勞德不動聲色地說：‘不過，最好不要這樣說。’已經舉起的手又放下了，只有一個人還舉着，是一個小得可憐的老太太。她踮着腳，把手盡量舉得高高的，晃動着，唯恐別人看不見她。這個黨衛隊軍官走過去，老太太大着胆子說：‘先生，我六十七歲了。’她身旁的一些人‘噓、噓’地暗示她不要說話。她却生氣了，如果說對年老多病的人，在一些例行公事上的要求不那么苛刻，為什麼這些人却要阻攔她，不讓她說話？他們為什麼不讓她利用這種機會得到一點好處？由於受人輕慢，她感到絕望，便大哭起來。象她那么大岁数的人居然尖着嗓子嚷道：‘我，先生，我已六十七歲了。’那個黨衛隊軍官聽見了便轉過身去。

“‘得啦！’他說了一聲，於是這個老太太便走到那個新編成的小組里去，由那個黨衛隊醫生領着往第二十五号楼去了。”正如這位犯人頭目所知道的，這是在給毒氣室挑選送死的人，而第二十五号楼則是待屠宰的牲畜的儲存欄。隨後德爾伯注視着那些被選中的人上了卡車。現在他們終於明白

了自己的命运。“尖叫声划破了蔚蓝色的天空，一个个光头挤在一起，他们嚎啕大哭起来，一张张嘴由于无声的恸哭扭曲着，一双双手无声地挥舞着，时间停止了。”

“点名，”吉泽拉·佩尔说：“是个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刻。天空没有亮光。可能是凌晨三、四点钟或者五点，也可能是傍晚，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把我们赶出去点名。我们排成一行，又冷又饿，破衣烂衫的。点名可能要持续一个钟头或两三个钟头。不管多么长久，简直象是过了几年似的。门格尔终于来了，服饰考究，穿了一件漂亮的蓝色衬衣，这么潇洒，这么漂亮，脸上带着微笑，身上散发出一股高级科隆香皂或香水味。”

佩尔想在门格尔面前碰碰运气，试图打动他做医生的心肠。她曾试图用自己的特长为犯人姐妹们做些好事。点名时，她由于急救一名受伤的妇女，排队来迟了。她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医生，他会理解的。我便向他解释我迟到的原因。”门格尔却用穿着长筒皮靴的脚猛地向她的胁部踢去。佩尔因此一连两个月尿血。

露特·埃利亚兹1943年12月被当局用牛车送往奥斯威辛时已经怀孕了。她逃过了集中营的挑选这一关而活了下来。她还有几个月才临产。1944年5月，她听说年轻力壮的犯人将被送往德国去清除盟国轰炸所留下的断垣残瓦。这是离开死亡营的一次好机会，但也有危险，就是她怀孕的情况会被发现。

“我已怀孕七个月了。我听说孕妇要被送进毒气室的！我才二十岁！我要活下去！朋友们成功地把我的号码列进了送往德国的名单上。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劳工被送往妇女营，在那里还要进一步进行挑选。这一次，门格尔医生

要亲自进行挑选。我们赤身裸体，而且必须象傻瓜似地从门格尔身边走过。几个年轻的女人决定把我夹在她们中间，这样试图把门格尔的注意力吸引到她们自己身上。我们绝不能走近他。这可能吗？门格尔医生没有注意我！我能活下来吗？新的生命在我体内骚动着。”

露特·埃利亚兹的确到汉堡去了。她以为已经逃脱了门格尔的魔掌。但是，她还要面临门格尔的另一次挑选，其结果将是凶多吉少。

吉泽拉·佩尔有个朋友叫伊比，她曾六次逃过了挑选的审判，还曾从载往毒气室去的卡车上跳了下来。当门格尔在医院的病床上发现她时，他又把她挑选出来送往毒气室。当党卫队的士兵把一队周身一丝不挂的妇女押往毒气室时，伊比又挣脱逃跑了。这一次，门格尔亲自追捕她，抓住她后，就用木棍击她的头部。他一遍又一遍地猛打，直打得她站立不住，跪倒在地上。当她已无力挣扎时，她又被迫回到那个去送死的行列中去。

当这群妇女朝卡车走去时，门格尔大声喊叫道：“你想逃跑吧，你跑不掉。你要象其他的人一样被送去烧死。你就要被宰了，你这个下流的犹太婆。”佩尔看了她朋友最后一眼，只见她赤身露体，头被门格尔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一会儿，佩尔又在医院里看到了门格尔，他一面吹着口哨，一面用香皂洗他那血污的双手。

门格尔毒打伊比，不仅表现出他脾气暴躁，而且也说明，他干挑选工作非常尽职。任何人只要触犯了他的权力，就有使他勃然大怒的危险。他非常爱好这种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工作。无数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

1943年10月，犹太教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这一天，

门格尔驾驶着摩托车来到关押着两千名孩子的足球场。“突然，我们所有人都发起抖来，”约瑟夫·克莱曼回忆说，当时他才十四岁。门格尔登上平台，俯视着他的一片阶下囚。他问一个十四岁孩子的年龄。这个身材瘦小的、精通集中营里各种门道的小家伙回答说，他十八岁了。

门格尔勃然大怒，大声喝道：“给你点颜色瞧瞧！”他命令一个卫兵拿来锤子、钉子和一块木板。他让卫兵把木板钉在足球门的一根柱子的一定高度上。“从木板下走过去。”门格尔对孩子们下令说。孩子们马上明白了，谁的脑袋碰不到那个木板，谁就会被挑去送死。

克莱曼拼命地往鞋子里垫石块来增加身高。门格尔大声吆喝，向孩子们命令着，他们都吓得乱转。克莱曼设法混在个儿比较高的孩子们中间，才躲过了这次挑选。但是，还是有大约一千名孩子不符合门格尔的标准。当党卫队士兵牵着狗围捕这些惊恐万状的个儿比较矮小的孩子们时，只听见一片尖叫声。门格尔和他的密友维克多·卡佩西乌斯看着这场混乱，不禁哈哈大笑。孩子们越是哭闹着要妈妈，门格尔的兴致似乎就越高。就在这次赎罪日屠杀中，所有一千名孩子都被挑选出来送进了毒气室。

门格尔在赎罪日进行挑选工作，并不是随意这样做的。他非常熟悉他的囚徒们所信仰的宗教。他知道，在赎罪日这一天，犹太人要背诵这样一段祈祷文：羊群要在牧羊人（即上帝）的牧羊杖下通过，由牧羊人来决定谁将活着。赎罪日就是门格尔向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们作出表示的一次机会，表示他就是他们的手持牧羊杖的牧羊人，也就是他们的上帝。

在进行挑选的过程中，他往往心血来潮，寻找种种不同

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权力。有一群女犯人被迫在室外当着门格尔和他手下人的面脱光衣服游行。吉蒂·哈特也在其中。后来，门格尔又命令这些身上长满疥癣的骨瘦如柴的女人们跑步。凡是没有足够的气力一蹶小跑的，就要站到死亡行列中去。哈特使出最后一点力气，一颠一跛地跑完了所规定的距离。门格尔对此只是表示部分的满意。他上上下下注视着她那满身的脓疮和疖疤，最后才用手指指，让她站到那个可以活命的行列中去。

这位医生有时故意要弄犯人，这就给挑选工作增加了戏剧色彩。右边的一行并不总是意味着死亡，而左边那一队也不总是意味着能活着。当吉泽拉·赫尔什的母亲向着毒气室走去时，她对吉泽拉·赫尔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救救孩子们。”赫尔什和她的弟弟被分开了，他后来在另外一个集中营里死了，因此，赫尔什常常感到内疚。她把挑选工作看作是她履行义务的主要威胁。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例行点名结束后，和她同住在一个营房里的女犯人们没有回到住处去喝水似的茶，也没有乘机去上一下厕所，却排着队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赫尔什心中明白，这就是说要去进行挑选了。但是她没有料到，一个大场子里已经“密密麻麻地站了一大片赤身露体的女犯人。她们排成一行行，一直排到场边又折回来折过去。成千名身体软弱无力的女人和姑娘只穿着木底鞋，拿着自己的带有条纹的衣衫。”

她的妹妹们不愿光着身子走。犯人头厉声命令说：“脱光衣服，鞋穿着，拿着你们自己的衣服，排好队。不准说话！谁也不许出声，否则就枪决！”于是她们就不敢违抗了。

一行行一丝不挂的妇女，剃着光头，蹒跚地朝前走去。

赫尔什突然认出了这位值勤的军官：“这么漂亮，身材修长，挺挺地站着，这是门格尔医生。”他不再需要她来效劳了。她没有穿着她的那件红色圆点花纹的衣服，一头长而乌黑的秀发也被剪去，他已记不起她了。

门格尔的动作不停地变换着，妇女们就跟着朝左或朝右边走去。赫尔什不知所措了。她搞不清楚究竟站到哪一边好，因为两边都有能干活的人。一个妇女因为不愿和自己的妹妹分开，被一名党卫队员摔倒在地上，她的头猛地撞在一块石头上。两名犯人工头把她拖开了，如果她当时还没死的话，那也很快就会断气的。

赫尔什心急如焚，想不出一个能够拯救妹妹们和她自己的办法。最后，她认定（完全是凭猜测）右边的一行是要去送死的。因此，当她的的大妹妹走到门格尔身边时，他指了指右边。轮到二妹妹时，只听见门格尔说“瘦骨嶙峋的，肩胛骨突出来就象翅膀一样”，也走到右边去了。三妹妹被推到左边。吉泽拉·赫尔什自己也到了左边。她讲起了德语，这使门格尔及其同伙感到惊讶。“对不起，先生。我们是四姐妹，我想求您不要把我们分开。我们愿意在一起。”

门格尔似乎有点为难。

“我们都很结实、健康。我们都是呱呱叫的劳工。我们一天能干上十五个到二十个小时的活儿，都不会感到累。对不起，先生，让我们向您证明这一点吧。让我们留在一起吧！”门格尔和一名女党卫队队员走到一旁商量了一阵。他们走了回来，那个女党卫队队员便向赫尔什点了点头，感谢上帝，她的祈祷得到了回报。门格尔遂问道谁是赫尔什的姐妹，然后就把她们全都分到右边去了。

右边！这是去死，赫尔什心里暗想。赫尔什听到门格尔

说：“四姐妹”，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这一次右边并不是意味着死亡。

门格尔的许多行动似乎全凭一时心血来潮，但他从来没有为其后果而感到不安。犯人医生埃拉·林根斯是在奥地利出生的，她在回忆门格尔挑选犯人的行为时说：“他站在那里，两只手的拇指插在手枪皮带里。我还记得柯尼希医生，我必须说，他是出了名的，就跟罗德医生一样，事前总是喝得醉醺醺的。门格尔却没这样做。他也不必这样做，他干这种事的时候总是头脑清醒的。”

挑选工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意味着死亡，但对某些人，却又意味着生存。茨维·戈尔德贝格的状态已经接近于“穆斯林人”，他知道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已被害。“这个消息使我完全垮了。我不想再活下去了。”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安息日，这是为死亡机器挑选材料的最佳时刻。戈尔德贝格和几个伙伴坐在地上，舔着清水似的稀汤的碗底。一帮醉醺醺的党卫队士兵围住他们，把他们带走。“当我意识到这是要把我们送往毒气室时，我的膝盖都发软了……我是第一次站在这些铁门附近，在这些门的后面，骇人听闻的死亡在等待着我们大家……我们呆呆地站着，不肯动一下。抓住我们的那些士兵生气了，开始强迫我们进毒气室。我们就用使人毛发悚然的哭叫作为回答。这一拖延和骚乱，终于有助于使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得救。门格尔医生听到吵闹声，走出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那些不该充当挑选者这种角色的士兵们训斥了一顿。他宁肯让党卫队的士兵们丢脸，还是决定自己来进行挑选。当时门格尔似乎心情很好。他问戈尔德贝格多大岁数。这个年轻人用流利的德语回答，并补充说他适宜于干任何繁重的工作。门格尔夸奖他德语说

得好，而且听说这个年轻人还在但泽的德国学校里学习过，就饶了他一命。他是被那些士兵兜捕来的三百人中仅仅得救的五十二人中的一个。

“当我回到营房时，”戈尔德贝格说，“它对我来说，真好比一个名副其实的伊甸园。”不过，他认为他所以得以幸存下来，不是由于门格尔的同情，而是由于门格尔自认为只有他自己才配是一个真正的挑选者的这种意识。说来奇怪，但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德贝格以及其他那些在死神面前被门格尔救了性命的人，都永远无法摆脱对这位死亡天使的既感激又痛恨的矛盾心理。

第五章 治 病 者

约瑟夫·门格尔来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前，除了在莱比锡医院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实习医生，以及他在“海盗师”的那段经历外，他对于疾患和外伤却没有什么治疗经验。证据表明，他在奥斯威辛的时候，医术也没有什么长进。

如果门格尔对于治病有兴趣的话，他就会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个机会难得的好场所。弗兰克·施蒂弗尔是个波兰犹太人，他是学医的，是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转到奥斯威辛来的。他在《铃声的故事》一书中描述了集中营的卫生状况：“……无数的虱子，成堆的跳蚤，传染性腹泻四处蔓延，犯人们几乎是不停地往厕所跑。在所有这些疾病中，最厉害的，而且历次大战中都避免不了的是斑疹伤寒这个可怕的魔王。……这一切非常可怕，又都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是不断发生的。你把手伸进袜子里一摸，就能抓出一大把跳蚤来。你抓抓你的衬衣，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手指缝里都是虱子。你一感到肚子疼，屎尿马上就会沾满内裤。你一发烧，就知道这可能是斑疹伤寒。人们往往不得不作出的重大决定，就是我到底愿意怎样去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毒气毒死，还是染上上帝恩赐的自然福祉腹泻或伤寒而死去？”

犯人患病会带来巨大的危险。任何人只要患了重病或造成伤残，就有立即被挑选出来用齐克隆B治疗的危险。另一方面，被派去劳动的犯人，如果由于患病虚脱，马上就会招

致枪决。或者，如果有犯人干活时晕倒在地，也无人理睬，整天躺在烈日下曝晒，或者在零度以下的气温里等死。劳工队每天收工回来时，都要拖回五、六具尸体。

犯人去医院看病，首先需要经过所在营房的囚舍长的批准。得到允许后，才能去找集中营的医生和党卫队的医生。集中营医院根本不进行什么治疗。去医院主要是想乘机找个比较舒适的地方睡一觉。药物是从不发给犯人的。实际上集中营里堆有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许多犯人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时，随身带有药物，但都被没收了。医生们则带着他们这一行的器械。这些器械也被送进了“加拿大”的仓库。被派到医院工作的犯人们，用病人和捐赠者瞒着党卫队隐藏的贵重物品来换取药品和器械。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比较人道的看守，特别是汉斯·明希医生也能给予帮助。明希是党卫队医生，他有时自己也冒着风险试图行使他的医生职责，为犯人们看病。

医院所以医治病人，只是为了保证供应训练有素的奴隶劳工。另外，男男女女的犯人所以被送进医院治疗，也是为了减少施蒂弗尔所说的“斑疹伤寒这个魔王”的传染。

有一次，周期性流行的伤寒又爆发了，门格尔担心会蔓延到整个集中营，便采取了严厉措施。1943年夏，门格尔染过伤寒或斑疹伤寒，并且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健康。他重新工作后，决心用他惯用的报复性的狂暴手段来对付传染源。他把女集中营中的大约七百五十到一千五百名犯人全部立即送进毒气室处死，不管她们是否有病。这些女犯人以及她们身上的虱子就这样一同被消灭了。

空营房密封起来用烟熏消毒，自然是用齐克隆B。接着，对第二座营房的犯人进行消毒。她们的全部东西，破衣烂衫，床

上的被褥，也一同被销毁。经过消毒的犯人则发给消过毒的新囚服和所谓床上用品，住进了经过消毒的第一座营房。然后再对她们原来住的营房进行消毒。接着再对第三座营房中的犯人进行消毒。这种过程一再重复，一直到集中营中的这一区域的斑疹伤寒源根除为止。门格尔的方法付出了七百五十到一千五百条生命的代价。很明显，不用死一个人，只要建立一所经过消毒的新营房，然后在每座营房进行消毒时，也对犯人进行彻底的消毒，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

门格尔对于可能是伤寒的症状，仍然怀着病态性的恐惧反应。当病人们皮肤上出现类似斑疹伤寒的疹子时，波兰犯人医生达尼娜·科希秋什科娃看见门格尔的眼里流露出恐惧。为了不让门格尔干涉她对一群孩子所做的试验，她和同事们就用一种无害的药膏涂在孩子们身上。于是，他们身上出现了皮疹，门格尔便远远地躲开这群孩子。

没有任何记载说明门格尔具备一名临床医生所应有的技术。有时，他在诊断某些疾病时，也显示过一种危险的本领。在一次点名时，吉泽拉·佩尔极为恐惧地看见门格尔指着一名女犯人，说她患有猩红热。门格尔说的是对的，但是，证实这一点就意味着，不仅对这名女犯人宣判死刑，而且也会牵连与她有来往的任何人。于是，对门格尔隐瞒许多疾病的真实性质，就成为一场斗争。每当埃拉·林根斯遇到可能传染了斑疹伤寒的病人时，就在诊断书上写上“肺炎”。

凡是出现高度传染性疾病的病人，门格尔都要取病人的血样。佩尔便和其他犯人医生们共同想方设法骗过他。如果他们认为有的犯人确实患了要用毒气杀死的疾病，他们就用自己的血取样，送交德国医生检查。

犯人们往往请求佩尔予以合作，能让他们在医院住一、

两个晚上，以便休息一下。佩尔由于意识到病房是门格尔喜欢前来进行挑选的场所，因此她一般不得不拒绝说：“我说，你不要住在医院里，这里会传染的”。

门格尔命令林根斯编制一份病人病情明细表，其中包括病情诊断和康复日期。如果预测病情严重住院时间要长，这就等于判处病人的死刑。如果把病人的病情写轻了，预料不久就可出院，也会招致灾难。门格尔经常到处巡视，他在看完病历后就会嘲笑几句：“怎么，你说你是医生，可是你却打算让这个已经半死的可怜虫在四个星期内就出院？”

病人很快出院，就会死在集中营的院子里。当这个受难者摇摇晃晃地在院子里走动时，几乎总有一名看守随时准备扑灭这个摇曳不定的生命火花。倘若不是枪杀，那也会在点名时晒死、冻死或被挑选出来送去处死。门格尔往往是不会被这些花招所蒙骗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他有自己的记载，知道谁大约在什么时候出院。

佩尔和林根斯都看出，门格尔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虚构的说法，即奥斯威辛集中营所进行的是真正的医学。“特别是”，林根斯回忆说，“1944年5月，当最糟的情况暂时过去时，门格尔医生在一次全体犯人医生的集会上说，‘女士们，现在我们医院已经创造了综合治疗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当好的了。’他这样说，是指那个连窗户都没有的马厩，现在空出来用作患结核病犯人的病房。”

林根斯又进一步讽刺地写道：“仅仅十五分钟以后，那些烟囱就开始喷出一阵阵浓黑的略带甜味的烟雾，弥漫了整个集中营。耀眼的火舌一冒就有六英尺高。烧焦了的脂肪和毛发的恶臭让人受不了。”

门格尔对于穿戴十分讲究，总是一尘不染。他也这样要

求他手下负责这些叫做“医院”的可怜简陋工作的人员。犯人和病人甚至连肥皂都不发，可是门格尔却强令佩尔和她的同事们要保持墙壁的清洁，并擦洗地板。由于无药医治大小便失禁的病人，因此要保持正常的卫生环境实在难以做到。

男女犯人住院期间，得了传染病，的确又康复了，不过这是一个诡计。纳森·夏佩尔在奥斯威辛党卫队开办的一个矿里干活时受了伤，他住院期间染上了传染病。每个星期四门格尔都要来查房，看这里的病人，凡超过两周仍未痊愈者就被车运往毒气室。十四天的期限也许与门格尔对病人的康复缺少耐心没有关系，而是考虑到奴隶劳动的经济问题。因为法本工业公司只给党卫队支付每名病人两周病假的工钱。

夏佩尔很幸运，他反常的高烧引起了门格尔的兴趣，特别是因为他的主治医生，一个捷克犯人医生解释不了病因。门格尔在第二个星期四那天，挑出了七、八名病人，用车把他们送走，却让夏佩尔留下了。那个捷克医生一天三次用冰块给夏佩尔降温。门格尔第三次出现时，他把这所小医院里的所有其他病人都打发掉了，但又给夏佩尔一周的宽限，门格尔第四次前来查看时，医生们刚刚离开夏佩尔的床边，他就立即从左腋下取出体温表，把它放在床头柜上，让它暴露在冷空气中。当他听见医生们走回来的脚步声，就迅速把体温表放在左腋下。体温表上的读数比以往各次都明显地有好转。门格尔对于治疗的成效，似乎感到满意，于是就走了。夏佩尔意识到他的好运已经到头，必须在门格尔再次出现前出院，虽然这时他并未痊愈。

门格尔作为一名医生，面对着赤裸的身体本应采取临床超然的态度。但他对于病人却表现出色情的兴趣。他特别喜欢挑选光着身子的女犯人。这种事情对于其他医生也是屡见

不鲜的，因为它还有进一层的意思，就是要羞辱犯人，剥夺他们人的尊严。但是，门格尔给这种做法加上了他自己的特色。他在医院出现后，首先命令全部病人把那些所谓衣衫的破布片脱去。根据埃拉·林根斯的说法，然后他盘问这些女犯人性生活的详细情节。这种盘问看来其根源在于性反常。门格尔提到犹太女人时，总是把她们叫作臭婊子。吉泽拉·佩尔认为，他对犹太人的憎恶——或者说是犹太人的诱惑力？——如此强烈，即使他有机会与犹太女人性交，也不会勃起。罪行膨胀的同时也伴随着“消肿”。

当然，佩尔确实也感觉到过门格尔发怒的痛苦。集中营中的许多党卫队队员不顾希姆莱关于不得与犹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禁令，利用职权奸污这些女犯人，法尼娅·弗奈伦是一位歌手。她著有《及时行乐》一书，谈到奥斯威辛管弦乐队的经历。她有时奉命去门格尔的住处为他演唱。弗奈伦临死前谈到她和这位医生历次相遇的情景，听者得到这样一种明显的印象，就是她是在谈论一位过去的“情人”。

一直传说门格尔在集中营与一些女人有瓜葛。首要的一个是二十一岁的女看守，伊尔玛·格雷塞。她是门格尔的助手之一。格雷塞有一双碧蓝的眼睛，满头金发，许多人称她为“美人”。她曾在希姆莱的私人医生和矫形外科医生卡尔·格布哈特的手下学护士。但她没有当护士，而在牛奶场找了一个工作，后来加入了党卫队。希姆莱原来是养鸡的，格雷塞是养牛的——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格雷塞使她的上司们深信她能够管理三万名女犯人。她就象门格尔一样，总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模样。她每次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精心地打扮一番，穿上没收来的最漂亮的衣服才露面。有时，她喜欢穿着一双长筒靴，臂部挂

着一支手枪，手中握着一根鞭子，在院子里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她似乎喜欢用鞭子抽打女犯人的乳房。表现出一种性虐待狂的色情本性。

佩尔认为格雷塞是一个搞同性恋者。但有一次她曾命令奥尔加·仑格耶尔为她做妇科检查，以便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检查结果是否定的，因而仑格耶尔得到了一点食物作为报酬。也有人传说，一名女犯人为格雷塞做过人工流产。

由于格雷塞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努力工作，曾获得一枚奖章，然后又被调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在那里继续鞭打和杀害犯人。英国人解放集中营时将她捕获。格雷塞被判犯有战争罪行，于1945年被绞死。虽然门格尔似乎对女性同性恋很反感，但没有证据说明他曾对格雷塞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虐待犯人的行为有过劝阻。例如，有一次，他愤怒地谴责女犯人中间盛行的同性恋行为，使得林根斯大吃一惊。门格尔在这方面是非常古怪自负、非常敏感的；因此，林根斯不敢吭声，因为她知道为这种行为辩解只能是火上加油。

门格尔由于内心性的矛盾，对犹太人的憎恨（不是没有关系的）以及一心想要控制集中营犯人口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因而对那些十分不幸的怀孕的女犯人特别严厉。米迪恩·施特恩贝格·纽曼是被监禁在集中营里的一位护士。据她说，在一次点名时，门格尔让怀孕的妇女走出队列来去干轻活儿，她们实际上自己选择了去乘终身最后一回的卡车。另一次点名时，他命令看守们在有怀孕迹象的女犯人腹部画一个红十字。她们都被害了。佩尔例行公事地报告说：“我谦卑地向您报告，集中营里没有人怀孕。”

犯人们了解了门格尔的态度以后，她们就开始隐瞒自己怀孕的事实。有一次，门格尔走近吉泽拉·佩尔，让她报告

孕妇的名单。他解释说要把她们送往另一个食品供应比较好的集中营去。有些信以为真的女犯人听到这个好消息后，竟真的主动告诉门格尔自己有孕。这一次，又是她们自己选择了死亡。“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说她怀孕了，”佩尔说，“我就担心她可能是门格尔派来的密探，是来考验我的。”门格尔经常变换手法。他指示佩尔说，要允许孕妇足月后生下孩子。尽管他许诺不杀害母亲，但他不保证婴儿的生命。

佩尔明白，门格尔是想用新生婴儿来做他的试验。育婴意味着母婴“双双”死亡。“两条生命都会被扔进焚尸炉里去，”佩尔说，“我拿定主意，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再不能有女犯人怀孕了。”她开始在夜间为孕妇堕胎：“夜深人静时，在肮脏的地板上，只用我的一双肮脏的手。”

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妊娠时期过长，人工流产已为时太晚。“在夜色中，其他每一个人都集中在集中营黑暗的角落里睡觉了，我却在厕所里，一滴水也没有，就在地板上为她们接生。对于妊娠九个月的孕妇，我为她们人工破胎膜，加速分娩，一般在一、两天内，就会自然分娩，无需进一步帮助。或者，我用手扩张宫口，翻动胎位使婴儿降生。黑暗里，在一片污物和尘埃中，只用我的五个手指匆忙地干，没有药品，没有工具。孩子生下来后，我很快地把母亲包扎好送回她的营房，准备去干活儿。如果她需要在医院休息，我就说她得了肺炎。当我不得不毁灭这些婴儿时，任何人都不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喜爱这些新生婴儿，不只是因为我是名医生，而且也因为我是一个曾经交出了自己女儿的母亲。我被捕时，曾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一个非犹太人家。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好象我是在杀死自己的孩子，以挽救这位母亲的生命。我祈求上帝帮助我拯救母亲。如果我

做不到这一点，母亲和孩子们都会遭到杀害。”

门格爾的行为证实了佩爾的担忧。有几次。他对怀孕的女犯人关怀备至，作了全面的安排，其中包括接生时的灭菌环境。他极为小心地剪断了脐带。大概三十分钟以后，母亲和婴儿都被送进了毒气室。

一个名叫热奈特的巴黎妇女在这一期间即将分娩，而且是难产。吉泽拉·佩尔发现热奈特怀的是双胞胎。佩尔认为最好还是告知门格尔。开始接生时，门格尔就来了。“孪生子！孪生子！”他大声喊着。“孪生子终于要在这里出世了。”他对这位母亲表示感谢，为婴儿们准备了一个篮子，还有一些小衣衫和真正的羊毛毯子。这些东西无疑是从“加拿大”仓库那里拿来的掠夺物。热奈特本人也得到一件前所未闻的奢侈品，一条白床单。

分娩后过了一天，两名党卫队士兵闯进医院问道：“孪生子在哪儿？”他们抱起婴儿就走了，撇下母亲惊恐地哭骂着。佩尔和她的同事们安慰热奈特，谎称要进行例行检查。每天晚上这对孪生子被送回来，但看起来他们呆在门格尔那儿情况越来越糟。两周后，一个婴儿死去，另一个不久也死了。热奈特本人后来也被挑选弄走了。

露特·埃利亚兹怀孕七个月，由于藏在其他决定送往汉堡去清除炸弹片的年轻妇女中间，才逃过了门格尔的挑选。但到达汉堡，德国当局又把她送回了奥斯威辛。门格尔对于他在挑选中竟会忽视她已经怀孕这一情节，百思不解。他把她送回医院，去等待分娩。

孩子生下后，门格尔为自己竟被愚弄一事进行报复：他把这位母亲的乳房结扎起来，不让她给婴儿喂奶。露特·埃利亚兹回忆当时她所遭受的折磨说：“我的孩子饿得直哭，她要

吃奶。我把一点点面包嚼碎，放进她的嘴里。我的乳房涨满了奶，乳房以上直到颈项都肿胀起来。门格尔每天都来看这种情景取乐。八天后，他命令我说：“明天早晨你和孩子准备一下，我来带你们走。””这位母亲明白了，他打算把她们母女俩送进毒气室。

当晚，一位在医院里工作的犯人来到她的床前对她说：“不要绝望，我来帮助您。”灯熄后，这位撒马利亚人拿着一个注射器回来了。“给您的孩子打一针，这是大剂量的吗啡，孩子打针后就会死的。”埃利亚兹反对这样做，她不愿杀害自己新生的婴儿。

“您必须这样做！我是一名医生。您的孩子已活不成了，她已饿得半死，出现了饥饿浮肿。”争辩了两个小时，埃利亚兹已失去对自己的信心，简直要发狂了。但最后她还是让孩子注射了这致命的一针。

“我已经歇斯底里了。这位医生告诉我，我的孩子就靠在我身边慢慢地死去。我还能听见她最后的呼吸、最后的呻吟。”

那天凌晨，护理人员把夜里死了的人收集在一起，送到焚尸炉旁的尸堆里去，埃利亚兹的孩子也在里面。门格尔来后问埃利亚兹：“你的孩子哪儿去了？”她回答说死了。门格尔说：“我要看看尸体。”她说：“夜里死的。”

门格尔毫无反应，只说了句：“那么，你又走运了。你随下一批人出去干活儿去罢。”

门格尔在这件事里的行为，不仅是想要惩罚埃利亚兹，而且也是为了进行他那极为残忍的试验之一，新生婴儿要几天才能饿死。

扎拉·诺姆贝格—普许蒂克曾在一个妇女医院里工作。

一名犯人女医生向他传授了秘密接生的办法。诺姆贝格—普许蒂克在她所写的《奥斯威辛》一书中说：“分娩不得不在暗地里进行。料想这事神不知鬼不晓。在医院的住房里分娩，要想瞒过德国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办法是，婴儿出生后采取某种手段弄死他，而又不让母亲知道。尽管有许多事实都已证明，但有些母亲却固执地认为，纳粹分子会对她们自己以及她们的孩子手下留情。我们给新生儿打一针，孩子便死了，然后再告诉母亲生下的是个死婴。天黑后，就把孩子扔进死人堆里。我们就用这种办法拯救了母亲。”

诺姆贝格—普许蒂克也看见过一次私下分娩的过程。她的任务就是提来一桶凉水。“分娩开始了。这名女犯人疼得紧咬着嘴唇，直咬得出了血。她没吭一声。她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抓得如此紧，以致于后来我的手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最后孩子终于生了下来。女医生曼西用手捂住孩子的嘴，不让他啼哭，然后把孩子的头按进冷水桶里。她好象在把一只还没睁开眼睛的小猫溺毙了。这时，我感到要昏倒了。”

“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曼西对母亲说。后来，死婴用一件旧内衣裹起来，扔进院子的死人堆里。

门格尔却用一种奇异的诡辩为杀害母亲和新生婴儿的罪行辩解：

“当一个犹太孩子出世时，或者当一名妇女来集中营时即已怀孕，我不知应该如何处置孩子。我不能给予孩子自由，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再自由地生活下去。我不能让孩子留在集中营，因为这里没有能够使孩子正常成长的便利条件。把孩子送进焚尸炉，而不让母亲在一旁亲眼目睹孩子的死亡，是不人道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母亲和孩子

一同送进焚尸炉的原因。”

除个别例外，党卫队其他医生的所作所为，都与门格尔毫无两样。林根斯说，埃德蒙德·科尼希医生一再抱怨说，他对于在集中营中执行任务，感到很痛苦；因此他为能够经受得住这种折磨，喝了大量烈酒。但是，科尼希也毫不留情地杀人。有一次，他对一例坏疽性口炎很感兴趣。这是一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流行的坏疽性面部溃疡。科尼希使用磺胺剂，并给病人使用维生素。这种治疗对于一名犯人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优待。当这名犯人的坏疽性口炎治愈后，他就把她送去处死了。

弗利茨·克莱因医生是一名中年党卫队医生，有时也表现出同情心。有一次，伊尔玛·格雷塞被某些犯人的举动触怒，她把三百五十名女犯人关在一间盥洗室里，三天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奥尔加·仑格耶尔劝说克莱因把这些犯人放出来。克莱因作为一名军官兼医生，他的权威取代了格雷塞的权威。当格雷塞听说，这是仑格耶尔向克莱因求的情，她勃然大怒，用手枪柄猛砸仑格耶尔的头部。

不过，克莱因一时表现出的同情心对于他固有的信念，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埃拉·林根斯竭力对他持有的社会准则提出异议，曾向他提出问题，不是问他同化犹太人是否可取，或者犹太人可否在德国人中间自行生活，而是问他，作为一名医生，他能否声称他重视人的生命。为了强调自己的意见，她还指了指那些冒着烟的烟囱。克莱因的回答是：“正是出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我才要从患病的机体上除掉化了脓的阑尾。犹太人就是欧洲机体上的化了脓的阑尾。”

一位显然与众不同的医生是威廉·汉斯·明希。细菌学家明希最初被列为不适于服军役者，后被征入武装党卫队。

1943年春天，党卫队的卫生学研究所派他前来奥斯威辛，大约与门格尔同期到达。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实验室里，明希的上司向他透露了奥斯威辛真正的性质：“一切对您来说都是崭新的，不过这也不太坏。我们与这里的杀人事情全不相干。那不是我们要做的事。两个星期以后，如果您不愿意呆在这里，您可以离开。”明希说，他决心要尽快地离开这里。

明希来到集中营几天，就越来越不愿再呆下去了。主任医官爱德华·维尔茨命令他去集中营执行挑选任务。明希拒绝了。维尔茨稍稍作了让步，解释说，不会让他经常干这一工作的。明希立即前往柏林，与卫生学研究所所长进行商谈。明希很幸运，他的上司同情他的观点，并打电报通知奥斯威辛，同意明希不参加挑选工作。

“一个人只有在刚到奥斯威辛的头几个小时里，才能象正常人那样作出反应，”明希在若干年后这样说：“只要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就不可能作出正常的反应了。在那种机构里，每个人都要被玷污。你就会被抓住跟着干，不能自拔。”但是，明希正好和他自己的论断相反，并没跟着干。他违反规定，搞来一些药品和器械，冒着会给自己带来的很大危险，秘密地给犯人们治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明希的名字在列有战犯的通告中出现。他从巴伐利亚被引渡到波兰，和其他四十名战犯一起受审。集中营原来的犯人纷纷出来为明希辩解，因此陪审团宣判明希无罪。

弗朗茨·卢卡斯医生的案情则不是一目了然的。他于1933年参加采取暴力行动的冲锋队。一年后他退出了冲锋队，“因为冲锋队成员们的行为全然不能令人满意。”1937年他

加入纳粹党，同年党卫队又接纳了他。

1963年至1964年法兰克福审讯期间，卢卡斯和其他二十名奥斯威辛的官员们一起受审。当局曾经希望门格尔也在其中，但他当时仍然在逃。

克拉科夫的T·S医生是集中营中的一名犯人医生。他作证说：“通过他（卢卡斯）我们才重又对德国人抱有信心。他给病人弄来药品，而且不理睬那些告发者送来的小报告。我们对于他的这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作法感到惊讶。”

另一位见证人把卢卡斯描述成为“能够把我们当作人来对待的唯一医生。”也许，卢卡斯的党卫队同伙们的态度对他最为有利。法庭听说，在卢卡斯调离奥斯威辛时，他在集中营中的同事们骂他是“不能为祖国尽自己一份义务的不孝子孙和叛徒。”

另一方面，前集中营犯人中也有人作证说，在采取暴力行动时，卢卡斯也在场，而且他也干过挑选工作。但他坚决否认曾充当过这一角色。一位妇女详细地叙述了当年的一次事件，在那次事件中，她正抱着她那还在吃奶的小弟弟。她说，卢卡斯从她手里夺过孩子，扔给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当时正抱着另一个孩子。这位见证人说，她是被安排到干活儿的那个队伍里的，而她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却是走向死亡的。

埃米·邦赫费尔是一个与审讯有关系的观审者。她的哥哥克劳斯·邦赫费尔和嫂子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因为反对希特勒双双被处决。埃米·邦赫费尔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协助前来法兰克福出庭作证的人们。她听取了对卢卡斯的起诉和为他所作的辩护。她在一系列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一直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这位医生究竟是犯了杀人罪，还是拯救了她（卢卡斯从她手中夺过孩子的那个年轻妇女），使她免

于一死？把七百五十人送进毒气室处死的命令不是他下的。他能够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力图逃避这次杀人任务。或者可以这样说，他挑出了二百五十名适于干活儿的人，从而就拯救了这二百五十人的生命。

“人们要是由于在这个事件中，既不见援助，也没有营救，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做很难说是公平的。可是，我已把当时的情景向你们描述过了，因为某些党卫队的士兵只要向魔鬼稍稍退让，他们就会明显地陷于两难的境地。”她阐述的是明希的观点。

法兰克福的裁决认定卢卡斯有罪，因为他起码参与了四次挑选工作，至少约有一万人死亡。他被判处三年徒刑。但是，上一级法院却将他释放，理由是他所以未能拒绝参预暴行的任务，是因为他真诚地认为，那样做会给他招致不幸。

有些集中营的犯人主动帮助监禁他们的德国人，希冀获得一份额外的口粮，一种轻松一点的工作，或者只是为了活命。犯人医生们和护士们每当他们在党卫队的高压下不得已而为之时，他们总是感到良心不安并且受到职业观的谴责。有的人对于当局逆来顺受，没有表示什么反抗。波兰人瓦迪斯瓦夫·德哈林医生以自己的医术为党卫队所驱使。然而，他却同情纳粹的宗旨。弗兰克·施蒂费尔是医院的护理员，他协助德哈林工作。“利沃夫的布尔什维克，”德哈林对他的新助手咆哮道：“我们要把你的睾丸割掉。”当另一名犯人为施蒂费尔辩解时，德哈林说：“库里洛维奇又来为犹太人辩护了。可是你应当明白，所有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

在德哈林离开现场后，库里洛维奇提醒施蒂费尔说：“要当心，伙计。绝不要和德哈林医生说些什么，谁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为他而被送进焚尸炉内烧掉了？当他看起来对

你不那么同情时，你就尽量不要露面。”

党卫队对于德哈林的合作给予了奖赏。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获得释放的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德哈林参与了集中营中的绝育行动，因此他为莱昂·乌里斯的小说《第七高等法院》中有关他的活动，以及一部以描写在英国的一起有名的诽谤案中他所起的作用为中心的电视片，提供了参考情况。

原告德哈林争辩说，他是在被迫情况下为党卫队效劳的；阿德莱德·娥塔尔出庭为其辩护。她是一位法国医生，曾坚定地拒绝协助门格尔进行任何他的那些试验。可是党卫队却没有惩治她。

德哈林声称，他曾设法逃避给作试验的犯人注射致死的酚剂。他说，由于他的这种人道主义的行为，党卫队曾限制他，不准他离开住所。陪审团作出了一个于他有利的裁决，说他受到了诽谤，而且还给了他一美元的赔偿费。这种审判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与纳粹合作也并不能保证活命。一个名叫萨默埃尔的上了年纪的犹太医生，获得了一个他自己的实验室和份外的口粮，以及与在瑞士的女儿通信的权利。突然有一天，萨默埃尔和他的科学研究都消失了。

调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这种地方的党卫队医生，对于这里的职责不是一无所知的；或者对于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抱有某种怀疑。当负责各集中营医疗工作的长官、旗队长恩诺·洛林接见一位新调来的党卫队医生时，这位天真的医生许诺说，他要把死亡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洛林当即解除了他在集中营中的职务。

“对于象我这样的一个医生来说，”吉泽拉·佩尔回忆

第六章 科学家

门格尔为集中营研究工作具有的潜力所吸引，来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实验室中塞满了供试验用的人。门格尔在养伤时，曾与以前的老师奥特马·冯·弗许尔联系过。1942年冯·弗许尔已担任柏林近郊达莱姆的德皇威廉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所长。

冯·弗许尔曾经大肆宣传过纳粹的种族主义。他在1942年宣称，“我们已经有了保护日耳曼血统和德意志世代相传的健康体质的法律。不仅这些专门法律，而且目前政府的整个领导及其成就都充分地意识到遗传和种族观念的价值。这种种族观念现已成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本原则。”

门格尔受到冯·弗许尔的启示，对孪生现象极感兴趣，认为这是揭开遗传和种族秘密的关键。冯·弗许尔和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德国第一流外科医生，后来转而反对纳粹）商定对门格尔计划在奥斯威辛进行的研究工作予以财政支持。

所以选择奥斯威辛作为犯罪的地点，是有充分理由的。1943年4月，负责各个集中营医疗工作的党卫队旗队长洛林曾经对一些听众说，奥斯威辛将要建立“一个生理学和病理学试验站”，并要与德国的海德堡、慕尼黑、柏林和柯尼斯堡的各大医学中心联系起来。甚至连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那些犯人医生，对于这个计划对科学的贡献，也留下深刻的

印象。

对孪生子的研究工作吸引着门格尔。由一个卵子诞生的孪生子称为同卵双生；异胞双生，即两个分开的卵子同时受精则比较少见，这种现象能为自然与营养影响的比较、遗传输入对经验和环境的比较提供极好的研究机会。门格尔希望通过对孪生子的研究，建立“血统”优越论，就是说，“血统”是使人具有所希冀的特征的决定因素。当前，在关于智力、补偿学习计划和社会改进方案的一系列争论中，仍在谈论着合法的孪生子的研究工作。

但是，米克洛什·尼斯利则认为门格尔所以对孪生子有这么强烈的兴趣，是别有企图的，即“增加日尔曼种族的繁殖……使纯种日尔曼人足以取代犹太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而所有这些种族的人都应被消灭，但目前他们却依然生活在被宣布为对第三帝国生存攸关的领土之上”。这一结论即是对尼斯利的，也是对门格尔的有关人类繁殖理解的置疑。为此，能够产生多生卵子的母亲便成了一个更能结出硕果的研究对象。

每当门格尔在铁路侧线上走来走去进行挑选时，他总要四处寻觅他所要的孪生子。他对孪生子的研究如此着迷，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在会见刚下火车的新犯人时花费这么多的时间。由犯人组成的特别小队队员收拾新来的人们的行李，并从火车上搬下尸体，由于他们知道门格尔的兴趣所在，就悄悄地告诉新来的犯人，让他们说自己是孪生子会有好处的。于是，父母们赶快把年龄和长相大体相似的孩子们集中在一起，教他们如何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随后，孩子们就自己说：“我们是孪生子。”这句话保住了他们的生命，然而，这却是具有意想不到的痛苦的生命。

1944年初，马尔克·贝尔科维茨和自己的孪生妹妹弗朗西斯卡，还有另外两个妹妹和母亲，被塞进装牲口的闷罐车里。他们是来自喀尔巴阡山地区的犹太人，在路上颠簸了三天两夜后，火车终于停下不走了。他们在上了锁的车厢里等了几乎半天的时间，直到深夜党卫队才来开门。

“谁也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贝尔科维茨说。

“有人问党卫队的士兵，士兵的回答是‘奥斯威辛’。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不过，我们知道他们把犹太人赶到许多可怕的地方去了。实际上我们在比克瑙就已尝到暴行的苦头了，只是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名字。”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名党卫队医生。我们第一个印象是，他待人极为温和，非常友善。我当时只有十一岁，被拉到男人们一边，但是我们谁也不明白这一行行队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四下看了看，发现了救护车（这是往毒气室运送齐克隆B的），这使我起了疑心。我跑到母亲那里，对她说：‘好象有些不对头。’妈妈说了我几句，让我不要跑来跑去。接着，我看见前面有许多衣着整齐的人，我就说，我们应该去问问情况。”

由于儿子的不断纠缠，母亲失去了控制，大声喊叫起来：“你们把我的一家人都抓去了，破坏了我的生活（她的丈夫和一个儿子在她们全家被捕之前，就被特别行动队杀害了）。别再把我的孩子们分开吧。别杀害我的孪生子吧。”

两名武装党卫队员听到了“孪生子”这个字眼，马上把贝尔科维茨的母亲和这个男孩拉到一边，并且警告说：

“不要走开，我们去叫医生。”

医生来了。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我要说，对于这里的混乱情况，我感到非常抱歉。要做的事

情简直太多了。请原谅。请问您的姓名？”

“阿德勒夫人。”她回答说。（后来马尔克·贝尔科维茨从奥斯威辛获得自由后，就放弃了阿德勒这个姓，并且移居到了美国）。

“阿德勒夫人，”门格尔说：“您的孩子们真漂亮，特别是您的儿子看上去很勇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他们真是孪生子吗？”马尔克·贝尔科维茨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而他妹妹的却是黑色的。

“我是一胎生下他们两个的。”母亲回答说。

“我们被送到一个家庭集中营，”马尔克·贝尔科维茨说：“这样的集中营有两个，一个是关押吉普赛人的，另一个是关押供医生们试验用的犯人的。这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我们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他们把我们关在一间空屋子里，党卫队的士兵们给了我们一些象毯子似的散发出一股尿骚味的破烂布片。我还看见上面有人的粪便。我们都睡在地板上。”

早晨，这家人第一次参加了点名，后来就吃早饭，一碗照得见人影的清水汤。没有要他们去干活儿，他们一家人单独住了几天，吃到的东西少得可怜，每天参加点名。门格尔来过几次，随便聊一会儿。有一天，门格尔提出，要让孪生子中的一人登记。“如果我让你们自告奋勇的话，我知道谁会来的，”他微笑着说：“我们就从你开始吧。”他对贝尔科维茨点点头。

“我的母亲开始哭叫起来，但是门格尔请她放心，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一名女党卫队员与他一道安抚我的母亲，让她安静下来。他用酒精洗洗手，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用一个电池作动力的装置慢慢地开始给我们打上号码。他干得非常

有耐心，而且也很细致。‘你是一个小男孩，将来会长大成人的，总有一天你可以说，你的号码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亲自给你打上的。你肯定会出名的，只是不要把它除去！’”

显然，门格尔相信他对孪生子的研究一定会在遗传学上获得重大的突破，到那时候，就连那些微不足道的供试验用的小人物也会沾这位医生的光而出名的。

第二天，门格尔来检查了他的杰作，并且夸奖贝尔科维茨能遵守他的指示。“你的胳膊有点肿，我看已结血痂了。你没有摸它，这很好。我已经喜欢上你了，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你了。”

门格尔对这家人继续笑脸相迎。所以，当他提议给孪生子再做一些试验时，他们并没有感到不安。

“我们当时认为，这可能是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某种研究，”贝尔科维茨说。兄妹俩便躺在实验室中的两张分开放着的台子上。“我感觉到针头扎进了我的背部。接着我感到浑身火烧火燎的。当时我知道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在拼命挣扎。”他也听到妹妹在抽泣。

“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这样做，”门格尔担心地说：“疼痛很快就会过去的。”大约过了四十年以后，贝尔科维茨仍然还感觉到由于那次注射而造成的疼痛。他没完没了地挨针刺，被注射过某种药剂，浑身感到钻心的疼痛。门格尔从他体内抽取各种液体，让他头顶着地倒立好几个钟头，还把他浸泡在灌满凉水的钢制桶里。门格尔把这两个孩子倒挂起来，是为了计算血液从他们腹腔里排出的速度。冷水试验是要取得失去知觉时体温的数据。

经受试验的其他的人都谈到了门格尔的这种彬彬有礼的残暴行为。“他在给我们抽血时，比所有的护士都要耐心。”

哈娃·布劳这样说。她是捷克人，当时只有十一岁。

莫什·奥弗尔和他的孪生兄弟蒂比也被用来作这些试验。“他们用X射线照我们，”莫什·奥弗尔说：“随后门格尔医生走了进来，给我们几块糖。他穿着一身白大褂，不过可以看见白大褂下面露出的党卫队的军裤。他给我们糖果后，就给我们打针，疼得我们难以忍受。”

门格尔挑出蒂比来作专门的研究。“他们决定给蒂比作外科手术，”他的孪生兄弟莫什·奥弗尔说：“而且经常地做……，在一次脊柱手术后他瘫痪了。他们又切除了他的生殖器官。第四次手术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兄弟了。”

莫什·奥弗尔幸运的是没有象他兄弟那样惨遭厄运，他活了下来。一对孪生子中只要有一人死亡，另一个也就活不成，这似乎成了一种规律。而门格尔却坚信这种现象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病理学家尼斯利解释说：“在正常情况下，谁会发现孪生兄弟会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死去？孪生子就象其他任何人一样。由于生命的情况不同，而死亡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他们彼此的生活相去甚远，几乎从没有出现过同时死亡的事例。一个人可能十岁时就死去，而另一个则可能会活到五十岁。在这种情况下，作剖析的比较是不可能的。”

尼斯利听说门格尔在奥斯威辛消灭了“生命的情况”。一天，他拿到了一对孪生子的档案材料。一名特别小队的女队员抬来一具棺材，里面装着一对两岁的孪生子的尸体。尼斯利看过临床报告后，就通过X光对两个孩子的尸体进行仔细的观察。一切看来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开始解剖尸体，首先解剖那个小小的心脏。他摘下一个孩子的心脏，进行彻底的检查。他发现心脏上面有一个进行皮下注射时留下的极细小的针眼。进一步的检查又发现，在大量已

经凝固的血液周围有氯仿的气味。尼斯利一下就明白了，这是由于直接往孩子心脏上注射了氯仿才致死的。这对孪生子死亡的原因相同，这对孪生子被杀害只是为了取得同时死亡的解剖数据。

这位病理学家这时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两个可怜的被受害者的档案材料里没有载明死亡原因。后来，门格尔指示他的下属，要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和意见填写死亡原因。尼斯利所了解的情况，要比证明这两个孩子是被谋杀之事广泛得多。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人们认为死亡证明书是必要的东西。集中营医生通常是这样写的：“因呼吸道疾病突发死亡”，或者笼统地写上“因心力衰竭死亡”。那些一下火车就被送进毒气室杀死的，就毋须编造死亡证明书了。他们在被纳粹装上火车解往奥斯威辛的那个时刻就正式地不在人世了。

在尼斯利解剖那对被杀害的两岁孪生子的那一天，他同时还接收了另外三对孪生子的尸体，并且发现这些孪生子被杀害的原因就在他们的眼睛上。八个孩子中有六个孩子的一只眼睛是褐色的，另一只则是蓝色的。眼睛异色现象在非孪生中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孪生子中却属罕见。

门格尔的老师，德皇威廉研究所的奥特马·冯·弗许尔对染色体异色具有特殊的兴趣。病理学家尼斯利照例把对门格尔的试验可能具有科学价值的各种器官都贮存起来。“那些可能使柏林达莱姆的研究所感兴趣的器官都保存在酒精里。这些人体零件经过专门包装后寄走。包裹上写有：“军需物资——急件的字样。在运输中保证优先投送。”（在斯大林格勒城外准备决一死战的德军指挥官对于这种写法会作出

什么反应，这无需多加猜测）。

尼斯利寄出一批批包裹，而德皇威廉研究所则将该所实验室作出的精确的研究结果的报告寄回来。这些寄送的报告也包括各种指示，其中主要是要求寄出更多的标本。除了各种器官和其他人体组织外，门格尔还准备了大量血液样品送交他的导师冯·弗许尔。冯·弗许尔的一名下属卡林·马格努森医生被指派研究孪生子体内染色体异常现象，她的工作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这所研究所对眼睛色素沉素的联合研究的一部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响应上级的号召而进行的，就是要帮助第三帝国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种推广到世界各地去。

对于人体其他方面特征的研究工作，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门格尔还研究过发色，他把各种不同的物质涂抹在他手下犯人的头皮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除了制造痛苦外，根本谈不上什么深入研究，实际上研究不出决定发色和发型的作用过程。他之所以对天然颜色如此感兴趣，很可能归于他自己的“毕波”^①的漂亮外貌。

对眼睛的研究工作，不仅给犯人带来可怕的痛苦，而且还会使他们的视力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后果。维拉·克里盖尔也是一个孪生子。她描述了她被带进实验室时的情景。她看见整个一面墙壁上挂满了人的眼睛，“就象蝴蝶被钉在墙上似的”。犯人医生贾库·维克斯勒也谈到他看见过类似的情景：“1943年6月，我来到吉卜赛营——比克瑙集中营。我看见一张木桌子上满是人的眼睛。每只眼睛都标着一个号码和一个字母。眼睛的颜色从深黄、宝石蓝、紫罗蓝到绿色和灰色，无所不有。”

^① 学生时代的绰号。——译者

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专门研究医生在第三帝国时期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他并不相信门格尔真的认为可以通过化学处理的方法来改造遗传的形式。相反，他认为门格尔集中精力搜集人体解剖的各种数据，所采用的是基础人类学的最普通的方法。“他的方法是说明性的，是数据的堆积。而且就我所知，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他有过什么具有重大意义的独创的科学见解。”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在人身上做试验时使用的令人痛苦难忍的化学物质，既不能进行比较研究，也无法加以解释。这就是真正的“门格尔方法”。

搜集供解剖用的人体部件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公认的拿手业务。特别小队队员菲利普·米勒观察过集中营医生们就象“牲口贩子”似地在死人堆里选取有用的东西。二十九岁的埃尔纳·施皮格尔是当时集中营中岁数最大的一个孪生子，他也是门格尔手下的试验品。他曾看见门格尔的试验室里有一个装满无名液体的浴盆。门格尔把一些犹太侏儒、蒙古种人和孪生子的躯体放进浴盆内，“将躯体上的血肉腐蚀干净，以便观察他们的骨骼”。

这个无惧无畏的一心要证明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优越的研究遗传学的医生，对于外来人种的躯体特别感兴趣。因此，门格尔便集中精力，专门研究侏儒和其他遗传性畸形体。他的这种特殊兴趣使米克洛什·尼斯利经受了一次极为恐怖的经历。1944年的一天，门格尔等待着对一列自波兰洛兹犹太区押解来的犹太犯人的火车进行挑选工作。这个犹太人居住区是1939年建立的，也是最后一个被消灭的犹太区。这批犹太人经受了五年的蹂躏和压迫之后，到达奥斯威辛时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成了“穆斯林人”。尼斯利估计，其中

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要被立即送往毒气室处死。

但是，门格尔这一天在挑选时，发现了父子俩人。父亲大约五十岁，看上去是驼背。十五岁的儿子则右脚畸形。门格尔把他俩从队列中拉了出来，党卫队的士兵就把他们押走，交给尼斯利。这位病理学家奉命对俩人进行全面的检查。他听说，这位父亲是个布匹批发商，去过许多地方；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想找专家为他治疗畸形的脚。经过高明的外科手术，再加上特制的鞋，这个孩子如今走路不瘸了。父亲的驼背不是先天的缺陷，而是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传染的结果。

尼斯利料到他们一定要被杀死的，于是就给他们东西吃。不出所料，在尼斯利作完检查后，一个名叫穆斯费尔德的党卫队二级小队长就不让他看押了，立即把父子俩人带往锅炉房。随后，尼斯利便听见那边传来了两声手枪响声。他被召唤到锅炉房里去，只见父子俩人已经倒在水泥地上，鲜血不断地从颈部的伤口里往外滴。

接着，这位病理学家又被迫对这两具体温犹存的尸体进行解剖。他说：“解剖并没有说明有比我事先就已查明的更多的东西。”但是，门格尔却想要用这两具尸体来进一步证明犹太人种已经退化，尽管这种畸形与遗传基因没有任何关系。门格尔为了迅速地把这些样品送往柏林达莱姆的研究所，没有采用通常制作骨骼标本的方法，而命令尼斯利采取一种最快的方法，即把尸体扔进水中一直煮烂，以便剥掉皮肉。

党卫队二级小队长穆斯费尔德搞来几个大桶，在尼斯利的指导下，把尸体放入桶内，桶下点火烧煮，大约煮了五个小时，然后熄火，让残骸冷却。尼斯利正在干别的什么工作，

这时有一名同事跑来对他说，“医生，快去！有几个波兰人正在吃桶里的肉哩！”

当时，有一群波兰犯人泥瓦工正在院子里干活。他们完成任务后在四处寻找吃的东西。他们偶然发现了热气腾腾的大桶，以为是特别小队队员为他们准备的珍贵的肉食。当尼斯利告诉他们实情后，那些波兰人感到“恶心、呕吐、吓得瘫软了”。

现有的寥寥几份有关门格尔在奥斯威辛时期情况的文件中，有一份是他签署的，是随一个十二岁吉卜赛孩子的头颅一同发出的。他们有好几次把患坏疽性口炎病人的头颅割下来送往德皇威廉研究所。

吉卜赛人集中营不仅向门格尔提供异染色体，而且也为他提供了另一个他非常喜爱的物品——侏儒。他发现一家十口人，其中竟有八个矮子，因此欣喜若狂。“现在我有了可供二十年研究用的材料！”这是他常用的惊叹句。

有一次，扎拉·诺姆贝格—普许蒂克在医院工作时，看见门格尔前来观察这群可怜的侏儒。这群矮子居然把他们的小桌子和小椅子都带来了。女人们还特地搽了粉，表示欢迎门格尔前来看望他们。诺姆贝格—普许蒂克记得，他们热情地向这位他们认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医生歌功颂德。“他多么漂亮，多么善良。他成为我们的保护人，真是幸运。他真是一位大好人，竟然还跑来看看我们是否缺少些什么。”

当门格尔带领他的党卫队的随从人员走进营房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一个矮子朝前走了一步，跪下抱住这位医生的那双锃亮的长筒靴说道：“您真好，好极了！上帝会奖赏您的。”

门格尔猛地抬起腿，把她踢倒在地。然后，他对一个有着

几个侏儒孩子的母亲（她本人不是侏儒）说道：“跟我说说，您和您那位侏儒男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位老妇听了满脸涨得通红。但是当命令她说话时，她只谈了她丈夫在马戏团里的工作。

“别跟我谈这些，只说说您是如何跟他睡觉的。”诺姆贝格—普许蒂克形容门格尔当时的神态是一副好色之徒的样子。

这位母亲拒绝谈她与丈夫的私生活的具体情节，门格尔碰了一鼻子灰后，便拂袖而去。几天后，他把其中一个矮女人的三岁儿子弄到他的实验室去。到傍晚时，这个孩子就死了。另外一个矮男子被看守诱骗去钻营地间的隔离电网时，被党卫队士兵开枪打死了。这位医生是不允许别人违抗他的命令的，他总是要想方设法，这样或那样地使自己得到满足。

活下来的侏儒，都饱受了门格尔试验的种种痛楚和羞辱。牙科医生把他们的好牙拔掉，护理人员每周给他们抽血。女人们的子宫被注入麻醉剂，她们的身体不断地遭到X光的辐射。作为最后的凌辱和践踏，她们还被迫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从党卫队队员的面前走过去。

奥尔加·仑格耶尔对门格尔的科学活动作了如下概述：

“他所进行的试验，所采取的方法是变态的。他输血时，故意使用不同的血型。他怎么高兴就怎么做。他搞那些试验时，就象个十足的票友那样随心所欲。他给犯人注射，根本不考虑后果。他不是一个脚踏实地搞科学的学者，他纯粹是一个数据收集狂。”在门格尔身上，一种传统的日耳曼人的性格发展到了疯狂的地步。

外行贝尔科维茨也赞同仑格耶尔的这一评价：“门格尔

有一个‘动物园’，一个私人的‘动物园’。其中的百分之五十用于真正的研究工作，研究人体的特性、遗传学、化学物品的反应、药剂、外科手术和在一定条件下处理人的方法。而其余的百分之五十，则是供屠杀的牺牲品。”

在门格尔的下属尼斯利看来，门格尔似乎是专心致力于他的“工作”的，尽管尼斯利把这一切称为“伪科学”。他回忆说，这个党卫队医生曾经因为他弄脏了报告的封面而责骂过他：“对待这些文件你怎么能够这样粗心大意，你知道我在编写这些报告时，费了多少心血！”

尼斯利进一步描述门格尔，说他“死死地抱着这样的信念不放，就是他是被上帝挑选出来揭示孪生原因的。这里，就在这血迹斑斑的围墙内，他俯身在显微镜之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这就是门格尔呈施虐待和淫威的情景。

第七章 军医旗^①和卐字旗

由于有象奥特马·冯·弗许尔和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这样一些德国科学界名流的支持，这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天使”才没有被人说成或写成是一个在第三帝国遥远的角落里，按照自己的意志自行其是的“弗兰肯斯坦医生^②”。实际上，门格尔不仅没有被人说成是一个不高明的扒手，反而被人看作是在一个完全为德国的科学界和医学界所欢迎的体制中的一个体面的成员。

在他一生的行动中，他的头一个而且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1939—1940年间为结束不治之症的痛苦而开展的“无痛苦死亡运动”。推行这一运动的主要动力来自教育家、经济学家，首先是医生们。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引用了1920年德国出版的一本题为《不配称为生命的生命（准许）消灭之》的书。书的作者都是各界的知名人士——卡尔·宾丁是法学家，阿尔弗雷德·赫歇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精神病学家。书的主题之恶毒从《不配称为生命的生命》这个书名就可见其一斑。巴伐利亚的精神病学家们在1931年的代表大会上，非正式地讨论了绝

① 希腊神话中宙斯使者墨丘利的手杖，上有二蛇和双翼，后用作医术之标志，军医部队旗亦同。——译者

② “弗兰肯斯坦医生”系英国作家玛丽·谢利1818年的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男主角的名字。弗兰肯斯坦是一个生理学研究，他创造了一个怪物，而自己最终被它毁灭。——译者

育和“无痛苦死亡”的问题，认为这是对付慢性精神病患者的一种为人所能接受的方法；这个时期的许多以“慈悲杀人”为主题的电影，对此也持赞同的态度，正如德国的美军占领区纽伦堡战争罪行法庭首席律师顾问莱奥·亚历山大医生所指出的，德国的一个官方医学杂志也提到了执行无痛苦死亡的这件事。

德国还在中学数学测验中，别有用心地向年青人灌输这种思想。测验中的一道应用题，要学生们把医治长期病残者所花的费用，和用这笔费用可以建造多少栋房屋、可以提供多少结婚贷款的数额作一对比。德国的教育工作也被歪曲，走上了邪路，用来激起人们的军国主义精神。一个典型的问题如：要毒死某一城市的居住在四平方公里面积内的五万居民，计算需要用多少毒气弹。

“无痛苦死亡”也得到经济学家们的有力支持。他们具体地计算了养活聋哑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有缺陷的人需要花费的巨大费用。战争的来临又进一步使呼吁推行“无痛苦死亡”的计划增加了声势。除了经济匮乏外，政府当局还预料届时护理军队和平民的伤亡人员的医护人员和医院床位都将极度缺乏。慕尼黑附近的埃格儿芬—哈尔收容所所长这样说：“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宝贵的士兵们流血、拼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这些日子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从经济上来说，我们要继续维持这些行尸走肉是不可能的了。当最优秀的青年们在前线献出他们生命的时候，这些自私的废物，无疑地也是反社会分子却躺在医院里，无忧无虑地过着受到保护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就简直忍受不了。”

希特勒由于受到经济学界和心理学界某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实际上也获得了他们的资助，因此在其活动初期才有了

坚定的，甚至是“体面的”理由，去屠杀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的人们，而他们都“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的公民。为了实行这一计划，他写道：“帝国领导人布勒（他的私人办公室主任）和勃兰特博士（第三帝国卫生和保健局局长）负有扩大某些由官方任命的医生们的权力的责任，以便在无法治愈的病人一旦确诊后，即可给予慈悲的死亡”。

当然，要杀掉那些被认为已属不可救药的残废人，其手段就寓于“无痛苦死亡”这一委婉的名词之中。“帝国医疗机构工作委员会”向各国立机构发出调查表，了解各机构病人的情况。“帝国科学处理遗传与体质引起的重病委员会”负责裁决患何种疾病应予死亡。“为病人服务的慈善运输公司”将不幸的患者运往指定的地点处死。符腾堡附近的格拉芬内克的一个机构就成为执行这种“死亡”的理想地址。一开始，这里接受的是残疾儿童，用掺入毒药的食物和注射毒剂的办法将其处死。后来，其他卫生部门中的医生们便向勃兰特和布勒领导的委员会提交有关他们护理的患者的情况调查表。凡被定为“不可救药的患者”，即被送往格拉芬内克以及后来的其他几个地方。行动计划是保密的。挑选委员会并不将病人的结局通知各个发送病人的医院。委员会如果受到追问，就解释说，委员会希望使用根本治疗的方法。到了1940年，无痛苦死亡计划已经扩大，把成年人包括在内了。医生、护士以及医院的管理人员也开始了解“新的治疗法”的性质。但是，许多人不但没有对此表示抗议，反而趁机把一些麻烦的病人清除掉，以减轻自己的负担。

终于，送往杀人中心予以处死的人数越来越多，使用过量的药物和注射毒剂已不敷需要了。于是，符腾堡的刑警专员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他同时负责贝乌泽茨集中营）建造了

一座小屋，里面装有假的淋浴喷头。煤气或一氧化碳气体通过管道送进小屋中，使锁在屋里的受害者窒息而死。然后用焚尸炉烧掉尸体。门格尔所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采用了这种传统的杀人程序。

最初，被害者的亲属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个死者最近的亲属都收到一份正式通知，内称他们的儿子、女儿、丈夫、父亲、母亲或妻子因患某种急症而死，尽管有很多情况说明，他或她在最后一次探视时看起来都是很健康的。这种官僚主义的拙劣做法，经受不住时间的检验，最终还是有助于揭露真相。有一次，一家人接到通知说，他们的亲属已死于急性阑尾炎——可是他的阑尾早在十年前就已切除了。还有一家人收到两份不同的死亡证明书，证明他们的亲人在两个不同的地点死于两种不同的疾病。

武尔姆主教是该地区路德教会的教长。他了解到格尔芬内克的详细情况后，给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写了一封抗议信：“如果年青的一代认识到，人的生命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已不再是神圣的了，那么，他们将会得出什么结论？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去消灭别人，这种暴行难道能受到宽恕吗？一旦开始堕落，就无法制止了。上帝是不允许人们欺骗他的。要么是纳粹的国家必须承认上帝所规定的种种限界，否则它就等于赞同道德沦丧，从而使国家随之沦亡”。弗里克对于这封具有预言性的信件却置之不理。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的确达到了它的目的。这种屠杀把那些收容身心残废者的机构中的病人一扫而光。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也为这种“新秩序”送了性命。其他的主教们，其中包括蒙斯特的冯·加仑伯爵在内，都对此表示反对。他说：“蒙斯特的公民们，受伤的士兵由于对国家已不再具有

生产性的用途，就被肆无忌惮地杀害。母亲们，如果你们的儿子从前线归来时已经残废，他们也会被杀死的。”

这时，即便是希姆莱，面对着日益增多的责难，也不得不退却：“……符腾堡山区由于格拉芬内克的缘故，出现了一场大骚动。人们认出了党卫队的灰色汽车，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了解了烟囱里不断冒烟的焚尸炉是怎么回事。那儿发生的事情是保密的，然而现在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公众的愤怒情绪使形势发生了危机，依我之见，只有停止使用这个特殊机构，别无他法。”

他只是说停止使用这个机构，至于是否停止那里的杀人行动却只字未提。

这一计划最后终于迫于人们的反对而被取消，不过这时已有十万人被杀害了。在这过程中，纳粹政府已经发展起一个系统，并且意识到要执行消灭数量巨大的人的计划，也需要后勤工作。医学界曾向纳粹表示愿意合作。维尔特和其他的人愿意在加快大规模消灭人的技术方面充当先锋。纳粹分子懂得此事需要保密，懂得触怒过分敏感的基督教教士会带来什么危险。格拉芬内克的教训记忆犹新：后来建立的从事大规模屠杀的集中营，包括奥斯威辛在内，大部分都位于波兰境内，远离德国。

“无痛苦死亡”计划也与医学研究有联系。一个名叫哈勒福尔登的精神病理学家找到无痛苦死亡计划的负责人这样说：“如果你们要把这些人统统杀死，那么至少要把脑子取出来，以便能够利用这些材料。”哈勒福尔登在战争罪行审判法庭受审时又补充说：“他们问我，‘你的试验能用多少人脑？’于是，我就告诉他们一个无限的数字——愈多愈好！”当局便从各个杀人中心给他提供了五百副人脑。

“为病人服务的慈善运输公司”每次都要运送一百五十副到二百副人脑。哈勒福尔登还说：“在这些人脑中有着极好的可供研究的材料，包括少见的智力缺陷、畸形和各种早期幼儿疾患。我当然收下了这些人脑。至于它们从哪儿来的，以及如何弄到我的手中的，这都与我无关。”他的这番诡辩是德国医生和科学家们在战后普遍使用的典型措词，也是对某些重要纳粹战犯（包括阿道夫·艾希曼在内）的论调的附和。这个国家所有的士兵对于他们的行为全都没有责任！

纳粹的这项计划绝不能与所谓的“慈悲杀人”等同起来。“慈悲杀人”的目的在于结束病人的痛苦。而德国的政界人物和医生们则是要为“新秩序”清除掉所谓的“白吃饭的人”。第三帝国还在被它所征服的国土上推行“无痛苦死亡”计划，悍然不顾那里的人民和政府对“白吃饭的人”是否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

诚然，所有这一切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在德国人看来，消灭犹太人实际上就是这种在科学上和经济上都被认可的无痛苦死亡的教条顺理成章的引伸。妇女、儿童、老人、病人和体弱者，只要是不能充当奴隶劳工的，都是“白吃饭的人”；他们会耗尽第三帝国的资源，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负担。

从经济到国民卫生，第三帝国不断给犹太人扣上一顶顶帽子，说他们是“寄生虫”、“瘟疫”和“害人虫”，是健康的大敌。正如埃拉·林根斯所说，党卫队医生弗利茨·克莱因就是利用医学的类比来为屠杀犹太人作辩解的。

希特勒要求医学界必须坚决支持他的关于提高日尔曼人种的计划。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个人自由的权利要让位于维护种族的权利。在此决不能有任何折衷的办

法。让那些不可救药的病人不断地传染其他健康的人，就是折衷的办法。这种办法是符合那种为了不伤害某一个人而让上百名其他的人去死亡的博爱精神的。这些不可救药的病人应该无情地予以隔离。这对那些遭受不幸的人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残忍的措施。但是对他的同胞和子孙后代却是一件幸事。”于是，希特勒便把慢性病患者或重病患者诬蔑为“传染病传播者”、“传染病毒带菌者”、“基因有缺陷者”。

《我的奋斗》中的这一段话随着1933年的一项法令而变成现实：“凡患有遗传病者均将施行绝育手术。”从理论上说，按照法院的程序，受害者有上诉的机会，但实际上正当的诉讼手续是行不通的。因此就连帝国的某些好心的医生也赞同这一法令。

1937年，德国人占领了莱茵地区以后，希特勒便下令对所谓的“莱茵地区私生子”，即法国和比利时驻军私生的子女，秘密地施行绝育手术。医生、护士以及医院都毫无异议地执行无误。

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医学已被政府首脑们的蒙昧无知所歪曲了，他们只相信民间医术和非科学的妄想。

党卫队的临床主任医生卡尔·格布哈特对于他的纳粹上司的态度是了如指掌的。他作为战犯受审时，这样招供：

“这些人对于科学的医学是一窍不通的，因此他们对自然医学全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他们对于‘无痛苦死亡’抱有一种幼稚的想法。各色各样的民间药物所以未能得到医药专门机构的通过，据说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药不了解，或是由于过份自负，或者从经济上考虑有意要压制这些药物的缘故。而这些药物都拿到各个集中营去进行试验。所以要进行这种试验，是因为希姆莱认为医学纯属基于玄想的谬说。”值得注

意的是，元首本人对于江湖庸医特奥多尔·莫雷尔百般信赖，并请他担任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让他服用江湖秘方，这种秘方使希特勒的体质虚弱起来，并且很可能由此造成他终生情绪的不稳定。

这个政权还把一些大学教授职位授予一些用土法治病的专家。一名医官竟然用钟摆来治疗结核病，本来应将他撤职，但他却受到了保护。当年的养鸡农场主希姆莱建议，用狗油摩擦皮肤来治疗冻伤。莫雷尔则提出用马汗作为防治斑疹伤寒的验方。

纳粹在梅克伦堡建立了一所培训德意志医生的元首医学院。纳粹的种族理论在这里被纳入正规的医学训练之中。

（在梅克伦堡医学院开创时，门格尔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进入了医学界。）希姆莱则创办了“遗传研究所”，以及一所对医学试验具有管辖权的“先祖遗传研究所”。

用人作医学试验品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在此不妨举出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1559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在巴黎逗留时，曾玩军事游戏作为消遣。一支长矛偶然地穿透了他的面盔，刺伤了一只眼睛。他的御医们竭尽全力为他治疗，专门砍下四名健康的罪犯的人头来研究眼睛周围的组织。但试验失败了，这位国王也就死了。比较近的例子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陆军雇用一些包括医生在内的志愿人员进行试验，以便证实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播的这一观点。不过，这些试验品至少是自愿贡献出自己的。

用人作试验品，而试验的人又不知道他们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就是这种试验具有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面。

现代医学绝大部分是靠使用低等动物作试验的。而纳粹却把人分成各类，把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斯拉夫人列为低等

动物。希特勒是赞同这种医学试验的，他说：“罪犯们在这里也是为祖国效劳。”

德国人在1939—1940年间，开始执行用人作试验的计划，对二百二十名犯人施放碳酰氯和芥子气，以观察其效果。这次试验由希姆莱的“遗传研究所”主持，由一个叫作奥古斯特·希尔特的医生进行的。一位试验现场的目击者说：“被试验者所受的痛苦使人震惊，以致人们简直无法接近他们。”德国空军医生西格蒙德·拉舍尔是最早利用集中营犯人作试验者之一。他也是希姆莱的朋友。拉舍尔曾写信给这位党卫队头头说，对于高空飞行的效应尚缺乏了解。他写道，由于在这方面进行试验非常危险，因此德国空军飞行员中看来无人愿意自告奋勇。“您能否为这种试验提供二、三名长于此行的犯人？”拉舍尔在信中这样问道，并且又说，他很乐意接受一些低能的人作为替代，然后这些人可以通过“无痛苦死亡”计划予以消灭。

希姆莱热情地赞同拉舍尔的提议。这个党卫队的头头对于这种“革新”方案，有着一种孩子般的天真的喜悦。于是，德国空军便在达豪集中营创办了“第一试验站”。拉舍尔就此可以放手去干了。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男人们关在压力舱内，用泵把里面的氧气逐步抽出。在一些试验中，被试验的人的肺破裂了。一名犯人助手说：“有些试验产生的压力太大，使受试验者感到头都快裂开了，他们发疯似地拼命扯掉自己的头发，试图减轻这种压力。他们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自己的头和脸，抓得到处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各种试验方法中，这种“试验”使空气压力舱变成一种杀人的工具。

拉舍尔又把他的研究范围扩大，去研究酷寒的效应。这

种试验模拟飞行员被击落后坠入海中的情况。德国空军第一试验站让犯人穿上飞行服（冬季的和夏季的），再穿上救生衣，然后把他们泡在冷水池里。冬季，在达豪集中营，这些非自愿参与试验的人要在室外零下气温里过上几夜。拉舍尔亲临现场指导，命令往被试验者身上洒水，这些水马上都结成了冰。在一次更为异乎寻常的冒险中，他研究用“动物的体温”使“严重冻伤的人”复苏。一个已失去知觉的人从冰水中被拉出来后（他的体温为摄氏23~25度，华氏77~80度），放在达豪关押的两名妓女的身体中间。希姆莱亲自批准了这项试验，这至少说明了这个党卫队头子的性的问题。拉舍尔在他的研究中总共使用了大约三百名犯人，其中只有两名在试验后还活着，而他们又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立即被处死了。

拉舍尔的工作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设法要把他从空军调到党卫队来。希姆莱在写给空军元帅艾哈德·米尔希的信中说：“这项研究涉及人体组织在高空的反应和人体在冷水中长时间冷却后的现象，以及对于空军至关重要的类似问题，尤其是那些对我们特别有效的问题。因为我亲自负责把集中营中那些只应处死的反社会分子和犯人供这些试验用……在基督教医学界人士中，正在出现这样一个观点，不言而喻，就是应当让年轻的德国飞行员去冒这种生命危险，但让一名犯人去从事这项工作，其生命则是太圣洁的，因此，人们不应去沾染这种罪恶。我已亲自视察过这些试验，而且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还以帮助和鼓励的态度参与了这项科学工作的每一个阶段……要使我们的人民摆脱这种狭隘的观念，至少还要十年的时间。不过，这不应该影响这项研究的进行。”希姆莱对“狭隘观念”的担心和与基督教

医生们的观点相左，看来是多余的。因为数以百计的医生，包括曾经是天主教徒的门格尔在内，对于这项“研究工作”从来没有退缩不前。

党卫队的临床主任医生格布哈特是一位矫形外科医生。他的父亲曾经是希姆莱的私人医生。格布哈特把拉舍尔的工作说成是“毫无价值的”，“完全非科学的”。尽管他贬低这位空军医生的工作，但在用人作医学试验的问题上，却毫不逊色。1943年，他声称，他对集中营正在进行的试验，担负“全部人的、外科医生的和政治上的责任”。格布哈特在他的霍恩吕钦医院里，与其同事弗里茨·非舍尔医生、路德维希·斯通普菲格尔医生一起，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健康的女犯人身上截下肩膀、胳膊和腿，移植到另外供医学试验的人身上。这种异体整形移植大约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无效，然而即便是在四十年代，对于神经病学的结缔问题和异体组织相斥的问题都已有了相当的了解，这就足以使最大胆的有责任心的科学家也不敢去贸然从事。

拉舍尔虽然屡遭失败，但并不气馁，又对医治战地创伤发生兴趣。为了试验各种化合物，犯人们被枪击，截肢以及人为制造其他种种作战时的创伤。拉舍尔还进行他所谓的“皮革检查”，即命令犯人脱光衣服进行检查，挑选适合试验需要的人。如果他捏一把谁的臀部或大腿，说一声“行！”那就意味着这个犯人被处死后，要把尸体的皮剥下。因为拉舍尔除了拥有一个试验室外，还开办了一种皮革加工厂。这个工厂对人皮进行化学处理后，经过烘干，然后制成手套、马鞍、骑马服，拖鞋和手提包。纹身的人皮尤为珍贵。皮革工人如果提出原料缺乏时，拉舍尔就会这样回答说，“不要紧，弄些尸体来”，于是就会弄来二、三十具新的尸体。枪

击或棒击犯人时，要击中头部，以免损坏躯体上的皮。

拉舍尔最后还是失宠了。但不是因为其他的医生或官员抓他的小辫子，指责他用人作试验样品，或攻击他极端残暴，本性难改。而是因为他和他的妻子曾试图蒙骗希姆莱，要他相信他们发现了一种秘方，甚至可以使老年妇女怀孕。

（他们偷偷地收养了三个从波兰弄来的婴孩，诡称他们是这些孩子的亲生父母。）当希姆莱知道了这是一场骗局时，就把拉舍尔夫妇抓了起来。后来把他们处死了。

拉舍尔不过是许许多多利用集中营犯人作试验的德国医生中的一个。克劳斯·席林医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热带病医学专家，虽然已退休，但奉希姆莱的命令又出来工作，在达豪集中营研究疟疾。席林用带菌蚊子去叮咬犯人，并直接往机体上注射菌苗，使犯人染上疟疾，然后用来研究各种抗疟疾药物的效力。经他的手而传染上疟疾的一千二百名犯人中，有三、四十人死于这种疾病。其他许多人则由于十分虚弱而死于集中营里常见的其他疾病。

集中营犯人也是试验潜在的武器的材料。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医科主任J·舒勒医生连医学学位都没有获得过。他和爱挑剔的格布哈特一道观察了毒弹的效果：“……五名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被用以乌头硝酸处理的毒弹枪击……五名犯人平躺在地上，每人左大腿上部被击中一弹。有两名犯人子弹穿透大腿上部。过了一段时间后，仍然未见毒药发作的现象，因此，这两名犯人被弃而不用了。其他三名犯人中毒后表现出的症状惊人的相同。二十到二十五分钟以后，他们的运动神经开始失调，并且开始轻微地流唾液……四十到四十四分钟以后，则开始大量地流唾液。中毒的犯人不断地咽唾液，但唾液太多，咽也咽不过来。泡沫状的唾液就从嘴里往外

流。接着又开始出现噎塞和呕吐……一名中毒的犯人吐又吐不出来……过了一会儿，运动神经失调加剧，他们就上窜下跳，眼睛不停地转动，手和胳膊毫无目的地做一些动作。最后，骚动渐渐平息下来，瞳孔扩散，这些死囚躺在地上不动弹了。其中一名犯人还出现了直肠痉挛和小便失禁。这三名犯人在受到枪击后一百二十分钟、一百二十三分钟和一百二十九分钟先后死亡。”

直接与军事有关的其他试验，是在别的地方进行的。卡尔·格布哈特非常看不起拉舍尔的科学，因此他在自己的试验中也毫不示弱。虽然磺胺药物是在德国发现的，但纳粹却不象同盟国那样，使这种药物用于临床治疗。所以，当盟国军队将磺胺药品用以防止病毒感染时，德国军队对于疾病传染和伤口坏疽仍然束手无策。

格布哈特奉命要确定磺胺药剂的效用，于是他便开始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试验。他们在年轻健康的女犯人身上制造出作战的创伤。与格布哈特一起工作的医生割开犯人的腿，把木片、脏物，玻璃渣、带有链球菌和葡萄球菌的杂物塞进伤口内，然后再用包括磺胺在内的各种药物来医治一些不断溃烂的伤口。为了进行对比，有的伤口就不加治疗，任其发展为致命的坏疽症。秘密警察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遇刺死亡后，进一步推动了这项对磺胺药物的研究计划。但是，对于德国士兵来说，遗憾的是，建造一个大规模生产磺胺的工程已为时过晚。

另外一系列的研究工作的目的是要防止德国士兵托病开小差，就是美国兵所称的“逃避勤务”。东线有相当多数量的德国士兵偷偷地给自己注射挥发油和其他非致命性的化学药品，以逃避战斗。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二十八号营房

中，弗利茨·克莱因医生在犯人医生的协助下，把三十名健康的犹太男孩集中起来。集中营犯人医生杰扎·曼斯费尔德原是匈牙利佩斯大学药理学和实验病理学教授。这时他也挤进房来，亲眼看见人们往这些孩子的皮下注射挥发油和石脑油。曼斯费尔德对一名参与此项工作的犯人医生提出，这种化学药剂对人体的反应已为人们所知晓，这种试验只应在动物身上进行。克莱因向他介绍，往每名犯人大腿内注入的药剂，预料一周内，会出现大面积脓肿，然后抽出脓液运往布雷斯劳的组织学研究所去。这就再次明显地说明，德国的医学主流是如何广泛地卷入集中营的事务上去了。然而这种研究并没有解决问题，不过使犯人的人数大大地减少了，所有的受害者都被送进了毒气室。

对于种族和遗传学的研究，也是集中营医学史中比较残暴的篇章。在以希姆莱的副官沃尔夫拉姆·西韦斯为首的“先祖遗传研究所”的赞助下，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组织了一次搜集头盖骨和骨骼的工作。后来，希尔特汇编了七十九具犹太男人，三十名犹太妇女，四具亚洲人和两具波兰人的残骸的科学数据资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对门格尔死亡的推测，主要根据的也是头盖骨的数据资料。希尔特向希姆莱的一名助手索要样品时，开列的要求项目总是很具体的：“但是，在犹太人种中，可用的头盖骨样品寥寥无几。东线的战争现在可以为我們提供弥补这一不足的机会。获得这些犹太种布尔什维克政委们的头盖骨后，我们就有机会取得科学资料了。这些政委们代表着这个令人厌恶的、但具有特色的劣等人种的原型”。希尔特为了保证其研究成果的完整性，坚持要求在这些犯人试验品还活着的时候，将其头颅进行测量。“在这些犹太人后来诱导死亡后”，希

尔特说，“其头颅不应损坏。医生应将其头颅从躯体上割下……装在密封的锡罐中寄走。”

希尔特还参与了“有生命期间使用的显微镜学”，即对人体器官内的活细胞进行研究。希尔特的这种研究，剥去它的空想语言和委婉的措词来看，就是从活人身上取下有生命的器官。

其他的人也利用这些新的机会进行“研究”。例如，年轻的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埃德蒙德·柯尼希医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便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犹太青年作试验，以观察电击对大脑的影响。集中营的犯人埃内斯特·米歇尔1943年春在法本公司干活时受了伤，他曾经研究过书法，因而被委派担任书记员的工作。一天，他和一名男护士前去报到，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即把一些刚下卡车的年轻妇女领到集中营医院的小屋去。这六名至八名犯人显得惊慌和激动，对于下一步的遭遇惴惴不安。她们是头一天刚从匈牙利来到的。米歇尔和其中的一位十几岁的美丽姑娘谈了几句话，这位姑娘虽然焦虑不安，但却能控制自己。米歇尔和他的伙伴把这些年轻妇女带进医院的一间屋内，当时门格尔和柯尼希都在场。一小时后，米歇尔又回来把这些病人领回去。“在那间进行‘治疗’的屋子里，有一名妇女仍然和一台电动机器连结着，可能是在做电击试验。我们已奉命准备好担架，以便把她们担走。我们发现其中有两人已经死了，其中的一个就是那个美丽的匈牙利姑娘。还有两个人显然处于昏迷状态。其他的人则呼吸困难而且不规律。她们都神志不清。我注意到那些还活着的人，牙齿已被敲掉，嘴里塞着一团纸。”柯尼希也进行截肢，把手和腿截去；其实，这些患处只要简单地处理就可治愈的。蒂洛和非舍尔医生则切除阑尾，

疝气，并作妇科手术，即使这些部位并没有病症出现。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恩特雷斯为了提高自己的胃外科技能，就在健康的“病人”身上进行通常诊断为胃癌的重大手术。他的试验对象要么死在手术台上，不死的也要被送进毒气室。

为了清除犹太人的世界，并控制非雅利安人人口的增长，第三帝国的理论家和科学家通力合作，去寻找一种既迅速又价廉的绝育方法。主要对象是“混血儿”，即父亲或母亲是犹太人，以及奴隶劳工。

霍斯特·舒曼医生是“无痛苦死亡”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提出用强X射线辐射犹太男子和其他的人，从而破坏他们体内制造精子的功能。希特勒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维克托·布拉克是舒曼的后台老板。布拉克向希姆莱进言说，一台X射线装置一天能使一百五十到三百人绝育。如果安装二十台这样的机器，这条装配线一天就可以破坏三千至四千人的生殖能力。这种装置可以隐蔽起来，所以当人们坐在桌旁填写表格时，就可以悄悄地对他们辐射。实际上，这些机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产生可怕的灼伤。各病房负责治疗这些接受试验的病人的犯人医生看到，这些受害者的生殖器有异常的色变。约瑟夫·门格尔参与了这些X射线的试验。不过他的试验集中在对妇女的反应上。他利用一群波兰修女作试验。

绝育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外科手术阉割。切除睾丸手术做得快的予以奖赏，因此就使这种手术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速度竞赛。这些纳粹分子找到了几名愿意合作的犯人医生。如波兰人瓦迪斯瓦夫·德哈林就是在霍斯特·舒曼指导下工作的，他就代表他的主子们操起了手术刀。的确，德哈林为他

的手术速度之快而感到无比自豪。他能在十分钟内使用局部麻醉就可以完成一例睾丸摘除手术。为了节省时间，他每次手术后既不消毒器械，也不洗手，接着就进行下一例。

起初，这些男犯被带进手术室时，并不清楚他们来干什么。后来消息传开后，许多犯人宁肯去触电网，也不愿接受这种手术。

一名苏联犯人从一伙要被送去摘除睾丸的人群中逃跑了。他对一名法国犹太犯人西姆·克塞尔谈过这件事，当时他和十名或十二名其他犯人被押往由约瑟夫·门格尔领导的“生物试验科”。他听到受害者痛苦时的惨叫，便跳窗户逃跑了。……而他的伙伴们却在没有施麻药的情况下，被除去了性能力。

党卫队也用X射线辐射女犯人，使她们不育。奥尔加·仑格耶尔照料过阴部严重灼伤的年轻女犯人。德哈林还帮助党卫队摘除受损坏的卵巢进行镜检。

卡尔·克劳贝格是一位平民医生。他是东普鲁士的一位妇科教授和许多科学著作与论文的作者。他不仅拥有一个进行研究工作的试验室，并且还有一个谋利中心。他与法本工业公司做了一笔交易，他利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来试验该公司生产的药品。为此，该公司同意每项计划付给他一笔优厚的酬金。克劳贝格有一个理论，认为一种叫作贝母的物质可使男女均绝育。因此，他与党卫队签订合同，购买一百五十名集中营的女犯人。纳粹分子为他从荷兰运来了一群犹太妇女。她们刚下火车几分钟，就在挥舞皮鞭的卫兵和张牙舞爪的狼狗的包围下，被押走了。其中有的已怀孕，有的还年轻，有的则是刚刚迈进可以生育的年龄。这些试验品的候选人在一群嬉笑取乐的党卫队士兵面前，被迫脱光衣服。她

们的头发和阴毛都被剃光。犯人医生卡雷尔·斯珀伯说：

“她们身上被涂上了一层油腻的除虱膏”。这时，旁观者就戏弄地说，她们的阴部被涂满了油膏。克劳贝格随后把贝母剂注射进她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很快引起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有些波兰妇女也在克劳贝格的试验品之列，她们哭喊道（根据当时翻译的话）：“胖屠夫来了！这个混蛋坏透了！”

克劳贝格的一伙人干摘除卵巢，对女犯人实行人工授精，然后截除生殖器官等事情。他们甚至把癌细胞移植入子宫内，一个月以后再摘除子宫观察后果。克劳贝格和他的同事考夫曼医生同样出于好色的欲望，还把一名被阉割的裸体男人和一名同样一丝不挂的妇女关在一间屋里。然后这两位科学家“为了科学和知识”，便透过一块玻璃进行观察。

门格尔也是试图用一种简单的化学手段进行大规模绝育的这伙医生中的一员。玛格达·巴丝就曾经是他的试验品。她回忆说：“我和其他妇女一道被挑选出来。他们在我们的嘴里和唇上注射药剂。门格尔在一旁注视我们。几天后，接受注射的大部分人头部肿胀起来。这些人就失踪了。我算走运，我的头部没有肿胀。不久，我又和为数更多的妇女一起被送到同一个地方。这一次是在我们臂下进行注射。门格尔仍然在一旁观看。被注射后的人中，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腿和脚都肿了起来。她们也不见了。后来，我终于来到了美国。我想要生个孩子，但一直不孕。马约诊所的医生们对我说，由于我受过的试验，我可能终身不育了。”

特别小分队队员菲利普·米勒的工作是负责处理门格尔及其同事们试验后的尸体。他说：“有的尸体惨不忍睹。这些尸体一般都被肢解，或经过解剖。许多是青年男女的尸体，身上有着奇怪的灼伤，睾丸上或躯体的较下的各部位有

溃烂处，或者腹部和大腿上有脓肿。然而，另外一些尸体则呈红中透青色；或者面部发紫，牙关咬紧。”

用人来做这样的试验，是在改进治疗或纯洁人种等借口下进行的。而且还作出许诺说，这种试验的目的是要发现治疗胃癌的新方法，为治愈生殖器失调和控制传染疾病寻求新药物。而且，党卫队的医生们还大言不惭地向他们的同行们这样通报。根据莱奥·亚历山大的说法，从1942年起，“在集中营进行的这种试验，就已公开地在医学会议上加以介绍了”。西格蒙德·拉舍尔甚至使用了“对人进行的极限试验”一词。而那些济济一堂的医学科学家们，在听到了这种玷污希波克拉底誓约的自我招供后，竟无人起来表示反对。1943年5月，门格尔的恩师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柏林军事医学科学院讲学。卡尔·格布哈特及其副手弗里茨·非舍尔医生正是在这所科学院里讲授过他们如何在犯人身上进行毒气坏疽试验的。

在伦敦举行的一次诽谤案的审讯中，瓦迪斯瓦夫·德哈林试图为自己洗清通敌的罪名。而加德纳勋爵在为被指控对德哈林进行诽谤的被告辩护时，提到了1946年以前的历次事件，他说：“因此，如果有人问道：‘你们认为在这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在西欧的基督教的文明和文化昌盛的国家中，居然有那么一个国家，把成百万的老人和儿童，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是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赶进毒气室去，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任何人都会说，绝不可能……因为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想象不出任何人有任何理由要这么干。否则，他们将会因此而招致全世界人们一代之久的憎恨，如果他们在和平时期这么干，他们马上就会陷入战争，因为人人都将起来制止他们。如果他们在战争状态下这么干，那么他们又能以

什么理由来为他们的这种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罪名辩解……其次，我们会说，‘你们要让人民那么干是办不到的。’一支征募而来的军队毕竟是由来自千家万户，来自各个工厂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你能想象，你能让自己有儿有女的人们去把数以万计的儿童赶进毒气室吗？如果有人说或者提出建议……把人当作试验物，并在他们有意识时，在他们自己的眼前割去他们的生殖器作试验……我们会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撇开这一点，这种事情只有医生能够做得出来，可是你又能从哪里找到医生去这么干呢？然而，我们完全错了，就有那么一位医生干过这种事情。反犹太主义是一个原因……”。诚然，加德纳勋爵的这番话是针对德哈林一案而说的，不过他的这些话也适用于德国医学界即使不是数千名，至少也是数百名的成员。

1945年5月双方作战部队停火时，用毒气杀人也早在1944年11月间根据希姆莱的命令停止了。但挑选工作以及其他的杀人方法，仍在继续杀害集中营的犯人。同盟国调查人员报告说，参与集中营各种犯罪活动的德国医生共计三百五十名（犯人医生不包括在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德国注册的一万名医生的百分之三点五，这个数字应当减去犹太医生的人数。除这三百五十名医生外，还必须加上一些象奥特马尔·冯·弗许尔这样给予支持的人。冯·弗许尔本人就是一名医生，只不过没有在集中营呆过而已。这些研究活动中，有许多涉及到大学里的一些科学家。他们亟力想利用集中营的各种活动。此外，还不断有许多医生来集中营临时任职，如克雷默尔；或者是一些平民百姓，他们为了各自的研究目的，也常来集中营访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医学界对于集中营的种种犯罪活动的了解，必然是很广泛的。

H·德祖瓦伊和M·M·拉菲特在《希特勒分子的犯罪心理学》一书中,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论:“纳粹分子,包括纳粹医生在内,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灭绝人。整个医学机构只不过是一种装饰,只不过是一个蓄意掩饰大屠杀的谎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医生在集中营里进行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医学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人类对痛苦和死亡的承受能力,以及寻找各种方法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这些实验包括对囚犯进行长时间的饥饿、寒冷、疲劳和痛苦,以及对囚犯进行各种手术和药物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被用来为纳粹的战争机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然而,这些实验也造成了无数无辜生命的死亡和痛苦,是医学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第八章 “好人”和“恶魔”

——双重性格

1944年8月，一名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曾对门格尔作过这样的评价：“门格尔医生为人坦率、诚实，性格坚强。此人正直可靠，品行端正。从外表看不出他性格上的弱点、爱好和癖。他智力和体力的先天条件极好。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期间，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实践和理论上尽到了一个集中营医生的职责，并与猖獗的流行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他兢兢业业地、坚持不懈而且尽力去完成指派给他的全部工作。因此上司对他非常满意。事实证明，他能够驾驭任何一种局面。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人类学者，他还利用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深入地进行研究工作；并且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科学材料，在人类学领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些试验的特色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要谈他的举止，他职业上的成就以及他对问题的看法，门格尔医生显然是思想坚定而且成熟的。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的言谈并不那么拘泥不化，而是很有说服力，甚至具有一种感染力……”

这份材料还列举了门格尔在武装党卫队任职的情况和他所获得的各种奖章；还建议考虑提升门格尔，委派他担任新的职务。但是门格尔最后还是留在奥斯威辛了。由于未能得到晋升，他可能感到沮丧。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位善良的“好

人”遂一变而成为可怕的“恶魔”。

有一段时间，马尔克·贝尔科维茨甚至还以为门格尔是一个被迫去干那些勾当的好人。但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这个孩子看到其他被用来作为试验品的孩子都失踪了，他才明白天幕下浓重的烟云和那难闻的臭气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天，厄运终于降临：他母亲所住的营房中的所有犯人都要被处死了。

“门格尔把我们一家人分开时，曾经对我说：‘我会给你母亲安排点活儿去干。你会常常见到她的。’但是，他心里明明知道我的母亲死期已到。”贝尔科维茨回忆说。在他母亲死的那一天，门格尔为他的这个小勤务兵安排了一个差使，让他在他的母亲被装上卡车前，可以和她在一起走走。这名小勤务兵很快就回来了。他强忍着泪水为门格尔擦拭桌子。门格尔问他：“你还相信上帝吗？”

四十年后，贝尔科维茨一想到这个处处总是先提上帝一词的德国人，就感到恶心。可是，当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办公室里，他却小心翼翼地回答说：“要说保卫上帝，我不懂什么意思。而要说保卫我的母亲，这个我懂。我开始想说，‘我的一切都完了’。但这似乎是说我活着没有信仰。所以我改口说，‘我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没有了。’我总要有支持。我现在有信仰，我相信，我是为上帝而活着的。”

这个党卫队军官，这位总是佩带武器的医生，突然杀气腾腾地打开他的手枪套，手抓住枪柄，象是要把枪拔出来。贝尔科维茨清清楚楚地听到他打开手枪套按扣时的“咔嚓”声。“‘你瞧着我，’他手抓着枪柄说，‘你毕竟还是一个犹太人！’

“‘我已经失去了一切，但我还没有失去上帝’，我

说。“您可以从我这里夺去一切，但不能把上帝从我这里夺走。””

“这么回答很好，”门格尔说，旋即又恢复了常态。他指了指他的长筒靴说：“今天你把这双靴子好好擦擦。”后来，贝尔科维茨从办公室里出来时，注意到天空中翻滚着的黑烟。他想，我最好为母亲念念珈底什祷文^①，到明天也许我也活不成了，也就没法念了。”

门格尔继续折磨这个孩子的精神。“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一天，他和气地问道。

“这里对您来说好象很不错，”贝尔科维茨争辩说。

“那么你在哪里！”门格尔走了过来。“难道你不是在这里跟我说话吗？”门格尔这一问使得贝尔科维茨惊慌起来。回答“好”或“坏”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他尽量不让门格尔抓住什么话柄。“门格尔想听听犹太人工作时的想法。”贝尔科维茨这样想。“他就象一匹蒙上眼罩的马。纳粹的思想就是驾驭他的骑手。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他只是一味地奔跑。”

他还向贝尔科维茨灌输他的宗教信仰。他带着贝尔科维茨去做礼拜。这种礼拜只有纳粹分子和极个别享有特权的犯人才能够参加。门格尔非常了解，在笃信自己宗教的犹太人中间，教堂是一个受到诅咒的地方。因此，犹太人不愿从教堂门前走过，而宁愿绕几步从街的那边走过去。这不仅仅是一是宗教信仰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当地狂热的犹太教徒对于这些听布道的犹太人的所谓背叛行为感到愤怒。有时他们在教堂附近出现，对离得最近的去

^① 犹太人为死者念的祷文。——译者

做礼拜的犹太人进行报复。去望弥撒，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贝尔科维茨是在一个犹太人可以和犹太人一块游戏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因此，他能够大胆地去望弥撒。这就满足了门格尔的好奇心。

门格尔还喜欢考验他的胆量。“他不断地向我提出，夏天我可以到党卫队的游泳池去游泳，这样就凉爽了。于是，我就到游泳池去了。可是一进游泳池就象掉进鲨鱼出没的大海里一样，他们把我的头按进水里，也许是逗乐，也许不是。”贝尔科维茨认为，门格尔至少看起来有时是佩服他的勇气的。“他不喜欢抹眼泪和大声哭叫。我总是装作一副毫不害怕的样子。当我奉命去为他办事走过营门时，说话从不吞吞吐吐。我大声地向看守报出我的姓名和囚号。可是其他的犯人勤务兵总是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卫兵随时都会开枪射击的。而且，还有那些拴着链子的大狗，要是想从它们身边挤过去，大腿上肯定会被撕下一片肉来。”

门格尔有时也一反常态，表现宽厚，这时他也会流露出对音乐的一片激情，他会邀请这个孩子到他的住处去，教他唱歌，让他摇动留声机，听一些软绵绵的咏叹调的唱片。门格尔是反常的，德国是反常的。一面是血和铁，一面是音乐和诗歌。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贝尔科维茨说。“他戴着一顶带有骷髅头标志的软帽，而不戴正式的大盖帽，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腰带上刻有一句格言：‘祝你成功’。然而这句话也可解释为：‘祝你死亡’。”

门格尔和贝尔科维茨玩的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在他进行挑选工作时达到了顶点。“他和某个人打电话时，常常说要在点名时进行挑选。他知道我在竖着耳朵听哩。所以他故

意要多讲几句话，假装说要向犯人们提一些问题。比方说谁愿意去干活儿，谁愿意呆在营房里。不愿去干活儿可能意味着要被毒气杀死，但自愿劳动者也有可能被装上货车送去处死……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他说，在一次点名时要进行挑选，这可能牵涉到我的妹妹。随后，他派我去干一件事，并要求我很快回来。我知道只要在营房里抄小路走，就可以省出三分钟时间，足够跑去提醒我的妹妹，让她设法保护自己。”

对于门格尔的反常行为，贝尔科维茨是这样下结论的：“一个有哲理的医生，一个治病的医生，一个喜爱音乐和诗歌的人，他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风度。他那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很能迷惑人，能够让你为他效忠卖命。他能够完全解除某个人的思想武器。你绝料不到这样的人会撒谎，然而他却总是在撒谎。他为人处世的基础是：如果你能对一个犹太人说声早上好，这就证明你是一个好人。”

那些无意掩饰自己个性的犯人头目和看守们日复一日地肆意胡作非为，在这种气氛和环境中，门格尔的那套做法自然能够奏效。“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摆出一副阴沉的面孔，瞪着一双凶神恶煞般的小眼睛，你就会想马上逃进屋子里去。然而，门格尔却大不一样，看起来显得格外顺眼。我们要是看见他，就会跑到大门那儿去迎接他。”毋庸置疑，对于一个非常幸运、没有遭受过奥斯威辛这座人间地狱折磨的人来说，可能很难想象对门格尔这类人居然会有这样的反应。你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了解这种情况，而且必须相信，象贝尔科维茨这样的证人所作的证词。尽管这种证词可能使人无所适从，但是，要想能够对一些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可理解的事物有所了解，这也是一种原始材料。

吉泽拉·佩尔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就是门格尔曾冷静地盘算过他的风度所产生的作用。“无论他让乐队为我们演奏乐曲，还是他的微笑，都是他要折磨我们的一种恶毒手段。他只是没有亲手杀人而已。他折磨我们。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我的丈夫也是，我们的儿子在十岁时就举办了他的首次音乐会。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几乎是神圣的东西，门格尔竟然会一面让我们站在那里等待挑选，一面又让乐队演奏一支欢快的维也纳华尔兹舞曲。

“他满面春风地走到我们面前，身上散发出香皂的芬芳气味，显得那么潇洒，那么漂亮。他穿的那件蓝色衬衣，颜色好看极了。有的姑娘居然这么对我说：‘吉希，我愿意和门格尔睡一觉’。这是能使我们发狂的另一种手段。闻着焚尸炉散发出来的臭气。你会被熏得发狂，而看到门格尔那么迷人，又想和他过夜。他也清楚女人们的这种态度。他把我们叫做‘下贱的婊子’。我们身上又是尿臭，又是屎味，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而他还羞辱我们，拿我们取乐。把我们看成是最下等的动物，比妓女还要下贱。”

门格尔和蔼可亲的外表里面隐藏着的凶残性，在他行凶时就暴露无遗了。有一次，贝尔科维茨闲逛到一个堆煤的地方，在那里看见，门格尔拔出手枪对一个十七岁少年的一条腿的膝盖开了一枪，然后又朝另一条腿开了一枪。这个少年疼得尖叫起来，门格尔上去一手揪住他的头发，一手又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门格尔转过身来对着吓得要命的在一旁亲眼目睹的贝尔科维茨说：“你知道吗，这个地方他不该来。（这个受害者当时正在弄一点煤准备生火。）你也必须遵守这里的纪律。”

玛格达·巴丝回忆说，甚至其他的党卫队员也害怕门格

尔。马尔克·贝尔科维茨描述了海因茨·蒂洛医生的所作所为，他是在门格尔的威胁下才规矩起来的。他说：“蒂洛想象仿门格尔的样子。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工作环境，并且想象门格尔那样搞一套研究计划。他非常妒忌门格尔。一天，门格尔要离开集中营外出好几天，他临走前命令我说，他走后，他的‘动物园’里的一切不得弄乱。蒂洛想在我们中间进行挑选，并把我也算在里边。于是有一个侏儒说，现在该是我们做祷告的时候了。我吓得要死，后来终于开口对蒂洛说，门格尔医生外出时，吩咐我要照看他的资料。蒂洛一听到门格尔的名字，就停止挑选了。门格尔的名字成了我们得以生存下来的口令。”

党卫队的看守们常常用他们所谓的“运动”来消遣。他们强迫犯人们在雪地里或泥泞中下操；赶着他们跑步，一直到他们跑不动倒下为止；逼着他们在垃圾里爬。门格尔取乐的方法更新鲜：有一列车来自匈牙利的犯人在奥斯威辛的岔道上下了车。门格尔看到新来的犯人里大约有一百人左右的犹太教教士，大多数是飘着长须的老者。门格尔把他们和其他犯人分开，把他们带到空地上。那里坑坑洼洼，到处堆着破桌子、废电线和垃圾。他命令这群教士在那里站成一个大圈子。然后让他们跳舞。象这样的事情搞过好几次。有一次，犹太教教士们被迫脱去衣服，一面跳，一面高举着他们千辛万苦地从故乡带到奥斯威辛来的圣书《图拉经文》。还记得有一次，他们倒是穿着衣服，当门格尔大声喝令他们唱歌时，他们就唱起了“科尔尼德利祷词”。这是犹太人赎罪日举行仪式前唱的。不管哪一种，毫无疑问，“消遣”完了，所有的犹太教教士都会被挑选出来送去处死。

根据马尔克·贝尔科维茨、吉泽拉·佩尔以及其他人的证词来看，激发门格尔身上邪恶一面的是反犹太主义这副毒剂。毒剂时时发作，会使门格尔兽性大发，就象在赎罪日那天，他竟把一千名小小年纪的犹太男孩挑选出来处死，后来又把一百名犹太教士拉出来当众耍弄。

埃拉·林根斯不是犹太人。作为一名犯人医生，在门格尔视查她负责的病房并检查她记载的病历时，她每周能见到他二、三次。他从来没有向她暴露过恶魔的一面。由于埃拉·林根斯曾经在维也纳力图帮助犹太人逃脱纳粹的魔爪，因此被秘密警察囚禁过。当门格尔第一次遇见她时，他曾问她为何被押到奥斯威辛来。听了她的回答后，门格尔即没有瞧不起她，也没有对她发怒，只是说：“你怎么以为你会成功呢？”他的语调几乎是温和的，几乎是友好的。

“为什么不呢，”林根斯回答。“犹太人向秘密警察行贿就能跑掉，这种事情有的是。”

她的回答并没有使门格尔感到不安。相反，他却说：“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把犹太人卖掉来赚钱的。不这样做，我们就是愚蠢。但是，你为什么要卷入这种交易里去呢？你究竟得到什么好处了呢？现在你不是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了。”现在林根斯认为，她想要帮助犹太人的企图所以使门格尔不快，只是因为这样干太外行了，而且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她确信，门格尔已经下定决心，他所作的都是对他有利的事情。

马尔克·贝尔科维茨还讲了一件门格尔贪污受贿的事情。一天，门格尔对他的勤务兵说，去找四、五名“最结实强壮的男孩来”。在一名党卫队士兵的押送下，这些孩子来到指定

的地点。那里放着几个橡胶轮手推车，旁边还有四个用金属带捆得紧紧的板条箱。贝尔科维茨至今还记得，“这些金属带象刀片一样锋利”。这几个孩子用手推车把箱子推到铁路岔道上，把它们装上一辆开往德国去的货车。货车上已装了许多散包的衣服和鞋。但是，贝尔科维茨注意到，他们送来的四个箱子上面的地址却是京茨堡。“我敢肯定，箱子里装的多半是用金牙溶成的金条（吉泽拉·佩尔也说是门格尔偷来的），还有各种金笔，金打火机、金表、金烟嘴和珠宝。”

与门格尔平时的谈话，也使埃拉·林根斯觉得，门格尔并不是一个把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囫圇吞枣般全盘接受的没有头脑的狂热者。虽然他行动上确实是这么干的，但也许是因为这样干符合他的意图？“德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有智慧的民族，”他对林根斯说。“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个民族中间究竟由哪一个民族来统治世界。”这和他经常叨唠的论调迥然不同。难道他说这番话主要是为了向林根斯表达一种善意？还是主要想再一次考验她，看看她有什么反应？也许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很可能，每个因素都有一点。

其实，埃拉·林根斯的结论是，党卫队中即便是最“有理性的人”，即使在第三帝国的命运已经衰落时，也要去捍卫希特勒。这种没有理性的行为，和他们坚决的反犹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正象一名党卫队员曾对她说过的那样，尽管希特勒从事的许多“惊人”的事业会失败，“但至少我们正在驾驭着犹太人的世界。”在她看来，他说这些话的态度是认真的。

汉斯·明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表现与门格尔大不相同。但在四十年以后，他仍然认为他的这位同事“见多识广，对一般问题都有涉猎，不仅仅限于医学方面。与集中营的其他一些党卫队医生（他们都是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相比较，门格尔是不同寻常的。他不仅聪明，而且，无论从一般方面，还是从科学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我们在友好地交换意见时，我可以发表不同的见解，他都耐心地听着”。当问到他是否认为门格尔是一个“愉快的伙伴”时，明希哈哈笑道：“一点儿不错。他和其他人显然不同，在他们一伙人中，他是最容易接近的。因为在他身上没有党卫队医生的那种一成不变的顽固态度。”

埃拉·林根斯认为，不管门格尔对纳粹的事业持有何种信仰，但他最后终于失去了这种信仰，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处境，他从未采取过严肃认真的态度。他认为集中营的状况是腐败的。”林根斯说，有时门格尔也振作起来，想改进这种状况。但是，她同时也指出，门格尔仍然继续不断地“残酷地杀人”。难道这是因为他对所有一切——包括人的生命在内——都无所谓吗？他肯定对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是很重视的，正是因为十分珍惜自己的这一切，他才在战后保住了性命而逍遥法外。

尼斯利曾经指出，门格尔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研究工作上。他在从事他的研究工作时，摆出一副教授的架势，书写病历和资料卡片总是先用拉丁文写，然后再用德文写。

“他本来可能在学术方面取得第一流的成就，”埃拉·林根斯说。“使他感兴趣的是真正的研究工作。我始终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行业，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在犯人医生中，没有一个人从事过按严格意义所说的研

究工作或见识过实验工作。病理学家尼斯利是个例外，不过他也只限于验尸方面的知识。有一次，门格尔邀请埃拉·林根斯参观他的科学资料。她把几个井井有条的装着各种数据的卡片盒翻了一遍，看起来里面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

“当我把这些资料粗略地看了一遍以后，他说，‘有意思吗？如果这些东西落到布尔什维克的手里，就太可惜了！’这是1944年9月间的事情，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居然没有听到他重复任何人都会对我们讲一通的什么最后胜利的那套老生常谈。”

吉泽拉·佩尔认为，门格尔过去之所以对他的研究工作保密，目的是要隐瞒他的罪行。林根斯现在认为，门格尔所以让她参观他的工作，也许是要她成为一个证人，证明他的研究工作是“清白的”——只不过是一些孪生子和侏儒们的头颅和身躯的测量数据而已。门格尔不是一个傻瓜——他想到了未来。

另一方面，明希说，尽管他们之间有过交谈，“但门格尔从不和我及其他任何人讨论他的研究工作。他对此保密。这些研究工作将是他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他不想和任何人共同享有这些材料。”明希是这样说的，任何人也都是这样解释的。

门格尔是经过考虑以后，自愿到奥斯威辛来工作的。他到这里来，曾经得到科学界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因此，他废寝忘食地、勤勤恳恳地以他独特的方式投身于他的工作中去。他想象自己是处在遗传学新领域的尖端上。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他或许能取得重大的突破；这就可以证明，他违背他父亲的意志以及他的杀人活动是对的。看来门格尔是这样一种人，他通过标有“劳动给你以自由”字样的集中营大

门，便相信了这一说法。诚然，他对劳动的概念颇为特殊，而对自由的概念则完全是一种奥韦尔^①式的，即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中的那种人身自由。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门格尔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呢？……显然没有什么现成的或简单的答案。但是，其根源肯定是与其父的关系开始的。他接受的是一个要求绝对服从的母亲的爱。他自己就说他的母亲瓦尔布尔加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人。这种情况是否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虐待儿童？这不是一种没有可能的猜测……心理学家们发现，那些受过虐待的人，最有可能对自己的子女施行残酷的手段。从门格尔的情况来看，他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些年幼的孩子们，常常先是表现出一种父亲般的慈爱，然后就残酷地惩治他们。而且，在他拿孩子们的眼睛（是他的代用品）作试验的描述中，不就反应了奥狄浦斯的故事吗？^②不就是对恋爱亲生母亲、憎恨亲生父亲的行为的惩罚吗？

门格尔反抗他的专制的父亲，表现在他拒绝继承他的衣钵上。他要想取父亲而代之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取得非常的成就。他在东茨堡的同学尤利乌斯·迪斯巴赫说：“我认为，正是由于他热衷于声誉，他才去从事那些不人道的科学研究工作，使他的野心发展到这种地步：除了试验，一切都无所谓了。”

显然，门格尔垂涎“教授先生”的称号。也许会授予他

① 乔治·奥韦尔，本名埃里克·布莱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及散文家。——译者

② 奥狄浦斯是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底比斯王子，曾解怪物斯芬克斯的谜。后误杀父亲并娶母亲，发觉后自刺双目，流浪而死。——译者

这一“永久性”的权威的头衔。然而，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所享有的权力不过是过眼烟云。他一直是一名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而在集中营范围以外，他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了。

虽然他瞧不起经商，但他还是设法保持与父母的联系。卡尔·门格尔和瓦尔布尔加·门格尔对他们的长子抱有极大的期望。虽然最初他们对于他选择这一职业感到遗憾，但他们一想到有个儿子能跻身于学术界和科学界的上层人物中间，会给他们增添光彩时，肯定会沾沾自喜的。

因此，他们对他的抱负加以鼓励。他需要从“一个具有非凡抱负的学生”起步，取得成就。撇开父母亲这种权威人物不谈，年轻的约瑟夫·门格尔找到了新的、能够提出严格要求的监护人。在政治方面，有阿道夫·希特勒；在学术方面则有奥特马·冯·弗许尔。

当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为教授的头衔拼命地奋斗时，这些父亲般的人物仍然不断地对他施加影响。他曾经为希特勒、为祖国而战。而且，为了表达他的疯狂的爱国热情，他先后加入过钢盔团、冲锋队、纳粹党和党卫队。而这时，他又为了祖国在“世界的粪门”中艰苦地工作。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考验。这一时期，他和他的学术与专业的导师奥特马·冯·弗许尔的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甚至他的亲生父亲也不过是他的舞台的一个部分。根据材料所说，卡尔·门格尔曾到过奥斯威辛集中营，和他的儿子在一起度过一段时间。这位年青人究竟能让他的父亲看到多少东西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人们可以这样设想，这次探望只能产生一种促使他取得成就的更大的压力。

门格尔的反犹太主义及其表现，都与他垂涎权威有直接的关系。诚然，种族主义是权威思想的一种自然产物，是一

个种族凌驾于另一个种族之上，是一个当权的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门格爾的父亲与纳粹订有契约，所以他肯定不会抵制反犹活动的。门格爾所信奉的天主教会，已经和纳粹达成谅解，（有人会说是和解）不再对迫害犹太人一事公开表示反对。门格爾的事业的前途要靠纳粹运动的成功。而纳粹运动是把消灭犹太人看作是它的宏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一个具有门格爾这样政治倾向的人看来，纳粹理想取胜的唯一途径就是，不能让向纳粹权威的挑战得以成功。作为一个权力主义者，门格爾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即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不妨再一次回顾一下他对埃拉·林根斯所说的话。他不动感情地、用他那一套符合自己意思的逻辑说：“德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有智慧的民族……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个民族中，究竟由哪一个民族来统治世界。”后来在巴西，门格爾继续为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辩护，理由是犹太人对纳粹的霸权造成了威胁。为了维护他所希冀的政权形式，除了把他的精力用来消灭这群异类，这群德国的敌人，他还能够选择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不错，有些人会这样说，门格爾尽管有这一切，但他必然会认识到，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但是，人的自我辩解、自我欺骗的能力是巨大的。尤利乌斯·迪斯巴赫认为，他能够探明门格爾的思想深度（他这样做，也就揭示了他自己的思想深度）：“人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并设法了解它。毕波可能会对自己这样说：‘在这里，我有机会进行研究。这些对象，这些人反正已经注定要死的。他们无论如何总是会被毒气杀死的，而我用他们作试验也许能够发明出一些药剂，能够在将来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这些药剂只能用人而不能用动物来进行试验。’”

但是，迪斯巴赫根本没有考虑门格尔施加在犯人身上的胡作非为的种种暴行，更不用说他的那些试验的残忍性了。如果说这些试验与发明新药物或拯救生命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

按照我们认为是起码的正常行为来判断，门格尔的这种行为肯定是不正常的。有人会说，根据一本教科书中所下的定义，门格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行为是高度的妄想狂。这个定义是：“性格失常，其特征为猜忌、多疑、固执和过敏，出现妄想症状。患者通常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常表现出不满，往往把在社会相互作用中的缺点归咎于他人。”

但是，这种说法过于简单，过于就事论事，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时代所流行的种种看法。这些看法对于门格尔其人，对其所作所为，都是一种维护其尊严并为其辩解的强大力量。门格尔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主流（包括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思想的主流在内）的放荡不羁的罕见的扒手。这个时代，再加上他父母亲的关系，要比教科书上为精神病所下的明确定义更能说明门格尔其人。

尽管门格尔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他并没有在科学上有什么突破，而且，1944年底，当强大的红军节节推进时，无疑，门格尔内心深处的沮丧和愤怒必然令人震惊。

第九章 出 逃

1944年11月26日，希姆莱感到大势已去，便打电报给奥斯威辛，要他们拆除杀人工厂，从而集中营的大规模屠杀的速度减缓了。一名证人认定，约瑟夫·门格尔于11月3日还在铁道岔道上进行挑选工作，也许这是这位“灭绝人的天使”最后的一次现场表演。在那一趟火车里，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塞雷德运来了五百零九名犯人。门格尔对其中的四百六十一人宣判了死刑，这些人立即就被送去处死了。

马尔克·贝尔科维茨说，大约在六周后的一个晚上，也就是在犹太圣节和圣诞节之间的某一天，他正和“一帮各式各样的犯人——搞同性恋的、政治犯和宗教人士”在盥洗间一起唱圣诞颂歌。突然，门格尔和另外两名党卫队员出现了。

“他象个幽灵似的从对面的吉卜赛人营那里走了进来。我不知道他怎么晓得我在这里。他身着全套军服，对我说，‘你多保重，再见了。’”

米克洛什·尼斯利则没有见到门格尔前来告别。一天早晨他醒来后，听说门格尔已经溜掉了。据消息最灵通的人士猜测，他出走的日期大概是在1945年1月17日左右。有的还说，是一名司机开车送门格尔走的。但是，可以找到的材料中却没有关于他有私人仆役的记载。总之，门格尔消声匿迹了。大约十天后，俄国军队解放了奥斯威辛。当时，集中营的犯人只剩下了一小部分，大约有两、三千人。绝大多数犯人都

已被押往西方。成千的犯人死在押送的路途上。他们或死于风霜雨露，或死于看守的枪弹下。马尔克·贝尔科维茨认为，门格尔的“动物园”里的一千八百名儿童中，象他这样能够活着走出大门的孩子只有一百八十名。

早先，就有关于纳粹集中营暴行的传说在流传，后来，从集中营逃出去的犯人们又提供了许多罪行材料。因此，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公开宣布，要对与战争罪行有关的人员进行起诉。罗斯福说：“凡是蓄意参与把犹太人送往波兰处死者……与刽子手同样有罪。”为了进行起诉，盟国成立了调查战争罪行的机构，负责查明罪行的参与者，并予以缉拿归案和进行审讯。

各国按照联合国的做法，先后发出通告，公布了被通缉者的姓名。门格尔的名字早在1945年5月间，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日的那一天，就上了通缉名单。并且，至少有七个国家发布过简短的命令，把他列为对本国公民犯有罪行的嫌疑犯。

遗憾的是，美国成立的管理被占领的德国的各种军事管制机构，以及负责追捕战争罪犯的人员全都组织不善。人员流动性很大，一批美国兵轮换回国后，接替而来的新兵又对军队的情况和对所承担的任务缺乏了解和经验。

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至少还有一个调查战争罪行的人。他为门格尔建立了一个尽管收集的材料不多的档案。这个人就是美国战争罪行调查处的首席研究分析人员M·沃尔夫森。他收集了几项指控门格尔罪行的检举材料。其中一份证词写道：门格尔“常常给儿童和成年人进行脊髓穿刺，给他们注射药剂，许多人因此得病，出现高烧症状而致死”。第二份证词指出：“门格尔医生的活动是相当公开的。他亲自动手，

或命令他人对男女犯人作绝育手术。他还从犯人体内抽血。”
沃尔夫森的报告还谈到了门格尔的孪生子研究，甚至还记载了门格尔在挑选犯人时的一些做法：“夫人，当心点，您的孩子会着凉的。”……“夫人，长途旅行后您累坏了吧。把您的孩子交给这位女士，您以后会在托儿所里找到他的。”

沃尔夫森一再建议，“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约瑟夫·门格尔应予列入通缉名单，应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

这位首席研究分析人员还揭发了奥特马尔·冯·弗许尔。沃尔夫森的档案材料中，还有一份来自他下属的柏林办事处的信件，内称：“根据各种材料……冯·弗许尔被指控与集中营中，特别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利用活人作试验的罪行有关。他被指控为一名积极参与罪行活动的纳粹分子。”

根据冯·弗许尔所充当的角色，他受到了审讯。当问到门格尔的情况时，他试图为他的这个门徒开脱罪责。他向审讯人员提出，这个集中营医生被派往奥斯威辛去，是违背他本人的意愿的，他曾经设法想要调离。沃尔夫森驳回了弗许尔的这个说法，扼要地重述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马特斯对门格尔所做的赞誉评价。

冯·弗许尔对审讯人员说，与门格尔工作有关的全部信件、文件和标本都已毁掉。沃尔夫森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是冯·弗许尔自己烧毁了一切罪证，以便保护自己和门格尔。

这位德皇威廉研究所前所长确曾供认，他曾从事由第三帝国研究委员会指派的医学研究工作。但他坚持说，这些研究工作只限于合法的医学卫生问题。结果战争罪行调查处对这位教授先生，这位门格尔的导师未予起诉。

可是，当冯·弗许尔和他从前的一位同事发生一场喧闹的公开争吵时，他依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他说他的

对手最初是个共产党人，后来加入了党卫队，如今战争结束又摇身一变而成为苏联的支持者。争执的中心是一批文件和设备的归属问题。冯·弗许尔声称，这些文件和设备是他从德皇威廉研究所抢救出来的。早在1946年，冯·弗许尔就向伦敦人类遗传局呼吁：“我希望，我从俄国人手中抢救出来的、并从柏林达莱姆运到黑森，后来又辗转运到法兰克福的前德皇威廉研究所的科学设备，可供我使用，以便使我能够在法兰克福继续，或者不如说重新开始我的研究工作……我们的工作将如以往一贯所作的那样，以研究结核病为中心……我从事结核病研究工作已有十八年之久……我相信，英美两国终将会有人帮助我继续我的科学研究。对此我从未丧失过希望”。

一个由冯·弗许尔之流组成的委员会，于1949年为他们这位同行辩护说：“如果我们在事后把一个一生历经艰辛而经常显示其高尚品质的、本来是正直而勇敢的人的一些孤立的小事，当作是不可原谅的道德上的污点，这就是吹毛求疵。”于是，德国学术界宣称，这个曾经身为门格尔导师的人物，无论在精神方面和思想方面都是完全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

后来，冯·弗许尔还是照旧被任命为西德的蒙斯特大学的医学教授。而这个曾经充当纳粹的支持者和理论家、曾经鼓吹过用人来进行医学试验的教唆犯，无论是其本人，还是蒙斯特大学，都没有因此而遇到过任何麻烦。冯·弗许尔此后一直在蒙斯特大学任职，于1969年去世。

虽然有大量人证证明门格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折磨并杀害犯人，但是战争罪行调查当局却主要忙于审讯那些纳粹的高级官员。如希特勒的主要助手赫尔曼·戈林、党卫队保安处

处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军队领袖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和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陆军上将、纳粹波兰总督、特别行动的狂热推行者汉斯·弗兰克等，所有这些人都在纽伦堡受审。

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证词材料多达数千页。罪行包括侵略其他国家，以及五花八门的范围极其广泛的暴行。在这些材料中，约瑟夫·门格爾的名字出现过三次。玛丽-克洛德·瓦杨-古久里夫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法国小分队的成员，她谈到门格爾在挑选犯人时，总是把孪生子挑出来进行试验。她回忆说，在挑选犯人时，门格爾嘴里常吹着“轻快的曲调。”苏联军队转交了一个十九岁男孩的证词，他说：

“我被关押在集中营期间，门格爾医生三天两头地抽我的血。”另外，从波兰押解来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霍斯也提到克劳贝格和舒曼进行的绝育活动以及“党卫队医官门格爾所进行的孪生子试验。”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森领导下的检查团首席检查官特尔福德·泰勒说，在审讯过程中如发现有损坏某人名誉的材料时，按正规程序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调查。因此当局本应加紧调查和搜寻门格爾，但事实上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工作。门格爾只是被列在一个长长的一般战犯名单之中。

1946年秋，对二十一名纳粹最高级领袖人物的审讯结束后，特尔福德·泰勒便奉命对德国社会中参与战争罪行的其他各阶层的重要人物进行起诉。有一次，审讯的对象主要是法律界的人士。另外一次则是以实业界和金融界人士为目标。第三次审讯则是针对医学界的。有二十四名医生受到指控。结果，其中十五名被判定有罪，七名被判处死刑。这些

被定罪的医生中没有一个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过的。被处决的有：希特勒帝国的卫生专员、提出“无痛苦死亡”计划和医学试验的首要分子卡尔·勃兰特；党卫队医药卫生首脑卡尔·格布哈特，此人在医疗方面曾亲自犯有暴行，他曾于1943年狂妄地声称愿为自己的工作承担责任；希特勒总理私人办公室主任维克托·布拉克，他曾对许多试验给予支持；与使用毒弹头进行试验一案有牵连的约阿希姆·姆鲁戈夫斯基医生；积极从事“无痛苦死亡”活动的瓦尔德马尔·霍芬。

约瑟夫·门格尔的名字在这次审判中没有出现。而他以前的一名同事弗利茨·克莱因却在另一个法庭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克莱因是一名中年医生，除了顽固地仇视犹太人外，对集中营中的病人还是比较关心的。后来，他被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调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克莱因离开奥斯威辛时，可能已经意识到战争的败局已定，遂向同事们话别，其中也包括一些犯人在内。在座的弗兰克·施蒂费尔非常惊奇地听到克莱因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请求你们对我在担任集中营医生期间可能犯有的任何暴行给予原谅。我是被迫执行命令的。”许多纳粹分子在接受审判时，都是吞吞吐吐地说“我的过错”。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然而这并未能挽救克莱因，后来英国人还是把他绞死了。

在同盟国对战犯们进行审讯的时候，门格尔却在千方百计地四处藏身。他的失踪，就是他一生经历中许多不可思议的谜之一。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他在1945年1月到1949年间的下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凭空想象的说法就应运而生了。

门格尔离逃奥斯威辛后，关于他的最耸人听闻的“英雄业

续”就流传开了。这是一则围绕着一个名叫维尔玛的波兰犹太女人的。这段奇闻是从这里开始的。维尔玛和她的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华沙由他们的祖父抚养成人。祖父是一个富商。他在巴勒斯坦的一次游历中，由于喝了街头小贩出售的掺有甲醇的饮料而双目失明。回到华沙后，便把他经营的生意出手，和孙子、孙女过起隐居的生活。德国人席卷波兰时，维尔玛的哥哥加入了一支受到人们鄙视的犹太人组成的保安部队。这是一个由纳粹资助的组织，其责任是维持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治安。美丽的金发女郎维尔玛当时只有十八岁，但已经是这个犹太区里黑势力头子希尔·陶贝尔的情妇。她从陶贝尔那里学会了一套黑社会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的本事。然而，她时运不济。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时，她被人出卖，被送交秘密警察。后来她被押往奥斯威辛。

在挑选犯人时，门格尔为她的姿色所倾倒，便把她安排在自己的住处当他的“女管家”。实际上，是他的情妇。不久，她就渐渐地向他施加影响。集中营中的犯人们为了讨好她，便通过集中营外的亲属给希尔·陶贝尔送钱行贿。陶贝尔这时已经逃脱了华沙犹太区被消灭的那场灾难。

盟军攻下罗马后，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苏军也于同年夏天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于是门格尔就与维尔玛商量他逃走的可能性。1944年10月，维尔玛说通门格尔，给她搞了一张临时通行证，随即前往华沙。她在华沙找到了一些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他们或是因为帮助过纳粹，或是充当过犹太。或是干过保安警察的勾当才得以活下来，有些人是为德国人的战争经济制造军需品的。但是，他们并不信任其主子，于是就将一些违禁品私卖给波兰的地下组织。这时，

维尔玛的老搭档希尔·陶贝尔也在这些犹太人残渣余孽之间浮沉，既与德国人也和地下组织作生意。

维尔玛到达华沙时，希尔·陶贝尔因有援助游击队的嫌疑正被秘密警察关押着。善于随机应变的维尔玛便利用她从奥斯威辛带来的身份证明文件，使当局相信陶贝尔是负有秘密使命的重要特工人员。因此，这个地头蛇不仅获释，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特别文件，允许他进行一些特殊的活动。维尔玛和陶贝尔设法会见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他们从这些官员那里取得了一些证件，波兰犹太人利用这些证件就可在德国人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前往瑞士。接着，他们把许可证转手卖给了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给他们签署了期票，有朝一日他们能凭这些期票从那些逃脱出去的犹太人手里兑换外币。

门格尔在这一诈骗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伪造的医疗证件就是他签署的。而这些证件在取得波兰出境许可证和瑞士入境证时都是必需的。即使在波兰境内还有活着的犹太人医生，他们所签署的证件也是无效的。而波兰医生则又不愿为犹太人治病。但是，由党卫队医生签署的证件极为有效。门格尔得到了一套古书手抄本作为贿赂，并获得在他离开奥斯威辛时可以得到帮助的许诺后，便同意参与这种阴谋活动。第一批顾客顺利地移居瑞士，其中有维尔玛的亲戚。他们到达瑞士后，非常贫困，需要当时的福利组织的支持。在欧洲胜利日之前，这伙亲属已攒够了钱，在苏黎世附近买下了一座旅馆。

后来，维尔玛又返回奥斯威辛，来实现与门格尔的交易。当苏联红军向集中营逼近时，这对情人便悄悄地溜走了。他们出了集中营的大门后，马上化装成一对逃难的犹太夫妻。维尔玛机警地领着门格尔向东南方向逃去。他们料定凭着这

身打扮定能安全地混过苏军的战线。为了摆脱纳粹的追踪，他们在喀尔巴阡山疗养区的扎科帕内这个地方的一所安全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到了1945年的夏天，这对“夫妻”趁着欧洲正处于混乱的和平时机，来到布拉格。他们在那里说服英国人发给他们证件，证明他们是奥地利的难民。这首叙事诗样的传说，接着下去的一段，便是描述他们前往维也纳，国际红十字会的证书又使他们进入瑞士的经过。在瑞士，维尔玛从她的亲戚那里收回了她应得的权益，其中包括苏黎世附近的那座旅馆也归她经营了。她又从西德和瑞士的犹太难民那里兑现了期票，这就使她暴发起来。而这时，希尔·陶贝尔手里也掌握着大量的欠款借据，但他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行动过。据说，他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试图偷越边境时，被开枪打死了。

这位波兰犹太女人和这位前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之间的情史就此终结。维尔玛仍然留在瑞士，而门格尔则短暂地回到德国看望他的家人后，使取道意大利逃往南美去了。

这就是美国和欧洲的报刊杂志中所报道的一段电影剧本的剧情。法兰克福的检察官汉斯埃贝哈德·克莱因自1974年以来就一直追查门格尔。他说，这种说法主要是一个“老纳粹分子”维纳·布罗克道夫编造的。布罗克道夫于1969年写的《逃离纽伦堡》一书中，有一章概述了许多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的一生经历。维尔玛和门格尔的这段往事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维纳·布罗克道夫的笔下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反犹情绪。书中描写的受害者，看来简直就象压迫他们的纳粹分子一样贪得无厌和无法无天。该书的基本要旨是说，战争期间每个

人的行为均属不端，又何必要把罪行全都推到战败者的头上呢？

布罗克道夫还在书中提到一些地址、几个人名和一些日期及事实，这似乎给人一种煞有其事的感觉。他声称曾与维尔玛的亲友们交谈过，但又说不出究竟他们姓甚名谁来。他还说，一个来自南美洲的门格尔的朋友证实了他的说法。

不仅如此。在集中营那种气氛中，居然能贿赂公行，以致于能让维尔玛能在奥斯威辛从事出卖色相的勾当，并且还能够从华沙的亲友那儿收受钱财，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布罗克道夫谈到犹太区被毁灭后，这个城市还留下五万名犹太人。但威廉·L·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指出，在华沙犹太区受到最后一次袭击以前，那儿活着的犹太居民总数为六万人，这也是全城剩下的全部犹太人。纳粹统计，在为期二周的袭击后，有五万六千名犹太人被打死，幸存者净数为四千人。此外，布罗克道夫所说的门格尔逃往南美洲的路线，从地理上来看，也错误百出。

检察官克莱因认为，布罗克道夫的故事纯属虚构。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却表明围绕着门格尔这个人物的种种传说为何四处兴起。在他逃亡后的四十年中，有关他的属于传闻失实的消息以及别有用心编造的假消息，连篇累牍，不可胜数。这些谎言的编造者中间，不乏布罗克道夫之流的纳粹辩护士，但也有一些是极端渴望看到门格尔走上受审席的人们。

关于门格尔逃跑的想象色彩较少而且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样的：他只是找个借口离开了集中营，前往京茨堡这个对他保持着善意的故乡去了。随着德军的溃败，成千上万的德国军队投降了。象门格尔这样机智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混

过德军防止逃兵的检查站。

1945年，伊雷妮·门格尔在离京茨堡几英里的奥滕赖德这个小村子里，向一个农场主租了一所小别墅。她便带着与门格尔1944年生的儿子罗尔夫在这里住了下来。许多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几年间，门格尔就是藏在这所房子里的。当汉斯·埃贝哈德·克莱因向那所房子的主人询问他的房客的情况时，他坚持说，除了门格尔夫人外，他从未见到过其他的人。保管门格尔档案的杰拉尔德·波斯纳律师说，他曾和一个人谈过话，此人发誓说，他在那几年里，在京茨堡“地区”看见过门格尔。克莱因却说：“没有证据说明门格尔在京茨堡待过。”他这样说，并不是断然否认门格尔这个逃犯曾经一度在京茨堡地区的奥滕赖德住过。

德国记者费利克斯·库巴拉在1985年间曾把门格尔离开奥斯威辛后的一系列活动编制成一套电视广播节目。库巴拉认为门格尔离开奥斯威辛后，不是前往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就是去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他可能是在随车前往上述一个集中营的途中，逃跑了。

库巴拉发现一个名叫托马斯·贝格托尔德的证人。此人出生于离京茨堡不远的布尔高镇。贝格托尔德对库巴拉说，他曾经是新闵斯特附近的英国集中营里的一名战俘。有一次，正当他和伙伴们闲聊用香烟换食物的事情时，另一个同屋的犯人注意到贝格托尔德的斯瓦比的口音，便询问他的故乡是在哪里。当他把他的故乡告诉他后，这个新来的犯人便问贝格托尔德是否知道京茨堡和门格尔工厂。当贝格托尔德说他当然知道时，那个犯人便说：“我就是门格尔，我是从京茨堡来的。”

罗尔夫·门格尔在他的父亲被证实死亡后，向《彩色画

报》杂志发表的正式材料是以和他的父亲往来的信件和谈话为根据的。材料说：“战争结束时，我的部队驻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停战的那天晚上，我们逃往西方。在一座大城市（《彩色画报》说是纽伦堡）附近，我们被关进了美军战俘营。我们辗转到过好几个战俘营，后来我们被放回美国占领区。”

尽管贝格托尔德的说法和门格尔自己的说法有出入，但库巴拉还是相信他的证人贝格托尔德的话。门格尔对他儿子所谈的具体情节比较含糊，所以可以想象他既落入过英国人的手中，也落入过美国人的手中。不仅如此，他可能只愿意说他一直坚持到投降的前夜，而不愿承认一有机会就向最近的盟军投降了。门格尔的一个老同学迪斯巴赫有一次曾说过，门格尔其人“勇敢不足，谨慎有余”。

门格尔和他的许多同事不同，没有让党卫队在自己的臂上刺上血型号码。后来，盟国占领军就以此作为识别党卫队士兵的一种办法。门格尔没有刺血型号码，这有助于他隐藏起来。库巴拉还写道，战争结束时，农业工人非常缺乏。任何能使当局相信他在农业方面具有知识的人，都能很快获释。门格尔很可能就钻了农业劳力缺乏这个空子，因而很快就被释放了。

总之，他来到了巴伐利亚的多瑙沃思，看望他的一位大学时代的朋友、兽医阿尔贝特·米勒。米勒的未亡人在回忆门格尔按响她家门铃的情景时说，“我打开门一看，是一位军人，我认出他后就打招呼说，‘您好，门格尔医生。’”她对她的问候感到惊讶。虽然当时她的丈夫不在家，她还是把他让进屋里。她的丈夫回来后，两人便谈了起来，米勒夫人则去准备饭菜。她说，她当时听到门格尔对他丈夫说：“你

将来如果听到有关我的任何情况，肯定全是谎言，你一个字都别相信。我没干过什么错事。”

门格尔后来对他的儿子罗尔夫说，从1945年到1949年这些年里，他一直在慕尼黑附近的罗森海姆的一个农场里当马夫。他说，他的雇主对于他是何许人根本不感兴趣。他要的是他的精湛的手艺。尽管没有什么可以证实的理由来怀疑这种说法，但是不应忘记，人们出于要保护那些庇护过自己的人的愿望，常常有可能说谎或隐瞒全部事实真相。

从门格尔逃往南美后所得到的帮助的前后情况来看，很明显，他必然与京茨堡的乡亲们有过密切的接触。但是，从战后至今，据说在他已死亡的这三十四年间，他们一直保持沉默，而且当时间又过去了六年后，那些过去对门格尔的消息一直讳莫如深的门格尔家人，门格尔公司的雇员们以及乡亲们，现在仍然守口如瓶。

京茨堡在战争期间，没有受到空袭的严重破坏，也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巷战。正当美国军队逼近这个城镇时，第三帝国的看守政府便投降了。空袭只破坏了一些建筑物，门格尔家的工厂大部分安然无恙。但是，由于供应品和人力缺乏，这家工厂只剩下了一百四十八名骨瘦如柴的工人。更糟糕的是，1945年6月，当地军管政府逮捕了小卡尔·门格尔，并且把他关押起来。当时他免服军役，在家管理企业的生产。门格尔的小弟弟阿洛伊斯则当了兵，成了战俘。

尽管如此，门格尔家族在战争期间的经历，仍要比那些反对过纳粹的人幸运得多。不妨以当地的天主教教士亚当·比尔纳为例。比尔纳牧师是在1935年，也就是约瑟夫·门格尔离开他的出生地以后，从奥格斯堡大教堂来到京茨堡的。当局所以把他赶出奥格斯堡，是对他反对纳粹的一种惩罚，

因为他在对挤满教堂的教徒们布道时，鼓吹要反对政府中的“犯罪分子”。他说：“凡是国社党员，不是白痴，也是精神失常的人，要么就是恶棍。”

据说，他的同堂教士不择手段地把他的不同政见，添油加醋地向当局告发了。于是，他被秘密警察抓走。1941年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日，他在审讯时被打得死去活来，警察不得不把他从监狱送往奥格斯堡的中心医院。四十年后，一家报纸深入地查阅了官方档案，发现了这么一条注释：“这名四十三岁的男子躺在那儿无人照管至少有四十五分钟，于下午七时十五分死亡”。在死亡证上签名的是医生奥特弗里德·格利希。他后来在京茨堡行医，是一名党卫队员。时至今日，无人知晓秘密警察究竟把比尔纳埋在何处。这位殉道者倒下去许多年以后，奥格斯堡的主教曾对一位要为亚当·比尔纳编写传记的人说：“你最好把他留在美好的记忆中，千万不要公开地对他表示敬意”，既然在京茨堡无人起来为亚当·比尔纳声张正义，那么，约瑟夫·门格尔这个在本乡本土为人宠爱的儿子的出现，不会有人出来告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地能够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较之比尔纳，更加不为人们所知晓了。京茨堡市有个“犹太人镇”，名叫伊青豪森，犹太自由民都住在那里。数百年来，犹太人排挤出奥格斯堡来到这里。奥格斯堡至伊青豪森之间的铁路线被人叫作“犹太人岔道”。1933年，纳粹进行登记时，伊青豪森活着的犹太人有三百零九人。大战结束时，一个也不剩了。这些犹太人不是逃亡他乡，就是被毒气杀死了。（伊青豪森的那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如今成了存放救火车的地方。1972年后，这个村子造了一条新的大街，竟被恬不知耻地命名为“门格尔大街”。）

京茨堡是美国一个军管单位总部的所在地，这个总部管辖的范围有许多城镇，人口总数达四万五千人。美国人力图挑选出一批与纳粹没有关系的人士出任市长。有些人被任命后，由于其劣迹被发现，又被免职了。同样，为恢复当地工商业活动所作的努力，也告失败。因为被认为最合格的人选也都被证实与纳粹有牵连。

京茨堡的居民看来是顽固不化的。从这个地区的市民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他们把纽伦堡的审判看作是“为了进行宣传而编造的谎言”。在军事管制单位的档案材料里，有一些当地居民来信，这些信件写道，因为他们的反纳粹活动，他们的邻居一直不断地找他们的麻烦。

例如，一位牧师在信中描写了他把武装党卫队部队在最后日子里防守这个地区的阵地布署情况通知给向前推进中的美国部队所作的努力。敌对行动停止后，他却受到了他的教士们的围攻……“炮兵协会”是德国退伍军人的一个联谊会。该协会在京茨堡举行了一次聚会。当地的警察们到场了，提供消息的人向美军当局报告说，一名检查员的妻子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犹太难民在附近宿营，他们在京茨堡的电影院看电影。新闻片的内容是，慕尼黑有一座新建的犹太教堂开堂，集中营里有成百的人被杀害等等。一位难民说，电影院里的观众看了哈哈大笑，有人还叫喊说：“可惜死的太少了！”这句话引起了一片喝采声。美国军事当局又火上加油，对犹太的难民营进行突然搜查。美国兵破门而入，践踏圣物，无视公民权利。实际上，美军宪兵全不把逮捕战争犯罪分子的工作放在心上，京茨堡当局的那些发了霉的记录中只有一份通告，它要求全体人民密切注意一名据说是潜藏在本地的战犯嫌疑分子。但此人却不是约瑟夫·门格尔。

不错，军事管制当局首先要考虑的并不是追捕战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为缔造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社会奠定基础。追捕逃犯是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队的职责。

情报部队驻京茨堡的小分队在执行其任务时发现，恢复卡尔·门格尔父子公司势在必行。这家公司毕竟是当地最大的雇主，它仍在不断生产的主要产品，正是为供应欧洲并刺激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战争结束时，这家企业的生产装配线几乎停顿，多亏卡尔·门格尔有先见之明，而且有办法，结果公司弄到了大量的木材。这位族长捐献出一部分木材用来修复京茨堡的一些地方，以及其他遭受严重轰炸的地方的建筑物。剩下的木材库存数量仍然很大，再加上节省下来的生铁，使门格尔家族能够在战后百废待兴的繁荣中，大赚其钱。

军事管制的记录表明，恢复工作从1945年7月开始，首先有了配给的煤，这就可以用来修复脱粒机、割草机和干草捆起重机的。不到三年，门格尔公司的经理部门便抗议说，美国的管制限制太多，限制了他们的产品销售。他们说，这种限制有可能使苏占区的一百台脱粒机的定货告吹。

卡尔·门格尔重又获得了人们的尊敬。在欧洲胜利日几乎十年之后，《京茨堡报》向这位该市第一公民表示敬意说：“……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不愧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为一切爱国事业而奋斗的战士，是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方式热情的拥护者”。实际上，这位爱国者确是到1918年还在拥护德皇，对于魏玛共和国至少也是不紧不慢地给以支持的，并且忠心耿耿地为1933年上台的纳粹政权服务过。这家报纸还说：“他从来没有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滥用其有影响的地位。”

这家报纸没有考虑，是否因为卡尔·门格尔巧妙地在纳粹分子中间周旋，从政治上讨好他们，他才能够如此有钱有势。门格尔公司的兴盛毕竟对京茨堡有利，全城的劳动大军有四分之一是为门格尔公司服务，并从那里领取工资的。从1947年到1970年，担任该城市长的赛茨博士就是门格尔公司的公证人。他和卡尔·门格尔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于是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赛茨并不鼓励在京茨堡开办新的企业，否则这些新的企业会和门格尔公司在劳力、原料以及土地等方面进行竞争。在1947年至1949年这危急的几年间，赛茨市长与门格尔家族的利益比较密切。这时，他主管警察工作。正是在这些年里，搜捕战争犯罪分子并予以起诉的工作逐渐移交给新生的德国政府的。

当时，在最高级人士中间，对于缉拿一名叫作“门格尔”的战犯嫌疑分子，显然是不积极的。在最下层的人士中间，由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对批缺乏热情，对于追捕纳粹分子不但不感兴趣，而且持反对的态度。

因此，关于约瑟夫·门格尔在逃离奥斯威辛后的最初几年，是躲藏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而且花钱买通了当地人，甚至买通了美国人，让他们保持缄默的这一说法，就很容易使人相信了。

1985年1月，由于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根据美国“通讯自由法”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陆军部便发表了当年驻在巴伐利亚的雷根斯堡的美军反情报部队特工人员本杰明·戈比于1947年4月26日写的一封信的副本。

戈比的这个只有一页的备忘录是写给美军反情报部队驻维也纳的一支部队的指挥官的。戈比在信中写道：“我部接获的一份情报内称，一名叫约瑟夫·门格尔的前奥斯威辛灭

绝营的主治医生已在维也纳被抓获。”这位美军反情报部队的特工人员写道，报告人说：“据他所知，门格尔医生是在德国美占区被抓获的”。戈比建议核实这一情报，提出如果找到门格尔，应立即讯问他从奥斯威辛弄走后去向不明的二十名犹太儿童的下落。戈比还说，其中一名儿童的父亲证实，门格尔曾把这些儿童带走了。

戈比的函件被用大字标题刊登出来。这封信被看作是一个证据，证明门格尔曾经一度被美国人关押过。事实上，戈比的函件发表不到几天的时间，就有两名前美国兵前来说，他们经过思考，回忆起有一名犯人与所描述的门格尔颇相似。已退休的加利福尼亚宇航工程师沃尔特·肯普索恩详细叙述了1945年7月间他经历过的一段往事。当时他是一名十九岁的士兵，在美占区的伊达尔—奥伯施泰因拘留营看管犯人。在“维森塔尔中心”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普索恩说，另外几名美国兵认出了一个人。此人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一百六十磅，头发黑色，但是他“显然把头发染白过”。他就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给三千名妇女作过绝育手术的王八蛋门格尔。”

肯普索恩起初说，他没有完全看清楚那个犯人，后来又说是偶然碰上那个人的：“他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他的呼吸非常急促，满脸通红，浑身是汗，就好象刚刚跑完一英里似的”。肯普索恩接着说，看守们把这个犯人折磨了一番，让他在伏天里进行操练。一名前看守说：“我们假装要把他绞死。这个家伙就是门格尔，就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给三千名妇女作过绝育手术的那个混蛋。”

第二个在伊达尔—奥伯斯泰因拘留营站过岗的前美国兵也记得有这么一名犯人，人们说他是一个“把六千名妇女

绝育了的绝育大夫”。他还描述了当年他们强迫门格尔模仿“德国空军”飞机飞行的样子，对他进行体罚的情景。

伊达尔—奥伯斯泰因拘留营的美军看守们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党卫队看守们所称之为“运动”的手段来拿犯人取乐，这固然令人反感。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谈，戈比和肯普索恩的这种描述中所提到的那个人却是令人怀疑的。然而，他们所说的这些事件时间相隔两年，彼此又不能呼应。如果相信门格尔被关了两年，最终又未能查明他是一名通缉在案的战犯这种说法，就未免过份地轻信了。早在1945年5月就公布了列有他的名字的战犯名单，而且美军反情报部队的各个机关直到1948年都在不断地追踪搜捕他。

1945年，甚至连普通的士兵都认识门格尔，因为据说人们都知道，他把“三千名”或“六千名”妇女绝育了。可是居然又把他随随便便地从伊达尔—奥伯斯泰因拘留营放掉，这也令人难以置信。戈比关于门格尔在两年后被监禁过这种说法，是依据一个报告人员毫无事实根据的情报。这位报告人员提供情况时，用了“就我所知”这样一句模棱两可的说法。他从未说过他是否看见过门格尔，也没有说明情报的来源。1985年，戈比还坚持说他的那个报告人员所提供的情报是可靠的；不过，这个报告人员也许是搞错了，或者搞到的是错误的线索。

移居巴西期间，门格尔曾对一位匈牙利移民吉塔·斯坦默（她的农场是他经营的）说过，战后他被美国人或英国人（这一点她记不清楚）关押过。但由于他未被列入任何通缉名单之中，遂被释放了。除非门格尔是在1945年5月以前被抓获的，否则他所说的不可能是事实。因为从1945年的5月起，所有通告中都有他的名字。诚然，门格尔完全有可能

象阿道夫·艾希曼那样，把自己的身份证毁掉，改用化名。

也可能是与各方面的讯息断绝了，从此门格尔便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最初，美国曾试图对隐藏的战争犯罪分子进行尽可能最广泛的调查。在美军占领区中，凡在战争结束时年满十八岁者均须填写一份调查表，以便甄别战犯。这项任务的工作量是很巨大的，要有五百所法庭，二万二千名审判员（他们所受的训练十分不够，而且又往往缺乏热情）来审理三百万件控诉案。法庭总共惩处了九十万人，这一情况乍听起来令人惊愕，其实，除罪大恶极者外，所有这些惩处不过是免去政界职务或文官职务而已。美国人编制了一份列有五千名重要战犯的名单，其中实际受审的不到二百人。英、法两国也减少了起诉案的数量。美、英、法三国总共判处五千零二十五人在纳粹的旗帜下犯有罪行。八百多人被判处死刑，实际执行的只有四百八十六人。在“铁幕”^①的那一边，有八万五千人受到审讯、判刑和惩处。

此外，美国的院外集团^②吵闹不休，对审判战犯的工作大肆诋毁。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约翰·兰金就象纳粹军团中的任何一名种族主义分子一样狂热。他宣布：“我要说，目前在德国纽伦堡所发生的一切，是给美国抹黑……一些种族少数派，在战争结束的两年半以后，在纽伦堡竟然以美国的名义，不仅绞死了德国的军人，而且还审讯了德国的企业家。”（事实上，那些从奴隶劳工中捞到好处的德国军人和企业家既没有被绞死，而且罗伯特·杰克逊和特尔福特·泰勒也不是什么种族少数派。）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竟然反对对在比利时的马尔梅迪枪杀美国战

① 指苏联、东欧国家。——译者

② 指在议会大厅外走廊上从事活动的议员。——译者

俘的德国武装党卫队队员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依阿华州的法官查尔斯·F·温那斯特鲁姆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任法官，他卸职回国后就对战争罪行审判法庭进行攻击。特尔福德·泰勒回敬温那斯特鲁姆说：“您的行为是在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病态的精神状态下产生的。”

于是，追捕门格尔的工作便走进了死胡同。1947年，住在美国的吉泽拉·佩尔写信给纽伦堡战争罪行审讯法庭的首席法律顾问，自告奋勇为有关门格尔的材料宣誓作证。她收到了一封由爱德华·H·扬格上校签署的回信，内称：“据公布，约瑟夫·门格厄尔（原文如此）于1946年10月死亡。”非常奇怪的是，佩尔和奥尔加·伦格耶尔都在她们所写的描述她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经历的书中，把这位纳粹医生的姓氏(Mengele)中间多加了一个字母“r”（Mengerle）。

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发现了一份日期为1948年1月19日的文件的副本，系特尔福德·泰勒对来自华盛顿的一封信所作的答复。事实上，泰勒重申了扬格上校的报告，或者说是依据这份报告答复说：“我处材料说明门格厄尔医生已于1946年10月死亡。”

这种混乱现象的产生，不可能是因为门格尔这个名字的第六个字母写错了所造成的，也不可能真会有一个“门格厄尔”恰好在1946年10月死亡，而“门格厄尔”这个名字在战犯名单上又正好是列在“门格尔”的下一行的。所以，又如何解释这种权威性的死亡说明呢？混乱也罢，或是如前面提到的讯息中断也罢，误传失实也罢，假传消息也罢，凡此种种，皆各执一是。总之，尽管有通知说门格尔已经死亡，但是拼音正确的叫作“门格尔”这个名字的人还活着，这个名字列在1947年2月发布的应予缉拿归案的战犯名单之内，而

这是在他据说已经死亡之后至少四个月的事情。

即便是面对着这种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这时人们对于追查门格尔一事已经没有什么热情了。冷战正在全力进行，许多美国人叫嚷存在着苏联的威胁，并且只对此感兴趣，对于善恶报应却不大感兴趣。于是美军反情报部队不再为约瑟夫·门格尔之流，为那些战争犯罪分子们苦恼了，而且把克劳斯·巴比之流招募来为自己服务。如果把纳粹警察过去的罪恶和他们充当情报特工人员具有的价值相比较，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实际上，关于门格尔流传着一种富于想象的传说。传说门格尔被送入一所英国人办的谍报学校接受训练。他就是从这个学校偷偷地离开了德国前往南美洲，在那里为英国女王陛下服务去了。这当然是胡说。门格尔过去根本没有谍报工作的经历，因此无论如何，绝不会去充当一名最没有希望的谍报新手。

同样，这位“灭绝人的天使”看来也不会由于他的德国同胞承担了处理战争罪行的工作而担心会受到他们的迫害。四十年代末，刚刚成立的西德政府对于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努力并没有表示什么热情。即使对什么人提出了起诉，对他们的判决也只是从轻处罚或者仅只斥责一顿而已。门格尔很可能一直在京茨堡呆了好几年，等待着大赦的发布或者通缉令有效期限的终止。

西德的执法官员在这件事情上看来是勉为其难，但是门格尔的行为太残忍了，最后还是不得不采取行动。西德政府作了逮捕他的准备工作。据说，京茨堡的一个市民向当局报告说，这个医生就住在附近。

但是，甚至还在第三帝国的残余分子打出投降的白旗之前，党卫队的队员们就已经在为各自的前途奔走了。无数被掠

夺来的财宝被埋藏起来。四十年以后，当许多人还在搜寻这些财宝的时候，企业界主要阶层中的许多人物却面临着战胜国的报复，终日惶惶不安，一心想彼此救助。党卫队的一些死硬分子可能渴望纳粹运动能够继续下去，但多数人则挖空思想要找出一个安然逃脱的办法。他们建立了“老党卫队队员组织”，略称“奥德萨”。关押在盟国战俘营中的党卫队员建立了第二个组织——“蜘蛛”。两个组织都建立了自己的联络网，以便协助被通缉的人员逃出德国。他们建立了一些安全据点，伪造证件，训练向导和联络员，制定越境的路线和办法，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安排了庇护所。他们还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建立了一些落脚点，以便帮助纳粹流亡者在那里建立新生活。

无论“奥德萨”还是“蜘蛛”，都不象正式组织起来的团体那样进行活动。它们既没有会员证，也没有会议记录和热心办事的主席。他们就象一伙残兵败将，一伙为了活命而凑到了一起的乌合之众。

有些人认为，西方的情报部门极力想要扩大他们的情报来源，因而偶然也和“奥德萨”一道协助战犯逃走。臭名昭著的“老鼠通道”曾经把许多党卫队中的“毕业生”偷偷地送往南美洲去。这条通道既为“奥德萨”，也为美国情报机构的需求服务。不妨举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克劳斯·巴比就是在美国情报部队的协助下，化名“克劳斯·阿尔特曼”，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由“老鼠通道”经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前往直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和热那亚。然后，他们从热那亚这个港口城市乘船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作为对巴比的针对欧洲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和组织进行谍报活动的报酬。美国反情报部队对于他在战争期间对法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当然是了如指

掌的。

被盟国正式雇佣的德国人，就在边界各处活动。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马尔克·贝尔科维茨发现，他要离开这里，竟比他过去的德国主子离开这里还要困难。他有好几次都被边境边界警卫人员赶了回来。最后，美国军队在特拉维赛奥附近抓住了他。贝尔科维茨回忆说：“英国人当时正对美国入阻止难民流窜的工作施加压力。因为有大量犹太人正在非法地进入他们所谓的‘巴勒斯坦’。一名黑人美国兵把我放了，否则，我可能要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这时是谁帮助了门格尔，则无人知晓。不过，根据最合乎情理的猜测，他走的路线是经过巴伐利亚的山坡，进入意大利的蒂罗尔，然后再从那里前往罗马。意大利过去是纳粹德国的盟国，后来又成为敌人，这时已成为逃亡中的纳粹分子的避难所。特别是罗马，因为那里的阿洛伊斯·赫达尔主教有权有势，正担任罗马这个“不朽城”的德意志教会的教区长。赫达尔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曾促成了1933年的政教协议，因而使希特勒感到十分满意。这个协议还涉及梵蒂冈的另外一位代表，就是欧金尼奥·帕切利。他被推选为教皇庇护十二世，从1939年至1958年一直统治着天主教会。纳粹占领罗马期间，赫达尔和庇护十二世的统治摇摇欲坠。虽然这位教皇对于迫害犹太人问题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他还是同意动用天主教会的黄金来赎救一些意大利的犹太人。但他公开拒绝谴责纳粹分子的行为，即使他们违背了和他签订的1933年政教协议的规定：不迫害天主教徒，不反对天主教会。

赫达尔主教还用印有他自己姓名的花名标记的信笺（以此与梵蒂冈的印信相抗衡）写过一封信，要求停止放逐犹太

人。他在信中争辩说，逮捕犹太人会被“反德的宣传家们用来当作反对我们德国人的武器”。不错，这位主教没有提出什么道德问题；然而，当阿尔米尼奥·瓦赫斯伯格在兜捕中被抓并押往奥斯威辛时，赫达尔在“阿尼玛修道院”里掩护了一批犹太人。罗尔夫·霍赫胡特在他所写的剧本《代理人》中，严厉地谴责了庇护十二世顺乎潮流的妥协态度，对赫达尔敢于出面写信一事则加以赞扬。

尽管人们认为赫达尔主教要比这位“圣父”更具有同情心，但是，向一批德国的逃亡战犯大开教会的庇护大门的却是这位赫达尔。阿道夫·艾希曼、米兰的党卫队头子瓦尔特·劳夫、对屠杀八十万犹太人负有责任的加利西亚总督奥托·赖因哈特，都在赫达尔主教的保护下受到罗马天主教避难所的殷勤接待。人们最熟知的避难所，西奇利亚路的方济各会女修道院，就在著名的罗马韦内托路过去不远的地方。

因此，1949年，约瑟夫·门格尔这个可能比别人更受欢迎的受过洗礼的罗马天主教徒，便住进了西奇利亚路的女修道院。他的忤悔简直就象一个最虔诚的教士表达救人的信念，即使这还不能说就是对他忠诚于上帝的信念的一种考验。门格尔潜藏在罗马不露面，等待着时机。后来，他对罗尔夫·门格尔说，意大利警察把他扣留了三个星期，后来他们表示歉意，放他走了。1949年夏天，门格尔持意大利红十字会第100501号护照旅行，前往热那亚。当时，这种证件意大利当局已发放了五十万份。“我们接到了各地请求发给旅行证件的申请，”时至今日有一位官员这样说。“人们可以持我们的证件旅行。遗憾的是，其中也包括那些滥用了我们的信任，并且对我们说了假话的人。要知道纳粹分子和犯罪

分子并没有在头上贴上标签。”

门格尔的护照上用的名字是赫尔穆特·格雷戈尔，出生于意大利北部，是一名机械师。护照上贴的是他弟弟阿洛伊斯的照片，但是谁也不去仔细验证他的证件。于是，门格尔就在热那亚登上一艘轮船，前往阿根廷去了。

第十章 阿根廷的赫尔穆特·

格雷戈尔

门格尔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才放下心来。他的弟弟相去不远，在南美洲代理着门格尔公司的事务。这时，德国人大批涌进南美洲，有的是为了逃避迫害，有的是寻找新的生财之道，有的则是害怕欧洲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从1948年到1953年间，单是来到阿根廷的就有两万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看起来象是一座欧洲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公民们简直可以看作是柏林的或者慕尼黑的公民，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胡安·庇隆，也完全和希特勒一模一样。

门格尔化名为“赫尔穆特·格雷戈尔”，他在阿根廷的行动无人注意，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在城里佛罗里达区的阿雷纳莱斯大街上的一所漂亮的住宅中，租用了几间房子。住宅周围有不少格调古朴的白色建筑物，那些漂亮的车库大门都是用栎木制作的，街道非常清洁。门格尔一步步地跻身于当地的社会之中，后来终于成为一个桥牌团体中的一名成员，这个团体中也有犹太人。当然，他们只知道他也是从德国来到此地避难的。在故乡京茨堡，汉斯·拉特恩泽尔律师是许多受到指控的战犯的代理人。他也被聘请作为门格尔的辩护律师。但是，门格尔在阿根廷生活的最初几年间，人们并没有尽力去寻找他。

有一件事情使门格尔感到非常失望。他原来曾指望伊雷

妮能够随他同行,但是伊雷妮没有同意。事实上,她证实了她的公婆所担心的事情,就是她的所作所为不象是门格尔家的媳妇。门格尔逃走后不久,她就搬到离京茨堡几百英里外的弗赖堡去了。这种自作主张的行动把门格尔家搅乱了。1949年,小卡尔·门格尔去世,死时才三十七岁,这又使这个家庭进一步解体。

1954年,老卡尔·门格尔感到形势已比较安全,可以去阿根廷看望他的儿子了。他到达后,给门格尔带去一个坏消息——伊雷妮要求离婚。门格尔亡命他乡,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表示同意。于是,他们通过信件,结束了这场婚姻。伊雷妮马上又嫁他人了。

两年后,由于在对战犯起诉和追捕方面没有一点动静,门格尔的胆子大了起来,不再使用“赫尔穆特·格雷戈尔”这个化名,而用自己的原名取得了阿根廷的外国人居住许可证。为了取得必要的证件,门格尔来到西德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馆,并通过大使馆的斡旋,向京茨堡索取一份他的出生证明。从京茨堡来的门格尔公司的工作人员汉斯·泽德尔迈尔,甚至还陪同门格尔前往大使馆,以帮助证实其身份!

1956年,门格尔利用新的证件,前往瑞士旅行。在瑞士见到了他的十二岁的儿子罗尔夫。可是罗尔夫还以为他是从阿根廷来的叔叔,和他一起滑雪,度过了一个假期。这种杜撰是很容易使人相信的。因为罗尔夫真正的叔叔阿洛伊斯确实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到三年以后,罗尔夫才明白,他在瑞士会见的“叔叔”,其实就是他的父亲。门格尔的弟弟小卡尔的未亡人玛尔塔,以及玛尔塔的儿子卡尔·海因茨都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相距不远。

约瑟夫·门格尔在1956年用自己的姓名前往欧洲旅行，竟没有一个国家对他发出逮捕令或者引渡通知。这真是奇闻怪事。不过事实确是如此。门格尔仍继续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当然还谈不上是引人注目的生活。而且，他还大胆到这种地步，竟然把他的电话列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话簿中。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门格尔以为人作堕胎手术为职业，而且在1959年由于他的手术失误，致使一名妇女死亡。这个故事还说，警察便将门格尔抓了起来。一位朋友赶来为他说情并行贿，于是警察在两个小时后就将他释放了。纳粹缉捕人员西蒙·维森塔尔和已故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以及几家新闻杂志都报道了这一传说。但是，阿根廷警方的记录表明，没有证据说明门格尔以堕胎为业。虽然在阿根廷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中止妊娠是非法的，但这里的助产士们长期以来都相当公开地进行这一手术。因此看来，门格尔未必会为了微薄的报酬，冒着违法的风险，偷偷摸摸地为人非法堕胎。而且在那里，只要付出微不足道的一点费用，到处都可以取得助产士的服务。

诚然，门格尔是需要有收入的。早先，他是靠家里通过其公司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事机构提供的一点钱生活。这个逃亡者也可能随身带有大笔金钱。而且他的父亲前去看望他时，也不会两手空空。1957年，一家名为“法德罗·法姆”的公司在阿根廷登记注册，专门出售化学制品和药剂。门格尔对这家公司投资一百万美元，成为该公司的合股人。他的这份投资显然是门格尔公司贷给的。人们还认为，门格尔把他家公司所生产的农场设备卖给了南美的顾主，从而也增加了他的收入。

1956年，门格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待了一些有趣的客人——他弟弟的寡妻玛尔塔·魏尔·门格尔和她的儿子卡

尔·海因茨。还有一个传说，1954年老门格尔来阿根廷与儿子会面时，曾经提出一个想法，让门格尔和玛尔塔结婚。不管怎样，1958年他们在乌拉圭确实结婚了，新郎用的是自己的原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结合明显地带有犹太人的特色。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兄弟要把寡嫂或弟弟的未亡人算作自己的家庭成员，如果是单身男子，可以娶她为妻。实际上，门格尔娶了玛尔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她的钱财归为己有。这个婚姻也可以使门格尔家族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玛尔塔改嫁后，她在门格尔公司中的一份财产就会落入外人之手。由于门格尔正式放弃了他的财产继承权，门格尔家族就避免了把财产分给门格尔的问题。这样也就预先防止，一旦起诉，门格尔的一份财产就有可能被没收。据估计，为了报答他，一家人保证在经济上支持他。意味深长的是，罗尔夫·门格尔的母亲伊雷妮改嫁他人，而罗尔夫也不象卡尔·海因茨和阿洛伊斯的儿子迪特尔那样，从来没有在门格尔公司中担任过任何职务。

事端起因于一个叫赫尔曼·朗拜因的人。他曾作为一名政治犯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朗拜因曾于三十年代中，在西班牙和保皇党分子作过战，希特勒强迫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他被关进集中营。朗拜因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关押时，干些文书工作，因此他有可能搜集到有关门格尔的具体罪行。1959年，朗拜因担任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的总书记。这个委员会是由一些矢志不忘大屠杀，坚决要查明其凶手的纳粹集中营的劫后余生的人组成的。当西蒙·维森塔尔询问朗拜因有无关于门格尔的任何消息时，这位总书记就把门格尔的最后一个合法的德国妻子伊雷妮·门格尔已在弗赖堡提出离婚，以及伊雷妮的住址等情况，告诉了这位缉拿纳粹分子的

人员。从弗赖堡的档案中查出了门格尔写给他的律师拉特恩泽尔的一些信件，上面有门格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址。

朗拜因和维森塔尔都是奥地利公民。他们对西德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门格尔采取行动。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弗赖堡市的检察官于1959年6月7日发出了逮捕令。随即，波恩联邦政府要求阿根廷引渡门格尔。

阿根廷拒绝了第一个令状，因为门格尔已不住在所开列的地址。阿根廷人还提出，除非西德人拿出门格尔的确切地址，否则他们无法采取行动。很明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官员们不愿参与这个案件。其实，阿根廷的警方完全可以跟踪门格尔，特别是因为他用的是原名。

维森塔尔和阿根廷的一位朋友进行联系，这位朋友向他提供了门格尔的两个新的公开地址。1959年12月30日，搜捕范围缩小，仅限于一座住宅，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比森特·洛佩斯区比雷一贝尔蒂斯大街九百六十八号。维森塔尔叙述说，他告诉了朗拜因，朗拜因又通知了西德的检察官们。

司法机构的行动极其缓慢。1960年1月初，波恩第二次提出引渡门格尔的要求。但是，阿根廷的官员们一再拖延。一名官员甚至说（估计是板起面孔说的），对门格尔的指控可能属于政治性的，因此要求引渡是不妥当的。从历史上来看，即便是显而易见的犯罪案件，但要从南美各国引渡罪犯，也难以办到。而且，多年来巴西一直就是一个出名的美国贪污盗窃犯和诈骗犯的安全的避难所。不愿交出战犯的，实际上并不就此一个例子。例如，国际警察组织也坚决拒绝在逮捕战犯方面进行合作，理由是，这些指控可以被视为不过是一些政治活动。

拖延的结果，只是给予门格尔在欧洲和在南美洲的朋友

们以时间和机会，使他们可以向他告警，他已处于危险之中。

门格尔周围的朋友中有门格尔公司的董事汉斯·泽德尔迈尔和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上校。鲁德尔是第三帝国中获得勋章最多的一名军人。他于1936年应征加入德国空军。他是一名轰炸机飞行员，主要在东线作战，曾摧毁敌方坦克五百一十九辆、炮兵掩体一百五十座和八百辆战车；而且炸毁三艘大型船只和七十艘小型舰艇。他的飞机曾被五次击落。他曾获得镶有剑与宝石的金橡叶勋章和铁十字骑士勋章（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获得这一勋章的人）。鲁德尔最后一次坠机时失去了一条腿，并被关进了战俘营。获释后，他变成了各色各样制造商的代理人，其中包括曾一度在奥斯威辛设有工厂的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他的经营范围包括南美洲在内。虽然他从未被列为战犯，但他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右翼分子。他还协助阿根廷的独裁者胡安·庇隆建立了阿根廷的空军。

鲁德尔的顾主中，就有门格尔公司。他在经商过程中，与门格尔公司的董事汉斯·泽德尔迈尔熟识起来。汉斯·泽德尔迈尔是被该公司指定负责处理约瑟夫·门格尔事务的联系人。门格尔自己就说，他在阿根廷会见过鲁德尔，不过请求鲁德尔为门格尔从中斡旋的却是泽德尔迈尔。

1959年，胡安·庇隆被赶下台，但鲁德尔仍从事活动，并与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关系密切。斯特罗斯纳是巴拉圭一名巴伐利亚移民的儿子，1956年成了斯特罗斯纳总统。他用铁腕统治着他那拥有二百万人的封地。1959年，欧亨尼奥·希米内斯—努涅斯占有最高法院中决定入籍申请批准与否的三个席位中的一个席位。一个名叫路易斯·马丁内斯·米列托斯的律师对希米内斯大献殷勤。用黑手党的行话来说，米列

托斯在巴拉圭权力机构的上层要人中间有他的“把兄弟”。米列托斯曾担任驻巴西大使，也曾一度出任司法与劳工部长。米列托斯与鲁德尔十分熟悉，这时他正顺利地奔走于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此外，米列托斯还享有一个纳粹分子应得的“声誉”——其实，他所以迟迟没有被这个国家的执政党科罗拉多党所接纳，就是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巴拉圭的纳粹党徒关系密切。

希米内斯法官回忆说：“米列托斯对我说，时间紧迫，要我赶快处理一名德国医生申请入籍的文件。”希米内斯对于申请人的情况毫不了解，但是他说，他觉得挺奇怪，一个医生竟会选中这么个人口稀少的地方定居。这个地方，除了一些德国人外，土著居民甚至连西班牙语都不会说，他们说的是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

米列托斯似乎把一切都作了安排。他们挑选了一名年轻的亚松森的律师塞萨尔·奥古斯托·萨纳夫里亚去递交申请入籍的情况简报。萨纳夫里亚的父亲有个老朋友是巴拉圭国籍的德国侨民，名叫维尔纳·容格，在亚松森开了一家五金商店。容格过去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移居巴拉圭，以便协助在这个大陆上为纳粹德国的胜利作好准备。容格打电话给萨纳夫里亚，请他到他的五金商店来和他的当事人见面。

萨纳夫里亚回忆说，“他是一个黑黑的瘦高个儿，留着一撮小胡子，上门牙间有条裂缝。他看起来不象个德国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萨纳夫里亚做了，门格尔早已准备妥当：他带有证明他出生情况的各项必需证件；还备有说明他的经济来源可靠的声明——一张亚松森中央银行的五千瓜拉尼（大约三十五美元）的存款说明。他还找到两名巴拉

圭人，他们准备出面证明他在巴拉圭至少已经居住了五年。这两名证人是，维尔纳·容格和亚历山德罗·冯·埃克施泰因海军上校。埃克施泰因是1930年从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移居此地的。他在1932年到1935年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的伟大的查科战争中，曾与当时的斯特罗斯纳上校并肩作过战。

萨纳夫里亚在与他的当事人作了两、三次简短的会谈后，便将这些证件递交上去。证人所作的证词当然是伪证。门格尔并没有在巴拉圭住过五年。冯·埃克施泰因承认，他只是在1957年或1958年才见过这位医生。1959年10月，巴拉圭发给门格尔一份护照；五个星期后，“何塞·门格尔”便成了巴拉圭的公民。由于巴拉圭的法律规定，禁止引渡本国公民。因此“何塞·门格尔”似乎就得到了一面攻不破的盾，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过了一个月，即1959年11月，老卡尔·门格尔去世。据说，（未经证实）约瑟夫，或何塞，出于孝心，竟冒着很大的危险回到京茨堡，参加葬礼。说来奇怪，1985年西德的绿党左翼领袖佩特拉·凯利也是出生于京茨堡。她坚持说，根据她从三位修女那里获得的消息，门格尔就藏在女修道院里。维森塔尔说过：“全京茨堡的人都知道门格尔就藏在那里，只有警察不知道。”证词就说到这种程度。

波恩的官员们终于把事情搞得满城风雨，这自然要给门格尔在南美洲的商业活动带来麻烦。他的合伙人通知他说，他的名字是个麻烦，因此把他从公司中除名。而且，当西德政府试图通过通常的国际渠道拘捕约瑟夫·门格尔时，另外一个有关方面，即以色列国也在进行一项大胆而异乎常情的

划。1948年，以色列政府忙于在居民人口不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遭到英国的坚决反对，以色列的人口仍因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而不断增加。但它还没有时间和财力投入追捕战犯的工作。到了1960年，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认为报应的时候已到。他把以色列的情报组织“穆沙德”的首脑伊塞尔·哈雷尔找来，指示他追捕逃亡的纳粹分子，由以色列来进行审判。以色列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政府对任何对犹太人犯有罪行的人进行审讯，即使这些罪行是在以色列国建立之前犯下的，也不管罪行是在哪里犯下的，一律严惩不贷。

虽然有些说法表明，门格尔是以色列追捕的第一个目标，但伊塞尔·哈雷尔注意的头号人物却是前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就是海德里希的吹鼓手，受党卫队指派四处推行“最后解决”的那个家伙。

哈雷尔说：“五十年代初……我曾经抽出一些业余时间研究大屠杀的历史。我对那些对毁灭欧洲犹太人负有主要罪责的战犯的命运尤感兴趣。有两个名字很突出，一个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对‘最后解决’的执行要承担罪责；另一个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奥斯威辛的‘死亡天使’……我把这两个人列在‘穆沙德’通缉名单的首位。艾希曼，是因为他对大屠杀负有全面的责任，而且，抓住他就可以进行审判，从而可以把对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种种事件公诸于世。”

艾希曼象门格尔一样，也利用了梵蒂冈的表示同情的人士所提供的方便。他也住在罗马，在那里弄到一份由梵蒂冈政府签发的护照。护照上载明他是机修工里卡尔多·克利门特，生于意大利的波尔萨诺，父母系德国人。这简直又是一个“赫尔穆特·格雷戈尔”。

西德黑森邦的检察长弗里茨·鲍尔博士识破了艾希曼的伪装。鲍尔和他的某些同事不同，他积极地追捕战犯，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他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以前在斯图加特任法官，在逃亡瑞典之前，曾被纳粹监禁过。鲍尔从西德的一名打入“敖德萨”的谍报员那里发现了有关艾希曼下落的线索。他把这个情报转告给伊塞尔·哈雷尔。于是，“穆沙德”的特工人员便谨慎地对整个阿根廷进行了搜索。

搜索艾希曼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他非常谨慎。他居住在不为人们注意的地方，经常变换住址。但是，阿根廷警方了解“里卡尔多·克利门特”的真实身份。他们虽然没有理由拘捕他，可是他们确实把他监视起来了。

“穆沙德”的特工人员开始工作，想要证实克利门特确实就是艾希曼。他们偷偷地从许多不同的角度给这个可疑分子拍了照片，并把照片送到特拉维夫和德国，由认识艾希曼的人进行核对。但是，他年事已高，因此克利门特看起来非常衰老，不大象艾希曼。人们认为，从照片上辨认，不可能定论；直到又送来了3月21日拍摄的一张克利门特戴着一束鲜花回家的照片，这才得出了结论。3月21日这个日子恰好就是艾希曼结婚纪念日。对于“穆沙德”的成员来说，这一稀奇的细节非常说明问题。于是，准备秘密地把艾希曼弄到特拉维特去的工作便开始了。

哈雷尔说，当阿根廷中央情报局局长豪尔森·梅西纳海军中校向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提供了一项备忘录后，他对这次行动的胃口更大了。这个备忘录内称：“发现克利门特和另一名高级纳粹分子在圣菲省的拉加拉雷塔附近露面。另一个人，根据所描述的特征，与约瑟夫·门格尔很相似。”

前景对于哈雷尔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此他决定前往

布宜诺斯艾利斯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一些以色列官员对于派一架专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把艾希曼载回以色列花费巨大而发愁，哈雷尔回答说，“要使这笔投资更合算，我们就要设法把门格尔也抓回来”。

艾希曼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加里巴尔迪大街。一天早晨，行动队注视着艾希曼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去上班，然后他们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半，当毫无觉察的艾希曼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准备走回家时，两名“穆沙德”的行动人员走上前去，一前一后地将他抓住，推进一辆没有熄火的轿车中。整个行动可能只用了三十秒钟。艾希曼曾想呼救，但是汽车疾驰而去，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艾希曼被带到了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安全地方。

于是，哈雷尔授权一名特工人员为代表，审问艾希曼有关门格尔的情况。出于策略，他们告诉艾希曼，以色列已经知道门格尔医生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他现在应该把他的确切地址讲出来。艾希曼没有否认他认识门格尔，但是他一口咬定他对于门格尔的下落一无所知；他声称他甚至不知道门格尔是否在南美洲。哈雷尔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因此命令要进一步审讯。艾希曼后来终于吐口，但只是说，他担心他的妻子儿女的生命安全。

哈雷尔怀疑艾希曼是真的害怕只要帮助以色列，他的亲人就会遭到报复，还是担心会被断绝了经济援助？根据后一种假设，这位“穆沙德”的首脑答应艾希曼，如果他说出门格尔的地址，他们将从经济上援助他的妻子儿女。他试图用这一许诺使艾希曼回心转意。哈雷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我认为艾希曼所以这样顽固，不是出于什么忠诚的思想，纯粹是害怕。”这本回忆录是他用希伯来语口述或撰写

的，所以翻译起来非常吃力。对艾希曼不断施加压力，最后他勉强地吐露说，门格尔曾经在一个叫于尔曼的德国女人经营的寄宿舍里住过。

根据这一线索，哈雷尔又想采取一个新的步骤。他的特工人员发现，有一对以色列夫妇，在他们过去的祖国阿根廷住了一段时间。两个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而且简直可以冒充本地人。丈夫叫宾亚明·埃弗拉特，他告诉哈雷尔，他“听说过门格尔，但对他不大了解”。埃弗拉特对门格尔的经历不了解，这说明一直到1960年，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在以色列，发表的有关门格尔的消息少得惊人。哈雷尔介绍了门格尔的经历，埃弗拉特遂同意帮助“穆沙特”。

这对夫妻行动小组开始在据说门格尔住过的比森特·洛佩斯大街附近进行侦察，并从当地居民中获悉，有一对北美洲的夫妇据说就住在说是门格尔居住的比雷·贝尔蒂斯的地点。哈雷尔推测，既然西德政府已经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那么门格尔很可能用这个谎言作为掩护。

宾亚明奉命接近当地的一名邮差，并且说他在寻找一个长期失去联系的叔叔，估计他就住在这一地区，但是他把他的地址丢落了。

邮差问他：“您的叔叔叫什么名字？”

宾亚明回答说：“门艾尔医生。”他按照哈雷尔的指示，故意把名字的音读错。

“门艾尔医生？对了，附近有个叫这个名字的人，他几个星期以前就住在那里。”邮差指着那座被怀疑的房子说。宾亚明又追问他转信的地址，但邮差说没有收到过转递的信。他又到邮政局进一步查核门格尔医生的行踪。这一次用的是正确的名字。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令人泄气的：虽然他确

实在所说的那座房子里住过，但是他已离去，而且没有留下新地址。

哈雷尔在《加里巴尔迪大街上的那所房子》一书中写道，有关门格尔的另一条线索，是比森特·洛佩斯的一座汽车修理间。据说门格尔在那儿有几台车床，宾亚明去这个车间，打听格雷戈尔先生的机床是否能生产那种左旋螺丝。格雷戈尔就是门格尔原来的化名。一位女秘书请宾亚明稍稍等候一会儿，她要请示一下上司。不一会儿她回来了，仔细地打量他一番，然后又消失在车间里。最后，她跑回来说：“谁都不认识格雷戈尔，而且这里也不加工那种零件。”

根据这一迹象，哈雷尔确信，那个车间的工人肯定认识门格尔。那个女秘书的拖延和打量都意味着肯定有了解情况的人认识格雷戈尔。但是宾亚明未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哈雷尔命令再作最后一次努力。宾亚明设法混进了比森特·洛佩斯的那座房子，发现那里的房客是新近搬来的。正象那个邮差说的，门格尔已经搬走了。哈雷尔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们把艾希曼麻醉后，就象在一场事故中受了伤那样，把他包扎起来，抬上飞机，运往以色列去接受审判。

艾希曼是在1960年5月被劫持的。随即关于“穆沙德”的大胆行动的流言就传播开了。那些关注追捕战犯的人们开始谈论起两个月前在阿根廷有一个名叫诺里塔·埃尔多特的以色列妇女的死亡事件。人们发现她死在安第斯山麓的游览胜地巴利罗切的悬崖脚下。最初人们认为她是一时不慎摔下来的，但是现在联想到以色列特工人员冒险行动的前前后后，联系到门格尔的九死一生，似乎从这幕拙劣的戏剧中得到某种启发。

巴利罗切这个地方，长期以来深受那群德国移民的欢

迎。实际上，这个地区就象欧洲的吸引着大批德国居民的蒂罗尔。其他的德裔居民也经常来这个疗养胜地度假。据说，门格尔也来过不少次。其中有一次是1960年3月，当时他的化名是弗里茨·菲舍尔。

这段时间，死者诺里塔·埃尔多特也曾在那里。她的名字很多，有人叫她诺拉·埃尔多克，也有人叫她努里特·埃尔多德。她是以色列驻科隆的贸易代表团的雇员。几个月前她来到阿根廷，表面上说是看望战争爆发前就到那里避难的亲戚。

根据西蒙·维森塔尔的《藏在我们中间的凶手》一书的说法：“一天晚上，她在当地一家旅馆的舞厅里，突然发现她自己和门格尔面对面地遇上了。当地警方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他是否认出了她。门格尔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处理过’成千上万名妇女。不过，他的确注意到她左臂下部刺有的号码。受害者和迫害者一言不发地互相瞧了好几秒钟。当时的目击者们后来证实说，他们什么话也没说。几天后，她去山里游览，一直没有回来。几周以后，警方接到了通知。埃尔多克小姐的遍体伤痕的尸体在一个大裂缝附近被发现。警察只是作了一些例行的调查，把她的死因列为爬山不慎的事故。”

1974年，已故的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的《劫后余波》一书问世。书中的中心人物是马丁·鲍曼，说他现在还好好地在南美洲活着。门格尔是书中的第二号人物。在这本书中，巴利罗切的事件被说成是一个性爱情杀的故事：门格尔被诺拉·埃尔多克弄得神魂颠倒。两人热恋，情话绵绵，又是吃饭，又是喝酒，又是跳舞，真是难分难解。一天，他和埃尔多克徒步到山里去旅行。几小时后，有三个男人——门格尔和他的两名保镖，在回巴利罗切的途中，来到路边的一家咖啡馆……

他们中的一个人奔进店来，用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西班牙语喊道：“真惨啊！同我们一行的那个女人掉到悬崖下去了！”三天后，一群搜寻的人在一个岬角下发现了她那粉身碎骨的尸体。法拉戈解释说：“门格尔的一名助手曾闯进埃尔多克的房间，偶然发现了她的秘密，这就注定她要惨遭不幸。”门格尔的这名助手在她的箱子活底里发现了她的以色列护照。法拉戈并没有含糊其词，他引用一份所谓的阿根廷警方的报告说，埃尔多克是以色列情报局的一名成员，她同一伙以色列人一道来到巴利罗切。他们分住在各个旅馆中。法拉戈说：“派来诺拉，这就引起门格尔的杀机，这是合乎逻辑的。他们正确地估计了门格尔的弱点——好色。一个陌生的男子绝不会有这么亲近地观察他日常的活动。但一个漂亮的女人却能够办到，诺拉就是这么做的。奇怪的是，法拉戈没有采用犹太情妇维尔玛的故事，说她曾帮助门格尔逃走。这个故事倒是与所谓的“弱点”的说法相符合。

维纳·布罗克多夫是维尔玛这一故事的编造者，他对诺里塔·埃尔多特的死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不过他把埃尔多特叫做朱迪斯·阿尔多特。布罗克多夫声称，那些逃出波兰的犹太人，起初是同纳粹分子合作，后来则是靠维尔玛和门格尔的帮助。他们非常害怕门格尔会死。布罗克多夫说，门格尔为了保护自己，曾警告说：“我在五个不同的地方存放了密封的信件，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让人觉得我是死于非命，那么这些信件将被开启，由此从美国到以色列，就会出现一个自杀的浪潮。只要我还活着，这些信件就会保护我。”

还是根据布罗克多夫的说法，当诺拉（或是朱迪斯）前往阿根廷时，接近以色列情报机关的人士，也就是担心会

被门格尔“密封信件”揭发的人，即与在阿根廷的同谋者联系。一个前佛兰芒党卫队员，被布罗克多夫称之为“阿尔贝特”的人，便与这个以色列女人建立起友情。门格尔并没有露面。带她到山里去旅行并使她死于非命的正是阿尔贝特。

关于埃尔多克和门格尔之间遭遇战的故事所以流传甚广，并为人们所相信，这主要是因为迈克尔·巴尔—佐哈尔博士。他是以色列的政府官员，曾经写过几本书，其中一本名为《复仇者们》，内容专门描写追捕战犯的事情。法拉戈说，他的消息就是从巴尔—佐哈尔那里得来的；这位以色列人甚至还用图来描绘这次谋杀：受害者和两个客人一同进山，但不是与门格尔。“就在那一天，他们三个人攀到一座陡峭的悬崖顶上，从那里可以放眼观赏‘拉丁美洲的瑞士’的宏伟景色。突然，其中一个男人偷偷摸到诺拉·埃尔多克的身后，在她后颈上猛击一拳。随后，就和同伙把她扔下了悬崖。”

人们会以为，这些满是对话的描述富有戏剧性的效果，并足以告诫欧洲、南美洲、和美国的新闻报刊杂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报刊依然把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改头换面地登出来。人们不会忘记那些著名的报刊就曾收买并且出版了据说是希特勒的所谓日记。

然而，有胆识的阿根廷的记者们于1961年开始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入的投资。他们发现，实际上诺里塔·埃尔多特是于1933年离开德国的。她从来没有进过集中营，臂上也没有刺过号码，而且也不认识门格尔。她到阿根廷是去探望多年未见的姐姐。在阿根廷，她遇到一伙年轻的阿根廷籍犹太人，他们打算移居以色列，请求埃尔多特教他们希伯来语，并向他们介绍以色列的文化。这伙青年决定集体在巴利罗切度假十天，进行学习，邀请她一同前往。她是最后一刻才加

入到他们一伙中去的，所以没有必要和大伙住在一个旅馆里。阿根廷的记者们曾采访过其中的几个青年。他们非常具体地描述了进山的情况：人们是怎样分开的，彼此的行踪是多么难寻。当全体人员都下山后，马上发现诺里塔不见了，但是没有人感到吃惊，因为大家都以为她可能自己到镇上去了，或者已返回她所住的旅馆。

有人以为这伙犹太青年就是一帮纳粹秘密特务。驳斥这种看法的最有力的证据也许是那张这些青年在巴利罗切的集体合影。照片上也有诺里塔·埃尔多特，她正在和一个穿熊皮外衣的男人打闹。特工行动组一般不准合影照相的。比如说，谁也没有见过绑架艾希曼的行动小组的照片。

就在门格尔的尸体被发现的那个星期里，诺里塔·埃尔多特的惊险故事又旧话重提。于是传闻失实以及蓄意制造假消息的这种令人讨厌的花招又出现了。纳粹分子布罗克多夫千方百计地诋毁受害者，他把犹太人说成是门格尔的盟友。反纳粹的人们则有意或无意地试图把一些新的罪行，甚至是更为耸人听闻的罪行加在门格尔的头上，以便加速追捕他。这种办法其实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年来，为门格尔这个战犯进行辩护的人和反对者都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帮凶，因为他们撒下了一层浓浓的烟雾，把门格尔的下落搅成一团乱麻，同时也把他的性格、特征给歪曲了。

第十一章 传闻失实、制造假情 报和几位名人

追捕门格尔的步伐开始加快了。在波恩对这个逃犯发出第一个逮捕令约一年后，即在1960年7月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法庭对他发出了逮捕令。这一逮捕令是由联邦法官豪尔赫·卢克签发的。卢克是1956年由彼得罗·艾拉姆布鲁总统任命的。这一任命是清除庇隆政府的贪污腐败的法官们的一个步骤。卢克身材短小，酷似侏儒，常以自己有一位曾为洗劫和占领秘鲁的皮萨罗（哥伦比亚）的征服者担当牧师的世祖感到荣耀。卢克宣称，应当向全世界表明，阿根廷的法官们是遵纪守法的。如同他的无数的同胞一样，卢克对以色列劫持艾希曼的行为深感愤怒。他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他们国家的主权和法庭的权威。

“以色列人绑架艾希曼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他说，但又承认，“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德国没有提出引渡艾希曼的任何要求，而且我们也不会承认以色列发出的引渡令。艾希曼不是在以色列犯罪的。他反对犹太人时，以色列这个国家还不存在。但是，德国人向我们提出引渡门格尔，这是正当的。我的目的是要找出门格尔，把他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由法庭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决定是否应该把他押送回德国。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使人们信任阿根廷的司法机构。”

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在自己的书中记述过一件事：卢克对以色列的劫持行为大动肝火，遂下令封锁边界。卢克把法拉戈的这种说法斥责为杜撰。他说：“一个法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还否认波恩当局曾向他提供过门格尔的假地址。对于法拉戈在书中提到向他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一事，卢克哈哈一笑。他说：“我连见都没有见过这个人。”

显然有人把卢克法官的不懈努力告诉了门格尔。门格尔随即离开了阿根廷，前往巴拉圭定居。他有时在阿文尼达·麦克阿瑟大街上的维尔纳·容格家小住，这里和斯特罗斯纳的总统府以及美国大使馆只隔几个街区。但门格尔多数时间却是住在距离首都亚松森市大约五十英里的奥埃瑙的德国大牧场主阿尔巴恩·克鲁格的庄园里。

比利时纳粹分子阿尔方茨·迪尔克斯当时曾见到过门格尔。他说当地人都用德语或西班牙语称呼这位医生为“弗里茨医生”。据迪尔克斯说，“门格尔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谈自己的过去。但是有一次他吐露说，由于他在战争中执行的职务，而一直受到迫害。

冯·埃克施泰因是一名军人，曾作伪证说，门格尔在巴拉圭已经居住五年了。现在他说，在1959年至1961年间，他每月都能见到门格尔一两次。“他总是驾驶着一辆吉普车到亚松森来。有一次他还偕同夫人一道来。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门格尔为人和蔼可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科学家。谁也没有说过他是一个罪犯。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医生。后来，在1961年，警方侦缉队长阿尔韦托·普拉纳斯博士对我说，‘请注意，刚才有五个以色列人找我，他们说他们正在寻找一名战犯’。我回答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普拉纳斯告诉我：‘他就是你的朋友门格尔。’我大吃一惊。在我

看来，门格尔是个连蚊子都不会伤害的人。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维尔纳·容格。此后，我就没有再见过门格尔了。除了有一次他来看我，那是1964年或1965年间的事。”

不用说，以色列人认为是容格把消息泄露给门格尔的。门格尔为了安全起见决定转入地下。门格尔从公开场合消失了，这显然是从冯·埃克施泰因把这个有用的消息转告容格以后开始的。

这五个所谓的以色列人究竟代表哪个方面，就弄不清楚了，也不知他们的幕后人是谁。与此同时，伊泽尔·哈雷尔不管事情发生什么变化一直在抓这个案子。“穆沙德”派出的行动小组在南美洲各地搜索门格尔，进行试探，看是否有可能用绑架艾希曼的办法来对付门格尔。1962年，这些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查明门格尔躲藏在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接壤的三角地带的某个地方。哈雷尔把侦缉目标定为两个地点。一个是紧靠边界的恩卡纳西翁附近的一个德国人所有的农场。哈雷尔说，遗憾的是，经过监视，没有发现门格尔在那里出没。

哈雷尔说：“门格尔藏在这个农场里，是合乎情理的。但并不是一直藏在那里。这个农场有武装警卫保护。当然，也可以采取对那个地方进行突击武装搜查的办法，去查明门格尔的下落。但是，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在巴拉圭的丛林中杀出一条路来，并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地区进行一场恶战，才能把他抓到手。这将会在我们与巴拉圭之间出现一场严重的冲突。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果万一门格尔不在那里，或者袭击失败，致使我们不能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要想抓获门格尔就没有希望了。同时，我们还另有情报说，门格尔已经转移，藏到巴西的一个环境恶劣的德国移民聚居地

去了，那儿离圣保罗大约有四十公里。这一情报是我们在这一地区进行工作时一名转而为我们工作的纳粹特工人员提供的。”

但是，这次以色列人终究未能证实门格尔在不在这个聚居地里。他们放弃了行动，包括对圣保罗的搜寻活动。实际上，在1962年期间，门格尔确是在巴西。不过是住在离圣保罗足足有一百英里的塞拉内格拉，而不是在“穆沙德”猜测的离圣保罗二十五到三十英里的地方。

六十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穆沙德”追捕门格尔的计划确实难办。以色列情报局抓获艾希曼而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世界上多数国家对此赞赏不已。有一次，当阿根廷就此事提出正式抗议时，连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也对以色列表示支持。正如豪尔赫·卢克所说的，那次对付艾希曼的行动，即便是不合法的，也是合乎情理的。波恩却打算用合法的手段诱捕门格尔，但以色列人还是不愿相信德国人（至少有其历史的原因）。或许是想把他们自己的大胆行动执行到底，他们拒绝采用通常的手段，因此未能取得积极的结果。门格尔可能躲藏在巴西的消息传到波恩，波恩可能就会向巴西提出引渡的请求。巴西警方只要进行搜索，就能把这个逃亡者找出来，即使他并不住在“穆沙德”所估计的那个地点。只要巴西发出通缉令并大张旗鼓地搜捕门格尔，那至少也会使门格尔为了寻找新的避难所而露面。

毫无疑问，绑架阿道夫·艾希曼一事，的确使得门格尔以及其他一些逃亡南美洲的纳粹分子惊恐万状。有关以色列行动小组和绑架小队的传说四处流传，哈雷尔说：“……其他一些受到通缉的战犯开始逃离他们的藏身处。许多人已开始发现以色列的突击队在各地追逐他们。我们就是要使他们

不得安宁，尽可能地增加他们的恐怖感，使他们如坐针毡。”

法拉戈、巴尔一佐哈和维森塔尔等人更是为这次追捕运动推波助澜。他们为绑架门格尔出谋划策，而日期和具体情节却大相径庭。但是，一个流传甚广的冒险行动，则是，1964年在奥埃瑙附近的蒂罗尔旅馆发生的。

维森塔尔在《藏在我们中间的凶手》一书的开头这样写道：“这是一个炎热的黑夜，六个男子跟踪‘弗里茨·菲舍尔医生’来到蒂罗尔旅馆二十六号房间。后来我见到过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他们参加组织了一个‘十二人委员会’。这十二个人是十二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有的人发了财，捐出一大笔钱用以实现把以前严刑拷打他们的某些凶手押上审判台的愿望。”

维森塔尔接着写道，那个六人小组是在南美执行任务，“他们要活捉门格尔，把他带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那里正在准备奥斯威辛审判。”（实际上奥斯威辛审判于1963年开始，于1964年已接近结束。）“离凌晨一点还差几分钟，这几个男子走进蒂罗尔旅馆的走廊，跑上楼梯，打开二十六号房间的门。房里空无一人。旅馆老板告诉他们说，菲舍尔医生十分钟前接了一个电话后，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他连睡衣都没来得及脱，披着外衣跑下楼梯，随后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巴尔一佐哈引用了维森塔尔在《复仇者们》一书中的话说：“我知道那些人，他们来看过我，就在我的这间办公室里。……这个‘十二人委员会’经费充足，曾经计划绑架门格尔，把他带上一艘游艇，开到海上去进行审判。”他接着往下写道，袭击蒂罗尔旅馆后的几天，巴西警方发现了一具

青年男子的尸体。他的头部中弹，“是在那天晚间与这名纳粹战犯的保镖枪战时被打死的。”

根据法拉戈的说法，这支复仇者的队伍是十二名巴西犹太人组成的。其中两人渡过巴拉那河去执行侦察任务。“人们随后发现他们的尸体顺着河漂流而下。他们的喉咙被割开了，两臂伸开，象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似的。”

法拉戈在描述诺里塔·埃尔多特这个人的传奇的结尾时，也使用了这种手法。他写道：“在搜捕艾希曼时，没有人员伤亡。但在搜捕门格尔过程中，诺里塔却是第四名已知的牺牲者。如果加上蒂罗尔旅馆事件中死亡的两人，法拉戈计算的死亡人数则是六人。门格尔在自己周围筑起的这道防护墙也许可以被攻破，但能攻破这道墙的人却不能生还。”

如上所述，伊泽尔·哈雷尔有一次就曾说过，在对门格尔的搜寻中，“穆沙德”付出了“伤亡”的代价。但是，另外一次他却又说，在他的指导下，以色列情报部门在寻捕门格尔时从未有人员牺牲。在情报部门内部，保守最严的机密，莫过于他们自己的失误了；而他们的成功之作却往往会向新闻媒介透露出来。据说，在“穆沙德”中没有退休一说，即便是他或她已递交养老金申请书，也还要继续工作。哈雷尔在和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发生争执后，于1963年正式辞职。但就事而论，即便如此，他所说的一切，或许仍然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法拉戈却把一些可靠的材料与一些纯属想入非非的杜撰混为一谈。而在他写作时，这些可靠的材料中涉及的人物仍然健在。在《劫后余波》一书发表之前，法拉戈发表过一些可靠的著作，其中包括颇受欢迎的乔治·S·巴顿将军的传记。而且，法拉戈在他自己成为一名特工人员

后，他所提供的有关门格爾的材料也被人们认为是可靠的。但是，《劫后余波》一书却令人生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是以马丁·鲍曼于1945年后逃往南美洲为前提的，而致力研究第三帝国领导人物生平的许多专家深信，鲍曼已于1945年死亡。《劫后余波》一书的结尾中描述说，本书作者法拉戈坐在一家由玻利维亚修女开办的小医院里，守在鲍曼的病床边。法拉戈还在描述门格爾于七十年代露面的情节时暗示说，他当时曾采访过门格爾，并且还引用门格爾所说的原话。前以色列驻巴拉圭大使本诺·魏泽尔·瓦龙曾经接受过法拉戈的采访，瓦龙问这位作者，他所说的已查出门格爾在巴拉圭的住处，以及他向门格爾采访一次要付给他多少钱的说法是否属实。法拉戈对瓦龙说，门格爾当时要价三万美元，但是他大声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值那么多的钱，门格爾医生！”据说，这个恬不知耻的战犯又拿出一本带有“门格爾著”字样的论述孪生子研究的著作，索价十万美元。

在一次为《劫后余波》出版而举行的聚会上，法拉戈对瓦龙说，他曾经会见过门格爾，这位外交官问法拉戈，那个采访交易是否值门格爾索要的三万美元。“当然不值！”法拉戈说：“我假装对他的孪生子一书感兴趣，目的是让他会见我。”瓦龙问道，如果他确实见过门格爾的话，为什么不指明书中的引用语是直接引用那位医生对他所说的原话。法拉戈这个富有魅力而且机智的家伙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如果我直接引用他的话，他就会要我付钱的。”

根据法拉戈的说法，为搜捕门格爾已付出了六条人命的代价。他认为，这个被搜捕的对象为了向法院提出他的正当权益（不过三万美元），就会从巴拉圭内地的阴暗角落里冒出来。这大概是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的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

想法。

法拉戈在他去世前不久，曾对瓦龙说过，他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声称已经找到马丁·鲍曼的文章以后，一家名叫西蒙和舒斯特尔的出版商提出，可以给他预支一大笔稿费，要他写一本以马丁·鲍曼仍然活着为题材的书。也许作者为了避免出版商要求他归还稿费，所以才不得不编造出一套有关鲍曼还活着的具体情节，另外又增加了对门格尔的描述，作为一种额外的奉献？

另一种关于门格尔的富于想象力的叙述，出自埃尔温·埃德施泰因的手笔。埃尔温·埃德施泰因出生于维也纳，流亡到南美洲。他逐渐参加了巴西警察局的工作，人称“埃里科博士”。他声称他是战犯们的灾星。在他写的《第四帝国》一书中，埃里科博士详细地叙述了1968年设下的一个捉拿门格尔的圈套的故事。当他设法要把门格尔渡河运往阿根廷交付警方时，巴拉圭人登上了他的船，把俘虏释放了。埃德施泰因写道：“门格尔和他的朋友拼命地向安全的地方逃跑。我举枪向门格尔开了四枪，击中了他的胸部和肋部。他向我转过身来，用一种惊奇的神情瞪着我。我又冲他开枪。这一次直接命中他的喉部。”埃德施泰因说，他看着巴拉圭人把门格尔从水里捞了上来。“他的身体软绵绵的，因此我认为他死了。他在水中至少呆了五分钟。”

法拉戈这次却成了批评家。他断言，如果埃德施泰因开枪击中了什么人，这可能是一名走私犯。据说，埃德施泰因面对法拉戈的责难，只好耸耸肩膀承认说，他显然是杀错了人。但是，这很难一笔勾销《第四帝国》书中的那些对话。因为书中明明白白地描述了他与门格尔对话的情况。被人叫做埃里科博士的埃德施泰因，他的活动范围是圣保罗。要是

他真的有一个象他所说的那样效率很高的情报网，难道他会不知悉，或者找不到一点证据说明，那个所谓被他开枪击毙的男子，几乎就藏在他的鼻子下面？

和希特勒一样，门格尔罪大恶极，但这居然使他一跃而成为一个众目睽睽的神话般人物。因此，这就给他的生平和死亡的种种说法带来了，或者因实际需要人为地使它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德政府虽不积极，但终于发生了逮捕门格尔的合法令状，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在暗中追踪，因此，门格尔便放弃了过公开生活的希望。他与玛尔塔的短暂婚姻也完结了。在他这方面来说，他对于玛尔塔并没有什么热情可言。他说她是一个“恋家、严谨、性格内向的人”。而玛尔塔则不喜欢藏身在巴拉圭乡间的大牧场里。大约在1960年左右，玛尔塔决定返回欧洲。她的儿子卡尔·海因茨正在那里求学。玛尔塔最初住在瑞士，随后便在梅拉诺长期定居下来。这是意大利蒂罗尔的一个城镇，住着许多德国移民，犹太人则寥寥无几，附近还有门格尔家的一个工厂。

最后一批实际上的见证人曾经看见门格尔领取了巴拉圭的公民证件。失去了他的确实情况后，种种编造的有关他的事便应运而生，也许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规律。但是，他虽然不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还是有人见过他。例如，有一位妇女说，她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出后，嫁给了亚松森的一位珠宝商。1965年的一天，有两个男人走进了她家的商店。他们讲的是英语。当她接待这两位顾客时，她突然吓得目瞪口呆。她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就是当年那个“漂亮的约瑟夫”。二十多年前，在这个人的手指漫不经心地一弹下，她

侥幸地活了下来。直到那两位顾客走后，她才能够告诉她的丈夫，她刚才看见约瑟夫·门格尔了。

同一年，德国驻巴拉圭大使埃克哈德·布里斯特根据波恩的指示，向巴拉圭总统斯特罗斯纳提出引渡门格尔的问题。这位独裁者拒绝参与此事，理由是门格尔已加入巴拉圭国籍。布里斯特提出异议说，这些证件是靠欺骗弄到手的，门格尔伪誓说已在巴拉圭居住了五年。斯特罗斯纳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一旦成了巴拉圭人，就永远是巴拉圭人。”这一事件使布里斯特不能再顺利履行公务，波恩方面被迫将他召回，换了大使。又过了十五年后，波恩政府才鼓起勇气再次要求引渡门格尔。

前以色列驻巴拉圭大使本诺·魏泽尔·瓦龙相信那个珠宝店妇女的叙说，以及表明布里斯特在亚松森的事业已告终结的那次事件。瓦龙实际上是在极端敏感的局势下，于1968年来到亚松森肩负起他的职务的。瓦龙是一个独具风格的能言善辩者。他和门格尔一样，都是学医学的。但是，当门格尔在工作方面声名狼籍时，瓦龙却在完成医学学业的前三个月从维也纳的纳粹分子的魔掌下逃出来，流亡到厄瓜多尔。他在那里成了一名记者，是厄瓜多尔报业辛迪加的第一位专栏作家。

瓦龙回忆说：“1946年，由于我过去的经历，犹太人代表（当时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代表）派我前去说服拉丁美洲人接受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主张。1948年，联合国有五十七个国家，其中拉丁美洲国家就有二十个。”以色列国建立后，瓦龙同意在纽约的犹太人代表处中担任一个职务。

由于他的经历，也许由于某个精明的以色列官员看出瓦龙聪明、机智、惹人喜欢，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人物。于是，

这个从前学医的学生便被挑选出来，在关键的时刻派往巴拉圭担任大使。巴拉圭这个国家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轮换制，在授予小国的十票表决权中，巴拉圭在两年间拥有其中一票表决权。“我被派往那里去的目的只有一个，”瓦龙说：“就是争取巴拉圭在安理会中支持以色列。在特拉维夫，谁也没有对我说起什么门格尔避难所的事情。”

瓦龙并没有正式接到有关门格尔的信息。但是他在亚松森，每周至少获得两份有关门格尔下落的情报。最初，他尽职地把情报转回国去，但当他接不到国内对这个问题的回音时，而且当他明白了每份情报的地址都不一样时，他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说以色列没有正式搜寻这个奥斯威辛的医生，而接收这些情报的最合适的机构当然是德国大使馆。当美国大使一定要瓦龙听取一名情报提供者的报告时，他感到美国的这种主动做法预示着会有严肃的调查结果。然而，到头来这个嫌疑犯竟是个六英尺四英寸高的大个子。世上还没有哪一种矫形外科手术能把门格尔的个子拉得这么长。

还有一些定期送来的报告，瓦龙也不得不看。报告的内容是说门格尔自由自在地在巴拉圭各地游历。这些报告是由一个名叫图维亚·弗里德曼送来的。他是一个以海法港为基地的追捕纳粹分子的自由人员。在报纸一再披露弗里德曼对巴拉圭政府的指责后，巴拉圭的外交部长召见了瓦龙。这个由斯特罗斯纳紧紧控制的巴拉圭政府弄不明白，像弗里德曼这样一个普通公民，如果没有以色列领导人的纵容，怎么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诽谤另一个国家。瓦龙注意到，这个外长，劳尔·萨佩纳·帕斯托尔博士始终没有对弗里德曼的说法提出过质疑。他仅仅只是报怨说，弗里德曼对他的国家进行了

不友好的攻击。

萨佩纳·帕斯托尔在气头上，用一种非外交辞令说：“不论门格尔干了些什么，他也是作为一个德国人，是以德国的名义干的。您了解我们的国家，您真相信会有人躲在这里而不被人们所发现？人们也弄不清楚他来自哪里？这不属外交官管的事情，而纯粹是治安官的事情。”

这番话是否暗示说，可以派遣不受法律制裁的远征行动小组，对此，瓦龙则不能确定。如果说“穆沙德”仍在积极活动，而瓦龙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指示，要他寻找门格尔或任何其他战犯。但是，他来巴拉圭的最初使命已经完成——巴拉圭在安理会中每次投票时都支持以色列。

有趣的是，美国没有一位大使报告过，在与巴拉圭历任外长会谈时曾出现过这类性质的场面。无论是国务院，还是白宫，都不愿冒激怒斯特罗斯纳的风险，而去要求逮捕一名有巴拉圭国籍的战犯。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是开始提出了有关门格尔的报告。1972年6月，第一份报告要求最高级官员们注意“躲藏在一个姓门格尔，名字不详的人所拥有的农场中的次要战犯的种种活动。”报告还说：“根据……（原名称去）报告说，门格尔住在恩卡纳西翁，化名恩里克·沃尔曼医生。报告人还说，他和另外一些人大肆贩卖毒品。”（许多材料都说，恩里克·沃尔曼系门格尔的化名）。这名情报人员还说，他正在设法证实这个门格尔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臭名昭著的战犯”是否是同一个人。报告引用了1965年里约热内卢的一条广播说，前党卫队成员阿尔弗雷德·弗伦克尔对国际警察组织说，有人在恩卡纳西翁看见过约瑟夫·门格尔，他受到斯特

罗斯纳的保护。

几个星期后，送到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接踵而至，这些报告又补充了更多的具体情节。一份报告说，门格尔来到巴拉圭的日期“第一次大约在1951年左右，他在巴拉圭、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各地不断变更居住地点”。这份报告还列举了巴拉圭的许多具体地址，并且重复了一种传闻，说门格尔在离巴西边界几英里的地方当一名汽车修理工，以及他住在恩卡纳西翁附近或查科(在巴拉圭东部)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大牧场里等。这些调查报告含糊其词，影响了人们对情报机构成效的信任。

还有一份关于门格尔在巴拉圭的情况的四页报告是1974年6月7日写的。报告向探寻门格尔情况的人士作了描述。报告开头是这样写的：“一名前德国士兵费德里西”，“去年被以色列恐怖分子打死。他们以为他是门格尔。费德里西的妻子的一只耳朵被打掉一块，腹部也被恐怖分子击伤”。报告说，这位未亡人写信给德国大使，要求给予抚恤金，因为她的丈夫曾在军队里服过役。中央情报局的这名情报人员在报告中特别提到：“这些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了逃避政治活动，从东普鲁士来的。”

1974年以来，一直担任门格尔一案的西德检察官汉斯·埃贝哈德·克莱因对这一事件毫无所知。巴拉圭政府以及新闻界中任何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所谓的费德里西谋杀案。

1974年6月7日，中央情报局的快报中还提到，发现了一系列据说曾与门格尔有来往的人。但每个事例中的姓名均被删除，因此无法查证所说是否属实。例如，有一个人经营一个企业，企业的名称被略去，但又说此人系“一名前亲纳粹分子，据说与门格尔非常熟悉……他说最后一次见到门

格尔是在1970年。门格尔是他家的常客，曾居住在附近的一个叫霍黑瑙的德国人聚居地的一个农场里。该农场属于……”——这里的姓名又被删掉了。这个地名的发音听起来很象“蒂罗尔旅馆”，就是受到那个所谓“十二人委员会”突然袭击的地方。这个消息的提供者似乎是一个名叫阿尔曼多·雷纳茨的比利时纳粹分子，他经营这家蒂罗尔饭店。那个农场主很可能是阿尔班·克鲁格。这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引用同一情报来源的材料说：“门格尔是一个好人，他曾经免费为许多人治过病，他常玩一种叫斯卡特的纸牌，他从不谈论政治。”对这些阿谀之词的来源，人们倒是应该加以考虑。

第二个提供情报的人承认自己内心里仍然是一个纳粹分子。他希望纳粹运动能在拉丁美洲东山再起。他勉强地应承说，如有必要， he 可以与门格尔进行接触。但是，几年前在与德国的一些出版商闲谈后，一名巴拉圭人（职业与姓名均删去）“来到他的房中，提醒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好还是闭口少谈为妙”。他说门格尔还在附近，但是出门时都有保镖跟着。

第三个报告人声称，门格尔经过外科手术整容后，看上去比他的年龄年轻多了。他还报告说，门格尔住在一所由一些“武装的恶棍”保卫的房子里。

第四名报告人则坚持说，他曾看见过警察局里的门格尔档案。最为有趣的是，档案中有一份门格尔在1973年申请巴拉圭护照的文件。据说，档案中还有一张门格尔一岁时的照片。如果这一情报准确的话，那么，这些日期就很重要了，下文将会谈到这一点。

话题再回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份报告上来。这份报

告说，据信恩里克·沃尔曼医生就是约瑟夫·门格尔，与一名贩毒嫌疑分子有关联。这份报告在一些有关的部门中慢慢地传阅着，速度非常缓慢，这些部门有麻醉品管理局、美国海关、国家安全署等。这些部门查遍了他们的档案，却都找不出门格尔从事贩毒活动的任何证据。因此，1979年，也就是这份首先把门格尔与贩毒活动连结在一起的报告提出七年后，中央情报局在其有限的几个核心人物中间提出，“所说门格尔与贩毒活动有联系的问题……经考虑不拟在《国际麻醉品评论》杂志上发表。本局认为，这种文章虽然带有一点似是而非的情报，但是它是以偶然的，而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证言为基础的。因此不能作为一个完善的情报予以发表”。实际上，这一消息主要的提供者甚至还说，门格尔和马丁·鲍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

由于以色列人一心想要争取南美洲的好感，德国人因门格尔下落不明，感到巴拉圭人态度固执而心灰意懒，美国人则对此事不感兴趣，凡事采取应付的态度。因此，真正热衷于追捕纳粹逃亡战犯的只是那些业余的和由私人资助的个人和团体。

其中首先为人所知的人物就是那个曾使以色列大使瓦龙倒楣的图维亚·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23年生于波兰的拉多姆。他说，他在贝乌泽茨集中营里被关押了几年，后逃了出来。他声称，在被关押期间，他曾设法偷听了集中营副总指挥库特·伯茨歇和他的助手威廉·布卢姆的谈话。听到他们谈到故乡，并且记住了这次谈话。

欧洲胜利日后，弗里德曼前往伯茨歇和布卢姆居住的城市，向占领当局告发了他们。两人立刻被押往波兰，在那里

被判为战犯并处以绞刑。

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第一个回合即马到成功，感到兴奋异常。他遂选择以追捕战犯为职业，并自愿为胜利国充当情报人员，混进战俘营去活动。他乔装打扮成一个不幸的士兵，为占领军管当局搜集纳粹战犯的情报，其中包括战犯的名字和住址。

作为维也纳犹太人代表处的一名雇员，弗里德曼采访了一些难民，劝导他们揭露本乡本土的纳粹积极分子。有时，他用一包食物来交换点滴情报。他搜集了许多嫌疑分子的照片，让受战犯迫害的人们去识别。他还查验了许多城市居民的名单。据他所说，他查出了许多通缉犯以及一些应予通缉的人。经弗里德曼查出的战犯中，绝大多数被苏联和波兰当局逮捕，其中许多人被绞死。

到1950年，以色列国已经建立，犹太人代表处不再需要在维也纳设立机构了，于是弗里德曼就带着他在维也纳积累的档案材料，移居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亚德·瓦西姆”雇佣过他一段时间。但是，由于他独来独往继续进行活动，这就惹恼了他的某些同事。他们认为，“亚德·瓦西姆”的职责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要使人们对大屠杀的恐怖永志不忘，而不是充当袭击战争罪犯的总部。最后，弗里德曼离开了这个机构。

阿道夫·艾希曼被捕获后，有一批人出来声称，这次行动应当归功于他们所起的作用。弗里德曼也是其中的一个。实际上，《时代》杂志最初还准备发表一个长篇故事，把弗里德曼说成是一位有待歌颂的英雄。不过，《时代》经过进一步核实后，把他的作用大大降低了。

尽管某些记者和电视播放者仍然把弗里德曼看作是一个

可靠的消息来源，但执法当局则不那么相信他。然而，当弗里德曼开始为追捕约瑟夫·门格尔行动时，他仍然打算从各家报纸那里领取保证金，这就使得驻巴拉圭大使本诺·魏泽尔·瓦龙大伤脑筋。弗里德曼断言门格尔是斯特罗斯纳的私人医生。这种说法使得亚松森的官员们大为愤怒，并矢口加以否认。瓦龙也不怀疑门格尔曾经会晤过斯特罗斯纳。冯·埃克施泰因上校被公认为是个不可信赖的人，他发表声明说，这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曼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有所收敛，还坚持说，门格尔曾用假名前往迈阿密去旅行过几次；1979年，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的特工人员手持逮捕门格尔的证件，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空等了一场。他们坚持说，他们采取行动并不“只是根据一点小情报”。弗里德曼甚至还说，门格尔已经躲到佛罗里达晒太阳去了，同行的可能还有一些当年受他迫害的年迈的人。

这位追捕纳粹分子的积极分子宣称，因为波恩方面已经不再需要引渡战犯进行审讯（据说西德要求不要逮捕门格尔了），美国当局对此要求已表示让步。于是，这位积极分子在美国官员中的声望受到了打击。这也是咎由自取。

与弗里德曼同时开始以追捕纳粹分子为业的还有西蒙·维森塔尔。维森塔尔是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奥地利军官的儿子。他是学建筑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波兰的利沃夫市挣得一份工作，以充当机械师为生。起初，苏联人占领了这个城市，抓走了他的继父，枪杀了他的同母异父弟弟。德国军队赶走红军后，又把犹太居民交给当地的凶残的乌克兰人处置。有几次，维森塔尔自己也面临死刑。有一次，只是由于教堂的钟声响了，行刑队才停止枪决，要被枪决的人中就有维森塔尔。

维森塔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集中营中度过的。直到1945年5月才在茅特豪森集中营被美军解放。许多人在获得解放时兴高采烈，但过后对世事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冷漠态度。维森塔尔对此感到愤然。为了使正义得到伸张，便自告奋勇协助各审讯战争罪行的机关进行工作。由于他为在达豪举行的审判收集了很多证据，他认识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职业。

1947年，维森塔尔在林茨成立了他自己的“文献中心”；几年后又在维也纳设立了办事处。这不是因为他在维也纳受欢迎，相反，他在那里不受欢迎。奥地利人认为，他们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是希特勒的受害者。因此，就实用主义地全然不顾这一事实，即在和德国合并的问题上，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投了赞成票。金钱和战后盛行的风尚给他们以新的启迪。从一开始，奥地利就反对向受到本国纳粹分子迫害的人发放补偿金，同时毫无顾忌地向德国要求补偿，把自己放在和以色列等国相同的地位上。德国政府首脑康拉德·阿登纳回答说：“如果奥地利想要索取什么，那我们就把希特勒的骨头送给他们。”但他毕竟也出生于奥地利。波恩还是把三千二百一十万马克付给了他们以前的同犯。这些钱大都用来救济那些在战争中财产受到损失或失去了工作的奥地利人。实际上变成这样一个局面：当地的纳粹分子领到了由于他们支持第三帝国而招致的损失的偿金。结果，给予他们的是偿金而不是惩罚。奥地利的公民支持他们的政府。舆论界也明显地倾向于反对对战争罪行进行审判。许多被告被宣判无罪，他们受到欢呼，人们送给他们鲜花。维森塔尔其人可能有些热情过分；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却不是夸大其词。他说，尽管可能对西德提出种种指责，但

在为希特勒分子的辩护上，再没有比对奥地利做的更卖劲的了。他得出结论，奥地利应当报答他，所以他便在维也纳呆下去不走了；他希望奥地利人能够问心有愧。

维森塔尔为人直截了当，说话生硬，面貌酷似猎犬。他的办公室乱糟糟的，档案材料看来也杂乱无章。不过，维森塔尔却象计算机从储存中提取条目那样，能迅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件。

由于他抨击奥地利人同情纳粹分子，致使他接到了许多恐吓信。因此，他的住宅装上了报警系统，门口的警卫也要求来访者出示证件。他的工作受到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及其在纽约办事处的支持。

拷打、折磨和死刑等使维森塔尔变得坚强起来。他也懂得如何用机智来消除敌意。例如，一群年轻的德国人组织的“条顿社”，邀请维森塔尔去演讲。但是，在他还没有开始讲话时，一名诘难者便站起来说：“维森塔尔先生，您的事情我们都了解。您早餐时吃掉一个纳粹分子，午餐时也要吃一个，晚餐时还要吃一个。”维森塔尔回答说：“您说错了，我的年轻朋友。我信仰的宗教禁止我吃猪肉。”

维森塔尔经历不凡，成绩卓著。他说，他曾协助逮捕了一千多名战犯。他对逮捕安妮·弗兰克及其亲属的秘密警察进行过追踪。他揭露了许多至今仍在为东德政府工作、逍遥法外的纳粹分子。这使东德政府十分恼火。他不断地要求西德政府延长对战犯通缉法令的时效。他还提供情报，导致躲藏在巴西的前索毕堡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长官弗朗茨·施坦格尔落网。他声称，是他揭发了藏在阿根廷的艾希曼。但伊泽尔·哈雷尔说，他并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维森塔尔有时也承认失误。他在《藏在我们中间的凶

手》一书中说，马丁·鲍曼就住在靠近阿根廷和智利边境的地方。但是，这本书出版几年后，他又宣布撤销这一说法：

“所有那些有关他还活着的故事，只不过是一种猜测。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他已于1945年5月在柏林自杀了。”

成功以及伴随而来的声誉，似乎使得维森塔尔有些飘飘然起来。当瓦龙赞扬塞尔日和比特这对追踪战犯的夫妇时，维森塔尔感到不快。因而欧洲的一些记者就说，维森塔尔当时摆出一副架势，好象关于门格尔之流的战犯们的情报，他是独一无二的可靠来源。

他总是有效地利用新闻工具。他的理由是，新闻宣传可以把逃亡者从他们的隐藏地方冲刷出来，并推动各国政府进行清除。他还很富有创造性。比如，当联合国把1979年定为“儿童年”时，他就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库特·瓦尔德海姆，亟力要求施加压力追捕门格尔，因为他对儿童也犯下了滔天罪行。这倒不是一个不合情理的建议，假如把门格尔在死亡营中利用儿童进行试验的罪行公布于众的话。

公平而论，他也爱把话说得太绝。例如有一次他就说，只要调动他在南美洲的各种关系，门格尔就能在二十四小时以内被捉拿归案。当然，这一逮捕计划从未付诸实现。不过，维森塔尔倒是真的不停地追踪着门格尔。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宣称门格尔在智利、巴西、阿根廷、秘鲁出现过，并说他在巴拉圭就有六处落脚点。他在《藏在我们中间的凶手》一书中报道了两例。一例是在希腊群岛，一例则在西班牙，他都交臂失之，险些把门格尔抓获。但是，门格尔的尸体从恩布公墓中被挖掘出来以后，从收集到的证据来看，这个逃犯似乎从来没有到过这两个地方。

维森塔尔也是最初悬赏捉拿门格尔的人们中的一个。他

悬赏，凡因提供情报致使将门格尔捉拿归案者，奖赏五万美元；门格尔如被拘押，所在国警方可获得一万美元福利基金。这笔非同寻常的赏金是由一个私人组织提供用以追捕战犯的。这种做法就进一步使有关门格尔的传说不胫而走。

塞尔日和比特这对法国夫妻强调了他们所遇到的种种对立情绪，以及给那些对自己的同胞和其他国家人民犯有战争罪行的分子予以定罪、要求定罪和定罪时给予指导过程中，他们所碰到的危险。1979年，他们因工作需要前往南美洲，开展逮捕前党卫队旗队长瓦尔特·劳夫和臭名远扬的克劳斯·巴比的运动。瓦尔特·劳夫是用毒气车来灭绝犹太人的罪行中的关键人物。克劳斯·巴比则是里昂的秘密警察的头子，后来又与门格尔相互勾结。

与此同时，对南美洲十分关注的还有“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1978年，这个电视台的人前往巴拉圭拍制一部名为“追捕门格尔医生”的故事片。这部影片概述了门格尔的一生经历，并集中描写了他在巴拉圭活动的情况。制片的依据是伊泽尔·哈雷尔等人的材料。影片的画外音叙述了门格尔在远离“克鲁格的防守严固的农场”的地方行医的情况。格拉纳达电视节目还有一个由自称是约瑟夫·门格尔的巴西人制作的剪辑。这个人的面貌与那个在巴西渡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十七个年头、经证明系在伯蒂奥加海滩溺毙的人的面貌截然不同。但是，那张皱着眉头、留着整洁的短发、蓄有胡子、不带帽子、只穿衬衫的男人的照片一直被当作门格尔的最后一张照片而被一再使用。甚至当门格尔的遗骸在恩布被发现时，《时代》杂志还在其封面上用了这张照片。这些生动的画面据说是1966年在阿根廷的埃尔多拉多拍摄的。据施塔默尔夫妇说，门格尔在这段时间里，总是戴着帽子，身着

一件夹克衫，因此这些照片就更为可疑。

格拉纳达电视台还用这样的说明词来强调门格尔是住在巴拉圭的：“包括最后一任的赫尔穆特·霍夫在内的三任德国大使都对我们说过，斯特罗斯纳总统曾亲自下令，让门格尔必须离开首都亚松森，并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电视台为了强调门格尔的所谓下落，还引用了偷拍下来的采访镜头。恩里克·米勒是一个怙恶不悛的德国移民。他在亚松森被人普遍叫作“纳粹分子米勒”。此人在摄影机前滔滔不绝地说，他“每周、每月都见到门格尔，……我们每个月定期见面，一起玩牌”。米勒说，四个星期前他还见到过门格尔。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六十分钟节目”中，播放了他们自己制作的有关追捕门格尔的节目，致使美国大使罗伯特·怀特于1979年4月打电报给美国国务卿：“自十七个月前上任以来，我参与了门格尔一案，曾与政府官员、六名或八名外国记者、几个国家大使以及犹太社会中的一些人士，就纳粹战犯约瑟夫·门格尔的下落问题，进行过会谈。政府官员承认，门格尔以前住在巴拉圭，但又说，他多年前就已离开该国，他们对于他的下落一无所知。欧洲各国大使中无一人确切知悉门格尔是否还住在巴拉圭。犹太社会中的人士也声称对此毫无所悉。曾经访问过我的记者们到巴拉圭来，想找到门格尔，并给他拍照。就我所知，迄今尚无人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门格尔是住在此地。但也有些人相信，他仍在此地。而且有一、两个人认为，门格尔居住在巴拉圭的几个德国移民聚居地中的一个地方。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并非事实。……如果门格尔想要住在巴拉圭，政府会允许他居住的。”

怀特大使的这番话说得非常明确，就是说那些认为门格尔仍在巴拉圭避难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但他的这一明确声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些拼命想把（这是可以理解的）门格尔送上审判台的人们，仍然对有关门格尔的几乎每一条消息都深信不疑。而巴拉圭政府的性质使得自由调查无法进行。这个国家中的未经特许开发的大片荒野和强大的亲纳粹的德国人聚居地，正是门格尔逍遥法外的理想之所，因此谣传不胫而走。有些误传的消息纯属以讹传讹……那些和门格尔的相貌特征近似的德国移民，自然就会被误认为是这个逃犯。人们街谈巷议，容易把道听途说当成了事实。

但是有些关于门格尔下落的证据，却是别有用心制造出来的，送往美国中央情报局、“穆沙德”，甚至是供格拉纳达电视台使用的藏在暗处的摄影机的假情报。提供这些假情报的人，则是一心想要帮助门格尔，使他逃脱正义的惩罚。

第十二章 南美洲的纳粹主义气氛

如果不了解南美洲的种族集团的情况和政治潮流，对于门格尔何以能够轻易地躲藏起来，当地各国政府和居民何以不告发他，而且还给他以帮助等等，就会使人感到困惑不解。

大量的德国人移居南美洲的时间，可以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1940年，巴拉圭有三万德国人，巴西有九十万，阿根廷有二十万。他们有的出生于德国，有的是德国人的后裔。这些来自欧洲的移民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不愿为当地民族所同化。巴西的布卢梅瑙、霍恩瑙、新汉堡、新德国、威斯特伐伦等城市都是脱胎于这些移民想要保留的原有城市的名称；非常象北美洲的殖民者创建了新伦敦、格洛斯特和新阿姆斯特丹。但是，所不同的是，这些拉丁美洲的移民是在已经确立的西班牙社会中站住脚跟的，而北半球的移民则是扎根在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上。

南美洲的德国人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南美洲的许多社会中，德语比西班牙语更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人通过成百的德国人的学校，积极地灌输第三帝国的社会准则。例如，1936年，在巴西的一千二百六十所德国人学校中有注册学生五万人；阿根廷有五十八所，七千二百七十六名学生；智利有四十四所，共四千九百零二名学生；幅员较小的巴拉圭列为第四，有三十一所学校，一千一百六

十一名学生。

纳粹党也在南美洲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1929年，纳粹党的第一个支部不无有幸地在巴拉圭成立，其成员主要是德国人和一些巴拉圭人。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四年的事情。在三十年代，纳粹党的组织就象毒蕈一样在南美洲蔓延开来。

到欧洲的敌对行动开始时，当地的纳粹分子已经有力量支持德国人了。尽管富兰克林·D·罗斯福提出了“睦邻政策”，但许多南美洲人仍然认为美国是一个外国佬恶霸。亲德国的宣传和谍报活动因此有了肥沃的土壤。巴西独裁者赫图利奥·巴尔加斯公开支持轴心国家，只是在德国潜水艇击沉巴西船只，杀害巴西人后，他才改变了这一方针路线。

德国驻南美洲各国的大使馆利用当地德国居民，组成了谍报网。德国军方的情报机关收集了有关美国的进口物资和运输的重要情报。德国的外交官们给特工人员开了成百万比索“见持票人即付”的支票。在巴西，一个入了巴西籍的德国人阿尔弗雷德·温克尔曼和出生于巴西、父母为德国人的费德里科·艾森德歇尔由于充当纳粹间谍而被关押。在巴拉圭，当局一旦明了第三帝国大势已去时，便将一伙庆贺罗斯福总统死亡的人加以逮捕。

欧洲胜利日后，大批德国人成群结队地涌进南美洲，就象大批犹太人涌进后来叫作以色列的那个国家一样，只不过规模小一点。这些人群中，有许多真正的纳粹战犯。古以色列帕乌尔教全体人员大会的二千五百名成员构成了圣保罗市的最大的一所犹太教会。该教会的犹太法学博士亨利·索贝尔估计，有五千名害怕受到起诉的前纳粹分子逃到了南美洲。其中仅先后藏在巴拉圭的就有三百人。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收容这么多的逃亡者。党卫队的江湖骗子弗里

德里希·施文德曾是一个制造假货币的人，定居在秘鲁的利马；瓦尔特·劳夫在智利安了家；拉脱维亚的纳粹总督爱德华·罗施曼在阿根廷和巴拉圭之间往返居住。拉脱维亚纳粹分子赫伯特·库克尔斯，弗朗茨·施坦格尔及其助手古斯塔夫·瓦格纳住在巴西。艾希曼和波兰普热梅希尔集中营头目约瑟夫·施瓦姆贝格尔逃到了阿根廷；克劳斯·巴比则选择了玻利维亚。而门格尔则先后住在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

追踪战犯的人们怀疑说，这些被追捕的逃犯可能受到过（现在仍然受到）一个有组织的阴谋集团（“敖德萨”或“蜘蛛”）的帮助。实际上，随着1985年门格尔的尸体被发现，“经过合乎情理的科学鉴定”后，圣保罗的警察局长罗梅乌·图马立即对美联社记者斯坦·莱曼说，“我相信有一个类似‘敖德萨’式的组织在保护这些逃亡的纳粹分子。拉丁美洲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地点。战争中的种种事件已经过去多年，许多外国人已在此安家落户，他们抱有一种天真的想法”。

后来，图马又撤消了他说过的肯定有一个“敖德萨”式的组织的说法。犹太法学博士索贝尔对于存在一个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网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巴西传统的民族和谐，能够容忍许多思想观点，而且对所有的外国人和新来的移民都同样殷勤友好。

本书作者认为，关于否定“敖德萨”存在的合乎情理的有力论据，可从使这个“组织”出名的人物爱德华·罗施曼事件中得出。罗施曼是苏德台区的德国人。党卫队旗队长罗施曼曾使里加的拉脱维亚犹太人闻风丧胆。据说，他应对大约三万名犹太人的死亡负责。1948年他逃亡阿根廷，化名为费利佩·埃尔利希·普拉特博士。1972年，小说家弗雷德里

克·福赛思把他写成为《敖德萨案卷》一书中的头号反面人物后,罗施曼就臭名远扬了。据说,福赛思是从西蒙·维森塔尔那里弄到许多有关罗施曼的背景材料的。这本书的故事情节是以罗施曼企图使纳粹主义在德国东山再起为中心的。

1976年10月26日,西德政府正式要求从阿根廷和巴拉圭引渡罗施曼,但没有成功。1977年,罗施曼持化名为费德里科·魏格纳的护照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亚松森时,感到胸部疼痛。六十三岁的罗施曼由一个自称为“里奥斯先生”的人送进亚松森的一家慈善医院。罗施曼住院十七天后,因心肌梗塞而死。里奥斯先生在他死前曾去看望过几次。医院的一些职员说,里奥斯看上去象一个德国人,不象西班牙人。但是由于他在罗施曼死后就失踪了,所以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就无法查明了。魏格纳只是在死后才被查明就是罗施曼,主要是根据这名前党卫队军官的特征:右脚缺三个脚趾,左脚缺两个。

罗施曼死亡的本身似乎有助于反驳“敖德萨组织”存在于南美洲这一说法。因为,他是被他的伙伴送进亚松森最差的一所医院去的,而这所医院又是供医学院学生们用穷人进行实习的场所。罗施曼死时身无分文,甚至连一个匿名者都没来探望过。因此,医院只好把他埋到贫民墓地去了。难道一个有组织的,有强大势力的,经费充裕的“敖德萨”对于它的比较受人尊敬的成员不能安排得稍好一点吗?

反对有类似“敖德萨”式的阴谋集团的论点,由于近四十年后仍然没有发现什么确凿的事实,因而就更为充实了。如果真有一个阴谋集团的话,那可以肯定会有秘密特工人员打入,或者被内部不满的告密者所暴露。即便是黑手党,毕竟也屈服于由执法机构控制的间谍和特工人员,美国中央情

报局、克格勃、美国联邦调查局等都有这种能力。门格尔的残骸在巴西被发现后，西德驻圣保罗领事泽普·沃尔克说：

“我认为门格尔之所以能活这么长时间，恰恰是因为并没有什么正式的联络网存在。”

当然，这并不是说，象门格尔这样的战犯在南美洲没有得到真正的援助和安乐。恰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来到南美洲的德国人，总是把对战争罪行的控诉看作是同盟国的宣传，看作是战胜国制造的反对战败国的谎言，看作是战胜国禁止战败国撰写自己的历史。那些战前来到南美洲的支持纳粹运动的移民，只是把战后来的移民当成打了败仗的兄弟姐妹中的一员。对他们来说，纳粹事业仍是富有生命力的。再者，来自东欧的难民是生活在共产党政权的压迫之下的，这就增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第三帝国不管有什么过错，至少它还是坚定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

门格尔受到过许多人的保护，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安慰。这些人对他的经历表示同情，并且持有巴拉圭作伪证者亚历山德罗·冯·埃克施泰因一样的见解。埃克施泰因把共产党人称作真正的威胁，说：“红军中，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是共产党人……是谁杀害了俄国的皇族？是另一种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政委。最大的战犯就是共产党。他们杀害了成百万人，还使成百万人失踪了，而共产党的头目是些犹太人。”

冯·埃克施泰因虽然是上校，但不过是军事指挥部中的一名行政事务官。他是从在查科战争中他的老战友斯特罗斯纳总统那里得到了有关门格尔情况的暗示的。埃德加·L·因斯弗兰在六十年代初任巴拉圭内政部长兼警察局长。他说，1961年德国方面第一次要求引渡门格尔的文件到达后，他曾和斯特罗斯纳总统交谈过。“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是

我们的问题，”斯特罗斯纳说：“那是欧洲人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对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他曾经对大屠杀受害者有六百万人这个数字加以嘲笑。

门格尔住在巴拉圭时，比利时人阿尔方茨·迪尔克斯和这位医生非常亲近。迪尔克斯把纳粹逃亡者盛行的观点概括为，“人们对广岛、长崎、德累斯顿以及其他德国的城市只字不提。在这些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妇女、老人和儿童无家可归；正是同盟国无情的轰炸使他们失去了生命。而战胜国却把责任推卸给被征服国，以求得自己良心的安宁”。

当格拉纳达电视台小组被错误引导，以为门格尔住在巴拉圭时，他们倒了解了当地德国人的态度。“纳粹分子米勒”坚持认为，门格尔“与你或我一样。他当时所做的一切是他的职责。美国人今天的所作所为同样也和门格尔当年所做过的一样，都是血腥的试验”。米勒又进一步讽刺说，他相信门格尔干了对他指控的那些行动，但他又说：“我原准备亲自支持这一行动。我们当时所要做的，就是要清除掉我们社会中的渣滓……如今当我瞧着所有这些渣滓，瞧着他们转来转去的样子，我所能说的就是，门格尔所做的不过是搔搔表面而已”。纳粹德国战败大约已有三十五年，而“无痛苦死亡”却还在蔓延，某些病毒并没有死亡。

威廉·萨森斯是一名在逃的战犯。他声称：“我第一次遇到门格尔是在1949年。从才智的观点来看，他才华横溢，是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高明的医生。”维尔纳·舒比乌斯也对格拉纳达的电视片提出争议，说他不相信门格尔犯有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行。“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说他不可能干那些事情。对此我深信不疑。如果他确实干了些什么，那也只是执行命令而已（这也和艾希曼的‘合理’论

一样)。我只能想象门格尔同其他任何人一样，是一个人……谦虚、有教养、有非常良好的教养，比我们要强多了。”阿曼多·雷那茨是个比利时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武装党卫队服役，后来逃亡巴拉圭，在那里经营蒂罗尔旅馆。他反对对门格尔的指控，他说：“对这个人有什么可指控的？他在集中营里只是一个医生。我们老是听到屠杀犹太人这种胡说八道，你们可能也知道，那只是报纸上这样写的。”

有一名土著巴拉圭商人，他和来自巴西、阿根廷的德国客人打过交道。他说，纳粹精神至今仍没有被连根铲除掉。

“他们许多人在心中仍是一个纳粹分子。你只要和他们谈上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如果他们有机会东山再起，他们还会这么干的。他们对希特勒仍然非常崇敬。”一名德国驻巴西的外交官说，成千上万的纳粹逃亡者到这里，也带来了他们在希特勒时代所接受的哲学思想衣钵。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些思想，他们把它看作是与故国，即他们的祖国之间的纽带而保持着。

门格尔在南美洲所经历的气氛，就总体而言，虽然对纳粹分子表示殷勤友好，却没有七十年代期间和八十年代初，玻利维亚、智利、尤其是阿根廷的独裁政府确实曾与一小撮流亡国外的纳粹分子沆瀣一气（这也包括克劳斯·巴比在内），以保证他们的极右翼的统治。但是，南美洲各国政府在纳粹主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属于失职，而非有意犯罪。拉丁美洲的统治者、“洪达”、独裁者、甚至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没有一个曾经把一名知名的战犯作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出境。顶多是同意引渡，而被驱逐出境者寥寥无几。

如此看来，门格尔所以选择阿根廷作为第一个避难所，就不足为奇了。胡安·庇隆欢迎法西斯分子。如果庇隆及其精神上的继承人能够维持其统治，那么门格尔完全有可能就在那里扎根于一百万德国居民中度过其一生。（甚至今日布宜诺斯艾利斯仍然有专门接待纳粹分子的饭店。）当然，阿根廷人赶走庇隆后，门格尔对于庇隆的继任者是无法信任的。

门格尔把巴拉圭作为他逃亡的下一站，是因为鲁德尔的关系，是因为那里有二十万出生在德国的或德裔移民。斯特罗斯纳也向老牌纳粹分子伸出了友谊之手。再者，这个国家的独裁制度显然稳定，这也使门格尔感到放心。（克劳斯·巴比之流的完蛋，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更迭。）但是，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照他的原名搜寻他，因此他就需要再找一个新的住所了。

现在，需要改名换姓，才能够保证安全。巴西这个地方，特别是事后来看，似乎必然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从地理上看，巴西与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比较，土地荒凉。它大约有美国那么大；居民区稀少，新闻媒介很难达到这些地方，而且治安力量薄弱，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居住在那里，无人前来查问。

巴西人对于意识形态漠不关心，而且有着为避难提供场所的传统。这就保证三百六十万有德国血统的居民有机会抱成一团，相互接近，并且继续保持他们从故国带来的文化和思想。门格尔只要改换姓名，便可万事大吉。在巴西出现战犯或纳粹逃亡分子，对此无人大惊小怪。所以，选择巴西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把门格尔隐藏起来的详细情节仍有待查清。

第十三章 佩德罗先生和巴西的 阴谋集团

为掩护门格尔进行准备工作，再次成为门格尔在南美洲的教父鲁德尔上校的责任。鲁德尔遂与门格尔公司的董事、门格尔一切活动开支的慷慨的提供者汉斯·泽德尔迈尔共同策划。诚然，这两个人完全接受了纳粹的思想体系，他们帮助门格尔，既是在做交易，也是出于本愿。

鲁德尔在旅行中遇到一个名叫瓦尔夫冈·格哈德的奥地利人。格哈德生于莱布尼茨，1949年离开奥地利的格拉茨（这是纳粹战犯从意大利逃亡时的必经之路）前往南美洲。这个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战争后期入伍的格哈德是在热那亚乘船去南美洲的。他走的路线和门格尔的一样，只不过他是在巴西上的岸。圣保罗警察局局长罗梅乌·图马说格哈德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格哈德确实对自己为之奋斗过的事业从未失去信心。他费了不少时间，试图组织纳粹同情分子的集会，印刷有关纳粹运动的宣传品，并把这些宣传品从巴西运往世界各地。然而他却一事无成。有一次他曾说过，他做梦都想用铁钩子勾住西蒙·维森塔尔的尸体，挂在汽车后面，把这个追捕纳粹的家伙拖上几英里。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生性浪漫的人，爱好艺术、音乐和诗歌（更准确地说，他还写过一组完整的赞美月亮的诗歌）。格哈德还喜欢喝酒，喜欢一伙人聚在一起唱歌。

当鲁德尔提议由格哈德去为门格尔寻找一个藏身之所时，门格尔家族对所有的安排进行检查后表示怀疑。格哈德经营生意一再失败，而且又嗜酒如命。他们认为，这些都说明让格哈德去办这件事不妥当。他们还意识到，格哈德可能会对他们进行敲诈。但是，鲁德尔却认为门格尔家族应该同意格哈德去干。也许是因为这个奥地利人表示干这件事可以不取分文；他认为帮助门格尔是一件荣耀之事，远胜过任何报酬。结果，格哈德争得了门格尔一家的同意。此外，门格尔在京茨堡的亲属也从不放过贪图便宜的机会。

于是，格哈德便入了伙。他提出一些可能充当门格尔的房东的人选。其中的一家是他在1956年起就相识的。他认为这家人可以掩护门格尔。他们是格察·斯坦默和他的妻子吉塔·斯坦默。他们是于1948年从匈牙利移居到南美洲来的。格察·斯坦默是一名土木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正在求学，后来当教师。战争后期，他所在的大学搬到德国。正如吉塔告诉笔者的，这对夫妇离开匈牙利，“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们已经被他们统治三年了”。当问到她对纳粹德国的态度时，吉塔令人捉摸不透地哈哈大笑说：“匈牙利人是从远处赞扬德国人的，您明白吗？我们认为，他们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很了不起。但是，这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我们一向是反共的，但我们从不附属于任何政党。我们是保守的，既不右也不左。”

1956年，三十一岁的瓦尔夫冈·格哈德在一次匈牙利流亡者聚会时见到斯坦默夫妇，吉塔是三十六岁，她的丈夫还要大几岁。格哈德并不努力去掩饰自己的政治同情心。但是吉塔说，在那些日子里，谁也不去打听其他流亡者过去的

历史。她认为格哈德很有教养，很有理智。此后，斯坦默便与这个奥地利人不时地相互访问。象格哈德这样一个狂热分子，很可能已对他们进行过充分调查，所以他确信，他们至少对于他的信仰是很同情的。

斯坦默夫妇来到巴西时，除了身上所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起初他们住在圣保罗的一套一个房间的公寓里，靠一个匈牙利基督教组织的救济生活。格察·斯坦默在一家土壤分析实验室从事土地分级工作。后来，他们攒足了钱，在离圣保罗大约二百英里的干旱的“新欧洲”平原上买下了一座十一英亩的农场。这里条件非常原始，而且没有电。

1961年秋天，格哈德又去拜访他们，并对吉塔·斯坦默说：“找个人帮助你们一下，好不好？”格察毕竟离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格哈德又说，他有一个“和他年龄一般大的朋友”，正想要找一个住处。10月间，格哈德便带着他的朋友来了。这个人瘦瘦的，脸色苍白，手上有老茧。格哈德介绍说，他名叫彼得·霍赫比希厄特，是一个瑞士农场劳工的儿子。吉塔回忆说，他来的时候，“带着两只中号箱子，里面装着衣服和书”。他解释说，他需要找一个能够恢复一下身体的地方。他看起来的确象是刚刚大病过一场。

当地人都把这位房客称为“佩德罗先生”。他现在和斯坦默夫妇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占有一个房间，单独有个供他出入的门。他在附近做些不固定的工作，比如，为牛犊接生等。有一次，他给一头公牛做手术，人们发现他的医术非常高超，实属罕见。大约过了一个月后，霍赫比希厄特声称，他对这里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要求能与斯坦默夫妇一道长期住下去。

但农场里有一些劳工却不喜欢佩德罗先生。“我们不喜

欢他。他喜欢支使人。他对农场的活儿一窍不通。”其中一个劳工这样说。斯坦默夫妇似乎也有所怀疑。但是门格尔却消除了他们对自己的反感。他宣布，他要和他们合伙一道去寻找一个新的，条件好些的居住地方。

到了1961年12月，斯坦默夫妇和他们的房客搬到离圣保罗一百英里的塞拉尼格拉镇。在这里，这位被斯坦默夫妇叫做彼得的房客，整天忙着建造一座石头的了望塔。这是由当地的一名石匠，按照“彼得”的严格要求建造的。

从这座位于高山上的了望塔里，可以把周围地区动人的全貌一览无遗。而彼得则在了望塔里消磨了很多时间。吉塔·斯坦默注意到，彼得出门从来都要戴上帽子，穿上外套，把脸藏在衣帽中，只露出一小部分。吉塔说，当初她想询问一下他过去的经历，但格哈德却劝阻说：“还是不知道他的过去为好”。这个阴谋集团的代理人显然想把这个逃亡者的真实身份隐瞒起来，一直到可以肯定斯坦默夫妇完全能够信赖时为止。

斯坦默夫妇和彼得之间逐渐发生磨擦。彼得似乎总改不掉想要支配一切的毛病。他打扰了房东的生活，而且对待这两位农场的雇主和家中的帮手总是颐指气使。吉塔回忆起1963年的一天，她偶然发现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附有臭名昭著的门格尔的照片。人们非常怀疑，这可能是阴谋者们为了表示形势危急，故意在杂志上这样安排的。不管怎样，吉塔发现照片酷似霍赫比希厄特，加上他平时行动诡秘，又精通医术，因此感到惊恐不安。她说，她便大着胆子去问他：“这个人很象你。你这个人也很神秘。”霍赫比希厄特顿时面色发白，一言未发地走出了房间。那天晚上，他向斯坦默夫妇承认，他确实就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

斯坦默夫妇声称，他们要求格哈德把他带走。他们现在争辩说，实际上在以后的十一年中，他们一直试图摆脱这位帮助他们解除贫困的房客。在他们第一次向格哈德提出上述要求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来到斯坦默家。此人五短身材，肥肥胖胖，但穿着考究。斯坦默夫妇只知道他叫汉斯，是从欧洲来的。此人其实就是代表门格尔家族利益的汉斯·泽德尔迈尔。他要求斯坦默夫妇再忍耐一下，而且很可能给了他们钱，让他们克制一些。吉塔说，汉斯先给了门格尔两千元美元，在他察看了周围的环境后，又给了他五千元美元。后来，汉斯和彼得两人一起出去蹓跹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估计他交给门格尔的钱可能还要多一些。

一旦斯坦默夫妇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并接受了这一切后，门格尔所表现的任何的胆怯（不是出于本性的）似乎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着手按照他的准则，试图组织这个房子中的生活。吉塔说：“他说我们对待孩子太宽容了”，应仿效他所接受的严格的教育，虔诚地接受权力主义。“他老是要我们今天开除这个仆人，明天解雇那个佣人，说我们对佣人要求太松了。他还和我的丈夫争论，‘你干那个工作，为什么不多要点钱！’”

据吉塔说，门格尔谈到她丈夫的时候，口气很轻蔑，这使她很恼火。“我对他说，‘你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为什么要躲躲藏藏地活着！你的同胞都有勇气公开地活着，接受审判，有的人还被绞死。我们的同胞，那些非共产主义者，他们被俄国人杀害了。但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男子汉，他们也决不躲藏’。”这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门格尔听了这番话稍感震动，但是他是不容许有反抗的。他举起胳膊好象要揍她，但是没有动手就大踏步地走出了房间。

后来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谈话，门格尔怒不可遏地大声叫喊起来，“你们要是再这么干的话，那我们就较量一下谁强谁弱吧”。他说着就拍拍自己的腰部，好象说他带着手枪。格察·斯坦默用他那套旁敲侧击的办法，似乎一心想激怒门格尔。在晚餐时，他故意询问有关通缉他的问题，经常使得门格尔极不愉快。

据吉塔说，争吵的结果往往是他们又一次向格哈德提出，解除他们的负担。“格哈德说，他要把彼得送往埃及、摩洛哥或利比亚。他所需要的只是时间，以便弄到必不可少的证件。他还说：‘再稍稍等一段时间，再等几个月。你们必须明白，再找个地方并不容易，因为没人愿意要他’。”

没有人需要这个臭名昭著的战犯，这点无疑是格哈德的一个巨大的负担，也是他悔不当初的根源。但格哈德毕竟认为，门格尔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受到不公正迫害的科学家勇士。

不管是否悔恨，格哈德除了要求斯坦默夫妇谅解和忍耐外，还进行过威胁。他谈到，如果报告进了警察局将会有什么危险，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指控犯有窝藏罪。他还指出，他们的两个儿子就会受罪。他还暗示说，如果出卖门格尔，就会激怒在巴西的人数众多的德国居民，这是很危险的。他说，这伙人是拥护纳粹事业的。

正如在京茨堡的门格尔家族所担心的，格哈德办事往往缺乏周详的考虑。他曾打算在恩布镇附近的阿佩塞里卡达塞拉的一间度周末的小屋里举行集会，来推动巴西的纳粹运动，而在这所小屋里举行集会，就可能引起当局的注意。1967年，当圣保罗的警方根据西蒙·维森塔尔提供的情报，在罗梅乌·图马的指挥下抓获了前索比博尔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

长官弗朗茨·施坦格尔时，格哈德气得发火，他决定“一定要帮他点忙”。（这是门格尔亲自对后来和他非常要好的沃尔夫拉姆和荷泽洛特·博塞特这对奥地利人夫妇叙说的。）格哈德通知门格尔说，他打算去警方担保施坦格尔是一个受尊敬的守法公民。门格尔告诉博塞特，他曾劝格哈德，“这样做可能又是轻率从事”，最后终于说服格哈德不再去采取任何可能暴露自己、引起警方调查的鲁莽行动。门格尔当然也考虑到，决不能让了解自己内情的人去为那个众所周知的战犯辩护，这样做会暴露他自己。

由此，格哈德的性子便被摀捺下来，门格尔才得以安安稳稳地和斯坦默夫妇一起又同住了七年时间。1969年，他们一同从塞拉尼格拉镇搬到距离圣保罗只有二十英里的凯埃拉斯。他们的住房位于一块两英亩的宅地上，从此放弃了农场的经营。

吉塔·斯坦默对于她和她的丈夫何以要再次为门格尔寻找避难所，继续让他住下去是这样解释的。她说：“我们被吓住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错事。可是，你和某个人在一个屋顶下同住了那么长时间，也就习惯了。要告发这伙人是不容易的。我们并不喜欢彼得。”（有趣的是，几乎整个世界都已经知道霍赫比希厄特就是约瑟夫·门格尔以后，她还继续把他称为“彼得”。）“他经常闷闷不乐，但他从来没有对我们凶狠过。他有时也开开玩笑（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以前在奥斯威辛也是这样），但通常他总是发牢骚。”

她说的是事实吗？斯坦默夫妇是从共产党统治下逃出来的，这番经历说明，他们在四十年代的匈牙利法西斯运动中，即使不是积极分子，至少也是顺从者。正如前面所说的，要不然格哈德决不会信任他们。因而也可以说，他们收留门格

尔，可能是把他看成是和他们自己一样受到共产党的迫害。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门格尔肯定通过泽德尔迈尔，或者其他的中间人使他们的财产显著地增加了。

这位匈牙利妇女和这位医生之间也可能有过私情，这也不是违背常情的。因为他们相遇时，吉塔只有四十岁，门格尔五十岁。她的丈夫格察又长期在外。沃尔夫拉姆和荷泽洛特·博塞特曾对《尾》杂志记者曼弗雷特·冯·康塔坚持说，这对男女是情人。但博塞特夫妇说，吉塔到了更年期后，再没有性欲高潮了，对门格尔这个性对象也就不感兴趣了，因而这俩人的这段风流韵事也就结束了。博塞特夫妇对于妇女性功能的无知是出人意料的，尽管兴趣在消失，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俩人之间仍有藕断丝连的私情的可能。

吉塔·斯坦默矢口否认她和门格尔之间有任何私情。她还声称，对于门格尔的任何性活动一无所知。“他经常外出散步，走得很远，我不记得他有什么机会干这种事，要不他就是极其谨慎地干的。”她还回想起，门格尔喜欢瞧女佣人的大腿。门格尔死了六年后，警察在他贮藏的一堆药品中发现一包巴西制造的避孕套，里面少了一只（药品堆中还有几个胶囊丸，起初人们以为是按照希姆莱和戈林的党卫队传统发给的自杀药丸，后经鉴定是腹泄药）。

是情人也好，不是情人也罢，反正“彼得”继续给斯坦默全家人的生活添麻烦。“我们的大儿子一点也不喜欢他，”吉塔·斯坦默说：“彼得总是叫他干这干那，差使他。我儿子常说，‘他又不是我爸爸，管那么多干嘛！’”

门格尔还嘲笑他的房东的出身。“他说，”吉塔说：“‘你们是典型的匈牙利人。战争期间，我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伙伴。’”当沃尔夫冈·格哈德和沃尔夫拉姆·博塞特这

两个奥地利人来斯坦默家做客时，他们总是象老朋友似的和门格尔坐在一起，大肆吹捧日耳曼“种族”高贵的品德，而蔑视房东所属的民族。“他们说我们不过是些匈牙利人罢了，”吉塔说：“只有德国人才是诚实的、勤恳的……”

门格尔相信他的那一套发自本能的日耳曼人优越论。这一信念对于门格尔来说，不只是说说，他从未放弃过日耳曼人是“统治的种族”这一观念。他对其他所有民族以及“外来人”一律持以轻蔑的态度。他仍然坚持反犹太主义立场，诋毁犹太人是德国的“外来人”。以色列国，这个他事实上的和想象中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故乡，经过两次战争终于成立了。门格尔对此勉强地承认说，“他们的处境是困难的”。当然，他不会支持他们，而且设法进行歪曲，把问题说成是一个种族问题。他说：“虽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但他们却在打仗。这是兄弟之间的争斗，就象德国和英国之争，虽然他们都是撒克逊人。”

门格尔在主动谈到他经过考虑的意见时说，为犹太人挑选作为家园的这个地方条件很差，气候条件差，而且这里还有持敌意的民族。他说，他主张犹太人应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定居（系印度洋上的法国殖民地，现为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计划”实际上是希姆莱和他的助手们在实行“最后解决”以前提出的一种设想。这个计划是荒谬的，而且不切实际，但它起到了掩盖纳粹分子的真实意图的作用。

对于现在已作为他的家园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他倒是给予了适度的赞许。他说，巴西人心肠好，尽管他们是“浅薄而散漫的”。他讨厌“明天”和“多少有些”这种说法。在门格尔看来，真理是绝对的，实行真理不能等待明天。

门格尔声称，他承认“纯粹的”黑人，而这种黑人在南

美洲却为数甚少，但他谴责黑人和其他种族的混血儿。他对一个女仆这样说，奴隶制决不应该结束。

当斯坦默夫妇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并且同意让门格尔带着他的慷慨赠予进入他们生活后，门格尔让这一家人在晚饭后听无线电广播，或收看电视。在这种场合，他就开始发表他那没完没了的、无边无际的意见。对于美国，除了平时从书本上读到的和在电视中看到的以及那些道听途说的而外，他可以说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美国作一番无所不晓的精辟的分析。他对吉塔·斯坦默说，他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值得一看。遗憾的是，战争使他失去了作为一名交换留学生前去看一看美国的机会。但他又大肆抨击他所认为的美国生活方式。他高谈阔论地说，民主制使一个人的价值降低到了最低的标准，降低到了大众的水平。“人人平等，在民主制度中所准许的事情未免太多了”，而对人实行强制性的规定却不够。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生意问题。一个人的价值，就看他拥有的金钱有多少。”门格尔说的最后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他声称他崇拜他的父亲，他是靠自力奋斗而发家的；这就是说，在他看来，一个人的价值就是根据他积累的财富多少。

门格尔瞧不起那种“任何人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尊重权威的”社会。他在巴西的小山头上从他所躲藏的地方赞赏的是哪一类国家呢？是那种有“一个能够照顾整个民族的强有力的政府”的国家。理想的国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权。这个政权使一个一度成为如此衰弱的国家一举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他坚定不移地崇拜元首。可能是沃尔夫冈·格哈德，也可能是博塞特夫妇曾送给他一盘希特勒讲演的录音带，他对此十分珍爱。这盘录音带重新唤起了他早年

在慕尼黑对元首产生的崇敬之情。

“他从来没有掩饰过他对希特勒的钦佩，”吉塔·斯坦默回忆说：“他说，希特勒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虽然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能够把事情组织得这样完美。他说，许多人都钦佩他。”其他的领袖人物与他相比，则逊色多了。门格尔逃到阿根廷时，胡安·庇隆的政府对于这些纳粹战犯可谓宽宏大量。他的某些成就受到了称赞。但门格尔却说，庇隆的成就是神话，不是事实。另一方面，埃娃·庇隆受到人们的极力称赞，被誉为“伟大的妇女”。门格尔说温斯顿·丘吉尔由于“购买了英格兰”，由于卖掉了英国的贵族遗产而为人们所鄙视。门格尔说他钦佩英国人民，因为他们“沉默寡言，遵守纪律，是忠诚优秀的士兵”。而且还喜欢英国人所具有的传统——而纳粹不得不创造他们自己的传统。他认为约翰·费·肯尼迪聪明，“但不正派”。这种略带轻蔑的评价根据什么，则不清楚。他喜欢戴高乐，认为他是一个权力主义的人物，没有其他领袖人物身上的那种懈怠。

门格尔似乎厌恶新的德国。他从电视或收音机中听到某些事情，或阅读德文报纸时，会惊叫道：“呵，呵！这个政权！太不象话了，它就知道赚钱，国家兴旺，但简直要把老百姓的水平都拉平了。”

他还向斯坦默夫妇谈论他对当代的各类其他事件的看法。当克里斯蒂安·巴那德医生在南非第一次进行心脏移植成功时，门格尔并不很重视。他正确地预料说，接受手术的人活不长，还说这种手术也不是长久之计。对美国人登上月球以及探索宇宙空间，门格尔却表示了他少有的赞同，但又咕咕哝哝地有所不满。他用了“异想天开”这个字眼。他阅读的书籍和文章大多是关于生物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的。他

也喜欢阅读有关音乐会的报道。癌症似乎是能够紧紧吸引他的唯一的医学课题。（他没有利用他的专业所长为周围的人们解除病痛。“如果有人病了，请他看看，”吉塔·斯坦默说：“他总是说‘吃片阿斯匹林吧’。”）

一提起奥斯威辛，总要被门格尔制止。他解释说，当他接受集中营工作的委派时，就保证过永远不谈论那里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位医生不是一个爱犯规的人。

斯坦默夫妇和门格尔一样，都是不爱上教堂的天主教徒。然而门格尔说，他仍然认为自己是这个宗教的教徒。他还对斯坦默夫妇说，尽管教会本身的宗旨是“要人们同登善域，但僧侣统治已经过时了。在现代的生活中，已经没有这种宗教存在的余地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以及他的“大地和平之神”的封号和他的教会民主化，已经很难鼓舞门格尔对罗马天主教的统治者们表示信仰了。

在斯坦默夫妇看来，门格尔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一套强词夺理的见解。“美国百分之七十的军医是犹太人。精神病医生的情况也是这样。到处死气沉沉，人们怀疑一切。我们正处在谎话连篇的时代，这是控制着新闻界的一小撮人所造成的。”门格尔都这么说，这就更不用提某些人了，他们至今还在大谈“犹太人控制的”新闻界。

门格尔甚至进而对他的恩人鲁德尔评头论足起来。“鲁德尔的见解不过是1945年以来给德国青年们灌输的所有那些愚蠢的材料所产生的结果罢了。”实际上，门格尔所以对鲁德尔感到心情紧张，这是与许多事情有关联的。他无疑得知鲁德尔如何把他的产品向门格尔公司出售而索取大笔钱财的；而且也知道，鲁德尔会认为自己获得的超额利润是他为这个家族中的这位败家子服务理所应得之数。再者，鲁德尔

也不是不愿坦率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欧亨尼奥·希门尼斯记得，鲁德尔大谈过德国战败的原因。他说：“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听从一个狂人，一个笨蛋的指挥。”鲁德尔这个职业军人，对门格尔所服役的部门武装党卫队，也加以奚落。

“他们拿着的是最精良的武器，”鲁德尔说：“但他们却不是真正的军人。”

这种说法，很难使门格尔对鲁德尔产生好感。顺便提一下，这位医生也曾向斯坦默夫妇对他的这位保护人作过一番盖棺论定的结论。他说：“作为一名军人和飞行员，鲁德尔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人，他与我不是一类。”

门格尔公司与鲁德尔之间的交易于1969年结束了。但是，这位前德国空军上校仍愿意帮助这个逃亡者。1971年，局势有所发展。门格尔看来需要特别的帮助。但一连串异乎寻常的事件，终于使门格尔与鲁德尔彻底决裂。在这一过程中，另一个躲藏中的战犯又被暴露出来。

尽管门格尔和斯坦默夫妇时有争吵，但凯埃拉斯的这个藏身之处似乎十分安全。沃尔夫冈·格哈德总是来平息争端，不让这家人解体。但格哈德也有自己的烦恼。他在巴西结识的妻子鲁特的胃癌扩散了；他的长子阿道夫也得了骨髓瘤。虽然他是个熟练的修车工，并且能为门格尔所周旋，但他经营的生意却一个接一个地失败。目前，他经营的那个小小的纺织印刷厂已无法维持家庭的需要。家中的两个病人既需要钱，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治疗。于是，他决定收拾行装回奥地利去。

由于不能再指望格哈德帮忙，斯坦默夫妇发现这个性情暴躁的医生越来越无法让人容忍。因此，门格尔家族只好转而求助于鲁德尔。这位前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建议，让门格

尔换个隐蔽的地方，从巴西搬到玻利维亚去。具体地说，就是让他和当时化名为克劳斯·阿尔特曼的“里昂刽子手”克劳斯·巴比结伙。

鲁德尔曾在巴西与巴比做过生意，同时也与另一个在南美洲的党卫队逃犯弗里德里希·施文德做过买卖。施文德此人曾搞过许多计划，其中包括领导伪造英国货币的阴谋计划。施文德一直在秘鲁的利马活动，曾与巴比搞过几笔金融交易。

圣保罗警察局长罗梅乌·图马说，他没有发现表明门格尔居住巴西期间曾外出旅游的任何迹象。但吉塔·斯坦默却记得，格哈德和门格尔曾几次外出旅行，每次时间为三、四天到一周之久。这段时间要访问欧洲似乎太短，但要是短途旅行到巴拉圭、玻利维亚和秘鲁去，则是足够的。所以说，亚松森那家珠宝店的那位妇女可能在1965年见到过门格尔，正如埃克施泰因1965年可能也见过他一样。

至于门格尔是否在玻利维亚见过巴比，这只能是推测，但曾有报道说，他在秘鲁出现过。弗里德里希死于1980年，据说他的寡妻黑达·施文德曾对利马的德国大使馆中她的一位女友说过，门格尔曾和克劳斯·巴比一起在利马看望过她的丈夫。1971年期间，秘鲁警官也声称，门格尔在施文德家中和一家高级饭店中与施文德见过面。

但是，使鲁德尔感到不安的是，门格尔拒绝永远离开巴西，不愿到安全莫测的玻利维亚去冒风险。他可能也考虑到，和克劳斯·巴比在一起，就不可能再继续支配他周围的人了。巴比在玻利维亚有自己的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他曾经帮助训练玻利维亚的特工人员，把他当年用来对付法国抵抗运动的那一套审讯方法教给他们。他可以自由地驾车到处活动并

和玻利维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们打交道。当然，巴比不会容忍门格尔那套凌驾于斯坦默夫妇之上的流氓手段。

当门格尔最终拒绝了巴比认为是他的慷慨友好的邀请时，巴比感到无比气愤，以致于干了一件极为轻率的事情——他以“克劳斯·阿尔特曼”的名字会见了《圣保罗州报》记者。谈话的中心意思是，他声明，“我是一个人，一个不躲躲藏藏的人。”结果，把他自己的身份和住所暴露给他的复仇者——追捕纳粹分子的比特·克拉斯费尔德。

门格尔拒绝去玻利维亚的拉巴斯与巴比合伙，也使鲁德尔大为生气。他断绝了与这位医生的一切往来。这次只好还是由足智多谋的格哈德来挽救局面。他把门格尔和斯坦默夫妇介绍给莉泽洛特·博塞特和沃尔夫拉姆·博塞特夫妇。格哈德是1956年认识博塞特夫妇的，也就是在他第一次遇见斯坦默夫妇的同一年。格哈德对博塞特夫妇显然是绝对信任的。沃尔夫拉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军队里当过下士。他至今仍然对纳粹事业保持忠诚。门格尔和博塞特夫妇一见如故。博塞特夫妇经常带门格尔外出旅游，陪他长时间地聊天，从而使斯坦默夫妇一家能够喘一口气。

格哈德也就在这时结束了他在巴西的事务，到恩布他母亲的坟前告了别，然后带着全家人回奥地利老家去了。

这是1971年的事情。尽管由于门格尔认识了博塞特夫妇，使斯坦默家中的争吵稍稍得到了缓解，但是大声争吵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在一次争吵后，沃尔夫拉姆·博塞特赶忙来到凯埃拉斯进行调解。他说，他把门格尔拽到一边，提醒他记住，他只是这座房子里的一个房客。由于门格尔家族好象已经预付了巴西所在的房地产钱款，所以门格尔根本不买帐。他大声说：“有一半是我的。”他指的是这笔房地产。

确实，门格尔曾在写给京茨堡家中的一封信中谈到，卖掉巴西的房子可收回二万五千美元。后来又发生了一次争吵。事情是这样的：门格尔家族送给格察·斯坦默一辆小轿车，斯坦默马上把它折价换了一辆带有司机的大型车。这种铺张行为自然使门格尔气得发疯。斯坦默认为，他付出了代价，应当得到回报。他用这种话回敬门格尔长篇大论的辱骂。

门格尔说的话并不完全前后一致，他有时也向斯坦默夫妇抱怨说，他在京茨堡的家庭不要他了；随后又故态复萌，虚张声势地说：“我不需要钱，没有钱我也能活着，我能养活自己。”

罗尔夫·门格尔为了自己的目的，这时声称，他们家每月给予门格尔的津贴只有一百至一百五十美元，但不包括泽德尔迈尔所提供的大笔款数，也不包括支付房地产的钱。不论怎么说，根据吉塔·斯坦默的说法，门格尔对于财产和奢侈的生活并不斤斤计较。她说，他喜爱做木工活儿，亲自做自己的床、桌子和椅子。事实上，金钱对他来说确实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因为如果他大手大脚地花钱，就会惹人注意，从而有被人发现的危险。

门格尔不仅是他的巴西房东们的一种麻烦，而且也使他住在德国的亲戚感到苦恼。老卡尔·门格尔去世后，门格尔的弟弟阿洛伊斯就回到德国去管理父亲的公司。他偶然地发现了门格尔写给他的侄子、即门格尔和玛尔塔婚后的继子卡尔·海因茨的信。门格尔在信中，用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行为理论教育这个年青人。阿洛伊斯非常吃惊。他马上写信给门格尔，要他不再与卡尔·海因茨保持任何联系。门格尔回信还击说，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应该和谁通信。虽然这个家

庭一直不断地支持这个躲藏在巴西的败家子，但门格尔兄弟间的联系已断绝了。

门格尔不加收敛，仍然试图对他所能接触到的任何人进行控制，即使通过写信也是如此。例如，他为汉斯·泽德尔迈尔的一个孩子制定了一个完整的教育规划。尽管这个孩子还在上中学，门格尔就决定他将来应成为一个法学理论家，甚至为他指定了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门格尔在一封信中不无哀怨地询问他的这个博士后补生在学校的成绩：“我在等待你考试成绩的通知，但已经白白地等了几个星期了。”

至于京茨堡方面，他在一封信中抱怨说，“他们为什么不根据我的观点寄来一本他们喜欢的书。我对政治局势的分析不感兴趣。我对他们自己的活动、计划、希望的消息则比较感兴趣……”对于象门格尔这样的妄想狂来说，看来只有在—一个他可以完全进行控制的世界里，才算真正安全。

对门格尔的行踪加以保密的那个阴谋集团是利用邮政信箱进行联系的。格哈德和博塞特夫妇的信箱在巴西，泽德尔迈尔的信箱在德国。他们还设计了一种密码。通信中称门格尔为“P”；罗尔夫为“Ro”；塞拉尼格拉的住宅为“塞图1”；凯埃拉斯为“塞图2”。鲁德尔被称为“好同志”。泽德尔迈尔曾微妙地把鲁德尔的情况这样通知博塞特夫妇：

“由于好同志要做他自己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再与他进行更多的接触了”（这大概是指鲁德尔为销售产品向门格尔公司索要高价）。

凡是在门格尔家中或者在德国的代理处出现过，以及声称与巴西阴谋集团相识的陌生人，都被拍了照片，并航寄到巴西去核对。反过来，凡是与巴西的这伙人接近，并声称与

京茨堡有联系的人也被拍了照。

1974年，斯坦默夫妇与门格尔终于分裂了。他们在圣保罗山上买了一块土地，租赁了附近的一所房屋，开始建造一座能够容纳他们全家的房屋，包括他们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在巴西商船队上任职的儿子和未来的儿媳们。门格尔在博塞特夫妇的监护下，仍然在凯埃拉斯住了几个月，然后就搬到圣罗保郊外多拉多区的一幢有五个房间的住宅里去了。

第十四章 最后的岁月

在一些关于门格尔在巴西生活的报道中，他被描写成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人，时刻害怕被犹太人抓走或遭暗杀。有一名女仆曾说，他睡觉时身边总放着一支手枪。但吉塔·斯坦默从未提到过这一点。她描述说，门格尔对每一个人都怀疑，而不是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他那表面上的妄想狂会突然发作——好象外面真的有人要抓他。

吉塔还叙述说，无论何时，只要报刊上一出现有关门格尔的消息，或者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中谈到他，他就会当众激动不安起来，露出紧张的神情。但是，对他的谈论时多时少，当他的名字不为公众注意时，他就感到心里踏实了。

但他总是被忧虑不安折磨着，慢慢地形成了一种神经质的习惯：爱把胡子尖咬掉，并吞咽下去。结果便出现了医生们所谓的毛粪石，相当于猫的肠道内的毛团，需要作手术，才能从他的直肠内把这种毛粪石取出来。

沃尔夫拉姆·博塞特说：“他心理变态，一走出房子就害怕。不论他坐车到什么地方去，总是用手把脸捂住。实际上这样做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心理变态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总是觉得每个人都在瞧着他。我对他说，这样做很显眼。于是，我开始比较经常地带他到公共场所去，看看电影，逛逛商店。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时，他往往紧张得直冒汗。”

博塞特夫妇还交给他们的两个孩子一项任务，就是让他们带着门格尔走出密室，到外面溜溜。有几个星期，他们领着门格尔到圣保罗地下铁道去。他们从铁道的这一头乘车坐到另一头，用这种办法来克服门格尔的“广场恐怖症”^①，克服他害怕外出的变态心理。博塞特的孩子们不象斯坦默的儿子们，他们渐渐地和门格尔要好起来。门格尔给他们做了一只小船，带着他们在附近的比林斯水库划船。

位于多拉多区的埃斯特拉达—达阿尔瓦兰加大街上的这所小小的住宅，有两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一间客厅，一间厨房和一间浴室。在房后的一块空地上，门格尔又盖了一套适于佣人居住的小房子，包括一间卧室，一间更衣室和一个洗澡间。在靠近天花板的一块墙壁嵌板处，他修了一个吊饰，是一个隐蔽的空地方，他可以把文件藏在这里。在他的尸体被发现后，警察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他所藏的一堆药品的。

沃尔夫拉姆·博塞特每周一次前来吃晚饭。在博塞特面前，门格尔总自认为是他的导师和领袖。而博塞特也甘居下位，充当学生。“因为他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与之谈话，他就向我谈起他的家庭情况，谈到他的家族历史中的种种传说，等等。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说，他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要不然，他就是装出这副架势）。所以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他在我所受的教育和作为一个人的发展中，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

门格尔唯恐被人发现的这种胆战心惊的状态并没有得到

① 精神病的一种。——译者

缓解。有一次，京茨堡的家人干了一件糟糕的事情，使他更加不安。门格尔曾要求家中给他寄些小玩意儿来，以便作为圣诞礼物送人（他和斯坦默夫妇住在一起时，常常在圣诞节时拿出糖果来；他在集中营时就是这样做的）。门格尔公司通常把铅笔刀作为纪念品，送给顾主们。所以，他们这次就往巴西寄了一盒铅笔刀，这使得门格尔又惊又气，因为这些小刀上都刻有门格尔工厂的字样。这种礼物对于他这么一个一直想方设法要隐瞒自己门格尔的真实身份的人，是根本无法送人的。门格尔需要的是一些不带任何会牵连到他的标记的东西。

随之而来的是对门格尔的安全更为严重的威胁。沃尔夫冈·格哈德与门格尔告别时，把自己的巴西外侨身份卡交给了门格尔。门格尔把格哈德的照片揭下来，换上了自己的。这在当时看来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当然，至于证件上载明的身体情况和指纹是无法篡改的。但门格尔认为，只要相片差不多，就可以混过一般的检查。但是，1976年当局决定彻底更换身份证。这时，门格尔就不可能亲自去政府官员那里冒充格哈德了。

于是，门格尔只好向正在欧洲的格哈德求援。门格尔运气不佳，这个奥地利人此时正对门格尔家心怀不满，虽然他对这个家庭中躲在多拉多区的这个逃亡者并无敌意。格哈德象过去一样，急需要钱。1973年，他想出一个主意，准备做装有偏振片的照相机的买卖。但是，要从事这一投机生意，需要大约三万马克，即一万美元左右。当他去京茨堡请求资助时，门格尔家族更加确信，他是个敲诈犯，因此拒绝见他，只拿出一千马克，即几百美元。

这使格哈德十分愤怒。于是，他写信给博塞特，把这件

事情告诉他。格哈德坚持说，斯坦默夫妇和门格尔第一次从新欧洲搬到比较舒适的塞拉尼格拉去的花费，用的是他的钱。

门格尔公司的董事汉斯·泽德尔迈尔受委托出面安抚格哈德。尽管他也对此感到不满，但泽德尔迈尔还是说服了格哈德再一次为门格尔家族效劳。需要格哈德的合作一事及其情况之紧急，充分表明并不存在什么组织完备的“敖德萨”式的阴谋集团。门格尔家族甚至无法弄到伪造的外国侨民许可证，然而其他普通人员却能令人惊奇地轻而易举地弄到这种证件。

泽德尔迈尔精明地安排格哈德到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去和他见面，然后带他作一次短途旅行，前去瞻仰“元首”的故居。这一行动是要使这个奥地利人消消火气；此人曾经在圣诞树的树尖上挂过一个卐字来取代那颗通常的星星。他们在这风光迷人的环境里经过长谈后，泽德尔迈尔终于说服了格哈德前往巴西，去设法弄一份新的证件。

1976年1月10日，格哈德抵达圣保罗，经过一切必需的程序，终于领到了新的身份证。一得到证件，门格尔立刻用一张与格哈德同一天拍摄的自己的照片换了上去。格哈德在巴西逗留的时间很短，只访问了恩布公墓。他对公墓管理人员说，要在他母亲的坟墓旁边保留一个穴位，以便埋葬他的一个年迈的亲属。这样，格哈德又为将来埋葬门格尔作了安排，然后就回奥地利去了。两年后，即1978年，他显然是在很神秘的情况下死去的。官方的解释是，格哈德站在他的汽车旁边时，心脏病猝发，突然倒下，头撞在地上失去了知觉致死。

就在门格尔的健康状况开始严重恶化的同一年间，阴谋

集团吸收了一些新的，可以说是不知内情的成员。莉泽洛特·博塞特在圣保罗当地的一所学校中教幼儿班。她通过工作，和她的丈夫一道认识了一个学生的家长——埃内斯托·格拉韦。格拉韦是一个出生于阿根廷的纺织工程师，祖籍汉堡。博塞特夫妇把格拉韦介绍给格哈德。格拉韦现在说，他对于格哈德崇拜希特勒并鼓吹纳粹主义东山再起，感到茫然失措。他争辩说，他总认为格哈德“神经有点不正常”。

然而，沃尔夫冈·格哈德1976年在圣保罗短暂停留期间，请格拉韦偶尔照顾下一位年事已高的奥地利人。这位纺织工程师表示同意。他说，因为“我乐意帮助我的同胞”。门格尔这时用的名字是彼得·格哈德，也就以此名字被介绍给格拉韦。

格拉韦在他的儿子诺韦尔托的陪同下，定期去看望彼得·格哈德。他们一面交谈，一面吃饼干和巧克力。彼得很少主动谈他一生的具体情况，只是说他曾在德国军队中当过医生，谈到过前线伤兵们的事。格拉韦说，他怀疑彼得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后来有一天，他吃惊地看到博塞特夫妇也来了。他说，他并不知道他们也认识彼得·格哈德。

1976年5月17日，诺韦尔托·格拉韦和他的未婚妻正在向这位高龄的长者问晚安时，突然发现他语无伦次、举止失常。诺韦尔托打电话与父亲商量后，便和沃尔夫拉姆·博塞特一起开车把门格尔送进一所小医院。经医生诊断，他患了中风。只是在门格尔向一名美国人缴纳一百美元以偿付最初的费用后，医院才收留他住院。实际上这种支付是违反巴西法律规则的，因为所有交易均须使用巴西货币克鲁塞罗支付。比违反货币法更重要的是门格尔居然有美钞。他到底还有多少，是谁给他的，这些问题当时不清楚，现在仍然不清

楚。

在门格尔住院养病期间，诺韦尔托·格拉韦便搬进了埃斯特拉达一达阿尔瓦兰加大街上他的住宅。病人出院回家后，诺韦尔托留下看护，照顾他。他把彼得说成是“以我为中心”的人。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可能是因为这个青年太随随便便地使用这所住宅了。诺韦尔托甚至还在后院举行野餐会，邀请他的朋友们来作客，其中有斯坦默夫妇的小儿子米克洛斯。米克洛斯不象他的哥哥。当门格尔住在他家里时，他从来没有被彼得所打搅。后来，当吉塔·斯坦默在她的两个儿子进入巴西海军军官学校前，吐露了他家的这位长客的真情时，米克洛斯却回答说：“我从来不知道我们认识过什么有名的人物。”

诺韦尔托说，门格尔实际上对晚会好象很感兴趣。“他老注意年轻女人。”但欢宴的气氛很快消失了。主人的“独裁主义”行为把格拉韦轰跑了。后来，他的父亲老格拉韦声称，他在彼得的住处发现了一本门格尔公司的农场设备产品目录，便开始怀疑彼得可能就是那个闻名遐迩的医生。

门格尔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了。因为这时他有了新的帮手埃尔沙·古尔皮安。她帮他做饭、清理房间，还带他去圣保罗玩。他们还一同下馆子，看电影。古尔皮安碧眼金发，身材窈窕，当时三十多岁。她现在否认和门格尔之间有两性关系。她为彼得·格哈德服务到1978年，她声称要离开他去结婚。门格尔曾要求她留下和他一起生活。但当古尔皮安问他是否愿意娶她时，门格尔却避而不答。也许因为他仍然是玛尔塔的丈夫，所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不能轻易地结婚去冒风险，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亲自携带外侨许可证前去登记处。

有些报道说，他爱上了埃尔莎·古尔皮安。但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一个孤独的上年纪的人非常不愿失去一个可以信赖的管家，同时又是可作伴的人，只不过是这种关系而已。

实际上，约瑟夫·门格尔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深交过。他与“我曾经爱过的唯一的女人”伊雷妮的结合，按时间算，前后有十六年。但自1938年结婚以来，他们只一起生活了两年，他就参加武装党卫队服现役去了。此后一直到1945年，他休假才和伊雷妮共同生活了一小段时间。从战争结束到1949年，他一直在东躲西藏，逃亡阿根廷后，彼此接触又只是书信往来。他和玛尔塔的结合，似乎没有任何热情可言，而且她在南美洲与他共同生活也不到两年的时间。

在他一生的经历中，无论是在中学时代的同学中，在医学院或在军队，还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他都没有遇到一个知心的人。新交旧友，相识的人很多，有迪斯巴赫、冯·弗许尔、鲁德尔、冯·埃克施泰因、斯坦默夫妇、格哈德、博塞特夫妇、埃尔莎·古尔皮安等，他们都不过是他走过小道时的街灯，而不是他人生中的补给站或真正的交易所。格哈德和博塞特之流显然认为门格尔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他们接受了他的那一套权威的宣言，不管这套宣言是多么陈腐和无知。但是，他不能够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人深交并赤诚相待。这样，他就必然不能够去爱他人，只是一味追求自我的满足。他性格上的这种缺点，也是妄想狂个性的一个特色，使他不能重视他人的生活。他对其他人没有感情，所以他能够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那些男女老少，把他们送去处死而丝毫不感到良心上有所不安。

如果说巴西的这个门格尔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制造恐怖的那个门格尔有所不同的话，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现在更是讳莫如深了。汉斯·明希说过，门格尔在集中营时，对事物的兴趣非常广泛，人们可以和他一起讨论问题并且提出相反的意见。可现在，在“彼得·格哈德”的身上，已经找不到一点过去的影子了。

门格尔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品质，也表现在他争取与自己的儿子罗尔夫通信时所作的努力上。罗尔夫在继夫的影响下长大成人，成为一名律师。除了1956年假期，他从没有与父亲通过信。一直到泽德尔迈尔有一次突然去南美洲后，父子之间才开始书信往来。共谋者们在西德的奥格斯堡有一个信箱。信件寄交一个名叫施魏加特的人收，在信封里面另装有一个注明“H先生收”的封口信件。然后，泽德尔迈尔再把这些信件分送给有关的人。泽德尔迈尔也把从德国的回信，转寄给斯坦默夫妇或博塞特夫妇。

门格尔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一方面，我决不可能希望你会对我一生的道路给予谅解和同情。另一方面，我的内心深处也无意要为我一生中在一些问题上所作的任何决定、任何行动或任何关系进行‘辩解’，或表示歉意……我的容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就是说，因为这关系到不容争辩的传统的社会准则，关系到我必然会为接近我的那些人以及我们德国人社会所担心的东西。”门格尔毫不动摇地认为，他在捍卫“不容争辩的传统的社会准则”中的行为是正当的。实际上，根据当时德国的情况，可以这样辩解：（门格尔确是这样辩解的）只要他的那个时代受到谴责，门格尔就难以赦免。他为自己在大屠杀中的行为进行辩护后，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衷心祝愿圣诞节快乐。”

他在另一封信中重复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服务是无可指责的：“我没有丝毫理由要为我的所作所为找借口……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国人民的功利”。

门格尔认为自己无可指责，就要抓住别人的失误进行说教。例如，他严厉批评希特勒的设计师、建筑大师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回忆录。因为这个回忆录批评了希特勒和纳粹政权。门格尔在信中对他的儿子说，施佩尔没有认识到，纳粹时代将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看作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辉煌的时代。

罗尔夫现在说，他已长大成人，又学习法律，因此不那么同意来自巴西的说教，并且通过信件往还进行了大西洋两岸的争论。最后，他对这种信件对话感到不满意，决定亲自去和他的父亲面对面地辩论一番。而且，他不打算改名换姓，便拿着1977年颁发的载有他的真实姓名的护照成行了。他掌握的唯一地址是博塞特夫妇家的圣保罗密苏里大街七号。

沃尔夫拉姆·博塞特同意开车送他去阿尔瓦兰加和他的父亲团聚。“我父亲住的那条大街，”罗尔夫说，“到处乱七八糟，路面没有铺修过（到1985年才铺修了硬路面），尘土飞扬，周围坑坑洼洼，遍地泥泞。街道左右两边是长达一公里的贫民窟，即著名的‘法维利亚斯’。沃尔夫拉姆·博塞特在我父亲的门前停下来。这所房子不过是一座木头小屋。我当时精疲力尽、疲惫不堪。”实际上，哪里有空地，那里就出现“法维利亚斯”。附近有一个贫民窟，并不是说整个地区就是一个贫民窟。位于阿尔瓦兰加的这所房子不是用木头造的，它有光滑的拉毛水泥的外饰。“我首先感觉到的，”罗尔夫说，“是一种陌生感。但是后来看到我的父亲

激动得直哆嗦。他的眼里含着泪水。”罗尔夫说，这所住宅很小，家具也很少——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衣橱。罗尔夫说，由于只有一张床，他的父亲就把床让给他睡，自己睡在地板上。其实，这个住宅有五个房间，而且门格尔还给佣人盖了一个棚屋，棚屋与住宅是分开的。

“1977年站在我面前的那个人，”罗尔夫在《彩色画报》（德国的出版物，罗尔夫的经历在其中连载过）中写道：“是一个提心吊胆的人。”他的父亲胆战心惊，情绪消沉，甚至谈到自杀。罗尔夫说，他的情绪低落并不表示有所悔悟，他不感到有罪。他不喜欢被押上法庭。因为，正如他对罗尔夫所说的，“没有法官，就没有罪行。”只有那些法官才存心进行报复。

一个提心吊胆的、情绪消沉的人的形象与博塞特夫妇所拍的许多照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们所拍的那些照片上，门格尔看起来在微笑，很愉快，好象生活得很美满。确实如此，当斯坦默夫妇在圣保罗邮局偶然遇见门格尔、罗尔夫和罗尔夫的妻子时，吉塔说，她从前的房客把他的儿子、儿媳介绍给他们，似乎极为高兴。当门格尔把埃尔莎·古尔皮安介绍给一个据他说是他的侄子的年青人时，古尔皮安也看出他的心情非常愉快。

在博塞特夫妇进入他的生活之前，门格尔是一直不愿照相的。照相是沃尔夫拉姆·博塞特想把他从他的小天地里拉出来而进行的活动的一个内容。这个亡命者相信博塞特是会谨慎从事的，他显然相信照片不会落入不该落入的人手中。女仆埃尔莎·古尔皮安则不同，她带着她的主人去参加她妹妹的婚礼。后来她注意到，一名雇来的摄影师拍摄欢乐场面，每当把镜头转向门格尔时，他都要躲开，她才明白为

什么门格尔或彼得·格哈德会没有一个镜头。

从博塞特拍摄的照片上看，门格尔已经上了年纪，正在高高兴兴地与家人团聚，仿佛是博塞特家的孩子们的爷爷，在罗尔夫小俩口的面前显得容光焕发。而莉泽洛特拍摄的照片，门格尔的表情是严峻的，几乎是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正心安理得地瞪着世人。他完全能够说得多年以后汉斯·泽德尔迈尔所报道的那番话：“我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人，我只是决定谁适宜去干活。”尽管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把人们送去处死确实可谓他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他居然会对他的儿子说，他的行为不是犯罪，也不是什么过错。

无论这种异乎寻常的推理和自欺欺人的谈话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门格尔在集中营里的行为、他的研究活动以及隐藏在这种活动后面的种族优越论的思想体系并不是他所特有的，而是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德国的科学主流。这种诱惑力是如此之大，甚至连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这样一些著名的精神病学家，都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病态性格，以及什么东西使病态性格相对地排斥文化和环境所造成的病态上；这一主流在门格尔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是令人惊异的，但却是确切无疑的。

在照片上，看起来门格尔很健康，精力充沛，但毕竟显得衰老了。中风症使他的左手扭曲。1978年，他的面部和身上又出现了皮疹，涂上药膏也不能减轻今天人们称之为带状疱疹的那种痛痒。他还常常出现抑郁症，身体日见衰弱，有时几乎跌倒在大街上。

据博塞特夫妇说，1979年2月初，他们邀请门格尔一起前往圣保罗以北四十英里的伯蒂奥加海滩度假，他们在那里租

了一套别墅。门格尔起初不愿去，后来还是同意了。他对他的最后一个女仆伊内斯·梅利希说：“我要去这个海滩，是因为我的生命快完结了。”

伯蒂奥加海滨的沙滩很平坦，坡度平缓渐渐地没入大海之中。你就是走上几百码远，水深也不过到腰部。2月9日，沃尔夫拉姆和他的孩子们，还有门格尔一起迎着浪花蹚水往前走。门格尔一直走到水深没腰的地方。博塞特一时分心往别处瞧了瞧，没有注意他。这时，他的一个孩子突然喊了起来。

门格尔要么是一时没有气力了，要么就是跌倒了，只见他在水中扑打着。博塞特赶忙向他冲过去。他说，他虽然奋力抢救，但门格尔已经气息奄奄，门格尔被抬上岸后，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他的尸体在海滩上放了几乎两个小时，由一名警察看守着。后来一辆救护车，把他拉到桑托斯的验尸处。

圣保罗验尸官何塞·门多萨说，尸体的鼻孔和口内都有白沫，这是淹死的症状。根据这一迹象以及在场目击者的证词，他认为没有理由再进行尸体解剖。他根据随后交来的一些证明文件，照例地签署了死亡证。他拿着死者的证件，没有机会检查，因为仅在一个周末，他就要处理十五到二十例淹死事件。因此大量的事务工作使他无法仔细检查每一起看来没有任何疑点的事件。

第二天，“沃尔夫冈·格哈德”的尸体装棺后送往恩布公墓，葬在格哈德母亲的墓旁。墓地的管理人员全都认识沃尔夫冈·格哈德，因为以前他定期前来看望他母亲的坟。当墓地管理员询问是否可以打开棺材，让老朋友们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时，莉泽洛特·博塞特突然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那位管理员看到她的那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只好作罢，

免得使她更加悲伤。于是，门格尔便人不知鬼不觉地被当作格哈德埋葬了。沃尔夫拉姆·博塞特当时不在场，他因奋力抢救自己的朋友，而病倒卧床好几天了。

当然，外界对门格尔的死一无所知。但消息却在那伙同谋者中间传开了。门格尔死后四十八小时，他的儿子罗尔夫·门格尔再次前来圣保罗。博塞特夫妇向他详细叙述了门格尔淹死以及埋葬的情况。他显然确信他的父亲真的死了。罗尔夫收拾了他父亲的文件、书籍和照片，便返回他居住和工作的弗赖堡了。奇怪的是，阿尔瓦兰加大街上的这所房子竟一直空了六年，无人居住。

1979年8月，发生了另一件与门格尔有关的事件：巴拉圭政府正式撤消了给予何塞·门格尔的公民权。理由是，从1961年起，他有两年以上时间不在巴拉圭。斯特罗斯纳所说的“一旦成了巴拉圭人，就永远是巴拉圭人”这句话，对门格尔也不起作用了。

第十五章 暴 露

1979年，美国国会的五十七名议员向巴拉圭总统斯特罗斯纳提出请求，要求引渡门格尔。美国国会打算为此向他施加影响。来自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曾向参议院提出一项州议案，要求巴拉圭对门格尔采取行动。维森塔尔说，巴拉圭现在取消了门格尔的公民权，这是因为巴拉圭害怕美国会取消对它的援助。但是，美国给予巴拉圭的经济援助最高额不过四百万美元，而一些年来，拨款总数只有五万美元。凭这样一点经援要对一个国家，即便是一个小国施加影响，也是很难办到的。只要内陆国家巴拉圭不幸地四邻非共产党国家，它就不可能得到大量的美援。那么，它究竟怎样摆脱这种局面呢？

巴拉圭是不会屈从于外来批评的，虽然国内的批评也难以听到。格拉纳达电视台的电视片触怒了巴拉圭的官员。内政部长萨维诺·蒙塔纳罗说，“电台的片子是虚构的，和那部描写巴西的电影是一路货”。他指的是《来自巴西的男孩们》这部电影。影片由格雷戈里演门格尔。内容是门格尔用无性繁殖培育了九十四名希特勒的后代。而在另一部电影《马拉松式的人物》中，门格尔显然被装扮成一个“白衣天使”。瓦龙大使含笑指出，美国人只是在看到《马拉松式的人物》中这位“白衣天使”试图谋杀达斯廷·霍夫曼以后，才开始对门格尔特别恼火的。

巴拉圭无论如何要封存它所拥有的有关门格尔的档案。但是，六十年代初，关于门格尔入籍的记载却从巴拉圭最高法院里消失了。怀疑对象是当时的首席法官路易斯·马丁内斯·米尔托斯。由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坚持说门格尔躲藏在巴拉圭，因此，多年来门格尔在巴拉圭一直是人们私下议论的话题。巴拉圭前内政部长埃德加·因斯弗兰回想起在门格尔突然从巴拉圭消失后他与鲁德尔的一次谈话：“我问他门格尔在哪里。他向我保证说，门格尔已不在巴拉圭了。我又追问他更多的具体情况，但他告诉我，‘他已在查科地区的一个大牧场里’”（靠近玻利维亚边境）。

因斯弗兰继续问道：“但他此时在何处？”

“我不能告诉您。”鲁德尔回答说。

于是，因斯弗兰对这位战争中的英雄着实恭维了一番，夸他是“巴拉圭的好朋友”。鲁德尔最后终于让了步，他说：“门格尔在巴西。”

因斯弗兰说，他从来没有向人透露过这次谈话，“因为没有人向我问起过门格尔的情况”。奇怪的是，1985年门格尔的尸体在恩布被掘出前一周左右，因斯弗兰竟对《舵手》报记者提供了这一线索。

回想起来，斯特罗斯纳政府的高级官员知道他们的这位外来公民已经死亡的消息。这一点看来已是相当清楚的了。巴拉圭取消门格尔的公民权所选择的时间，绝不是一种巧合。门格尔只要活着，巴拉圭的官员们就会为他提供公民权和护照，对他加以保护。如果追捕纳粹分子的侦缉人员追踪到巴西，他就可以避到巴拉圭去。但是，在门格尔死后，巴拉圭人就能够对要求取消其公民权的舆论作出某种回答。这是一种愚弄世人的毫无实际意义的姿态。巴拉圭人除了取消

其公民权外，并没有作出要处置约瑟夫·门格爾的任何暗示。传闻失实和制造假情报仍在进行，而且一些杰出人物往往也在这样干。

克拉斯费尔德夫妇在追捕克勞斯·巴比，并把他从玻利维亚押回法国受审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他们又双管齐下，同时在智利追踪瓦尔特·劳夫，在巴拉圭追踪门格爾。西德于1961年曾要求智利把劳夫引渡回德国，但是经法庭裁决，认为追捕他的法令已经失去时效，所以他被免于追究。1984年初，比特·克拉斯费尔德采取了追捕巴比时行之有效的战术，在智利的独裁者奥古斯特·皮诺切克的总统府前组织了一场示威。皮诺切克掌权十年来，智利人不准在从总统府的办公室可以目击到的范围内就任何问题进行示威。但是，克拉斯费尔德在“被拘留和失踪者亲属委员会”的四十名妇女的参加下，开进面对总统府莫内达宫的广场。克拉斯费尔德展开一面写有：“皮诺切克将军，您为何迟迟不把瓦尔特·劳夫驱逐出境？”的旗帜，一些观看者从附近的一家旅馆的窗户里向他欢呼。还有一些标语牌上写着：“智利决不能保护战犯”、“劳夫必须因九万七千名犹太人的死亡受审判”。

过去，当地的犹太人社会一提起抗议就不寒自栗，他们害怕皮诺切克会以进行所谓的政治活动为借口，对他们下毒手。同样，巴拉圭的犹太人社会也担心举行反对门格爾的示威游行，会被说成是反斯特罗斯纳。他们毕竟还得在这个国度里生活下去，而且不愿承受更多的痛苦。但是，当克拉斯费尔德在位于富庶郊区的劳夫住宅前举行示威时，智利的犹太人还是陪同她去了。

对于一个由于丝毫不能容忍不同政见而臭名昭著的政府

来说，智利当局对这次示威作出的反应却是温和的。克拉斯费尔德未经许可举行示威，只对她进行了短时间的拘留，并让她签署一项声明，保证不再采取此类行动；否则，就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比特·克拉斯费尔德回答说：“一个要求将杀害了九万七千人的凶手驱逐出境的人，突然间却面临有被驱逐的可能。”由于劳夫年老死去，这就给皮诺切克政府减少了麻烦。（应当指出，在他死前，曾于1960年和1962年使用自己的护照访问德国，并没有人企图拘押他。）

门格尔还活着，并且很可能住在巴拉圭内地，克拉斯费尔德便从智利飞往亚松森。她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首先您必须找到他的下落。然后再动员舆论反对他。他在南美洲还活着，不过不敢公开露面，也不敢四处乱跑。门格尔与劳夫不同。劳夫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装有电话，您可以给他打电话。克劳斯·巴比在玻利维亚常去德国人的俱乐部，有人看见他在那里唱希特勒的歌曲，喊‘希特勒万岁！’。门格尔则非常谨慎。他确实害怕，不敢公开露面。”至少，她所说的门格尔的生活方式是对的，不过她把时态说错了。

除了几个共谋者和巴拉圭的官员外，每个人从她的答辩中都以为门格尔是在巴拉圭。正是取消门格尔的国籍，并且可能知道他已死亡的那些人向克拉斯费尔德保证说：“只要我们发现他，一定会把他逮捕起来，并引渡给德国。”

与此同时，同西蒙·维森塔尔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在另一条战线紧张地战斗着。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负责人拉比·马文·希尔，在他的助手拉比·亚伯拉罕·库珀的共同努力下，依据“自由使用新闻材料法”，请求政府部门发表一切有关门格尔的文件材料。

作为对其要求的答复，美国政府发表了本杰明·戈比

1947年一封信件副本。戈比在信中说，一名报告人声称，门格尔已被一支美国部队捉获。于是，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的播放者都信以为真，把这个极不可靠的、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编成头条新闻发表出去。戈比现在在以色列定居，他对这封信件的内容确信不疑。

为了对付一个没有选民支持的微不足道的对象而展开一场运动，这种机会对于象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这样一些美国政客来说，并不是没有吸引力的。斯佩克特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所属的青少年犯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曾为门格尔的问题举行过听证会。这些参议员对门格尔具有强烈的反感，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不过，门格尔与一个调查美国青少年犯罪的委员会有什么关系，使人难以理解了。不仅如此，这种调查的目的并不在于进行美国儿童的立法以及解决法律实施时涉及到他们的问题，而是要搜寻所谓门格尔于1947年在美军看押下获释的情报。听证会则重弹戈比信件的老调，以及调查1945年曾在伊达尔—奥伯施泰因（西德）战俘拘留营服役的两名士兵的模糊不清的回忆。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霍华德·梅岑鲍姆和参议员斯佩克特询问证人负责情报工作的助理参谋长、美国陆军中将威廉·奥德姆，为什么不主动地调查这一案件，并要求他说明，对三十八年前释放门格尔一事负责的人员的姓名。如果门格尔真的被关押过，那些有关人员很可能已经死去或早已退休了。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拉比·希尔还在自己的文件中增加了另外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七十年代从巴拉圭送回的那些报告。这些报告把门格尔说成是从事贩毒的“恩里克·沃

尔曼医生”。拉比·希尔声称，西德根据走私毒品罪，将一个名叫里卡多·里芬施塔夫的巴拉圭人关押起来。里芬施塔夫说，他和门格尔关在一间房子里。法兰克福的检察官汉斯·埃贝哈德·克莱因在审理里芬施塔夫一案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说明门格尔与贩毒有关。而克莱因想必很想搞出一些证据来，以便提高他自己的身价。《尾》杂志的撰稿人曼弗雷德·冯·康塔写道，有几个在押犯与他联系，声称他们可以提供有关门格尔的消息。经调查后证明，他们企图以捏造的谎言来换取减刑或金钱。

当局认为，把门格尔与贩毒一事联系起来的说法是“愚弄人的”、“纯属偶然”、“毫无事实根据”、“不得作为有事实根据的情报予以发表”。而声称再次发现门格尔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于当局的这些评价只字不提，不敢发表任何意见。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这类问题上并不过分地胆怯和保守，1985年它就说，这不过是含糊其辞的谣传而已。参议员达马托也对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说，他很快要发表更多的有关门格尔的材料。但是，当笔者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时，他却说所有的材料都被“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弄去了。有人问参议员斯佩克特有无更多的情况时，他可能压根儿就没回答。

由于在一份文件中提到有一个名叫“约瑟夫·门克”的人要求移居加拿大，因而在加拿大北部边境地区引来了一阵骚乱。情报人员怀疑此人可能不是门格尔。而加拿大的报纸编辑却象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对此大肆进行宣传。布赖恩·马尔罗尼总理也宣称正在进行“有力的调查”。在当局肯定了“门克”并非“门格尔”，门格尔也从未打算移居加拿大后，这场骚乱在几周之内即平息下去了。

里根总统的政府不愿立法部门在门格尔的问题上捷足先登，便独自将工作进行下去。司法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命令他管辖下的情报机构进行调查，不仅调查美国军队在战后是否将关押的门格尔予以释放，而且还要在世界各地搜查此人。美国特别调查局局长尼尔·M·谢尔负责这两项任务。该局是美国专门负责追捕战犯工作的一个机构。谢尔派遣美国的执法官到国外去搜集情报。然而在这个案件中，罪行是在另一个国家中犯下的，而受害者中又没有一个人是美国公民，美国司法部如何有权过问此案件，这就弄不清楚了。参议员斯佩克特援引了十九世纪的一个先例，即美国的执法官曾前往南美洲追捕一名歹徒，不过他的罪行却是在美国犯下的。

西德、美国和以色列三国的执法官员就追捕门格尔一事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开得颇有声色。会议的日程和讨论纪要都是绝对保密的。德国的汉斯·克莱因坚持说，他过去的工作所以受到挫折，是由于缺乏来自南美洲的情报。但有几百万德国移民住在南美洲，他的这一说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克莱因还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穆沙德”在搜集情报方面，都拥有非常有效的工具。

回顾各执法机构过去的工作，往往是执行一种防止破坏的任务，而不是去进行富有成效的追捕逃犯的工作。西德人着手此案已有二十五年，除发出一些要求引渡的令状和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那里取得一些证词外，别无其他建树。汉斯·克莱因负责此案已有十年之久。他曾几次利用对德国刑法第五十二条作出歪曲的解释，要求按德国的法律对门格尔的家庭加以保护。刑法这条规定，罪犯的近亲，包括未婚妻在内，有权拒绝作证。但是，据迪特尔·门格尔说，克

莱因并没有设法会见这个家庭的成员，以取得“自愿提供的”消息。迪特尔·门格尔是约瑟夫·门格尔的兄弟阿洛伊斯的儿子。1974年阿洛伊斯死后，他便与堂兄卡尔·海因茨·门格尔共同经营这个家族的生意。执法官们肯定能够审问汉斯·泽德尔迈尔并调查他的活动。

1985年4月号的《明镜》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提到了三个可能知道门格尔下落的人的名字。第一个是与门格尔分居两地的妻子玛尔塔，她实际上可能利用了她那合法的地位（她对询问她丈夫犯罪经历的一个记者发表的回答是：“胡说”）。另一个是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他对克莱因来说是无用的，因为他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对门格尔一无所知。第三个被列入的人是泽德尔迈尔。维森塔尔说，他坚决主张对泽德尔迈尔进行调查。人们认为，通过电话窃听和检查护照，完全有可能揭露泽德尔迈尔和罗尔夫·门格尔所犯的泄露天机的过错。

出席追捕门格尔三国会议的以色列代表是负责追捕纳粹战犯工作的警官麦那克姆·鲁赛克。《耶路撒冷邮报》描述，鲁赛克拥有“一大堆有关门格尔的材料，其中包括他的指纹和一张补牙填料图表”。但是，笔者却没有发现过。牙医的记录已有四十多年之久，只能勉强可用。鲁赛克也发现自己处于守势。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以色列打了三次战争，又要与恐怖分子进行斗争，所以追捕战犯的工作有所松懈。为了国家能生存下去，追捕门格尔之流的工作受到了挫折。正如前以色列大使瓦龙所解释的，尽管巴拉圭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战犯避难所，但斯特罗斯纳的代表能够在联合国中为以色列尽力，所以以色列力图与巴拉圭搞好关系。这本来就是一种恶劣的做法，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也是

一种反面信号，以为以色列转而反对他的盟友了。使鲁赛克感到气愤的是，一些人指责以色列的情报机构“穆沙德”贻误了抓获门格尔的时机。

美国人首先关注的是，他们在约瑟夫·门格尔一案中，又遇到了另一起克劳斯·巴比案件。在那个案件中，美国情报机构雇用了一名知名的战犯进行间谍活动以反对赤色的威胁。美国特别调查局局长尼尔·谢尔的前任阿伦·瑞安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打算进入美国的一万名战犯中，被押上法庭审判的不到一百人；其中只有一小撮人被驱逐出境。调查可能只是着重说明了移民当局和司法部的这一成绩。美国小组首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封锁消息，而司法部长则使政府人士保持缄默。至于根据“自由使用新闻材料法”要求获得有关文件一事，只是得到这样一些老一套的回答：

“本局奉司法部指示，目前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有关门格尔或与政府目前对门格尔罪行调查有关的任何消息。”或者：

“我们认为，发布有关门格尔的任何时期的材料，包括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材料，均将干扰和可能妨碍调查工作。”采取这种关门的态度，势必进一步使传闻失实和制造假情报的做法扩展开来。

不难设想，华盛顿的官员们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声誉感到担心。在美国的任何一届政府中，无论是白宫还是国务院，都没有谴责过门格尔，或者对据说他曾经居住的国家施加过压力。有趣的是，参议员达马托和斯佩克特这两个呼吁捉拿门格尔的共和党人，却没有给他们的领袖里根总统找麻烦，没有去询问他的政府为什么不对门格尔采取行动。

为了把追踪者的历史继续进行下去，比特·克拉斯费尔

德又重返亚松森，进一步推进她所着手的案件。随她同行的有“奥斯威辛儿童幸存者”的成员麦那切姆·罗森萨弗特（他的父母都曾被关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纽约布鲁克林罗马天主教主教管区主教弗兰奇斯·穆加韦罗（他的参加增加了全基督教一体的味道）和布鲁克林区律师伊丽莎白·霍尔茨曼。霍尔茨曼本人是犹太人，而且是孪生子，她作为一名议员曾经倡议组织“特别调查局”。有人说霍尔茨曼女士对此案所以发生兴趣，可能另有目的。譬如她可能想要再度竞选由阿方斯·达马托占有的美国参议院的席位。不管怎样说，巴拉圭政府又一次表现出既彬彬有礼，又态度坚定。他们坚持说，门格尔已不住在巴拉圭了。他们的确作了让步，即：这些外宾们可以监视政府在搜寻他们已声称不在巴拉圭的那个人所作的努力。

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四十周年之际，一些幸存者前往该地举行纪念活动，这就把追捕门格尔的工作推进了一步。前往奥斯威辛的有马尔克·贝尔科维茨、露特·埃利亚兹（她曾弄死自己的新生儿）、维拉·克里盖尔（她在门格尔的实验室里看见满墙挂着人的眼睛的“眼睛墙”）。这群幸存者从波兰前往以色列，那里正举行一次模拟审判。出席的人物有审判过艾希曼的希德翁·豪斯纳、西蒙·维森塔尔、前纽伦堡审判检查官特尔福德·泰勒和历史学家耶胡达·鲍尔。

随着这些事件而来的便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记者们这时纷纷采访京茨堡和南美洲。实际上，搜寻门格尔已成为一种“家庭手工业”了。记者、作家和电视记者川流不息地进出于亚松森的各家旅馆。亚历山德罗·冯·埃克施泰因为其提供的材料索价一千五百美元至三千美元。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向他进行采访，而他却开着车子带着纽约律师

杰拉尔德·波斯纳在巴拉圭各地乱跑。波斯纳则宣称，他已搜集了二万五千页有关门格尔情况的文件并在南美洲采访了二百人。他似乎还成了《时代》周刊的权威发言人，虽然他那二万五千页的证据并未经过严密的审查，弄不清是否确有价值。

波斯纳还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中发表讲话，声称门格尔住在亚松森“近五年之久”，而且有一家人（阿尔万·克鲁格家的幸存者？）最后一次看见门格尔“是在1982年”。结果，门格尔才死了三年（门格尔的尸体是1985年发现的——译者）。波斯纳在其电台讲话结束时说：“我有可靠的证据，我认为它足以证实门格尔在最后的十八个月里到过巴西和智利。”——这其实是死者到处活动的一年。波斯纳还说，他正在和格拉纳达电视台的制片人约翰·韦尔合著一本书，书中“纳粹分子米勒”对这位采访者讲述了一些有关门格尔在巴拉圭的趣闻。

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总统对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发表的讲话，则比较模棱两可，而且也不坦率。他对记者约翰·马丁说：“我是很真诚的。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们也找不到他。”

在门格尔的故乡京茨堡，人们对于所有这一切普遍感到不满——不是对他们逃亡的儿子不满，而是对那些涌入京茨堡前来采访有关门格尔其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经历的那些记者们不满。京茨堡的人们一致认为，如果此人有罪恶，而把他的罪恶归咎于京茨堡，是不公平的。他们说，他毕竟从十九岁就离乡背井，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城镇的声誉，而不是它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居民的行为。

搜集材料的记者们发现了1983年发表的一篇短文《祖国

一片情》，这是约瑟夫·鲍迈斯特写的。他是当地一个研究民俗学的中学教师。文章中有一段谈到门格尔。他在文中对这位本镇前居民流露出的情绪远不是中立的：

“德国人依恋着德国，而你年青时也是这样做的。既然战争一败涂地，你和德国人民都将受到谴责……路德曾经叫喊：‘烧死这些魔鬼！’在学校里呐喊的是，犹太人只认识‘犹太！’据说，任何地方的人都这样说：吉普赛人和犹太人都是寄生虫，哪个国家都不欢迎他们。”

鲍迈斯特继续写道：“在学校时，他就以品行端正而出名，”他难以置信这样的好学生会“堕落成为这样一个恶人。在我看来，”这位中学教师宣称：“那些被德国人民谴责的人，比所有的纳粹分子更要卑鄙，因为他们至今还在要求德国拿出钱来，正如人们所说的，他们才是罪犯！”总之，受害者受到了责备。

京茨堡的市长鲁道夫·科佩尔的椅子后面挂着一幅雾蒙蒙的河景画，画上有一句英文题词：“只有无形的人，才做不到的事”。这句铭言对于这位义不容辞的市长是极大的讽刺。他的反纳粹立场是无可置疑的。他的父亲在战争结束的前几天被纳粹分子杀害了。在柏林出生的科佩尔又是一名中间偏左的政客。而且，科佩尔也感到无形的人（用他的话说是“魔影”）在出现。“一个传说便慢慢地在全世界形成，”科佩尔说：“都说京茨堡是纳粹顽固分子的一个堡垒。京茨堡既不比其他城市坏，也不比其他城市好。”科佩尔对于鲍迈斯特之流不屑一顾。

科佩尔拿出了一份阿洛伊斯·门格尔1965年的声明。这位战犯的弟弟说，由于他是在他们父母家中长大成人的，他无法相信约瑟夫会犯下这种可怕的罪行。但是，阿洛伊斯又说：

“如果有一个我能够信任的人对我说，他确实亲手枪杀或拷打过儿童，那么我就马上与我的哥哥从思想上一刀两断。”可能是在他读了门格尔写给他的侄子卡尔·海因茨的信后，才使他相信，他的哥哥是干得出他被指控的那些罪行的。

当记者们设法找到约瑟夫·门格尔的那些年轻的侄子们（他们现在正管理着门格尔家的公司）时，他们所得到的答复，和阿洛伊斯的声明相似。卡尔·海因茨承认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及其中的种种罪恶确有其事，但对他的伯父即继父的指控，却是“根据不足”。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问迪特尔·门格尔，如果他能够和他的伯父说话，他将对他说明些什么？

“我要对他说，他应该回到这里来，勇敢地对着大家说，我干过或我没干过，把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些可怕的负担去掉。”

在采访中，迪特尔声称：“我想他已经死了。他已经七十四岁了。我在报上读到，大家都在寻找他。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只要他还活着，他们是会找到他的。”卡尔·海因茨还对记者说，他相信他的伯父已经死了。

这两个人实际上已经知道约瑟夫·门格尔已经死了，不相信这一点是困难的。他们貌似坦率的武断说法，也可能是第一次试探性地透露门格尔的死讯。这种透露越来越有必要，因为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越来越大。在此期间，罗尔夫·门格尔却无法找到。

迪特尔在与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马丁谈话时，也流露出他们家庭的怨气。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找到我家来，而且全城的人都要为这个出生在此地、在这里只生活了十八年就离开的人承担责任。有人说约瑟夫·门格尔从我家公司里弄到了钱，或者说他拥有股份，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这是绝对不确实的。”

卡尔·海因茨坚决否认他们的公司曾给予约瑟夫·门格尔以任何支持；而且，对于这种说法也一无所知，即用他伯父继承的那份产业作基金，从中为他提供费用。“如果说，我的祖父有过这种安排，那他是如何安排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他是1959年死的。我和约瑟夫·门格尔从来没有任何接触，我从来没有有意地会见过他。我们没有给他任何钱，更不会从瑞士银行帐户里支付。”对于任何与他相反的说法，他都称之为“无耻的谎言”。

对报界撒谎不是罪行，而报界撒谎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门格尔侄子们的说法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博塞特夫妇和罗尔夫·门格尔都说，这个家庭（没有具体地说是谁）每月给这个逃亡者一百到一百五十美元，而吉塔·斯坦默所说的七千美元现钞肯定不是从汉斯·泽德尔迈尔自己的腰包里拿出的。泽德尔迈尔是门格尔公司的雇主。他的费用中另有一笔是约瑟夫·门格尔的生活费。在巴西的房地产是门格尔出钱买的；送给格察·斯坦默的小轿车也是门格尔家出钱买的；把沃尔夫冈·格哈德从奥地利接回巴西，为这个被追捕的逃犯弄许可证的飞机票肯定也是门格尔家买的。卡尔·海因茨争辩说，他与其继父没有接触。谎话不多，但仍然是谎话。使阿洛伊斯如此激动的那些信件无疑否定了他的说法。然而，门格尔公司的董事汉斯·泽德尔迈尔则公开承认说，他曾几次和约瑟夫·门格尔见过面。事实上，他是自愿为门格尔所有的指控进行辩护的：“我没有亲自杀害、伤害或肉体上损害过任何一个人”。他又说，他没有把犹太人挑选出来送往毒气室处死，他只不过“在兵工厂工作”。

缉拿门格尔的赏价高得惊人。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

尔中心”宣布，有一个匿名团体保证，凡负责合法逮捕并继而引渡门格尔者将得奖金一百万美元。以色列政府另外提供一百万美元。《华盛顿时报》也允诺拿出同样的数目。这家报纸属宋敏蒙收师的联合教会所有。为门格尔的日益衰退的脑袋所悬赏的总额达到三百四十万美元。提出重赏作法的倡始人西蒙·维森塔尔这时却不赞成这种作法：“您不能用钱买下整个国家。”由于每个人都深信这个逃犯现在巴拉圭被保护起来，所以赏金究竟能起多少作用，就很难说了。在巴拉圭这个地方，某个人是不可能以战犯罪名将一名公民逮捕的。但是，高价悬赏捉拿门格尔，仍然成为头条新闻和晚间新闻。

在这种形势下，1985年5月8日这个欧洲胜利日四十周年纪念日来到了。作为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姿态，作为一种政治债务（其意图并不完全清楚），白宫安排里根总统参加比特堡德国军人公墓的典礼。里根总统似乎没有看到，或者是有意避而不看在这一公墓中有四十七个武装党卫队员的坟墓。面对着强烈的抗议，里根总统解释说，“现在，在德国人中，活着甚至记得战争的人已为数不多。成年人中，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人以任何方式参加过战争”。“柏林档案中心”是存放被缴获的德国档案的地方，1953年起即由美国国务院管理。这里有四百五十万活着的西德人的档案材料，他们过去是纳粹党人。所有这些人在加入纳粹党时都已成年。

里根总统为了平息愤怒而把那些死亡的士兵称作受害者，与那些在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人们相提并论，这是一种惊人的对比。鉴于几名死去的党卫队员并不是青少年，而是那些被控屠杀战俘的部队中的老兵，这种对比就更加使人难以接受了。

当埃利·维泽尔戏剧般地呼吁里根总统不要前往比特堡时，他提到了集中营的恐怖：“……那里与世隔绝，无处躲藏。儿子眼看自己的父亲被活活打死而无能为力。母亲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活活饿死。还有门格尔和他的挑选……”。但是，甚至连门格尔的幽灵或者维泽尔的雄辩都未能制止住里根的这一行动。许多欧洲的观察家和某些美国的观察家认为，这种政治姿态是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安排的，因为他当时正面临比特堡地区的选举。

1985年5月25日，巴拉圭《船报》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对阿尔方茨·迪尔克斯的访问记。迪尔克斯说，他是通过阿尔巴恩·克鲁格认识门格尔的。门格尔住在巴西，后来在一次溺水事件中淹死了。他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他说，出于尊重克鲁格对他的信任，所以他一直保持缄默，克鲁格死于1982年。迪尔克斯的说法没有引起各国新闻界和追踪纳粹分子的人们的注意。据《纽约时报》的拉尔夫·布卢门撒尔说，西德人在两个月前截获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巴拉圭的一个德国侨民格特·卢克写给曼弗雷德·勒德尔的。勒德尔是1978年在巴西的蒂罗尔旅馆庆祝希特勒诞辰时的一名客人，此时因企图用炸弹袭击侨民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正关押在西德的牢狱里。卢克在信中通知勒德尔说，“大叔”前些时候“在巴西的海滩”溺毙。西德人推断“大叔”就是门格尔。但是，巴西的官员却说，他们无法验证这一消息，其借口是，“哪一个海滩？我国有一万七千公里的海滩呢。”

但是，在美国，特别调查局把一位奥斯威辛幸存者请到华盛顿去辨认一个老年人坐在游泳池边的那些照片。那个见证人似乎很肯定这个老人就是门格尔。这些照片是1984年在巴拉圭拍的，很可能是从一家意大利杂志上发表的一组照片

弄下来的。

1985年5月31日，西德刑警局的侦察人员敲开了汉斯·泽德尔迈尔在京茨堡的家门，并出示搜查证。这位此时已退休的门格尔公司董事和他的妻子显得很惊慌。泽德尔迈尔冲向衣橱，要拿一件挂在里面的上衣，但一名侦察人员还是设法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搜出了他的1985年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本，上面有些记载是用密码写的。

在一间泽德尔迈尔的妻子占用的房间里，有一些与约瑟夫·门格尔的来往书信以及与巴西的斯坦默夫妇和博塞特夫妇来往信件的复印件。据记者布卢门撒尔说，泽德尔迈尔并不知道他的妻子搞了这些复印件。当侦察人员把这些材料全部弄走时，他对他的妻子大发雷霆说：“你怎么能这么干？”

由于查获的材料中有许多是用密码写的，而且电话号码没有地区号码，破译工作受到阻碍。但西德人能断定，问题的关键在巴西的圣保罗。

据说，圣保罗的察警局长罗梅乌·图马手下的侦探们对“瓜拉拉皮斯650号”这个地区进行了调查。实际上没有这个门牌号码，但从密苏里大街十字路口过去几家，住着一对奥地利夫妇，名叫沃尔夫拉姆和莉泽洛特·博塞特。经过几个小时的盘问，博塞特夫妇顶不住了，只好承认说，他们的朋友彼得·霍赫比希莱特就是约瑟夫·门格尔，他于1979年已在恩布被埋葬。这是1985年6月5日的事情。第二天，警方搜捕了吉塔·斯坦默。当时她的丈夫正在海上旅行，乘的是他儿子指挥的一艘船。

6月7日，巴西人在一群记者、摄影师和电视摄影师们的陪同下，挖出了被当作沃尔夫冈·格哈德而埋葬的尸体。

一名侦察员冲着摄像机挥舞着头盖骨。在场的观察家，包括法医在内，都担心这样乱挖会损坏残骸，从而使鉴定工作更为困难。

没有几天，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专家小组来到现场，准备协助巴西的专家们工作。许多追踪纳粹分子的人士最初的反应是表示怀疑。以色列的伊泽尔·哈雷尔和麦那克姆·鲁塞克都表示怀疑。克拉斯费尔德怀疑这是一个骗局。维森塔尔对此信疑参半。杰拉尔德·波斯纳在电视里说，他和圣保罗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接触过，这位人士谈到，验尸官坚持说，他在1979年埋过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当然，门格尔的岁数要大得多。

谨防受骗是完全有道理的。豪尔赫·卢克想起巴拉圭有一个“死了的门格尔”，后来证明是一个捷克医生。埃尔温·埃德施泰因曾声称，六十年代他在巴西杀死了门格尔。1970年，来自亚松森的一篇报道说，门格尔死了，尸体标写的名字是费洛雷斯。德国—巴拉圭关系协会曾经报道，门格尔于1976年死于玻利维亚，尸体被火化了。还有人说，这个失踪者已在葡萄牙自杀。

许多对门格尔的死持有强烈保留态度的人士感到奇怪，门格尔的亲人和朋友为什么对于门格尔的死只字不提竟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门格尔的家庭却忍受着新闻界人士的不断骚扰和纠缠。约瑟夫·门格尔在德国的律师弗利茨·施泰因纳克曾为许多战犯进行过辩护；他曾答应说，他的当事人一死，他就通知当局。

当维森塔尔获悉，这次调查与往常几次不同，是从西德开始的，而且是根据突然从汉斯·泽德尔迈尔的家中查获的材料，因此，他便开始对这种可能性认真对待了。专家调查

组的第一份报告指明，这个曾与斯坦默夫妇住在一起并受到博塞特夫妇友好照顾的男人，确实是门格尔。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验室主任戴维·A·克朗和美国移民与归化局法庭文件实验室的分析专家吉迪恩·爱泼斯坦都是笔迹专家。他们说，他们“完全相信，毫不怀疑”从斯坦默夫妇和博塞特夫妇那里查出的文件都是出自约瑟夫·门格尔的手笔。

把这些残骸与当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那个神气十足的活人相比较是困难的，可以用来进行比较的档案材料少得可怜。多数的议论集中在骨盆变态方面。因为维森塔尔说，门格尔曾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髌骨骨折。而门格尔的档案只记载1943年夏天，他骑摩托车发生事故，把挡泥板撞弯了。埃拉·林根斯记得门格尔有一次因伤卧床不起，但想不起是什么时候了。谁也找不到他的病历，以说明他作战时受伤以及其他所需要的具体情况。例如，牙科方面的记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材料，而尸首的大部分原有的牙齿都已换成了假牙。

另一方面，法医学专家确定恩布挖出的这具尸体的确切身高，与门格尔的身高恰好相符。死者死亡时的年龄也与这个长期逃亡者一致。尽管牙齿方面的具体情况不详，但调查者宣称：“骸骨的迹象表明，上门牙在拔去前中间曾有一条宽缝。”——这一标记从门格尔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许多认识他的人都谈到这一点。

6月21日，这些科学家发布了一个初步报告，结论说：“在合理的、根据科学可以肯定的范围内，我们的意见还是：这具残骸就是约瑟夫·门格尔的”。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证据就是，用照片所作的一系列头颅，面部重叠的分析——用约瑟夫·门格尔年轻时的头部和面部的照片、博塞特夫妇所拍摄的照片与在恩布挖出的头颅相重叠进行分析。

这种比较有二十四点，其中包括嘴、鼻子、下颏和眼睛等部位。

虽然麦那克姆·鲁赛克似乎已深信不疑，但以色列政府在科学家们提出最后的报告之前，一直持保留态度。其他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调查的结果。当初那位验尸官曾说，他看到的是一个五十二岁将要淹死的人，这就把问题弄乱了。后来，他承认他的这些说法是根据出事时博塞特夫妇对他所说的话，于是问题得到了澄清。其实出事时，门格尔差一个月六十八岁。牙科医生玛丽亚·布埃内·比埃拉·德卡斯特罗对美联社记者说，她在1979年4月，也就是最近确定的门格尔死亡时间两个月后，给一个名叫穆勒医生的病人看过病。她坚持说，穆勒医生就是报纸上照片描述的门格尔那个人。这位病人在候诊室里发脾气，辱骂一位黑人病人。此后，她没有再给他治疗。“他不是那种您轻易能忘掉的人，”这位牙科医生说：“灰白的头发中夹杂着一撮撮淡黄色的头发，一双蓝眼睛游移不定，目光敏锐。”有趣的是，除了门格尔的眼睛是棕绿色外，其他方面倒挺象他本人。

博塞特夫妇雇用了弗拉维奥·马克思律师。这个律师曾阻止过引渡纳粹分子古斯塔夫·瓦格纳；他也是巴西的通缉犯西西里人马菲奥索·托马索·布谢塔的代理人。马克思说，他与《尾》杂志商谈，索价十万美元把博塞特夫妇手里掌握的门格尔的经历连同照片、文件、笔记本以及录音带卖给该杂志（《尾》杂志说，它出价不到十万美元）。马克思还向一家英国电视公司索价两万美金作为采访博塞特夫妇的酬金。但由于门格尔的身价在几周之内急剧下降，最后以两千美元成交。

在德国，几乎是在巴西发现门格尔尸体的消息刚刚传来

时，罗尔夫·门格尔立即声称，这就是他的父亲。他说，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他与此事的关系。他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但是他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即伊雷妮1954年与门格尔离异后和后夫所生的儿子，二十八岁的建筑师廷斯·哈肯约斯和妻子扎比内，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举行了这次记者招待会。他们在会上拿出一份罗尔夫的声明。罗尔夫在声明中表示相信，他的父亲淹死了。然后他说，“向所有的受害者及其亲属表示我自己的以及我们的最深切的同情”。在这个声明中，对于他父亲的行为则只字未提。这也是整个门格尔家族所采取的共同态度。罗尔夫还解释说，六年来之所以迟迟没有透露其父死亡的消息，是“考虑到最后三十年来与我父亲有过接触的那些人们”。

罗尔夫把大约有三十磅重的照片、信件、笔记本和备忘录等材料交给德国杂志《彩色画报》的编辑。他说，《彩色画报》出售这些材料所得的全部收入应捐献给与大屠杀受害者有关系的组织。

无论是《彩色画报》杂志，还是《尾》杂志，要在美国找到一个出售这些材料的现成的市场，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电视的开叫价为六十万美元。那些有权检查门格尔留下的遗物的人，看了这些东西以后，绝大多数认为没有什么重大价值，因而走开了。一位记者说：“如果此人不是门格尔，只是一个老年人坎坷的一生，其实就没有什么价值了。门格尔似乎并不认识纳粹统治集团的任何重要人物，也不了解第三帝国的内幕实情。作为历史材料，这些东西毫无价值。”

罗尔夫以个人名义对《彩色画报》的编辑说：“我没有支持过我的父亲，但是我也不愿背叛他。”凡是与罗尔夫共过事的人，仔细地读了门格尔的材料以后，都认为罗尔夫心

理很矛盾，交织着爱与恨。尽管父子俩只见过两次面，人们发现他完全被这位专横的父亲所支配和操纵了。父子间用密码通信，表明罗尔夫在这个保护门格尔的密谋集团中越陷越深。每当编辑们想对罗尔夫讲述他父亲的具体罪行时，罗尔夫总是说，这些活动不过是“传说而已”。罗尔夫不仅是一个儿子，而且也是一名律师。

当罗尔夫接受德国电视二台的采访时，谈到了他内心尚未解决的矛盾，可是话锋一转又说了这样一些比较沉重的话：“一方面，他是我的父亲。另一方面，对他的指控，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些恐怖的照片总是历历在目，令人无法摆脱。事情终于以这种方式，（即他淹死了）结束，而不是以其他方式，例如审判，尽管审判可能是重要的。因此，我感到非常宽慰”。

采访者问罗尔夫，他作为一名律师，如何将他个人的关系和他的职业上的责任协调起来。罗尔夫回答说，他很高兴他是生活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刑法典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换言之，如果法令解除了他的责任，那他就会从正义的立场来看待一名逃犯。他还这样说，他感到有一种特殊的道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感情，因为“由于我的出身，我已经与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搅在一起了。这也就是我所以遵守一切纪律去进行工作的动机，不是为了消弥往事，而是为了克服它，不仅为了认清个人的行为，而且还要认清产生这些行为的历史的根源”。有趣的是，罗尔夫的这种自我表白，便把自己与那些人分开了，正是这些人想把约瑟夫·门格尔说成是一个孤僻的精神病怪物，以便把他说成与那一代人中的其余的人是毫无关系的。

罗尔夫争辩说，他在信中，以及和父亲面对面的争论中，都无法向父亲表达自己的沮丧情绪：他到过奥斯威辛，“感到十分难堪。我等待他能作些解释。我在希望他说曾不断努力设法离开奥斯威辛，自愿要求上前线。但是，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甚至连谅解都没有达成。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他在和我谈话时，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可能造成一种恨的感觉”。

门格尔的结局令人兴奋，但在这种兴奋中一些令人奇怪的事情被人忽视了。导致发现门格尔尸体的线索，是在他死后六年才找到的，而西德法令规定，对援助重罪犯者提出诉讼的有效期为五年，这难道只是偶然的巧合吗？

首先，要提一下，1985年春天卢克写的那封信。然后是两个多月后，迪克斯在电视屏幕上公开露面。哈肯约斯夫妇又怎么在发现尸体整整四个星期前就租下了那个一楼的办公室？

导致搜查泽德尔迈尔住宅的那些事件，是最奇怪不过的了。官方的说法是，这个前推销员兼门格尔公司的代理人，1984年在一次酒后夸耀自己多年来一直供给门格尔的花费。一位大学教授（在此未提及他的名字）偶然听到了他的谈话。但是，直到1985年，此人才将这番谈话向西德当局报告，因此才于5月31日对泽德尔迈尔的住宅进行突击搜查。

再者，泽德尔迈尔似乎未曾想要隐藏带有罪证的材料。他知道自己是要受到怀疑的，因为1971年克莱因曾讯问过他有关一些刊物的事，还指名道姓说他与这个逃犯有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毫无用途，他的妻子会保留那些写给门格尔和巴西的这一家人的信件的复印件吗？他当着搜查人员的面斥责他的妻子，的确有点演戏的味道。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所谓的向泽德尔迈尔提供情报的人却从未索取过一文酬金。

那个成功地把门格尔隐藏起来达四十年（包括六年是死尸）之久的密谋集团，完全有可能又一手导演了这次大发现。随着1985年盛夏的一天天临近，看来参预密谋的人，没有一个有被检举的可能。鲁德尔已于1982年死了，格哈德死得比他还早四年。巴西的调查人员似乎也无意作进一步的调查。斯坦默夫妇和博塞特夫妇也没受到什么威胁，只是税务官员可能对巴西的那处房地产的所有权采取行动。阿尔瓦兰加的那所房子原来为斯坦默夫妇所有，后来又突然属于博塞特夫妇。门格尔死后，这处产业经京茨堡门格尔家族的允许似乎已被瓜分。

汉斯·泽德尔迈尔看到危险已过，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为门格尔家效劳，已经得到了优厚的报酬。他依然住在京茨堡近郊的繁华地区，住宅宽敞，有一大片草坪和花园。他拒绝与警方合作。“我已经做了我所做的事情，他们再也无法让我对以往的事情承担责任了。”检察官克莱因说，泽德尔迈尔的行动一贯“非常谨慎”（这一评语使人们对暴露他的那种拙劣的作法更加怀疑）。

他根本没有为他过去的行为公开认错。采访他的记者所听到的只是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形容词。发表这种话最保险，但却说明了他的态度：“我可以把门格尔过去所做的，他在奥斯威辛时所做的，他离开奥斯威辛后所做的，统统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会相信我的说法。报纸不会披露真情，因为这不符合犹太人的利益。”

门格尔的家人更不愿提供消息。在这个家庭中，门格尔的直系亲属大约有十二人。罗尔夫曾经把他父亲的遗物捐赠给《彩色画报》杂志，将卖得的款项用来救济大屠杀的受害者。这种姿态现在看来并不那么慷慨。因为，事实上他还保

留了出书和摄制影片的版权。最近有篇报道说，他为此索价五十万美元。

《彩色画报》的一位编辑说，在门格尔家庭内部，虽然彼此之间相互倾轧，但对外却是联合一致的。这番话把这伙人描绘得维妙维肖，他们在支持这名逃犯方面，全都一言不发，不予解释。门格尔公司是通过纳粹的效忠而发达起来的。它参与了德国战后的复兴工作，并且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尊敬。“当我从报上得知泽德尔迈尔所做的这一切时，犹如晴天霹雳。”门格尔公司的一位领退休金的雇员说。“且不说门格尔家族，就说经营这个公司的这些青年，都出生于五十年代，他们对于他们的伯父能有什么了解呢？你们不能因为门格尔的事就控告他们。所发生的这一切，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但是，对于所有这一切，你们还拿不出证据来。”……“门格尔家族一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一名基督教牧师说：“这家公司的声誉也好。”

门格尔家一如既往，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他们并没有因为坚决支持阿道夫·希特勒而受到什么实际的损害，更不用说支持和教唆这个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战犯了。这个家庭对于更大的社会所尽的有形的义务，就是向京茨堡的义勇队捐赠了一辆救火车，向当地的红十字会赠送了一辆汽车、给一所幼儿园以资助。平心而论，他们对于认真干活儿的，也给予优厚的报酬。门格尔家族就是通过现金交易与外界取得联系，他们对这个家族中流浪在外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应当说，他们对于这个流浪者并不慷慨大方。因为门格尔这家人毕竟了解马克的价值。

不妨把问题再转回来。吉塔·斯坦默说：“我要说，我们是情不自禁地被拖进历史中去的，而他们（指博塞特夫

妇)是心甘情愿的。”她的这番表白，给笔者的印象是不够坦率。可以肯定地说，斯坦默夫妇对于被卷入她所谓的“历史”中去，一点也没有表示反对。正是由于他们对此事所牵涉的主要的人物采取的如此态度，以及他们对事实所作的回忆的如此种种说法，才使真相不能大白于天下。不管吉塔·斯坦默几年前是什么感情，但是现在她回忆得知门格尔淹死时的情景，却是微笑着说的。她说：“当时我听说他死了，并不感到悲伤。”

而博塞特夫妇却是另一种态度，他们倒是豁出去了，一直供认不讳。当有人问他，倘若再有机会，而又有被起诉的可能，他是否还会掩护门格尔时，沃尔夫拉姆说：“会的。这是我的性格、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告发过任何人。从不干那种事情，有了一定的私人感情后就更做不到了。我是决不会告发他的。”

莉泽洛特·博塞特还说了这样一番不同寻常的话，来为她的朋友辩护：“他不是把人们送进毒气室，只是挑选去干活儿的人。”最后这句话，许多为门格尔辩解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好象是一个反对诽谤门格尔的联盟给他们寄来一份备用的反证词。至于门格尔的那些试验，她说：“他是在为人类造福。反正那些人都是已被判了死刑的。”

她的丈夫采取了一种高明的办法，以免人们骂他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追随者，他说：“我并不赞美他，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知识渊博，聪明过人。”

第十六章 “最后一个”纳粹分子

“他是一个十足的坏蛋……我有意地违反人们的一惯作法来描述这个神秘的‘名人’。他没有被抓获，这与他的性格有关，此外，大概还要归功于他的那一套讨人喜欢的作法。例如，他答应让儿童们吃上一顿‘可口的布丁’，但说完这话，他就把他们送进了毒气室……他还经常和新到的犯人搭话，问他们是否因旅途劳顿而感到不适。这位医生不仅与他的那些党卫队的同伙有所不同，而且也与所有正常人迥然而异。所以在我看来，这至少说明，古代露天剧场上或基督教神秘剧中的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古代人物，现在可能又一次出现在舞台上……这位特殊的‘医生’徒有人的外表，其实毫无人性……”

罗尔夫·霍赫胡特在他的1964年发表的英文剧本《代理人》中就是这样写的。霍赫胡特赋予门格尔以神秘和邪恶的本性。同样，新闻界在对门格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期和后来的活动的报道中，也塑造了一个大于实体、不合时宜的形象。在历来对从成吉思汗、爱用刺刑的符拉迪大帝一直到希特勒和门格尔之流这些戏剧性的死人贩子的描述中，都能见到这种有损真实的夸大描述的色彩。人们还用同样的手法，把阿道夫·艾希曼夸大地描写成为一个当代的传奇人物；直到汉纳·阿伦特，他才把这个不学无术的奋斗者描写为一个死板、平庸的家伙。

约瑟夫·门格尔有血有肉，是一个犯有真实罪行的真实人物。他并不是电视里的那种只是以杀人为乐的杀人狂。就人们所能揭发出的情况来看，无论他在党卫队服役的时候，或在逃亡的岁月中，都看不出他是忧心忡忡或患了恐惧症，因而神经失常；并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在性方面有什么问题——原教旨主义的精神分析学派们认为这是性挫败——从而使他与其他绝大多数“正常的”男人有所不同。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理论是，虐待者们通过他称之为“加倍”的精神体操，可以有助于克服他们行为的兽性感情在各个方面的表露，从而能给自己生命的丑恶的一面幻造出一个交替出现的、合意的本性。但是，门格尔身上却没有任何迹象，能说明他在奥斯威辛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感情上的突破；他也不致于天真到相信战后会出现重大的和解局面。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医生埃拉·林根斯声称：“我知道，党卫队的队员们几乎每个人都声称他曾经救过某个人的命。那里没有什么虐待狂，从临床诊断的意义来说，属于精神失常而犯罪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都是一些能够明辨是非、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全都明白形势的发展。”

耶胡达·鲍尔在他的《大屠杀的历史》一书中说：“集中营的长官和副长官绝大多数都不是虐待狂，他们也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医生、工程师等，都毕业于中欧各个第一流的大学。”

埃利·维泽尔对于这个问题非常轻描淡写地说：“我认为，那时候的德国文化并没有贯穿以伦理教育。因此，一个党卫队的军官可以在一天之内杀害几百名儿童，而同时又可以奢谈什么诗歌、音乐和哲学。”

根据种种说法，门格尔实际上是“聪明的”。他在逃亡

期间对于政治和人民所作的论断，闪烁着他知识的渊博和未得以发挥的才能。埃拉·林根斯鄙视他，但她却说，如果换个时间，换个地点，他在知识界中可能会有一个光辉的前程。如果第三帝国的所有人员都降低到艾希曼的水平，即犯有一般的罪行，那么，人们对于第三帝国在十二年零三个月中的所作所为的指责和深痛恶绝，就会有所缓和。

《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那些对于门格尔在伯蒂奥加海滩溺死的说法表示怀疑的人，是因为他们感到正义未能得到伸张。《时代》周刊说，人们普遍感到受了骗，因为这个人他的一生中给人们造成了无数痛苦，应该让他也经受一番痛苦的折磨。那些在大屠杀中身心受到摧残的人肯定会感到他们受了骗，因为他们再不能目睹门格尔坐在被告席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局促不安，继而被吊在绞刑架上摇晃的情景了（虽然西德没有死刑）。门格尔的死使无数受害者失去了报仇的机会，使他们无法消除一直积郁于心头的悲痛。只要门格尔，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刽子手的代表人物还活在此世，并逍遥法外，那么人们就会存有一线复仇解恨的希望。

首先，门格尔的死使得世人无法对他进行审判了。对门格尔的审判要比对艾希曼审判的意义更为重要。艾希曼不过是一个远离杀人现场的官僚而已，他从来不是一个决策人物。而对门格尔的审判，则可以起到一个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进行再审查和再解释提供论坛的作用。汉纳·阿伦特曾经尖锐地批评在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认为审判中的那些证词旨在激起人们的愤恨，但与这名罪犯所犯的罪行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然，审判也许不只是对一个受审者个人量刑的问题。有时，在个别情况下，也是一个既惩罚（或免

除惩罚)人,又教育人的道德剧^①。在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犯罪的地方,在文明人长期以来认为可厌恶,而法律却使之合法化的地方,肯定要从更广大的意义上来作证才是适宜的。门格尔对于犹太人,对于其他民族的人的所作所为,在德国并不是不合法的。雷纳·鲍姆在《大屠杀与德国的社会名流》一书中写道,这一切仅仅从道义上说是不正当的;不过,这种道义上的不正当,其含义又是不尽相同的。

来自军队的各阶层德国人,以及医学界、科学界和资产阶级(如门格尔的家庭)中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还有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全都认为“最后解决”的理论及其实施,乃是第三帝国的合法行动。《时代》周刊的文章说,门格尔“玷污了科学……玷污了德国”。但他并没有玷污他同时代的科学家,正是他们为门格尔树立了要忠实遵循的标准。他没有教导、也没有带领那些成千上万的普普通通的德国人,要他们从经济上和专长上来利用这些受难者。在这些德国人中,包括填写证件的职员、开火车的司机、管理营房并把已定死罪的犯人赶入毒气室的士兵等等,他们在看到和自己一样的人遭受污辱,受到摧残,并且根据当时极为人们所推崇的那种“人种学”的信条被杀害时,却一言不发地袖手旁观,表示赞同。

亲眼目睹罪行的人甚至连出庭作证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人们对追捕门格尔的工作提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纳粹主义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首先,是否有类似“敖萨德”这样的组织在阴谋窝藏战犯。爱德华·罗施曼临终前的潦倒和沃尔夫冈·格哈德的贫困状态(据他的女儿说,他死

^① 道德剧系西方中世纪末一种灌输善恶观念的宗教戏剧,又称寓意剧。
——译者。

后只留下一百美元)，使得人们不大相信会有“敖萨德”存在。那些密谋隐藏门格尔的人，看起来并不象是一些属于第一流秘密组织的熟谙世故、训练有素的行动人员。譬如说，一个“敖萨德”组织肯定能设法给门格尔弄到一张身份证，而不需要泽德尔迈尔连哄带骗并用金钱收买格哈德，让他千里迢迢从奥地利赶回圣保罗。其实并没有一个诡计多端的组织在制订一个隐藏门格尔的计划，而是执法机关追捕不力，才使他得以逍遥法外。如果被通缉的是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集团中的成员，或是红色旅的志愿兵，情况就可能不同，因此人们怀疑当局是否曾毫无保留地严密监视过门格尔的家庭。

还有人谈到，是否有一个为前纳粹分子提供照顾和生活费用等一揽子服务的联谊组织。从已经获得的证据来看，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联谊组织，有的只不过是用来对年老的纳粹分子的一般性援助而已。

再者，许多人都询问门格尔是否真的死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中间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那些（如新闻界中就有一些）一心想要让新闻报道不断继续下去的人。例如，一家西德报纸刊载了一个短篇故事，说门格尔还在巴拉圭活着，身患癌症，已经生命垂危。消息来源是一个匿名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国家检查员》这个无聊的小报也登过一条富于想象力的绝妙新闻，它说约瑟夫·门格尔还活着，就住在德国，不过已男扮女装，化名约瑟菲妮·门多察。

如前所述，那些追踪门格尔的人士都仔细地观察门格尔生平的这最后的一章。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承认说，在他们的那条工作线上，有时确实丢失过目标。但是，如果他们出了差错，追踪的人还是会把有关门格尔的报道继续进行下去的。对他

们的一些抱怨，居然与战争期间英国外交部的一个名叫D·迪尤的评论极其相似，他说：“……外交部在这些哭天抹泪的犹太人身上浪费的时间太不相宜了”。话说回来，要是当年这些哭声真的再大一些，也许还能有所作为，从而有可能挽救那些已经死去了的几百万人的生命！

还有一些麻烦的说法也流传开了，就是把门格尔及其伙伴在集中营中的所作所为与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行动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京茨堡有个人在谈到门格尔时这样说：“他也许干了一些坏事，一些对于德国人来说是坏事的事；但是，美国人在德累斯顿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比他好多少。”（实际上，英国人已经把德累斯顿摧毁了。）比利时纳粹分子、门格尔的好友阿尔方茨·迪尔克斯声称：“对于广岛、长崎、德累斯顿和德国其他一些城市只字不提，那里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被杀害，成千上万的家庭在盟国无情的轰炸中被摧毁。”京茨堡还有一个人，按照他的那种为我所用的历史观这样说：“人人都知道他是很残酷的，但是，为什么四十年后还要拿他来编造这么一出把戏呢。”

不错，对德累斯顿、广岛和长崎的攻击死伤了千千万万人，其中包括大量非战斗人员。但是，轰炸的目的是要消灭兵工厂的劳动力，摧毁支持战争的意志，从而使那些领袖们相信：进一步抵抗，将意味着他们的国家彻底毁灭。这些是起着作用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动机。而“特别行动”的杀人和用毒气灭绝人的活动，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与轴心国要打赢这场战争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大规模屠杀还起了相反的作用，它破坏了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和装备的供给，消灭了可能向工厂提供的劳动力。

把门格尔的行为与盟军战略性的军事行动（人们公认

这种行动的确使老百姓受到损失)等同起来的这种道义上的迟钝感,反映了雷纳·鲍姆所说的德国人的关键性弱点,即他们“对于道义漠不关心”。德国人民不会——或者说不能?——承认,以他们的名义所干的粗暴违背了道义的所作所为。正如已提到的,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唯命是从”。

那个诬蔑说四十年后还在“演戏”的门格尔的老乡,回避了真正的问题。“人人都知道,”他说:“门格尔是很残酷的”(这一点还是有争论的,因为现在仍然有人在为他辩护)。

但是,门格尔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是病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一种吸引人的心理失常现象,可以从中大做文章。这种种说法都不是从历史的原委来加以分析的。无论门格尔具有特性学上的何种极端的倾向性,但在他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期间,却是德国的主流及其盛行一时的基调、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也是科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滔天”,并不是根据他自己的、他的导师们的以及德国其他几百万人的标准而言,而恰恰是从他们之外的人们的标准而言的。他过去在德国绝不是一个为社会所遗弃的人。而且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今天他也不属于那些在德国被遗弃的人。大屠杀与门格尔之所以出现,并不是不得其时、不在其位的一个突出例子,事情恰恰相反。而且,埃利·维泽尔以及其他一直在努力对我们重复一句话,即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还会重演,并且是根据同样的理由,而遭受苦难的还会是那些人。这也就是大屠杀绝不应该被淡忘,也不应被宽恕的原因所在。

门格尔及其一丘之貉的同伙们可能在消亡,并且可以

说，他们是他们中间的最后一个代表，一个臭名昭著的代表。但是，这类人现在仍然大有人在。南美洲德国人社会中的成员表现出与希特勒主义的教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是他们还不成其为有形的、有组织的运动。在世界其他地区，在南非，在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间的无人地带，在苏联，在柬埔寨，在伊朗，本国土生土长的纳粹主义分子似乎在取得胜利。在世界范围内，在这块滋润的土地上，当人们对道义日趋冷漠时，再加上有一两个具有菩萨心肠的人物，只管没精打采地朝着他们自己的伯利恒走去。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最后的纳粹分子是不会有在伯蒂奥加的海滩上突然死去的。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EwOTQ1OTl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094592.zip",
  "filesize": 21012788,
  "md5": "11a05a51e9abf0e9856fe285ae5b37e2",
  "header_md5": "c35cb0c07ac7c4a317640103905fa504",
  "sha1": "01ac59ddd54b0934ddbba9de7a5d0b6e2d9751e7",
  "sha256": "c06bf6a943c3c32176384c409f102fd3476caeb65816c15197605fd795f1e661",
  "crc32": 597787409,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2138383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75,
  "pdg_main_pages_max": 275,
  "total_pages": 279,
  "total_pixels": 92133052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